

## 民国时期的房山商业

王绍清 侯之扬

### 概述

原房、良两县历史悠久，古属幽州。两县建置始于公元前200年西汉高祖六年（今之房山县，系1958年房、良两县由河北省划入北京市后合并而成）。位于河北中部，两县四至：东界大兴，南界涿县，西界涞水，北界宛平。据民国十二至十六年的史料统计，房、良两县东西广二百二十七里，南北袤八十里。全境系半山半平原地区，西北高东南洼，有村庄四百零五个，耕地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二十亩，总人口为二十三万三千五百一十一人。境内有永定、拒马、大石、小青四条大河，横贯东西纵流南北。琉璃河设有码头，通商船舶往来于白洋淀和天津。多数十条小河蜿蜒分布境内浇灌粮田。鳧览全境，峰峦层叠，沃野坦荡，景色壮观秀丽，天然地形成依山面水、矿植物自然资源极为丰富的地区。不仅有石灰、煤炭、石料、石板、银粉、磁土、青炭、铁矿石、玻璃石等主要矿藏，还盛产核桃、栗子、杏、花椒、柿子、红果、梨等干鲜果品。其中以栗子驰名中外，始称“良乡板栗”，唐时列为土贡。此外还有丰富的药材、荆条、檀木等土特产。古志亦曾记载：“资源之盛甲京西”、“房山任土详于禹贡宝藏、记于中庸。”

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虽地处物产丰富，也不过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借以生活而已。工商经济十分落后，其地位无足轻重。例如，唐制规定，“士族称为清流，做官称清资官，不许兼营商业，工商算是贱业，不许入士”。如此重本抑末的封建制度，束缚了工商经济的发展。再加之房、良两县是京都通往西南各省的门户，在军事上占有重要地位。从文字记载，由宋至金，一直是你争我夺、战马奔驰的疆场，田园荒芜，民不聊生，经济落后。在民间和市场见到的大多是肩挑叫卖或摆摊经营的小商小贩，以及一些小手工业者。自元、明、清定鼎于燕，房山之煤灰、石料供给京师，工商业才初露头角。其发展期是在清末民初，国内由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扩大，国民党四大家族垄断本的形成，使得我国封建的自然经济遭到了破坏和肢解，初步形成一个带有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商品经济。

鉴于房山自然资源的丰富，自清末民初国内受商战之影响，路政之改革，平汉铁路经良乡、窦店、琉璃河贯通南北，以及琉璃河至周口店、良乡至坨里两条平汉支线于房山境内的筑成，不仅改变了房山交通运输的落后状态，相应促进了工矿业和商业的迅速发展。故山西、四川、江苏、浙江、湖南以及天津、青岛等省、市大工商资本家，云集房山兴建煤矿，大办商业。后本地地主豪绅视农不如工商，也纷纷开煤矿、办铺店与之竞争，此时乃房山工商业发展达盛时期。据《房山县志》（民国十七年版）记载，民国九年（1920年），大矿年产煤约十二万吨，小矿可达五万吨左右，全县合计（一些小煤窑未计在内），年产近七十万吨。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登记在册的煤矿有三、四十个，南北窖到前山、北车营一带山系有小煤窑八十余座。周口店、坨里火车站及琉璃河码头共建煤厂有八十七个，直接运往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在“兴宝公司”煤业联合会的控制下，垄断了房山煤炭的购销。同时德国和日本人来到房山，在坨里、周口店两地，争修高空运煤线路。

由于剥削阶级制度所决定，封建的“重本轻末”制度被打破，又出现“随本勤末”、人竞商利的局面。伴随着工矿业之兴盛，商业跟踵而起，促进房山商业经济形式一变再变。全境生产基地、交通要道、出山之

口随之先后建立集镇、商市十九处，各定集日，远近交错，衔接不暇。据民国十六年房、良两县志记载：“全县有座商五百零四家，行业门类达四十种，其中行业最多者为粮行九十一家，杂货商八十九家，煤商八十七家。”商业的空前发展波及集镇、商市以及农村小的贫苦农民，出现了大量的小商小贩，追集赶市，串村叫卖。抗日战争爆发前，房、良两地商业已自然的形成了以集镇为中心，担担推车的小商小贩为脉络的商业网。

当时，房山和外地有资本者，都热衷于开业易、见利快的商业上，相互竞争，很少有人注意本国和本地区商品生产的发展。恰如民国十六年《房山县志》对当时商业的论述，“吾房小商耳，操奇计赢，仅与本县争蝇头利，鸟足志。虽然吾县商会成立已十数年矣，安知此中，无阜国裕民之豪杰，提之倡之，日求进步，以与东西洋经各国相颉颃哉”。

## 集镇商业的形成

### 一、城关镇

城关镇位于县境中部，县城所在地。随县建置而形成一镇，其商业发达始于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城西十里长沟峪、车厂开设两座较大煤窑，煤质好，产量高，四方煤商云集，销路甚广。琉璃铁路未修之前，运往京师之煤多经房山北关，驼队络绎不绝，且多在北关打店。同时有煤商在西关外开设了几个大煤厂，专供东乡和邻县农民烧煤，买煤之车日数百辆，皆带粮米销于当地，因之商业大兴。据民国十六年的统计，城内有商号一百零九家，分二十九个行业，交易以粮为大宗，故粮行多达二十家。城关镇每旬四个集，逢一北街，逢四西街，逢七东街，逢九南街。

### 二、石梯镇

石梯镇居县城北十四公里，为当时河套沟入京孔道，南窖煤运京必经之路。清同光前运煤驼队、马帮在此歇脚食宿，川流不息，随之商业繁盛形成一镇，有粮、布、席、盐、杂货七家座商。自坨里铁路筑成，煤上火车，驼户大减，坨里站商日盛。虽每旬为集日，互市者大减，粮行、杂货歇业，维盐店尚存，至民国二十六年集市亦无。

### 三、大灰厂镇

大灰厂镇（今属丰台区），居房山偏东北二十四公里，地处半山区，土薄石多，农民素以上山采石烧灰为主要生活来源。清同光前京师建筑取灰于此，有灰窑二十六座，故商业亦繁。但窑、商两业多为外地资本经营，多数劳动人民家无三日粮，因此形成每月单日为集，隔一天一个集，旧历正月初三就开市。集市以杂粮为最多，镇上有粮行七家，药铺一家，首饰两家。自周口店、坨里两站通运，大灰厂之灰窑歇业，其他商亦因俱倒。

### 四、石窝镇

石窝镇居县城西南二十七点五公里，系偏僻近山丘陵地区。因地产汉白玉石，明、清两代凡宫殿陵寝有建筑者皆取石于此，采石工匠运输车马与日俱增，因之逐成集镇。每月三、五、八、十为集日，有座商十九户。民国以后京城无大建筑，所售仅碑石、阶条和农家所用之小型石产品，集期尚称繁盛，平时与乡村无异。

### 五、良乡镇

良乡镇居房山县城十五公里，早期为京都西南最繁华之县，是西南十三省有事京师、文件邮递、方物入贡、餉车转运必经之交通站，故此商业也为之兴盛，有座商六十四家，每旬一、六、三、八为集日，以粮为大宗。

### 六、张坊镇

张坊镇居县城西南四十公里，传说古时为防辽兵，屯兵于此，所住皆为帐房，后演变成张坊由此得名。后经济不断发展，其地又处龙安、拒马、大峪三沟出山之口，因此构成商业经济输出入之集散中心。南通涞易，

北达三坡。其交易，输出以干鲜果品、木炭、香料、荆条、山木、药材为盛；输入以食粮、布匹、食盐为大宗。其兴旺之贸，应属粮食、木炭、红果、柿子、石碾、水磨等为最，有座商十六家，每旬一、四、六、九为集日。

### 七、长沟镇

长沟居县城偏西南二十公里，地势低洼，街心自西至东有道长沟，由此得名。甘池之水通此东南，经胡良过张村汇于拒马，解放前期该镇由两县所辖，东属涿县，西属房山，故有东西长沟之称，是通商运输必经之路。东至琉璃河去京，南至涿县县城通保定，西至张坊可达涞易，北至周口店灰煤区和房山县城，自古为一重镇。商业贸易甚盛，有座商二十八家，粮行六家，杂货八家，药铺二家，饭铺三家，席绳行一家，肉铺二家，布铺三家，酒家一家，烟铺一家，盐店一家。每旬二、四、七、九为集日，上市以粮菜为大宗，粮以小麦、小米、玉米、大米为最，商业经营以粮布杂货居首。

### 八、琉璃河镇

琉璃河镇居县城东南十五公里，古称燕古店，因燕国国都设于董家林，当时燕国官员进都公干在此落脚而得名燕古店，后据河名改称琉璃河，是京南交通要隘。当时其河可行船到保定、天津，商船载百货易灰煤及土特产品于此，春秋季节帆樯鳞集，诚为繁荣房山经济贸易之水陆码头，是当时最为兴盛的一大商镇。有座商八十七家，十八种行业，其中煤商即达十六家，还有过货栈四家，每旬二、四、七、九为集日，自京汉铁路琉璃周支线筑成，琉璃河为京汉铁路之要站，交通更为便利，市面更加繁荣。琉璃河在民国十二、三年间，商业最为兴旺，灰、煤厂，过货栈，设在镇东西两侧的牯牛河和西大河两岸。大桥东设有“接排子房”，来船进街要交一枚钱。去西大河的船只要经过闸口，待来船过后放闸憋水，水长后开闸，重船则取流而下。每天发船时因船只过多，由镇巡警局(十几个人)派巡警指挥行船，按次序开船。镇上“德顺”煤厂最大，“祥茂斋”点心铺生意最好，夜间买点心的船家煤客不断，昼夜营业。房良的盐业总店设在琉璃河码头，由水上从天津塘沽、汉沽运盐至此，店名先为“益照临”，民国十六年后改号为“永七”盐店。当时，琉璃河镇设有“商会”和“煤商公会”两个团体组织，维护两会各自的权益。在民国十几年，两会共同由各商号抽集壮年二、三十人，经过训练组建“商团”，由各号集资买枪子弹药武装“商团”，保护各商号的安全。民国二十八年发大水，琉璃河码头河道被冲毁。时值日军统治时期，在敌经济封锁的严厉控制下，民不聊生，商业日趋下坡，河道无人修复，水运从此终断。

### 九、窦店镇

窦店镇居县城东南十公里，隋末唐初，窦建德曾在此筑城，故取名窦店。古来即为一镇，有十四种行业，四十一户座商，每旬五、十两个集。

### 十、交道镇

交道居县城东十三点五公里，小清河西岸，昔日是个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由此得名。很早即为一镇，有座商十多家，每旬一、四、六、九为集日。

### 十一、坨里镇

坨里居县城北偏东廿点五公里，河套沟出山之口。自周口店获铁路之利，坨里铁路因之而起，光绪二十九年筑成。其商业由此繁盛稍次于周，逐形成一镇。有座商二十九家，每旬三、八为集日。

### 十二、河北镇

河北居县城西北二十公里，是河套的中心点，是通往霞云岭、大安山、南窖、史家营等深山区之交通要道，群山环抱，依山傍水，地势险要而秀丽。因座落在大石河谷北岸，故得名河北，自古是政治、军事经济之必争之地，是沟通河套内外商品交换的主要枢纽。南窖的煤、班各庄一带的石板输出必经之地，山货土特产集散中心。有座商九家，小食品摊，小吃摊、修鞋匠、白铁匠、小烘炉、小店等有三十来。再加商贩出入不暇，运输日夜往来不断，而形成一无集日之分的长期商市。

### 十三、周口店

周口店居县城西偏南四公里，清末革新路政，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初为筑京汉铁路运石料，修筑琉璃河至周口店支路，后继而运灰煤，输出日多。在商业竞争的当时，资本家视周口店为必争之地。全国数省厂商云集，逐使地方经济为之一变，志载云：“当日周口店商业甲全县，人皆视为乐土，昔为不耕之石田也。”据民国十六年统计，有座商六十三家，其中煤厂商多达四十家。

### 十四、南窖

南窖居县西北四十五公里，位于群山环抱的窖形盆地中，因此而得名。其地除盛产核桃、栗子、花椒、柿子、梨杏等干鲜果品外，素为产煤之区，早期煤之输出依赖牲畜驼运出山，销量远不及长沟峪，自高线修成，销路大增。南北窖三安子一带，大小煤窑之多达百余座，其商业遂因之而日盛，有座商十七家，除盐店外其它均为综合性店铺，生意兴隆，无集日淡旺之分。

十五、民国十六年后，为了一地一村之便利，在位居要道和较大村庄先后设立起五个集市，当时有半壁店、天开、赵各庄、吉羊、大韩继。

## 商会的建立

房、良商会的建立是随着民国政体之改革，商业之大昌，征商四起。在房、良两县以行业归类的商业体系已形成的基础上，而产生以当地商号为会员的商业团体组织——“商会”，以维护商权和商业利益，由会员中选举产生正副会长各一人主持工作。

房山县商会于民国元年八月在县城北街成立。

良乡县商会于民国元年在城内成立，琉璃河镇商会于民国二年成立，窦店镇商会于民国二年成立。

## 特种行业

### 一、盐业

盐自古为国家之专卖，民间称之为官字号买卖，为资金雄厚的各大资本家或官僚资本所承包垄断经营，依势专横，剥削无度。房山各集镇之盐店均为益照临一家所设，1925年房山城内益照临盐店因长期以缺斤短两向农民进行剥削，引起民愤，但无人敢上门去找帐。当时南关陈志（清举人）之子陈静初得知为之不平，命其亲属去买盐，陈随其后。经验证分量确实不足，当场折断盐店的称为群众出了这口气。后盐店虽仗势赴京上告但未逞。

### 二、牙行

牙行，是当时地方政府对集市交易进行征税的一种组织形式，依承包办法分别承包到各集市。牙行分斗、脚、估衣、猪、草、牧畜、灰煤、油、花生等九种之多。其收税方法，凡集市成交均要经过牙行之手，如卖粮过斗，卖草过称，买牲畜看口齿，买花生看货色。在买卖双方要价还价之间，还负责打元盘促其成交，以成交额之大小收税。此外，为了扩大市场成交额，他们还主动为商号和商贩招揽买卖磋商生意，还以灵通的市场信息掌握物价的涨落，以此刺激四方农民商人到此买卖，以达增加税收的目的。据县志记载，良乡县民国十二年各牙行承包银为：县城斗牙行一名每年纳税银十三两，窦店十三两，琉璃河十两，县城估衣牙行一名每年纳税银二两五钱；猪牙行一名每年纳税银三两六钱；油牙行一名每年纳税银六两，多者归己，亏者不减。牙行除正式收税，在集市协助成交均用行话暗语，袖口里讨价还价，吃一方，向一方，从中得利，有时两方俱吃。

### 三、当铺

当铺是以物做抵押取得贷款的一种高利贷行业,经营对象多为生活贫困者,豪绅富户者也有,但其情况各异。富者当,一是因遇一时之难,为无损于富有者之体面,既不能卖地又不能求借,而以贵重之物当之,以解燃眉之急;二是为珍贵而又不宜保管的衣物皮毛货等,换季后免受霉烂变质之损,或是城外富户为防不测,而送当铺得以妥善保管,随用随赎。贫困者当,其情况不一者有三:一是平时勤俭度日,如遇天灾人祸暂借无门,不得已而当;二是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的破落富户,初为维持现状,后为温饱生活而当;三是吃喝嫖赌游手好闲的懒汉,无钱则当,再无钱卖当票。常言道,奸出人命赌出贼,当时的当铺为这些人开设了方便之门。当铺实质上就是变相的高利贷者,但利率高于一分利,另加保管费。以物值的50%—60%为当价的最高限额,限期赎当,过期作废,如赎不起者以物之微值进行找死,当铺对过期或找死之物除珍宝外大部出售给估衣行和旧货商。

房、良两地由清朝至1937年,先后开设当铺三家,房山城内两家,良乡城内一家。房山最早开设的一家在清朝年间,名为“隆福当”,北门里路西,拥有资金白银六十万两,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到房山时,“隆福当”铺被一抢而空,后欲继开受阻,改开“隆福局”粮店。该店善结官府,分号多而面广。房山城内第二个当铺开设于1931年,名为“西天合”,在1937年“七七”事变期间,被三路土匪胡振海进城时抢空。

#### 四、杠房

杠房是向婚丧嫁娶之户租赁花轿、棺照、执事、鼓乐、搭棚、张灯、结彩、桌椅、茶炉等一切办事所用之物。

### 流动与固定的小商贩

一、流动小商贩,是以农业不能维持生活者较多,经营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经营品种是以农村生活日用必须品为主。其经营特点是:有一定的经营路线和大体的时间,以货易物为主,如鸡蛋、粮食、油料等。以货币交换者较少,以信誉争取主顾,满足顾客需求,这次无货下次定能为您带来,以方便主顾、和气生财为本份。其流动方式大体有四种,1.固定几个村的范围内长期流动。2.在本地区范围内集日赶集,平日串乡流动。3.长期由此至彼,追集赶市。4.随着季节进行不同农副产品的长途贩运,如粮食、干鲜果品、蔬菜、仔猪、蛋禽之类等等。

二、固定小商贩,一在农村,多为小杂货铺的形式。有的是合伙经营,有的是连家铺,经营一些农村生活日用必需品,有的开设小饭铺带茶水,大多在路边道口,招待过路车辆来往行人。一在集镇,多为摊贩,有经营纸烟、糖果、小食品的杂货摊,也有专营叶烟、鲜菜的长期摊,还有麻花、烧饼、炸豆腐、豆腐脑、老豆腐的小吃摊和生熟猪、羊肉杠等。

除上述者外,还有一些串乡修理筐箩、簸箕、洋铁壶、钉盆钉碗、锯钢锅、张箩拴屉、小烘炉等等流动的小手工匠,大多为外乡人农忙时种地,农闲时做为副业出来营生。民间的小商贩在市场上、交通线上常常见到的就是他们。在村街头巷尾,天天能听到他们熟悉的叫卖和不同声响的换头声,给当时农村千家万户带来方便,深受大姑娘、少媳妇、老太太们的欢迎。但自古以来,民间的小商贩,总是在倍受压制的情况下,艰难地从事自己的营生,开展着平凡而忙碌的商业活动,他们发展的路子是相当狭窄的。(在抗扫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敌人对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实行困笼政策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情况相当严酷的情况下,冒死沟通敌我之间商品流通的就是这些所谓跑单帮的小商贩)。

### 经营方式及手段

经营方式。清末民初房、良地区分门分类的商业体系形成,较大集镇商号分类细,且多巨贾老店,资金

雄厚货源充实。平、津、张、保南北货物品种齐全，批零兼营，杂货行多兼营酿造酱油、黄酱、高醋、酱菜、糕点等加工作坊，前店后场自制自销。乡村集市店铺少则分类粗，大多百杂俱全，综合经营。逢集遇节庙会时宜，备办货物设摊销售招待顾客。在集镇和农村尚有不少小本经营的“夫妻店”，集镇小饭铺较多，农村则多为小杂货铺，他们前店后家，营业时间较长，经营方便灵活，夜间小门售货随叫随开。

经营手段。在旧社会凡经营者，皆以谋一方一地之利而开设店铺，毫无为民之观念。但为扩大经营牟取利润，也给与群众一些方便和良好的观念。他们揣摩顾客心理，积累了一套徕待主顾“以诚相待，以货引人，薄利广销，信义为本”的生意经，表现于诸多殷实老店。相反，投机倒把商，为取暴利不择手段，勾结官府，残酷剥削，表面热情，心怀叵测。商品以假代真，大秤进，小秤出，掺杂使假，衣帽取人，看好货包次品，专捉老憨。春天放借贷，秋收吃高利，此类不择手段的剥削商为数众多，故旧社会商为世诟者已久。

一、以待客热情赢得主顾。远迎近接，主动问寒问暖，对富户迎进帐房烟茶招待，问清所需由学徒打点，走时伙计牵驴搬车，掌柜出店恭揖送别，路远者甚至留客吃饭。对贫穷上门的主顾，也会使你欢喜而来，满意而去。看生意以小集多，以主顾盈门而显示买卖兴隆，以此竞争，压倒同业，在店堂里悬挂“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称平满尺码足”的条牌，示意主顾买货放心。

二、立折赊销，以此垄络买卖，拴着主顾扩大经营。立折对象为殷实富户，对比较富裕之户也给予短期赊帐之便，结帐皆以端午中秋，年关三节为期。为保持与立折户关系长久。除在柜上殷勤招待，凡折户大事小情一盖随应。年关帐未结，新折又送到。

三、以信取信，扩大资金。商号货栈通过代存、预付的经营手段在与客户往来取得信任的基础上，一些殷实富户在农村为防匪患之不测，往往把银钱存于立折关系商号尚能得到微息，而商号不但以客户的存款扩大本店资金搞活经营，甚至向外放高利贷。定货预付，大多为山货商。每年春季，深入产地与货主订货，按收获量大小付给部分订金。到收购季节，对产品少或急需用钱户采取随收随结帐，对产品数量大或富裕户，采取收购后，分期付款或产品出手后一次付清的办法，借他人之本发己之财。

四、货真价实，薄利广销，创出字号，吸引顾客，买一捎十，扩大经营。此多殷实老店，如“天吉号”开设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是房山城较早的一家衡水老店，专营烟具。前店后厂，以自产自销批零兼营烟袋锅、烟袋嘴、水烟袋等铜制烟具而驰名于房山、良乡、涿州、易县、涑水等县。经营特点是：用料纯正，工艺精细。该号制做的烟袋锅，久用不坐锅不掉锅，货真价实，创出了字号。再如以自产自销的几种主要商品，采取看利薄、质量精而实惠的经营手段，招徕顾客盈门的山西老店“福源勇”，粮行兼营杂货，前店后厂，自磨自售白面，干白纯净，不掺假，出售时老称加一，售价不高于同行。城内商号、衙门、四街两关的群众，大多吃该号的白面，有时宁可排队多等也不愿到别号去买。还有杂货行，多在自产自销的点心、酱油、高醋、酱菜等几种商品上下工夫，聘请名师，用料讲究，制做精细，美观味醇，用此吸引顾客以达到买一捎十，多做生意的目的，也是与同行竞争的一种手段。

五、出售礼券。礼券是代替礼物馈赠亲朋的有价证券，是扩大商号影响，活跃经营的手段之一。使用礼券正常往来者，多系豪门富户，其次为工商企业结交官府，老百姓托人办事，打官司告状，为蔽人耳目出入方便多使用礼券馈赠，大城市较为普遍。房山地区仅城内“吉顺成”杂货铺一家出售礼券，其手续及使用方法按顾客交现之多少，在礼券正面填写金额，盖上商号和店主的印章，封入精致美观的礼券袋，不署送受者的姓名。受礼者凭券到出售商号可随意选购所需商品，亦可凭券兑现，但商号要从中扣除一定的手续费。

六、使用河票。河票是商号用来代替现金的一种票证。清末民初期间，发起于琉璃河锦福隆粮行（山西字）仅此一家发放使用。该号资金雄厚，在商界享有威望，当时该号因位居琉璃河，故简称河票。流通于当地范围互通往来的商号与商号、商号与主顾之间。如琉璃河附近富户、张坊以里的山货富户为携带方便存放安全，大多把银元在该号换成河票，用此可以买货亦可兑现。在房山城内的“德隆盛”杂货铺和周口店、坨

里的大成功煤棧三者与主顾之间使用流通着该号的河票。

七、囤积居奇，春放秋收，牟取暴利。房山为缺粮地区，年不敷半，故粮行之多达九十一家，占商号总数的22.2%。集市交易以粮食为大宗，粮行则乘机在新粮上市压价收购，麦收时小米与小麦兑比为一比一。秋收时一斗小米仅换小麦七升，囤积居奇。当农民青黄不接时抬价出售，同时并进行赊销，按时间长短，除一石还石三或石五，或春夏季节进行以粗换细，秋冬季节以细换粗，以此反复循环从中渔利。此乃粮行牟暴利之贯伎，如遇灾荒之年剥削更甚。

八、高利贷。是旧社会剥削阶级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手段之一，除地富向求借农民施以高利贷者外，在商业中也有不少商号兼放高利贷。张坊的炭厂结合收购山货的业务，春季向货主大放高利贷，秋季以粮货还贷，既得到了利又收购了货，而货主是钱货俱伤。高利贷利率高者月息二分至三分，低者八厘至一分。还有一种蹦蹦利，借一还二，多系用钱急、时间短的特殊借钱户。

九、商业兼营土地。非指地主兼营买卖而言，而是土地列入商号资产，而由商号管理经营者。如豆店两个酱园，均经营田园，雇工种植酱园所需之粮菜；房山城内黄酒馆在城外设有庄园；张坊祥瑞粮食杂货商，收帐户以地抵债的土地有二百多亩，出租给当地农民。

十、赶庙会。庙会初乃寺庙僧侣为繁荣本寺庙的香火(佛、祖、英、烈等纪念日)，约集地方商人在香火之期参加销售，方便香客，而后形成庙会。年年届期工农百作，四方商贩，不约云集而至，搭棚、设摊，随着季节出售应时商品。小型农具、广货布匹、饮食摊贩、儿童玩具、江湖杂耍、民间花会、相面算卦、说书唱戏等无所不有，就连赌徒恶棍亦皆涉足。比如，九月初一饶乐府的东岳庙，有些煤窑在秋收将了，借庙会之机摇旗呐喊招人下井背煤，当时即可预支部份工钱。不少贫苦农民为一家老小生活所迫，明知是祸也得去，不得不找保划押订下生死契约，下井时间由是年九月初一至翌年五月初一。

### 庙会日期地点名称(旧历)

日 期	地 点	名 称	特 点
二月初一	黑龙关	龙王庙	
三月初一	顾 册	娘娘庙	经营权把、扫帚小型农具为主
四月初四	琉璃河	关地庙	经营权把、扫帚小型农具为主
四月十五	辛 庄		经营权把、扫帚小型农具为主
四月屯一	房山城内	药王庙	经营署药
五月初一	长 沟		经营凉席、草帽、夏布等夏季商品
五月十七	房山城内	城皇庙	经营凉席、草帽、夏布等夏季商品
八月廿八	窦 店		
九月初一	饶乐府	东岳庙	山里红、大柿子、糖炒栗子等
九月初九	石 窝		
九 月	良 乡		
四月廿一	石 村	药王庙	
三月初八	良 乡		

## 日蒋统治时期房、良的商业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假借芦沟桥打靶，一声炮响又挑起继“九一八”事变后的侵华战争。国民党二十九军浴血奋战，杀得日军闻风丧胆，但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不抵抗政策，终因孤军无援节节败退。从8月15日前后，日军踏入房、良地区，在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下，国军寡不敌众，在大石河西岸与日军对持二十余日，全线崩溃。至9月17日两县平原沦入敌手，县城及主要集镇和村庄，墙倒屋塌瓦砾成堆，军民伤亡惨重，商店闭门，人员四逃。日军占领房、良县城后，县商会变成了维持会。在两县城外的散兵游勇和无家百姓，借国军溃退弃下的枪支弹药，组织起各路土匪，一路占据长沟一带，二路占据张坊一带，三路占据周口店一带，他们虽打着抗日旗号，但乌合之众缺乏战斗力，且多从自身利益出发，步日军践踏之后尘，打家劫舍，烧杀淫掳，扰商害民，强行向各镇商号、各村百姓要钱要粮，绑架商号店主逼金要银。

1937年11月1日和11月27日，三路土匪胡振海先后两次攻进房山县城，进城后却不知安抚百姓，不顾商号遇难之痛苦，反行抢掠，大吃大喝寻欢做乐。张坊经日军攻打烧杀淫掳，又遭二路土匪之劫，使所有店铺商号无法开业，人员各自星散，一个繁盛的集镇顿时处于萧条混乱之中。

1939年秋，各路土匪被瓦解，经维持会的上下联络，沦陷地区的商业虽然得到恢复，但由于日本侵略战争严重的摧毁了农村经济，人民涉身于水深火热之中，惶恐不可终日，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购买力明显减少；且在战乱中的商业被洗劫空虚，元气大伤；再加之经济封锁，交通堵塞，四通八达的货源渠道被切断，尚存的北平一条渠道，日伪军又盘查勒索甚严，资本稍厚的商户或转移或弃商避居，一般中小商户迫于生计，不得不惨淡经营。

1945年9月，日军无条件投降后，集镇商业曾一度恢复，但因国民党又随即发动内战，农村经济再次遭到摧残，民不聊生，经商运货，路站盘剥，重税勒索，各方留难，商业获利甚少。再加之国民党政府的币值不稳，物价飞腾，货一出手所收货币如废纸，致使商业交易不得不以货易货，小商大多破产，较大商号商品有价无货，囤积停售伺机而出，整个房、良集市交易呈现混乱、市井生意处于极端萧条的局面。

（《房山文史资料》第2辑）

作者王绍清系原区供销合作总社政工师、社史办主任，侯之扬系原区供销合作总社社史办干部

## 抗日战争时期房良的农民合作社

王绍清 侯之扬

### 房良合作社建设沿革

1941年1月10日,房良联合县第一个“农民合作社”诞生,名为房良二区农民合作社,地址六渡。

1941年6月14日,房良联合县分治后,改称房涿涿联合县,随之合作社亦改称为房涿涿二区农民合作社。

1941年8月初,二区农民合作社社址迁于九渡。

1941年秋,昌宛房联合县成立后,在一区区公所所在地庄户台,成立一区农民合作社。

1942年春,房涿涿联合县二区农民合作社社址迁于八渡。

1942年春,昌宛房联合县一区农民合作社,在日伪军扫荡中被洗劫,是夏再次重建。

1942年冬,房涿涿联合县二区农民合作社,迁十渡县政府所在地,改为房涿涿县合作社。

1943年4月中旬昌宛房联合县一区农民合作社,再次被日伪军洗劫捣毁,后未复建。

1943年12月,房涿涿县合作社撤销,县合作社人员又迁回六渡原址,恢复原二区农民合作社。

1944年初,房涿涿联合县二区马安村,成立马安村“合作社”。

1944年9月,房涿涿联合县分开,房山单独成立县政府,二区农民合作社再次迁十渡,合并房山二区公所,停止营业。

1944年12月,房山县政府设立“合作指导股”。

1945年3月,在房山二区十渡村,成立医药合作社。

1945年春,在房山一区龙门台村,成立“一区合作社办事处”,下设医药部。

### 房良第一个农民合作社

建立:二区农民合作社,是房良联合县创办最早的一个合作社。社址在房良二区区公所所在地的六渡村。从1940年10月在区农会的组织领导下开始筹建,创办人有隗福勤(合作社主任),隗永高(合作社会计),李合(合作社采购员)。经过两个多月的宣传组织,使居住分散的村村岭岭,对组织合作社、解决军需民食、有利于抗战、有利于人民生产生活的重大意义家喻户晓。当时广大群众虽经日军数次扫荡,烧、杀、抢、掠,缺粮少钱,生活极端困难,但都自愿地拿出仅有的鸡蛋、花椒、杏仁,甚至主动上山刨药材积极入股参加合作社。共凑集股金六百多元,按规定每股当时五角计算,达一千二百多股,折合小米千余斤。于1941年2月10日正式建立并开始营业。

设施:为适应战争环境和当时经济条件所限,办社一切因陋就简,合作社开始设在六渡村社员隗秉存家的三间北屋,与其同居一个院,天井之大不到四十平方米,设备简陋举目可睹,一无仓库车马,二无栏柜货架,屋内仅有两节墙柜一个,既盛商品又当柜台。大小两杆称,算盘一把,大缸小坛有五口,醋提油漏缸沿挂,墙上蓝色的布兜里装的是几十味中草药,别的再没啥。所有这些器具都是社员们凑集以及合作社工作人员自己随身带来的。

为了防备日军不断的扫荡和围剿，合作社对大量及重要商品、煤油、火柴、布匹等大都坚壁在深山炭窑、峡谷山洞之中，门市商品零星量小，如有敌情把商品分头装入背篓，随群众转移山后。当时合作社主要运输工具，就是人人身上的那只背篓，人不离篓篓不离身，到1942年初，合作社才有了第一头毛驴。

待遇：合作社工作人员的待遇和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一样“半供给制”，每人每天供给十二两小米（十六两一斤），后来就连十二两粮食也难保证了。

开拓：合作社建立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开拓内外商品沟通渠道。当时合作社曾选派精通业务、立场坚定的共产党员李合同志担任采购员，开拓南北两条地下商品流通渠道。在党的地下组织的掩护下，首先，在仅距日伪军重点驻地——张坊北侧约五里远的下寺村暗设“地下商品转运站”。该村属我解放区的边缘，地理条件优越，距敌封锁壕近在百米，出入内外可以接应；村北靠山，贴山逶迤西下，即可抵达根据地。然后，又在敌占区南尚乐村，建立与长沟以西一带商贩通商的“地下联络点”。

策略：抓住利我而不利敌的一切有利时机，争取民众，打破敌人封锁，开展供销。

一、针对日伪军对其统治区的横征暴敛、残杀无辜，穷苦百姓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备受亡国之灾的痛苦现实，通过关系深入敌区开展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唤起民众，奋起斗争。通过宣传和秘密联络，把一些食不饱腹、仇视日伪、不甘当亡国奴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小商贩，争取成为我方冲破敌人经济封锁、冒死贩运、沟通商品流通的一支有生力量，构成一条地下商品流通渠道，使内外物资和商品川流不息。

二、抓住伪军见利智昏的弱点，通过地下关系与官僚经商者挂勾，然后买通岗卡官兵，利用他们的特权，避免关卡的盘查、重税的勒索和各方面的刁难，在敌区封锁形成网络的情况下，保障商品流通的安全。

三、摸清敌人严紧虚实，乔装巧运通过封锁壕。地下商品流通渠道最关键的是通过敌人的边防封锁线，在边防线上敌人挖深沟为封锁壕，要道咽喉重兵把守，分段设堡筑碉，巡逻其间。

1. 以经商身份，公开在敌边防咽喉——日伪军重点驻地张坊活动，与伪军敌特拉关系买方便，如曾为合作社买卖的商人崔永贵和戴仲三，就是在张坊经商，经常给合作社在敌腹地联系货源推销山货，并从他们那里能了解到敌人动静，以便见机行事；2. 夜越封锁壕。在摸清敌人严紧虚实、出没时间动向，乘敌龟缩岗楼之际定点在壕之间与关系商贩互换商品；或随武工队、游击队夜间到敌区活动，背出山货到商贩联络点，带回西药、纸张、油墨、油印机、电池等军政急需物品；3. 乔装巧运。充分利用在封锁壕内外附近村庄过壕送粪、种地、打草放牧等有利条件，相互输送内外物品。如合作社收购社员成群羊只，就是伪装放牧，把羊赶到接近封锁壕的有利地带，由外边羊贩假称过壕牧羊，两群并做一群赶过壕沟，然后伺机把煤油、食盐、布匹、火柴等商品又假借过壕下地送粪运送过来；4. 以附近老百姓身份集日赶集，公开出入张坊敌人驻地。在敌我之间货币互不流通的情况下，合作社除以物易物外，对禁购商品，大部以银元成交。借赶集之机把银元放在挖空的旧房料中运出去，回来时如爱耳兰染色，放在自行车内胎里。对明显军用品西药、针头、钢笔等放在自行车座下的竖梁中，使敌人毫无察觉的带回来。

作用：房良二区农民合作社，由于党政的支持，主任隗福勤、会计隗永高、采购员李合三人同心协力，不怕苦不怕累，担风走险，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得到广大爱国人民群众的爱护与有力的支持，终于冲破敌人视若铜墙铁壁的经济封锁，打通南北两条地下商品流通渠道，使山区土产有处可销，急需商品有源可进，缓解了二区经济紧迫状况。可惜的是，在残酷无情的战争年代，合作社几经转移，有关图章、帐本等历史资料，藏于六渡腊沟港山洞而失落，仅据当时合作社几位健在的有关当事人和当地老社员回忆，以及有关史料等各方面考证。据不完全统计，在建社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输入煤油一百六十余桶（白铁桶每桶三十市斤），火柴八十余箱（每木箱二百包），食盐三万三千余斤，布一千多匹（土布每匹五十二尺），还有不少中西药颜色、纸张、油墨等办公用品以及小百货达百余种商品，并陆续输出大量花椒、杏仁、药材、木炭、荆条、檀木等

山货以及成群羊只。当时煤油大部供应军政机关办公用，食盐按数量分配到村由村到户。二区农民合作社，历尽艰辛，不负众望。

在日军扫荡中的二区合作社：1941年7月日军开始第二次“强化治安”运动，其中心是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隔绝与根据地的联络，繁殖点线，依据点线向外扩张，以达其紧缩我根据地的目的。

在抗日根据地日趋严酷的形势下，北岳平西根据地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斗争方针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形式与敌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待有利时机”。据此，驻房涞涿联合县十渡和平峪一带的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还有冀中十分区的兵工厂、医院，都撤到涞水山里暂时隐蔽。六渡二区合作社则是年8月初暂先向里迁至地势条件较好的九渡村。然后人分两路，九渡由主任隗福勤、会计隗永高负责，西关上由采购员李合负责，将以他家为仓库的大批商品煤油四十余桶，坚壁在该村西山背后“坛子沟”山洞，布匹、火柴等坚壁在“天佑”山腰炭窑，平时由沟口羊圈牧羊人日巡夜守进行监护，在社员群众共同帮助下作好了一切后撤准备工作。

8月15日，日军由华北敌酋冈村宁次直接指挥，开始调集华北的六个精锐师团，五个混成旅团及伪军一部十万余人，分十三路向晋察冀地区之北岳区平西根据地大举进攻。

8月22日，闻悉日军一路向张坊集结时，二区合作社西官上、九渡的两地工作人员，分头背上生活日用必需品和药物，随同广大群众安全撤入深山老林，与社员群众同吃同住，照常营业。

8月24日，集结在张坊的三千多日军沿拒马河谷直驱而上，逢村必搜，有户必入，踏遍拒马河两旁沟谷和村庄附近的山林，一路炮火连天硝烟弥漫，马嘶人啸，杀气腾腾，有把拒马河谷荡平之势。虽然气势嚣张，但合作社与广大群众所坚壁的商品物资以及粮食，就在敌人的眼前脚下，却一无察觉。当日军进至房山和涞水边界的一兵扼守千军难闯的八里塘凸壁悬崖，强攻之下死伤惨重，只得回兵十渡一带，分别在西庄、王老铺安上据点，妄图长期在此盘踞。

在房涞涿县委和二区区委领导下的游击队和各村民兵配合八路军，不间断的寻机歼袭日军，使其日夜不得安宁，迫使各据点日军仅盘踞了四十天，不得已于同年10月4日狼狈缩回张坊据点。

日军被逼退后，合作社人员同群众一起迅速返回村庄，检查各处坚壁的所有商品物资和粮食，皆未遭日军发现。但由于时间过长，又时值淫雨季节，坚壁在西关上“天佑”炭窑中的布匹、火柴，虽窑湿受潮，尚未发霉变质，采购员李合急合作社之急，在合作社人少的情况下，主动叫他妻子邵正秀带着不满三岁的孩子，拿上多一半是菜的干粮，去炭窑把布一匹一匹的打开挂在，附近山坡的树枝、荆丛之上，将火柴千包盒盒摆在向阳平静的山石上，翻来倒去、早去晚归，整整晾晒了三天，使这批来之不易的急需商品免受损失。

1942年春，二区合作社由九渡下迁八渡，社址在社员刘庆荣家。与此同时县政府为解决根据地人民群众缺医少药的困难，调来医生杜彦田(某区助理员)，增设了医药部，人员增至六人，商品山几十种增至百余种，在扩大零售业务的同时相应的加强了收购，组织与发动群众开展副业生产，对收上来的药材经泡制除供医药部使用外，大部出口换回丸散膏丹等成药。

采购员李合牺牲：1941年11月1日至12月25日，日军在其占领区开展了第三次“强化治安”运动。其中心是强力统治物资，完全控制人民一切生活物资与日用必需品。实行所谓“配给制度”，专心放在经济方面，求得经济封锁之彻底，一切生活必需品禁止出境，购买食盐每人不许超过二斤，但时有时无，长期无货。组织它的合作社向解放区推销化妆品、货烟之类的消耗品，利用伪组织到解放区抢夺山货。组织“粮食组合”，垄断粮食。加强各据点对根据地的封锁，急于切断我地下商品流通线，出动汉奸特务，明查暗探，在此期间，二区合作社”采购员李合，及他的外线联系商人等数人名单握入敌手。

1942年旧历四月十二日下午，李合为了多驮货，半路上把自己的一头毛驴也一起赶上，兴奋的直抵下寺村驮盐，子夜到达。次日拂晓前，李合背着超负荷的盐赶驴出村上路。此时，李合哪知日军已在村外四下

设伏，陷于包围之中，当他行至村西三岔路口进入伏击圈，日军突然向他喊话，李合方知情况不好，侧身向北坡外冲，已来不及了，当即身中三弹，倒于血泊之中，当时尚存一息，日军急于追问口供，给李合进行了包扎，进村抓来群众，用门板把他抬到村东马房河沿时，李合因流血过多，早已停止了呼吸，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当时年仅三十五岁。

第二天夜，西关上的地下党员在下寺村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将李合烈士遗体连夜送回西关上村。恶噩传开，全村皆悲，一致痛斥日寇、汉奸、特务，随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的口号响彻拒马河谷，抗日锄奸的烈火更加炽盛。

在一年多的期间内，李合同志不负众望，为抗战之所急，群众生活之所需，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艰苦的岁月里，往返于逶迤的山山水水，生死置之度外，越壕飞绕堡、内通外联，建立起一条由敌占区通向根据地的“地下商品沟通渠道”，最后他又以生命进行了捍卫，他不愧是民族之英雄，优秀共产党员，合作事业之先驱。为了不忘先烈，鼓舞后人，1979年，经西关上村和六渡公社逐级请示，县民政局于1983年6月15日，正式追认李合同志为“革命烈士”，并补发“革命烈士”证明书，京烈字第110044号。

李合牺牲不久，他的外线地下联系商人有两名同时被捕，落入张坊据点日军手中，敌人软硬兼施，用尽毒刑妄想从这两人口中弄清我地下组织，企图一网打尽。但他们为了民族的尊严、祖国的安危，宁死不屈，以自我牺牲的精神，使敌人一筹莫展，毫无所获。最后，有一名同志被日军绑在木桩上当活靶子，壮烈就在日军刺刀之下，又惨遭狼狗撕扯。

南渠道的开拓：南渠道是避开敌人的房张公路，由南侧进入拒马河谷的运输通道。为转移敌人视线，其路线是，由长沟向涿县冯村方向走，然后转向西行，经毛家屯、王庄、柴饭铺，沿拒马河滩到下滩，再至南拒马河的王家碾，走金满峪，经铁锁岩抵沈家庵进入根据地。

在日军第三次“强化治安”运动中，北渠道由于敌特搜捕设伏，李合等同志英勇壮烈牺牲，敌对南渠道也加强了封锁。在南拒马河两岸，由王家碾至金满峪一段路，白日设有流动哨兵，夜间暗下地枪。王林和那些与根据地秘密通商的商人等，在当地爱国群众的支持和指引下，采取夜间行动。由王家碾拉骆驼或背着物品，下河淌十来里路的水到金满峪上岸，安全通过设有地枪的路段，冲破敌人的封锁，冒险贩运。

## 房涿涿县合作社的建立与撤销

为有力配合根据地的“生产自救”、“大生产”运动，平西专署联合会及房涿涿联合县政府决定，扩大合作社组织，成立房涿涿“县合作社”。

1942年在敌加强经济封锁的同时又面临一场空前严重的大旱灾。是年3月30日到6月5日，日军在第三次“强化治安”运动之后，又进行了第四次“强化治安”运动，制定了更为详尽、更加系统的经济封锁措施。敌伪良乡、宛平、房山等县联合行动，沿我昌、宛、房、涿、涿根据地边缘，北从杜家庄、东西斋堂、吕家村，经大安山，长操、南窖，南到周口店、孤山口、下庄、张坊计十多个据点，连接成一条半圆形的“封锁线”。在敌占区内，运输必须由指定的六条道路，即房一良、良一官、琉一玛、琉一涿、交一宛、窰一房，否则以偷运论处。并在良乡、窰店、琉璃河、房山、周口店、长沟、张坊等九个村镇设立检查站，重要公路上设流动检查班。敌人并将各种物资分三大类进行统管。第一类，为兵器、弹药等军用物资绝对禁止流通；第二类，为金属建筑材料，如印刷机和其他各种机械，须经县长以上长官发通行证方可流通；第三类，为纪念品、皮革制品、棉麻制品及生活日用必需品，严格规定数量，只限于一人徒手携带，同时还须经县长以上行政长官的许可。若是粮食牲畜，必须到警察所提出申请，然后由县公署批准，方可进行搬运。

敌人的严厉经济封锁，给根据地的物资进出口造成极大困难，且根据地又地处山区，土薄地少，是年又

逢空前干旱，秋后颗粒未收。在这种万分困难的情况下，为了有力配合当时根据地开展“生产自救”而掀起的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进一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平西专署联合会及房涞涿县政府决定，于1942年冬，将二区“农民合作社”迁于十渡，改建为房涞涿“县合作社”，加强合作社的组织力量。县合作社共调配八人，主任有贾荫轩（河北雍县人），下设一部两股，“业务部”部长隗福勤、“组训股”股长张淑兰（女、宛平人）、“会计股”股长隗永高。

组织副业开展收购。县社建成后，首先配合生产自救大力组织社员群众上山刨药材、烧木炭、割荆条等副业生产。并通过以王林为主的地下商品沟通渠道，积极寻找门路推销各项副业产品，换回急需生活必需品。为使社员群众卖东西不吃亏，合作社采取销后向出售者返还利润的办法，使之得到实惠，有力的激发了广大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购运结合，增加群众收入。在“大生产”运动中，为解决群众吃粮支持生产，县合作社业务部长隗福勤亲自到涞水蓬坨、南城寺、赵各庄等地收购粮食六万余斤，并组织养牲口的户进行驮运，使之增加了运费收入。合作社还把收购上来的羊毛发给驻十渡八路军九团战士，利用他们的休息时间，打毛线、织毛衣、毛袜，合作社再用这些毛织品换回粮食。

组织集市贸易，互通有无。为了缓解根据地的经济状况，县合作社在十渡河滩，组织建立起集市贸易，互通有无。逢五排十为集日，涞水、易县飞三坡等地的小商小贩和赶集买卖的群众云集而来，多达五六百人，进行买卖和商品交换，使根据地的物资余缺呆滞局面，一下子活跃起来。

县合作社的撤销。县合作社是在根据地最艰苦岁月里的根据需要而成立的。经过一年的与敌人经济封锁和自然灾害的艰苦斗争，为配合根据地“生产自救”而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做出了应有的作用。由于1943年夏秋间形势开始好转，到1943年冬季同时，“大生产”高潮结束，在根据地已基本上摆脱了困难局面的第二个县合作社宣告撤销。

1943年12月初，房涞涿县合作社在完成“大生产”运动中的使命后，依据晋察冀边区合作社组织条例第七章第二十八条第二项“县联合社以县范围内各区联合社为社员，每县只限一社，须有该县半数以上之区联合社加入，始得成立”之规定，奉上级社指示撤销。

恢复二区“农民合作社”。县社撤销后，恢复原二区“农民合作社”，由十渡又迁回六渡原址，原二区合作社主任隗福勤调区公所工作，主任由县社会计股长（原二区合作社会计）隗永高担任。迁回后在县社经营的基础上扩大于供销业务，附设医药部，根据县联社生产贷粮办法，为恢复与组织本社劳动力、扶植社员非社员生产，开展信用业务，举办贷粮、贷籽种支持农业生产，还组织群众大搞副业生产，扩大合作社收购业务，增加群众，收入改善群众生活，增加出口，换回急需商品和禁缺军政物资。

### 一区庄户台、二区马安建立合作社

#### 一、庄户台区合作社的建立。

1941年秋，昌宛房联合县成立后，在一区区公所所在地庄户台村成立一区“农民合作社”，工作人员有蔡凤来、郑玉荣，主要经营生日用品必需品煤油、食盐、布匹、火柴和小百货杂品等，收购一些当地山货及土特产品，解决群众生活，扶植群众生产，支持抗战，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积极参加合作社组织，生意相当兴隆。

合作社遭劫与恢复。1942年春，日伪军一千余人从坨里进山经霞云岭沟向里进犯十渡。庄户台“农民合作社”在此次日伪军扫荡中遭劫。根据广大群众的迫切需要，不久再次重建恢复营业。同时并根据政府指示，为了搞活经济，繁荣市场，合作社配合区公所在庄户台村建立起集市，吸收四面八方的商贩来此进行交易。逢一排六为集日外，每集上人多时五、六百人，少时也有一、二百人，在商贩当中有的来自解放区，

有的冒险来自敌占区，把敌人认为封锁死了的死山沟一下子活跃起来。紧缺商品有人卖，土产山货有人买，集市上不仅有食盐、布匹、小杂货，还有骡、马、驴等大牲畜和家禽家畜等。

合作社再次被捣毁。时至1943年4月中旬，日伪军再次调兵遣将从霞云岭方向进犯十渡根据地时，在敌人一路烧、杀、抢、扫荡中，庄户台“农民合作社”又遭日伪军洗劫一空，此后未能再建。

## 二、房涞涿二区马安村“农民合作社”的建立。

马安村农民合作社，建于1943年冬，是在十渡县合作社撤销后，马安为保障本村人民生产与生活，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在大生产运动基础上，为进一步扩大再生产，马安人民续继发扬马安“抗日模范村”与敌斗争。寸土不让的革命精神，按照晋察冀边区合作社条例，积极主动地建立起马安村“农民合作社”。发展社员百余人，每股边币一元，社址在本村西石片刘德起家，西房两间，窗口售货。主任刘占直(兼合作社会计)，业务上有刘德秀、刘德新、刘德宽共计四人。商品来源，紧缺商品大部通过关系来自口外，有时二区农民合作社给予部分分配(煤油、食盐等)，一般商品来自张坊和当地十渡集市，如油灯、坛坛罐罐、副食品、针头线脑以及边区造纸烟、火柴、土布等。马安合作社每年年终都能按照合作社组织条例，进行盈余分配，提取百分之十至二十的公积金，百分之五至十的公益金，百分之五至十的职员酬劳金。当时该社职员报酬为每月二十斤小米，不出战勤。盈利剩余部分向社员分红，1944年至1945年曾逐年进行了两次分红，根据社员需要给实物(脸盆、毛巾之类)或现金。广大社员把合作社视为在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经济组织，它不仅减除了商人中间剥削，而且原来不可能买到的东西，现在不出村就能买到，节省了劳力，促进了该村农副业的生产。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马安村“农民合作社”办得有声有色，深受广大社员群众拥护，1944年，曾受房山县政府大会表扬，谓之“主动办社”、“为群众排忧解难”，号召各村学习马安。

## 建立合作社办事处及医药合作社

一、房山一区合作社办事处，建于1945年3月，地址龙门台杨宝斋家北房三间。合作社办事处主任隗永增，采购刘同春，会计梁巨来。合作社办事处宗旨是，组建合作社，扶植农副业生产。

合作社办事处首先建立的是“医药合作社”，社址同办事处二起，医生郑玉山。吸收社员办法，采取随看病随发展社员，秋后集股入社，每股玉米十斤。医治方法，为解决社员群众的困苦，“药社”开始采取看病拿药先记帐、秋后算帐的便民方法。“药社”盈利三七开，年终结帐后以盈利的百分之三十向社员分红，百分之七十归“药社”及办事处作为办公费用。进药大部由河北村与南窖村的通信成、通顺成药铺，成交是以当地收购上来的药材折价换取“药社”缺货及丸散膏丹等成药。合作社办事处除组织社员群众上山割荆条刨药材等副业生产、开展收购业务外，在办事处还建立了织布生产，有织布机两架。为增加社员收入，把棉花发给社员进行纺线，采取一斤棉花交十二两(十六两一斤)线，不付工资多交线多收入的办法。社员纺的是纬线，经线要从南窖收买，每匹布为五十二尺，布面宽为一尺四寸，销于当地。

组建集市：合作社办事处建立后，为了迅速发展本区经济，繁荣市场，在龙门台合作社办事处所在地，建立了集市贸易，方便了群众，互通了有无。

二、房山二区十渡医药合作社，建于1945年3月，当时二区为解决当地广大群众看病难，直接影响着群众的生产与生活，区公所作出决定，先由区公所拨小米一千斤做为底垫建起二区医药合作社。社址在十渡村下街齐彦荣家，占房两间。主任齐奉先(兼“药社”医生)，司药李庭巨，共计两个人。

他们是白手起家，勤俭办社。除由外地购进部分缺货以外，大部草药是就地取材。开始他们是半日看病，半日上山采药，回来自己炮制，后来才进行收购当地药材，加工出口换回成、缺货品弥补所需之不足。

走村串户巡回医疗。在贫困的山区有史以来由于贫困缺医，而使人们养成有了病习惯于扎扎、捏捏、拔

罐子发汗以及用一些土偏方为主要医疗法，病不到十成不请医，有时常常被那些进山卖野药的坑骗钱财，误病甚至丧命。“药社”建立后，他们根据群众抗病的习性，上门看病的少，登门请医的多等情况，“药社”医生齐奉先一出去就是几天，“药社”里只剩下一个十八岁的司药李庭巨，整天里一边见方子拿药，一边炮制药材，长期出不去门，有时因断粮而挨饿。虽然他们的工作很艰苦，但为了抗战，为了人民，他们对工作尽心尽力，非常认真。

(《房山文史资料》第2辑)

## 解放战争时期的北窖农民合作社

王绍清 侯之扬

房山县城西北，在高耸的杨家大岭峰峦层叠的背后，山洼之中，聚居着四百余户人家。这就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曾为组织社员发动群众与敌斗争、生产渡荒有功，受到平西北岳区誉为“合作指南”光辉称号的北窖农民合作社所在地北窖村。该村地处山环、土薄地少，但煤藏丰富，果木遍山，以板栗驰名中外(即良乡栗产地)，“唐时列为土贡”。这里的人民勤劳勇敢、善良朴实，是个幽静富庶的山庄。

七七事变后，北窖村处在了日寇铁蹄、国民党、还乡团的骚扰破坏及其实行的“三光政策”、“经济封锁”残酷恶劣的环境之中。该村曾多次遭受敌人的狂轰乱炸和扫荡，损失极为惨重，墙倒屋塌，人畜伤亡，粮物被抢劫一空，致使二十多座小煤窑停业梦断绝了生活来源。又加之连年天旱无雨，土地荒芜，人民生活极度困难。

该村四百五十七户，当时已断粮的有八十三户，二百零四口人；能维持一个月生活的八十六户，三百二十口人；能维持两个月生活的一百三十三户，五百五十八口人；能维持三个月生活的四十七户，二百二十六口人；能维持三个月以上的八十九户，四百五十四口人。

随着平西抗战的胜利，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和巩固，敌伪军、还乡团畏缩于城内，革命政权迅速建立，北窖村得到了解放。党和人民政府为了尽快的医治该村在战争中受到的创伤，解决人民群众当前的严重饥荒，与民同呼吸共命运，宣传党的政策，开展土地革命，成立农民合作社。

在主任吕玉山的积极组织下，先后两次发展社员四百多名，股金边币一千二百万元(合人民币一千二百元)，于1946年2月正式成立起北窖农民合作社。

合作社建立了，当务之急是土特产的输出和主要商品的输入，当时敌人虽已不敢出来扫荡骚扰，但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更厉害了，推销土特产换回日用必需品，在当时是相当困难的。但在我党民主政治的宣传鼓舞下，人民很快提高了觉悟，对敌人的封锁毫不畏惧。正如我们走访的北窖农民合作社主任吕玉山同志所说：“合作社是为社员谋福利，没有盐吃想法到外边给台弄盐，没有油点灯想法给弄煤油，叫社员挨饿那还行，多危险也得去呀！”话虽不多，却是极中肯的，为全村群众活下去，是不怕担风走险的。他们夜间爬山越岭，走的是坎坷崎岖、一般人识别不出、打柴放羊走过的山道，到距敌人老窝四、五里远的关系户，用山货换回必需的商品，这背出去的只能是少量的换回急需的，大批的是在人民政府扶助下，以合作为中心负责组织全村劳力“生产自救”。

在一年的时间内，该村共组织起砸核桃、砸杏核、熬油、运输、纺线、织布飞织袜子、卷纸烟、编筐、

打麻绳、打铁、擻木榄叶熬染料膏子等十一项副业生产，共组织男女劳力和老少近千人。使六千余斤杏核、二十多万斤桃核和栗子有了销路。织布百余匹，卷纸烟六目多条，织袜子二百多双，打大帽鞋钉二万三千个。用木榄叶烧灰熬染料两万多斤，总收入粮食达三十二万多斤。不但解决了本村的自需和生活出路，并支援了友临村庄的需要。由此这个被敌人摧残践踏得奄奄一息的山庄又生气勃勃地发展起来了。

（《房山文史资料》第2辑）

## 房山工商局发展简史

张志福

房山县早在1947年就设有工商管理机构。工商管理人员在县委和县委政府的领导下，为发展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经济，反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经济封锁，改善群众生活，发展生产，就开展城乡自由贸易，组织一些进步商贩经营商品，为解放区运送食盐、食油、布匹、煤油、纸张、火柴等生活日用品。同时协助地下组织秘密了解敌情，投送情报。

1947年前后，房山在六渡有一个国营商店，当时国营商店对敌战区叫精华贸易公司。商店主要经营干鲜果品、日用百货、土特产品等商品。工商管理根据县委的指示，一方面开展解放区的工商业、国营商业和手工业，另一方面通过国营商业，为解放区秘密经营武器、弹药，及时加强地方武装的力量。对保证战时供给，安定群众生活，为房山县人民的解放事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8年12月房山县解放，1949年2月房山县人民政府成立工商行政管理科。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开始了恢复国民经济。在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参与了没收官僚资本，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同时组织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社会主义改造准备条件。五十年代初期，房山县工商科对全县的市场进行了整顿，对个体、集体飞国营工商业进行了登记注册。尤其是用行政手段加强了金融管理和市场管理，运用法律手段严厉地打击投机倒把活动，以保证物价的持续稳定和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

1956年房山县人民政府成立了商业局，工商行政管理归属于商业局，对企业实行了归口管理，从此专职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自己消失。1960年3月，房山县人民政府成立市场物价管理委员会。通过市场管理，维护集体经济保证；国家计划收购任务的顺利完成。加强市场经济活动的监督和管理，打击资本主义势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左”的思潮影响下，房山县人民政府没有设立专门的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工商行政管理处于瘫痪状态。1968年房山县革命委员会设立了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临时机构，1972年3月建立房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处，下设七个市场管理委员会。工商行政管理处的宗旨是贯彻执行当时国家制定的农村经济政策，开始注意宏观经济的监督和管理。

1978年8月，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恢复原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建制，在工商行政管理处的基础上，扩大编制，建立了房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机关下设办公室、政工科、市场管理科、企业登记科，基层设有九个工商行政管理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工商行政管理局由机关的三科一

室,发展到七科一室,即:市场管理科、企业登记科、经济合同科、个体管理科、经济检查科、商标广告科、人事科、办公室。基层由原来的九个工商行政管理所,发展到十一个工商行政管理所,三个市场管理所。从1972年成立工商行政管理处以来截止到1986年底,全局由原来的三十七名干部发展到一百六十八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商行政管理主要职能是: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与监督,对各种经济形式的工商企业,在纵向和横向上进行指导监督、服务和协调,维护国家经济秩序,保证国民经济计划的实现。

(《房山文史资料》第2辑)

作者系房山工商分局机关党委副书记科员

## 房山“坨里高线风潮”事略 ——清末民初房山地区农民斗争史料

段天顺

清代光绪末年到民国初年,在北京郊区房山县的河套沟地区爆发过一场轰动整个北京地区的“坨里高线风潮”。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所说“坨里高线风潮”,就是房山县河套沟地区二十七个村庄(即今河北、班各庄、长操、南窖、坨里五个乡范围)的农民联合起来,先向坨里运煤高线的资本家,随后又向当地豪绅进行的一场规模相当大的经济斗争,时间持续达数年之久。

这场斗争发生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煤的运输问题而引起的。

房山县西北山区的大安山和贯穿房山中心的大房山一带都蕴藏有大量的煤。早在金、元时代,即由当地人进行小规模土法开采,到了清末民初开采规模日益扩大。仅房山西北河套沟的南、北窖、三安子、英水、杏园、南北车营等地就有煤窑八十多座。据民国九年农商部《西北地质志》载,这一带煤年产量达到五十余万吨。京汉铁路坨里支线修建后,坨里就成为河套沟地区煤的集散地。通过坨里铁路支线将煤运往北京(占百分之六十)、天津和保定。那时,从煤的生产地运到坨里,都是靠人背畜驮(骡、马、驴、骆驼等)。整个地区每天有几千头牲畜往返驮运,除地主乡绅的骆驼队、骡马帮以外,还有相当多的农户都有三几头牲畜参加运输。随着畜力运输业的发展,为运输服务手工业(荆编、马掌铺、铁匠炉等)、商业(包括小旅店、饭铺、骡马店等)也兴旺起来。象河北庄、磁家务、石梯、坨里等村镇,都成了繁华的小集镇,河北庄被称为当地有名的“小北京”。据《房山县志》记载,坨里镇光是煤业商号就有二十几家之多。可见,那时的畜力运输业已成为乡绅、地主、资本家发财致富之道,也成为挣扎在饥饿线上广大农民群众赖以糊口的生命线。

约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天津盐商王贤宾等人合股集资(据说到民国初年又有军阀曹锟、段祺瑞的部下入股),为了提高煤的运输量,从河套沟西部的三安子一带到东部的坨里,依山势高低,修建了一条长约五十多里的空中缆道,缆道上挂车斗,作为一条空中运煤的运输线路。这条空中缆道,俗称“坨里高线”,由德国人设计并提供设备,是以中国铁路工人为骨干修建起来的。缆道运输沿线设十三个小站,中间设中转

站，从业人员最多曾达到几百人。用这条索道运煤，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运输量占了全年运煤量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高线运输代替了很大一部分畜力运输。这样一来，畜力运输业很快衰落下去，许多商店、作坊也纷纷倒闭，当地乡绅、地主、资本家等遭到沉重的经济打击，广大农民生活也受到严重威胁。“山雨欲来风满楼”，河套沟地区很快就出现了各阶层大联合的“阻路风潮”。

斗争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二十七个村乡绅和广大农民联合起来，对坨里高线资本家的斗争。斗争一直是采取打官司的方式进行的。开始时(大约光绪三十三年、四年)二十七个村推举代表(分为文代表和武代表)向北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据人回忆，代表中记得起来的有：北窖张云普、辛庄李林、李各庄段茂森、东庄子村殷祖盘、刘振兴、彭江、河东村段辑五、段茂桐、上水碾村左光明、檀木港村郝鸿慈、黄土坡村杨××等等。法院当局最初曾用企图向西北移民的办法结案，但由于农民热土难离，而且移民耗资很大，未获解决。不久，资本家买通了地方法院当局，法院竟将二十七村的主要代表殷祖盘逮捕入狱，并百般折磨，终致病死狱中。殷是东庄子村人(现属河北乡)，死时年仅二十八岁。曾任县模范小学教员、劝学所所员，是个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的死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斗争的决心，人们编了歌谣来赞颂他，民间剧团编了戏进行沿村演唱。斗争获得了全县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也得到房山县知事和其他官员的同情和支持，高线运煤工人也罢工，使坨里高线运输停工两个多月。最后经最高法院判决，自高线运煤之日起，资本家每年向二十村付津贴款四千大洋，做为“贫民生计和国民学校学款”之用。这场斗争由此告一段落。

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斗争的果实经常被当地豪绅们所侵吞克扣，引起广大农民群众强烈不满。斗争转入第二阶段，出现了广大农民向当地豪绅进行的侵吞反克扣的斗争，先后持续了几年的时间。

原来二十七村的代表中，一部分是各村掌权的豪绅、地主(多数是文代表)，一部分是不掌权的农民代表(多数为武代表)。在联合向运煤高线资本家斗争获胜后，每年付给的津贴款项实际大部分落到了掌权的地主乡绅的手里，农民得不到什么。这就引起了代表的分化，一部分农民代表带领广大农民转向对地主豪绅的斗争。

其间曾有两次大的斗争高潮。

一次是旧历年关斗争。旧社会的年关是穷人的鬼门关。当年关到来时，答应给农民的津贴款仍没有发到农民手里。农民们起来找豪绅们要款，各村联合响应。豪绅们为了把这场斗争镇压下去。就向县府诬告农民代表段辑五挑动农民用新棉花沾煤油把高线烧了。县府连夜派人调查全无此事。段辑五据理力争，不依不饶。房山县知事苦无办法，威胁段辑五说：“象你这号人，就欠挨一炸弹！”但农民们毫无惧色，仍然坚持斗争，终于在大年三十晚上争得了被克扣的津贴款，斗争获得了胜利。

还有一次大的群众斗争。大约在1914年左右，农民代表与豪绅代表相约在河北庄铁瓦殿大庙对几年来津贴款的收付进行算帐。当农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都纷纷拥至庙前，把铁瓦殿大庙围得水泄不通。此时，庙里是农民代表的斥责质问，庙外是上千群众的喧声呐喊，把豪绅们吓得魂不附体，乖乖答应了农民们的要求。有劣迹的豪绅们不敢从正门走出，偷偷从后墙溜走了，有的还被农民痛打一顿，险些送了性命。这次斗争大大长了农民的威风，挫了豪绅们的盛气，获得了重大胜利。

应该说，房山河套沟地区的农民们通过这次持续几年的斗争，虽然每户每年仅仅获得几个铜板，但却锻炼了广大农民的斗争意志，提高了斗争本领，为以后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作了准备。

(《房山文史资料》第3辑)

本文作者系原北京市水利局局长

## 民国时期的房良合作社

王绍清 侯之扬

### 概述

房、良地区合作社的历史已久，在民国期间，无论“七七”事变前的国民政府，还是“七七”事变后的抗日根据地、日军占领区，以及日军投降后的蒋管区、解放区，根据所需，都各自建有合作社。但当时的合作社尚未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又因时过境迁，人们对合作社的记忆已遗忘不清。在老一辈人当中，除当事人（健在者已无几）尚能回忆起外，其他人提起来，只在印象中有过合作社，详情记忆无存，年轻人更是闻所未闻。在战乱期间，又很少有人为合作事业著书、立传、登报、上刊，就连知识界也少有人知。因此，作为当代合作社工作者来说，进一步探讨研究合作社，写好合作社史，是责无旁贷的当务之急。

### 合作社之始

房、良的合作社始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较北京大学“消费公社”晚八年，迟于随“五四”运动俱来的国内合作运动七年。我国自秦、汉以来，由于在伦理的束缚下，时时在讲知足，事事在讲知止，故经济思想趋于守旧。缘欧风东渐，才觉中国农工商商业的落后，就中国合作运动而言，较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迟了七十五年。

### 合作社的起源

合作运动起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它是被剥削被压迫劳动群众的社会运动。合作运动广泛发展之前的十九世纪初叶，合作社的启蒙者为英国的欧文、法国的傅立叶和圣西门等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想通过和平道路，用合作社组织起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但受社会制度的制约，他们虽曾努力宣传，尽力实验，终究失败。但对以后的合作社运动，却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

时至1844年12月，在英国北部罗须特尔镇的工人运动中，由二十八个纺织工人组织起一个“罗须特尔公平先锋社”，是世界上为减除商人中间剥削，改善工人生活，能够巩固和发展起来的第一个“工人消费合作社”。

鉴于罗须特尔合作社的经营原则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同时又能适应资本主义环境，后来各资本主义国家消费合作社的经营，大多采用它的原则。

### 国内两种不同性质的合作社

中国合作运动是随“五四”运动而出现的，所以开始传播时，就出现了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合作社思想与改良主义的合作社思想对立的局面。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合作社，是随着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是真正的劳动人民的合作社组织。它的宗旨是为“贫农打算”，是生产者自助互助的团体，其组织是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上，

并不把它视为单纯的商业企业，而是把合作社运动做为引导工人、农民参加革命的方法之一，以便把合作社的革命群众集中起来，组成战斗团体，同工会采取一致行动，从而争取革命的胜利(如1922年潮汕铁路工人组建的汕头米业合作社，是年7月由安源路矿工人组建的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以及苏区、根据地、解放区建立的消费、贩卖、信用、运输、粮食、耕牛、渔业、医药、手工业生产和延安南区式的综合性合作社等)。

改良主义的合作社思想，是以“合作社社会主义”理论为宗旨。它把当时中国社会的落后，广大人民的贫困，以及各阶级之间的矛盾，都归咎于没有合作社，把合作社视为阶级调和的工具。改良主义的合作社倡导者薛先舟主张要实现民生主义，以国家的权力，用大规模的计划去促进全国的合作化，实行全国合作共和。他提出：“由合作社运动而实现社会革命，唯有合作，始能防止资本主义；唯有合作，始能打倒共产主义；有了合作，社会革命始能实现”。

改良主义的合作社运动，在“北伐”前，为提倡、宣传、示范阶段，“北伐”胜利后，国共分裂，蒋介石在南京成立政府，视合作运动的重要，竭力提倡，广泛建立。于民国二十四年五月九日，在实业部设立合作司，九月一日施行合作法。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公布施行修改后的合作社法。在组织合作社过程中，是按合作社章法建社，但在行为上却与他们所提倡的合作社能发展“平民经济”、“繁荣农村”的谈法，反其道而行之。事实上合作社领导权是控制在国民党CC派手里，把合作社规定为“七项运动之一”，使合作社与保甲运动联系起来，从组织上和立法上把合作社控制起来，把合作社作为巩固统治农村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基层合作社的权力，掌握在富有阶层和保甲长等人手中，而无补于广大劳苦群众。

## 华洋义赈会为防灾举办合作社

当时除国、共两党建立的两种不同性质的合作社之外，还有“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组织领导下的合作社。

“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的由来，是源于民国九年(1920年)北方五省的大旱灾。当时待赈济者有三千余万人，单就国人的奔走呼号，劝捐募款以谋救恤是不够的，也要争取一部分外国人要尽其互助上的本能，乃联合国人和外国人作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劝募运动。赈务结束，即1921年，将其余款移作基金，成立“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各省设立分会，其目的一是筹办赈救天灾，二是提倡防灾事业。最后通过会议决议，以举办“合作社”为救济农民困苦的最好方法。自民国十二年四月始，首先在河北省组建了一批“信用合作社”，但其联合的社员绝大多数是中农以上的富有阶层，合作社的领导权掌握在地主富农手中，给劳动的困苦农民带来的利益甚微。

## 日本侵略军在占领区举办合作社

日本建立合作社，在世界上也是较早的国家，于1895年正式颁布合作社法，所以在他侵略中国后，很快在其占领区组建合作社，其目的在于殖化反共，施行经济封锁强力统治物资。通过合作社，完全控制人民一切生活物资与日用必需品，实行配售制度，发展农副业生产，意在达其以战养战的目的。

## 房良早期的合作社

房良早期的合作社，始于民国十四年，是“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河北省分会，在房、良两地经常受灾的农村，举办的“信用合作社”。据当地调查，华洋义赈会在良乡、琉璃河，由谢华臣负责曾组织过“信用合作社”，并贷款给困难百姓。据北京图书馆有关中国华洋义赈总会的部分史料中记载，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河北省各县合作社数统计表中：良乡共有“信用合作社”四个，其中被承认社一个，未承认

社三个；房山共有“信用合作社”二十三个，其中被承认社十一个，未承认社十二个。又据同年底合作放款县别统计表中：房山借款社数六个，借款社员数一百零七人，借款额数二千四百二十元。其借款利率为划一起见，于民国二十四年一月一日起改为月利八厘。又查“华洋义赈总会”，民国二十三年总结资料中：“房山县，白岱社，已无形停顿，历经派调查人员鼓励无效自愿停办，承认书及长方形社戳，均经调查员携带回会，经合委办会第八十五次会议议决取消”。因对该会办社具体情况缺乏，又便于对“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举办的信用合作社有所了解，特将该会所推行的方案、章程、准则等原文附后。

### 附一：

#### 本会推行合作事业方案

(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一三五次执行委员会通过)

一、本会提倡合作事业之目的在救济农村贫困促进农业建设故本会合作事业应以农村为对象。

二、合作社乃农民自身之组织其发达与进展应基于人民之自觉与努力但在农民能力尚在薄弱之时本会应尽全力灌输关于合作之知识技能及供给资金之便利以引冀农民之兴趣与热心以连纯由农民自动组织合作社及联合会之境地。

三、本会推行合作之时应以物质增进及精神陶冶并重并于合作之推行同时国民道德亦有向上之趋势与实践之机会。

四、本会推行合作先从信用合作入手但因地方需要亦可先由运销合作或供给合作或利用合作入手唯以一村只组织一社由一社兼营各种业务以便集中人力财力为原则。

五、本会指导合作人员应随时指导各社各联会在可能范围内与办切身需要各种公益事业如提倡节俭戒烟戒酒与举办民众学校养老恤贫之类是。

六、提倡农家副业及较大规模之共同生产事业对确有把握之生产事如旱田掘井类可以扩大经济的协助。

七、本会对于中央及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学术团体以及营利团体之有益农村建设之工作均当予以充分之协助力避重复冲突等弊以求事工之一致而增进工作之效能。

八、在不妨碍合作事业生存发展之条件下介绍资金流入农村。

九、一切章程规则均依据现行法规订定之。

### 附二：

#### 贷放准则

(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一三五次执行委员会通过)

一、合作社借款以业经本会承认且遵守本会章则及接受本会指导之合作社为限。

二、合作社借款之最高限度按照所经营之业务分别规定其标准如左。

(甲)为经营信用业务而借之款其数额以社员每人平均二十元为准。

(乙)为经营运销业务而借之款其数额以运销产品百分之七十为准办理青苗抵押时以上年度实收产量或本年度估计产量百分之二十为限。

(丙)为经营供给业务而借之款其数额以所需供给数量三个月为准但平均不得超过社员每人二十元。

(丁)为经营利用及生产业务而借之款其数额以其设备总值百分之八十为限。

三、合作社同时兼营数种业务时得分别商订借款但其总额除经营运销或利用或生产业务著有成绩者得随时特予核定外通常以平均社员每人六十元为限。

四、上项借款标准得各斟酌当地情形再依照合作社社务考成及成立年限区别规定之。

五、保证责任合作社借款总额以其所认股额及保证金额之合计额五倍以内为准有限责任合作社借款总额以其所认股额三倍以内为准。

六、合作社借款时须将该社未清债务详细申明本会认其负债能力不充足时得减少放款额或停止放款。

七、还款期限依经营业务之种类及还款来源(借款时须申明还款来源)而定其属于运销者最长不得过一年属于信用供给者最长不得过三年属于利用者最长不得过五年在此限度内并得订定分期归还办法。

八、还款日期载明合同但得随时提前偿还借款之全部或一部其到期不还者在延期内之利率应按原订利率增加四厘且延期至长不得超过一个月以上。

九、借款利率以月利八厘为准但得各依当地情形分别规定之。

十、借款利息自本会付款之日起至还款之日止(以收据及汇款票据为凭)所有汇况期间之损失其属于付款者归合作社负担属于还款者归本会负担。

十一、借款免费属于付款者归本会负担属于还款者归合作社负担。

十二、合作社借款侧重(集合使用)借款后尚有违背原订用途情事发生或社务上业务上发生任何变化时本会均得斟酌情形随时提前收回借款之全部或一部。

十三、联合会借款时准用本件之规定。

### 附三：

## 联合会章程拟订准则

(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一三五次执行委员会通过)

一、区联合会设于有合作社各村之经济中心即以与该中心有经济联系之地域为区域但不得超越县境县联合会当以县之区域为县域。

二、区联合会之名称以会址所在地地名定之如县区联合会是。

三、凡有县联合会之县份不必再组区联合会但得于相当地点由县联合会设办事处。

四、联合会法定有有限与保证两种但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以采用保证责任为准且会股金额应以每股五十元为准每社或会之认股多寡以各该社或会之人数比例定之以每二十人认纳一股为准。

五、保证金额以所认会股之十倍为准。

六、联合会之盈余分配方法准用合作社准则之规定。

七、联合会会员入会时应各缴入会费五元。

八、合作社或联合会出席于联合会之代表依各该社或会之人数定之。

附四:

合作事业人员标准薪给表

(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一三五次执行委员会通过)

等次		甲等	乙等	丙等
程度		大学	高中	初中
级 次 及 薪 额	见试	0	0	0
	习用	0	0	0
	一	60	40	20
	二	75	50	25
	三	90	60	30
	四	105	70	35
	五	120	80	40
	六	140	95	50
	七	160	110	60
	八	180	125	70
	九	200	140	80
	十	220	155	90

[附注]

一、见习以一个月为期间试用甲乙两等为二个月丙等为三个月。

二、进级以一年一级为准(进至丙等十级者得继续乙等七级及进至乙等十级者得继续甲等七级递进)但得依工作之考成特予提升或留级及降级。

三、等级之起止并须参照所在职务分别规定其标准如左

(甲)书记司事力、事员等自丙一起至丙五上(二〇——四〇)

(乙)股员课员调查员等自丙三乙一及甲一起至丙七乙三及甲一止(三〇——六〇)

(丙)课长视察员等自丙七乙三及甲一起至乙七甲五止(六〇——二〇)

(丁)组长股长主任等自乙八甲六起至甲十止(一二五——二二〇)

四、具有有关经验之人员开始任用其等级得斟酌定之。

五、大学程度以上及进至甲十以后之人员其薪额得临时定之。

六、本件标准薪给之规定实行时各地得依其经费预算为比例之变通。

## 附五：

## 农村合作社章程拟订准则

(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一三五次执行委员会通过)

一、名称：以社址所在地名定之。

二、责任：

(甲) 信用社以无限责任为宜。

(乙) 运销供给利用等社均以保证责任为宜。

(丙) 凡兼管他种业务者依其原定之责任为责任。

三、区域：各种合作社区域以一村为准其距离相近之村庄亦可共同组织但一村不得组织同一性质之两社。

四、社员：以农民为主其情愿入社而尚未照章取得社员资格者得为预备社员此项预备社员得享受本社之便利但不得参与社务及申请信用借款。

五、社股：社股股额以三元为准在一年内分期缴齐以后每年至少续认一股至五年为度其兼营业务者每增加业务一种至少添认一股。

六、盈余分配：信用社股息以年利六厘为准公积金百分之四十公益金百分之二十酬劳百分之十其余百分之三十为储蓄奖励金或按交易额分配于社员。

凡兼营业务之合作社各部业务会计独立但所得盈余混合分配之其预备社员应得之储蓄奖励金或交易额分红由社暂为存储将来入社时抵充社股如三年以内不能入社时即拨充公积金。

七、保证额：保证责任合作社之保证金额以十倍为准。

## 国民政府在房良举办合作社

继“华洋义赈会”之后，在房、良两地于民国二十四年四月，国民政府实业部颁布农村合作社暂行规程，各省建设厅设立合作指导委员会。房山于是年上半年，在河北省合作指导委员会领导下，在县政府建设科设一名合作指导员，并成立民众教育传习所，宣传、培训合作社干部，组织业校。房山九个行政区，各选派三名专职人员，由政府合作指导员李启如主持，举办了第一期“合作训练班”（地址在孔庙教育馆院内）。学期半年，其课程以中央合作法为主，结合学习合作社法施行细则、合作社暂行规程以及如何组建村合作社和组建合作社的重要性等内容。讲师有韩效侯、济冠英、李启如。学习期满后各自回村宣传组建合作社。当时办社较快较好的合作社是一区夏村，由民众自愿入股，选举理监事会，该村曹立本当选为理事，社址设在曹的院内，日用商品齐全。为推动合作社的迅速发展，县组织各区办社人员，到夏村合作社进行了参观学习。

“七七”事变前的良乡县合作社组建状况。从“七七”事变后日军办的《新民月刊》中查到1938年春《肖昔生良乡调查》一文。文中叙述到：“良乡合作社事变前业经成立，章则亦已订妥，各村正式成立者约二十余村，唯一般人民未得其实利。其组织方法，每社理事五人，监事三人，及司库计等。统辖于县政府第三科建设科。本县合作社，初由华洋义赈会来提倡，创办成立后归华北合作委员会统辖，唯成立以来，除信用合作稍见成绩外，余多未见实效”。

自民国十四年至二十六年房、良两县共建信用、消费合作社有五十多个。

## 日本侵略军在房良沦陷区举办合作社

“七七”事变良乡全境沦陷后，日军为了稳定民心，整顿社会秩序，于1938年春组织了一个良乡县战后社会调查小组。调查结束后，组员肖昔生(中国人)，在新民月刊内作了报导，他说：“良乡事变后，富室逃避他乡，警团解体，加以兵事之余，散兵游勇，聚众劫掠，粮食缺乏，金融吃紧，民生愈困，饥民铤而走险，流为盗匪，社会秩序完全破坏，即中产之家，亦不敢安居乡里”，因此日军确定良乡为新民会实验县。为整顿农村经济，恢复农业生产，肖在报导中又说，“盖目下本县金融吃紧，人民借取无门，交易停止，尤其春耕期间，应先借与种籽及肥料等现款，至秋归还。如此不但可以救济农村之贫困，且可避免将来之凶荒，引起人民之信仰，则推行合作自可得良好之基础。……据彼之见，此时推行合作运动，应由信用合作做起，渐及其他”。

在调查后的第二年，1939年2月，由良乡新民会以协助指导的方式，先后组织村“新民合作社”七十六个，拥有社员二千五百九十九人。在全县九十三个乡镇当中，除河东村落因隔永定河难于管制外，普遍建立了合作社。建社后各社都订立了“河北省良乡实验县村新民合作社规约”，共三十六条。根据规约第十七条之规定，设置如下之役员：理事长一名，理事四名，监事长一名，监事四名。又按规约第十八条之规定，理事长从社员互相选举五名理事中，由县指导部及县联合会任命之，任期二年。但连选得连任之，监事由社员中选任之，并互推一人为监事长，连选得连任之。

合作社的经营是以民众生活日用品为主。良乡县合作社联合会，在城内南大街设立一个合作社购买部。购入大宗民众日用之需要物品，以最低价格供给农村社，免除商人之重利剥削。为了联络与商人之间的感情，双方互不侵害，采取向各大商店进行批发。

为普及民众对“新民合作社”的认识，健全“新民合作社的组织，创设合作社传习会，对优秀之理监事加以合作事业的训练，灌输合作理论，业务执行技术”等。时间在1939年4月，时值春耕季节，由原定学习一周改为五日，后又缩短到三日。为弥补之不足，传习会将所有讲义及其他重要资料在《新良乡月刊》上辑成专号刊登，然后再由各社理监事，召集社员甚至村民进行广泛的宣传、灌输、讲解。

房山沦陷区在新民会组织领导下，于1941年春，成立“县合作社联合会”。设理事长、副理事长各一名，常务理事一名，理事三名，监事二名。理事长无，副理事长中小洛道田(日本人)，常务理事田口多喜雄(日本人)，理事三个系本县城内豪绅，监事二人系本县乡绅。下设总务、信贷、业务三个科和南大街购买部一个，资金上级拨款。主要供应面粉、食盐、火柴、煤油、布匹、纸张等日用品必需品，还供应鸡雏、白薯秧、树苗，肥田粉等生产资料。为稳定物价，价格比市场上便宜。上级业务关系是北京合作社地区业务办事处。为了农事之改良，合作社在房山城南肖庄建立了一个“农业实验场”，专门培育推广薯秧、小鸡、洋槐树苗等优良品种。新民合作社，除经营上述业务外，还负责管理交易市场和税收。

在农村采取村村建社，以各户户主为社员，以人定股(每人一股)，每股(伪币)二元。合作社发展之速，建社之广，但虚有其名，与合作社之规约而皆非。绝大多数社是掌握在保公所手里，有社见不到货。特别是晋察冀边区，冀中和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固与壮大，牵制了日军的行动。不但打乱日军侵华的战略计划，同时日军在沦陷区的后方，梦寐通过合作社运动，达其以战养战的经济目的，也未能如愿已偿。当时沦陷区的经济崩溃已无法控制，老百姓给他们总结了一句话：“日本兵吃高粱米没法子”，日军的处境不言而喻。

日军为拯救面临的经济危机，极力利用合作社，充当其实行经济封锁的工具，强力统治物资，对几种主要生活必需品，食盐、火柴、煤油等，实行配售制度，但时有时无。不久，就这点点配售商品也很难见到了。平日百姓吃的是小盐、混合面，用的是火镰，点灯用的是大麻子串。“新民合作社”是名存实亡，百姓称它是“味

心合作社”，是套在百姓脖子上的枷锁。

日伪县合作社的覆灭：1945年7月17日，八路军七团夜袭房山县城的战斗中，在随军入城的民兵、担架队群愤之下，把南门里日伪合作社的三百多匹布和纸张肥皂等运走，而后付之一炬。

## 日本投降后房良蒋管区的合作社

日本投降后，房、良沦陷区，国民党害怕八路军收复，蒋伪合流向人民夺取胜利果实。房、良伪军摇身一变又成为国民党地方保安团，伪官吏被加委成了先遣要员，置八年抗战人民的灾难而不顾，继续反共与人民为敌。效仿日军之政策，大肆向解放区进行“围剿”，实行“经济封锁”，其势比日军有甚之而无不及，严厉统治物资，臆想通过合作社力挽农村经济危机。

房、良两县在国民党统治区，于1947年3月先后成立“县合作社联合社”。房山县联社设在城内北街福音堂。县联社由理监事会组成，理事由十个乡乡长担任，常务理事主席王星三兼经理，监事三人主席一人。城内北街设直属门市部一个，经营火柴、食盐、布匹、百货等日用品。

各乡设中心社，各村以保建立“保合作社”，每股法币一千元，全县约收集社员股金二千多万元。

房、良国民党合作社成立，正值国、共和谈破裂，内战爆发，蒋介石全面进攻被粉碎。处于经济全面崩溃，商品奇缺，物价暴涨，民心动摇的时期。国民党对合作运动的发展与巩固，已无力顾及。

在县级以上合作系统，即无业务主管机构，又无商品调拨、批发，组织徒具虚名，是一个没有物质基础的空架子。

县合作社是内无资金外无货源。在资金方面，除当地政府投给一小部分外，急需时要靠向上级贷款，根本不能满足需要。在货源方面，合作社只能从私商批发进货，对奇缺商品，要靠自身投门路搞关系解决一部分。

国民党房山县联社，在建社一年多的期间内曾做了三件大事：（一）1948年春，县联社向北平合作金库给棉农按种植棉花户，取得每户十元的贷款；（二）县联社因统治区严重缺盐，经理张××亲自去天津托亲靠友，百般周折，好不容易从河北省银行天津分行农贷股，取得五千元金元券的贷款，由天津茶淀购进食盐两车皮，分给各中心社；（三）从北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运回煤油五大桶。政府得知，还被留做县军政机关使用。

房、良两县自1947年初，在国民党统治区，政治、军事、经济严重危机的形势下，刚刚成立的县合作社情况如此，更何况在我党政治、军事深入影响下的农村，其情况就可想而知。除县城附近尚有几个“保合作社”还能有点日用商品维持经营外，大多数合作社的情况是：入股后无社，有社者而无货，普遍处于消极懈怠状态。

1948年8月，国民党房山县联社理事会选举业务员张××任经理，又经经理张推荐，调夏村乡中心社张××为副经理。

1948年12月14日，房山县城解放，国民党房山县合作社联合社的帐目财产，经副经理张××向县人民政府实业科做了交接。

（《房山文史资料》第3辑）

## 解放战争时期的房良合作社

王绍清 侯之扬

### 房良形势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房、良两县的解放区已由南面拒马河谷的千河口、北面河套沟里的石堡，向外扩大到北起大灰厂，南至坨里、黄山店、南尚乐等一带村庄。为了巩固解放区，开展减租减息和清算复仇运动，以及把工作迅速而有力的推向平原的需要，1945年9月，房山县政府由南窖迁到张坊，坨里以内的河套沟划给良乡，在河北村正式成立良乡县政府。11月良乡县政府改为良乡县佐公署。

1946年6月，蒋介石背信弃义，再次挑起内战。房、良两县由伪军摇身一变的国民党保安团，配合国民党军队，疯狂向我解放区发起进攻，出入河套沟的咽喉要地——坨里被敌占据，从而形成敌人以房山、良乡、琉璃河、长沟、周口店、坨里为重地包围着解放区，筑堡设防，严密封锁了我解放区通向平原的主要通道，不断袭击我解放区边缘地带，使我解放区在军事、经济上处于困境。

房、良两县的党和人民政府，为了巩固新解放区，特别是坨里以里日伪军长期占据蹂躏的河北、南窖、长操、大安山等地区的一些村庄，为尽快医治战争创伤，解决广大人民群众面临的严重饥荒，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深入地宣传党的政策，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减租减息运动，迅速发展国营商业和村“农民合作社”。结合双减运动，以合作社为中心组织各村劳力，通过开展各项副业“生产自救”，恢复农业生产，冲破敌人经济封锁开展供销。当时合作社对恢复与巩固党在农村的政治、经济秩序，齐心协力地支援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

### 房山合作社沿革

一、房山县在抗日战争沿袭下来的合作社，有马安村合作社、十渡二区医药合作社、龙门台一区合作社办事处及医药部。

1. 马安合作社。自1943年建社至1948年，由于解放区迅速扩大，蒋家王朝将崩溃，房山老区和半老区已经土改，机关商店——“万顺兴”、“华兴号”在张坊建立。十渡、白岱集市贸易繁荣，群众买卖东西方便。马安村的干部因解放大业的需要，大部提干调出，马安“村合作社”，因一时无人管理，而告退股解散。

2. 十渡二区医药合作社。日军投降后，由十渡下迁到西庄村。至1948年4月，房山县政府决定，以二区医药合作社为基础，成立房山县“生产推进社”，从此二区医药合作社便成为县生产推进社的直属“药社”。他们始终关心群众疾苦，不惧严寒酷暑、山路崎岖，坚持巡回医疗。

3. 一区合作社办事处及医药部。1947年外迁大地港，1948年又随区政府迁霞云岭，正式改建为一区联社，医药部改建为一区“医药合作社”。郑玉山任药社主任兼医生，负责本地区的医疗卫生和解放支前等工作。

1947年9月，在解放周口店战斗中，一区药社配合民兵连参加了抢救伤员的支前队伍，在清理战场抢救伤员的紧张行动中，药社主任郑玉山机智勇敢，一人活捉隐藏在地坡荆棵中的敌小队队长及其随从一人(敌

小队长臧洪亮，原系圣水峪村我民兵中队长，罪恶累累，1946年6月投敌叛变)。

1948年初，房山一区天花、麻疹、瘟疫在各村普遍流行，严重地危及人民的生命与生活。据当时的统计，鱼斗泉村一百多口人，染病者在二分之一以上，因病死亡者十六人。大都是二十岁以下的霞云岭村染病者一百多人，死亡二十二人；森水三十四户一百九十四口人，患天花者二十六人，患麻疹者三十三人，患汗病者八人，共死亡八人。其中十八岁的一人，十岁的二人，其余皆为十岁以下的幼儿，刘德全一家八口就死亡四人，患者占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

在这严峻的情况下，一区区委会同医药合作社，召开了全区个体医生紧急会议，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研究措施，制定医治方案，以药社为核心成立医治委员会。在药社主任郑玉山率领下，二十四名医生，划分四个医治小组，分工包片深入到村，医治到户。

经过一番紧张的抢救治疗，广泛地组织卫生宣传，破除了拒医、信巫的封建迷信思想，控制了病情的发展。

1948年12月14日，房山全境解放，随着行政区划的变动，一区联社改为六区联社，一区医药合作社，合并了六区联社，改为医药门市部。

二、房山县政府所在地张坊机关商店(即机关合作社)的建立。

根据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1946年6月在张坊即县政府所在地，举办了合作社性质的机关商店，即机关合作社。当时有政府机关办起的“万顺兴”机关商店，县委机关青年、妇联等团体办起的“华兴号”机关商店其入社社员限于机关内部工作人员，每股边币一万元，一人可以多股，年终分红。商店设经理、会计、业务等工作人员。当时政府机关商店，经理隗永高，会计王炳华，业务李廷巨等共计六人，共吸收六十多股，政府拨五千斤小米作为底垫。在经营上，为了繁荣市场稳定物价，方便群众，价格均低于市场，生产生活商品齐全，有针织品、百货、油、盐、酱、醋、茶、糖等日用必需品，还经营文化用品以及各种小型农具，买卖曾兴隆一时。

至1948年4月，房山生产推进社成立后，县委、政府两处机关商店于5月宣告撤销，而政府机关“万顺兴”商店则改建为“造胰工厂”，仍由隗永高任经理，采购推销员李廷臣，共计四人。其原料用碱来自口外，牛、羊油脂采购于易县，日产肥皂百余条，广销张坊以里直至五台山下。“造胰厂”于1949年8月并入县生产推进社。

## 良乡合作社发展沿革

解放战争时期，良乡河套沟“农民合作社”蓬勃发展。

日本投降后，划给良乡县的河套沟以及(宛属)柳林水，从1946年至1948年，房良解放前夕，随着土地改革，先后建立“农民合作社”十一个，其建社沿革基本情况是：

1. 1946年2月，良乡五区北窖村成立“北窖农民合作社”。入社户数一百九十五户，社员四百多名，入股数一千二百股，股金边币二千三百万元(以下金额均为边币)。主任吕玉山，全社共三人，生活待遇，每人每月八斗玉米。

2. 1947年2月，良乡五区长操村成立“长操农民合作社”。社员股金九百四十六万元(原系贫农团土改剩余果实，后按划成分固定到户，作为入股股金)。

3. 1947年7月，良乡五区西班牙各庄成立“西班牙各庄农民合作社”。入社户数一百五十户，入股股金一千七百四十万元(土改剩余果实)。主任佟建书，全社共二人，生活待遇一切自备。

4. 1947年9月，良乡五区陈家台村成立“陈家台农民合作社”。社员入股股金六千万元(原系土改剩余果实)。负责人马振通，全社共五人，生活待遇采取二、八分红的方式，平均每天每人二斤二两五钱(每斤十六两)小米。

5. 1948年3月,良乡五区南窖村成立“南窖农民合作社”。入社户数三百零五户,股金二千万元(原系土改剩余果实),负责人刘德,全社共四人,生活待遇,两人每月每人六十斤小米,两人义务无薪。

6. 1948年3月,良乡三区河北村成立“民生合作社”。入社股数五百六十股,入社股金二千二百六十五万四千元。经理景希儒、张宗海,全社共六人,生活待遇,采用二、八分红,门市业务两人长期管饭,其他经理、采购等人员,因公外出一天者报饭费一顿,平时无饭。

7. 1948年4月,良乡五区北安村成立“北安农民合作社”。入社户数一百七十五户,开始以土改剩余果实一千二百八十五万元为资金。负责人罗玉全,全社共二人,生活待遇,每月每人六十斤小米另外二、八提红。

8. 1948年6月,良乡五区东班各庄村成立“东班各庄农良合作社”。开始因群众贫困一时难以凑集股金,先借贷款四百二十万元,又借贫农团三百八十万元,共计八百万元开业。负责人安庆志,全社共三人,生活待遇采用二、八提红方式。

9. 1948年7月,良乡五区西安村成立“西安农民合作社”。入社户数七十六户,一千六亿股,股金一千六百万。负责人付有申,全社共四人,生活待遇,每月每人六十斤小米,另外二、八提红。

10. 1948年11月,良乡五区佛子庄村成立“佛子庄农民合作社”。入社户数一百一十二户,入社股数五百股,每股小米十斤,共计股金小米五千斤。负责人李凤桐。全社共六人,生活待遇,每天每人一斤半小米,另外二、八提红。

11. 1947年立冬,(宛属)柳林水村成立“柳林水农民合作社”。入社股金一千二百二十八万元(每股一万元)。主任杨万全,全社共计四人(主任、会计、营业、牲口把式各一人),生活待遇,脱产人员每月每人一百二十斤小米,牲口把式每月百二十斤小米,另外给烧煤四百斤。

良乡县境内的农民合作社普遍建立后,对党在解放区的政治、经济起到一定作用,为了进一步巩固与提高合作社的工作,良乡县佐公署于1948年11月26日,在佛子庄召开第一次合作社干部会议。会议由县实业科韩晓昌主持,同时参加会议的还有:生产推进社负责人王炳华,商店的刘经理。会议上传达王专员的报告,总结经验,肯定成绩,纠正缺点,解决存在问题,进一步明确今后工作方向。

1. 会议决定:农民合作社由消费型转为供销型,与群众生产相结合,组织群众“生产自救”战胜灾荒,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支援解放战争。会议确认“北窖农民合作社”为当前典型的“供销合作社”。

2. 会议强调:扭转单纯营利分红的观念,应按社章规定,固有一定的公积金和公益金,增加积累扩大经营。

3. 会议决定:凡以胜利果实为资金的社,应立即结合解决土改遗留问题,或退还、或作为股金,确定到人,发股票,分红时以股票为证。

4. 会议指出:把生产贷款用作入股分红的社是不对的,应速归还用于生产,今后不可再发生类似问题。

5. 会议要求:坚决杜绝赊欠,已赊出去的欠帐,迅速收回。

6. 会议决议:合作社战勤问题,由社员轮流代替。股多股少不一,影响了群众积极入社,为了既不增加社员负担,又不妨碍社内业务,今后统一由利润中支出战勤费。

### 在解放战争时期合作社的作用

下面通过几个农民合作社的工作实际,来叙述它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作用。

#### 一、北窖农民合作社:

1946年2月,良乡五区北窖村成立了第一个农民合作社,主任吕玉山。开始办起的是只有一百万元边币股金的消费性质的合作社,解决社员群众生活日用品的需要。是年6月,内战爆发,驻房山城里的还乡团,

借助国民党军队的势力，曾多次袭扰北窖村。

该村地处山环，煤藏丰富，果木遍山，七七事变前是个幽静富庶的山庄。七七事变后，北窖村陷入日寇八载铁蹄蹂躏下，已是千伤百残，紧接着刚刚解放正在恢复中的北窖村，又连遭当地逃往房山城内的地、富、还乡团三次残酷抢掠；当年又逢春旱，秋后算帐；占全村总收入百分之四十的农业（包括果品收入），由平均每亩年产九斗二升，减产到六斗左右。据当时统计：该村四百五十七户，断粮的有八十三户，二百零四口人；能维持一个月生活的有八十六户，三百二十口人；能维持二个月生活的有一百三十三户，五百五十八口人；能维持三个月生活的有四十七户，二百三十六口人，能维持三个月以上的有八十九户，四百五十四人口。

更为严重的是，占全村总收入百分之五十的煤业，因敌人严密的封锁，坨里再次被敌人占据，煤运不出去，二十座煤窑被迫停产，常年到门头沟走窑的人也都不敢再出去，秋后收获的大批桃核、杏核也难向外销售，群众生产生活发生了极度困难。在这严峻的时刻，由于政府大力宣传党的民主政策和土改运动的开展，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坚定了与敌斗与天斗的信心与决心。正如1985年3月18日，走访北窖农民合作社九十二岁高龄的老主任吕玉山所说：“合作社是为社员谋福利，没有盐吃，想法到外边给弄盐；没有油点灯，想法给弄煤油，叫社员挨饿那还行，多危险也得去呀！”话虽不多，却极为中肯，为了全村群众活下去，不怕担风走险。他们经常夜间爬山越岭，走的是坎坎坷岖一般人难以识别的盘山小道，到敌老窝附近的关系户，用山货换回必需的商品。这背出去的只能是少量的，换回急需的，大批的还有待合作社在内地来解决。

为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北窖农民合作社主动变单纯“消费性质的合作社”为“供销合作社”，一切从群众生产出发，处处从群众生活着想。合作社主任吕玉山在政府提出的“生产渡荒”的号召下，不依靠政府贷粮贷款，带领全社职工，深入实际，摸清情况，积极发动，组织全村社员群众，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开展以合作社为中心的“生产渡荒”、多种经营的生产热潮。

解决群众燃眉之急。合作社开始第一步，首先收购了群众愁无销路的三十石（六千斤）杏核、二十万斤核桃。然后，合作社组织全村老少妇女八百多人，砸瓢子、推碾子熬油。不久长操油坊成立，便送瓢子到长操，换回粮食。这样一来，不但三十石杏核、二十万斤核桃，全部销售出去，群众还挣了砸瓢子手工费五百四十二万元，脚钱一百四十万元，合作社还分给大家三百斤核桃酱。不仅解决了群众青黄不接的困难生活，还有力的支持了春耕生产，同时合作社也积累了资金八百万元。从此，合作社开始植根于群众之中，群众积极参加合作社，社员股金由开始的一百万元，到冬季扩大到一千一百万元。

变冬闲为冬忙，生产渡荒。挖潜力发挥群众一技之长，各尽所能，“生产自救”。合作社大力扶植组织全村变冬闲为冬忙，增加收入渡过灾荒。

1. 组织村民纺纱织布。全村有六、七十架纺车，因没钱买棉花又无销路而搁置。据此，合作社先着手将四十五户的六十多名妇女，组成了一个纺纱组，由合作社供给棉花，规定每斤棉花交纱半斤，余下的纱作为手工费，用余下来的纱可以到合作社去换粮食。

织布。结合纺纱合作社投资购置了一架织布机，由社员王宗信负责组成一个织布组。用收上来的纱织布，每天织布一匹，每匹五十二尺，每匹一石五斗小米，在门市上出售，解决了本村群众冬衣用布的困难。

2. 组织畜力搞运输。全村有马一匹，骡子五头，驴五十五头。合作社把这些畜力户组织起来，往返张坊搞运输。一去驮山货，回来驮粮食。在组织过程中，他们还注意到对重灾户的照顾，解决了冬闲人吃马喂的问题，支持了春耕生产。

3. 组织铁匠炉。村中有四个会打铁的工匠，合作社把他们组织起来，设立了两盘铁匠炉。专打小型农具，除供本村需用外，由合作社推销到外村和邻县。

4. 组织高线工打鞋钉子。因敌人经济封锁。煤窑停产，高线（空中运煤线路）工人失业，地里又因受灾没打下粮食，拉家带口生活没法维持。合作社把这七户高线工人组织起来，教他们打“大帽鞋钉子”。昔日山

区交通不便，运输工具稀少，上地出门都靠步行，再加背篓负重，布质鞋底在步步皆石的山道上，怎经得起与石相磨，故以鞋帽钉钉在鞋底。其顶为圆形，五分硬币大小，边薄中间突起呈伞状，钉于鞋底前后)。还借给他们玉米一百零五斤，小米一百斤，扶植他们生产。一冬共打出鞋帽钉钉两万三千个。每千元六个，由合作社负责销往宛平、张坊等地。因此，这七户高线工三十四口人的生活得到了解决。

5. 组织编筐。村中有三户编筐的手艺人因窑停业。合作社把他们组织起来，与外村尚在开着的煤窑，签妥供筐合同，有了可靠的销路。编筐用的荆条由合作社供给，待筐出售后再结帐，使这三户的生活有了保障。

6. 扶植小商贩，村里还有四户小商贩，因吃掉了本钱而停业。合作社又为他们提供了六百万元的资金，扶植他们恢复营业，到了春季归还。借款后，他们就得了收益：玉米一石五斗，布一百五十尺，食盐五十斤。村内还有马福臣两户重灾户，开春就断了口粮，眼看就到春耕，择借无门，合作社又暂借给这两户五斗玉米，扶植他们去做小买卖，使这两户不仅有了吃的也种上了地。

7. 扶植残疾人打麻绳。村中的蒲拐柱是个拐子，不能从事农业生产，可他有打麻绳的手艺，但愁无原料和销路。合作社主动供麻叫他加工，规定每打一斤麻，给加工费四千元，妥善的安置了这个残疾人。

8. 组织织袜生产小组。在村中发现有一个过去在外会织袜子的技术人李存勤。由合作社出资买来两架织袜机，由李组成一个织袜生产小组，每天能织袜子六打(每打十二双)。每双袜子二升玉米，由合作社销往外村和邻县。

9. 组织卷烟生产小组。村中还有一个会卷烟的李春勤，合作社叫他负责组成一个五人卷烟生产小组。合作社从张坊、涑水、易县给他们购进烟叶搞加工纸烟。卷烟称为“边区造”。其制做方法：将烟叶蒸后，抽出烟筋切丝，加上白芷、山艾、甘草、梨汁等辅料，用土制烟器加工成纸烟。一斤烟叶可卷纸烟两条，每盒一斤玉米，销往河套沟至大安山。当时“边区造”纸烟很受群众欢迎。

10. 发动群众捋木橛子叶。木橛子是一种木本丛生植物，生长于山区。其叶芽可食，其叶烧灰色黑，当地群众常用它来染布，熬成膏即成为制色原料。合作社则发动群众捋木橛子叶，以十斤叶一斤小米或一斤玉米，进行大量收购。然后，把叶熬成色膏，销往北平，每斤膏子可买回十四斤小米。两年来共熬膏子两万多斤。

合作社处处为人民，事事为解放做贡献。1947年2月间，上级分派该村二百三十双军鞋任务。当时群众手里既没鞋面和鞋底布，又无线麻。合作社得知，主动派人绕道门头沟到北平，及时采购来色布、铺衬和线麻，使之提前完成军鞋任务。

北窖农民合作社，在主任吕玉山的组织领导下，明确地树立了合作社要“为政治、为生产、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扭转单纯盈利观念，由消费变为供销。在面临形势严峻紧迫的时刻，他们发扬了延安精神：“艰苦奋斗，自立更生”。在短短的一年内，组织村里男女劳力和老少近千人，开展了十多项副业生产，总收入粮食达三十二万多斤。不仅使北窖村广大人民群众，不靠政府贷粮贷款战胜了灾荒，摆脱了在日伪长期统治下的悲惨生活，而且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合作社本身也积累了办社经验，壮大了自己，扩大了公积金二千二百一十六万元，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爱戴和拥护。1947年秋后社员股金又由一千一百万元，增至二千三百万元，1948年春被评为良乡县“生产渡荒”的典型村，平西专署授予北窖农民合作社“合作指南”光荣匾(木制)一块，号召各县学习他们的办社经验。《北岳日报》曾多次刊登了他们的先进事迹。

### 二、长操合作社：

该社是在面临灾情严重，群众处于困境，在党的不专依靠政府贷款贷粮，“生产渡荒”的号召下，于1947年2月建立起来的。长操村是日伪军长期驻守之地，受害极为惨重，百姓家贫如洗。开始办社时，该村贫农团仅用土改果实叶烟、榆皮面、黄酱等物品作为合作社开业资本，后又得助于当地商店三十六斤食油、四十五斤盐、十二匹布、十五斤棉花的扶植，使合作社得以周转。成立后仅一个月就获利二百零七十八万元，买回玉米九石多，解决了群众燃眉之急。贫农团见合作社大有可为，便又将胜利果实中的一百七十八块银元、

一百六十八万边币和一些柿子干、大枣、杏仁等投入合作社，使合作社资金增加到九百四十六万元(后来贫农团投入合作社的资财，在村处理土改后遗留问题时，采取以成分固定到人，作为入社股金的办法进行了解决)。在合作社发展的基础上，除搞好门市业务经营外，还积极组织与扶植全村社员群众开展副业，支持农业生产。首先抽出一百五十万元，约织全村二十一架纺车，成立纺织组。又组织二十五头牲口搞运销。合作社本身还开了一座油坊(每天除开支能收入二十万元)，并收购外村的核桃仁和代加工的业务，油坊向社员群众收购烧柴也增加了他们部分收入。在春耕播种期间合作社除供应小型农具以外，还主动为大田间作购进四十二斤菜籽，间作了一千亩。

### 三、河北民生合作社：

民主办社，计划经营，扶植生产，面向群众。1948年3月，良乡县三区河北村通过整顿，成立“民生合作社”。河北村是河套沟的中枢，很早即为一商市。可是办合作社却较北窖、长操等村慢了一两年。河北村在1947年春，曾组织过一个群众性的纺织厂(即纺织合作社)，由于负责人办厂主观盲目而垮台。股东不但没分到红利，股本因购置了织布机等固定资产，也难一时拿回来。因此，群众对办合作社失去信心。1947年冬，村里又组织了一个单纯经营消费品的合作社。该社负责人以纺织失败为鉴，尽心经营，办成一个以单纯营利为目的的合作社，两个多月获得的红利就超过了股本，但入社户仅占全村户数的百分之十五。

翌年开春，村干部召开了一个研究整顿合作社的会议。如何办成一个群众真正需要的合作社?他们学习了北窖办社经验，检查了本村办社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首先分析了纺织厂失败原因：1. 缺乏计划、底数不清、盲目经营。在纱棉不足或没纱的情况下，职工没活干照常上班开工资；单纯照顾纺纱户，收上来的纱价钱比市场还高，加大了成本，会计手续跟不上，生产盈亏月底不能及时反映。2. 负责人办社主观，遇到困难，对上不请示，对下不商量，致使问题越来越严重，造成最后垮台。其次，对去年办的合作社分析是：单纯营利观点，是自吃自，单纯经营消费品，不为生产服务，群众增加不了生产，产品卖不出去，群众没收入，拿什么去买消费品，这不是群众所需要的合作社；日久，这样与私商无异的合作社会站不住脚。据此，他们通过整顿制定出以下改进措施：

1. 发扬民主办社。民主选举社领导，设立监察委员，监督合作社日常工作，搜集社员对合作社的意见和反映。社内一切主要事项和问题，必须征求社员意见，每月召开一次监察委员会，三个月召开一次社员大会。

2. 扭转营利观念，变消费为供销。一切从群众生产出发，组织与扶植群众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争取户户入股，扩大合作社的发展。

3. 恢复纺织厂为合作社附属厂。纺织工人的工资执行劳资兼顾、公私两利的方针，解决纱源，扩大与扶植纺纱户的发展。

4. 建立会议汇报制度。经常与上级取得密切联系，争取多方面对合作社的扶助，认真听取职工和社员意见。

5. 健全财务制度。要求手续清楚，提倡节约，减少消耗，一月一结帐，三月一分红。

会后，召开村民大会，讲清前段办厂办社的缺点和错误，公布今后民主办社的意见，宣传参加合作社的好处，号召大家来入股。大会后，由各拨工组组长负责广泛动员。为解决最困难户入社，政府贷款一百六十七万元给予支持。很快吸收一百七十四户入社，入社总数占全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入社股数有五百六十六股；入社股金达二千二百六十五万元。

召开社员大会，由社员民主选举景希儒为合作社经理，同时选举监察委员五人。为促进合作社今后工作，特给合作社命名为“民生合作社”，示意：合作社要为人民生产生活服务。

领导带头，勤俭办社，不图厚禄，廉洁奉公。在经理景希儒的带动下，办社因陋就简，在设备上没花一分钱。资金少，他们根据群众需要进货，不怕自己多跑路，采取少进、勤进、快销，做到商品不积压、不脱销，合理而有计划的使用资金。一心为把社办好，他们团结一致，不怕累、不怕苦，更不计较个人得失。他

他们没有固定工资,采取按劳分配,二、八提红的办法(按年红利平均计算,每人每月可得小米不过五、六十斤),司账和营业员因整天离不开合作社,社内管饭,自吃自做,只粗粮无细粮,家里农忙时由社员轮流帮工。经理、采购员外出一天者可报销饭费一顿,平日社内无饭。

沟通商品渠道,解决群众需求,稳定市场物价。冲破敌人经济封锁,合作社与敌占区商人挂沟,推销山货,换回急需商品。在内地与佛子庄、张坊公营商店建立供销业务关系。为稳定市场物价,合作社商品均低于市场价格,并扶植本村小本商人,合作社按进货价加脚力钱向他们进行批发。

组织副业,扩大收购,支持生产。

1. 发展纺织业,扶植纺织户,增加群众收入,保障纺织厂用纱。本着劳资兼顾的原则,采取由合作社供给纺纱用棉,纺纱户先按棉花价取棉,交纱时再按成色算帐的办法,中常的一斤纱,纱户可获利玉米六斤。为了鼓励纺纱户,合作社对其实行“利、货”优惠、即纱户用纺纱赚的钱到合作社买货时,按进货价算帐。扶植困难纺纱户,合作社采取先预付部分加工费,陆续扣还的办法,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对自棉自纺户,合作社给予收购或代销。支持外村纺纱组的建立:三区其它村也想建立纺纱组,但愁无销路。民生合作社主动收购他们的纱,并给予技术指导。开始收纱时成色不如本村的好,为了扶植外村纺纱业的开展,合作社也不少给做价。

2. 组织运销。合作社把村中养牲口户组织起来,往来自张坊搞运销,使物畅其流,活跃了市场,方便了群众。开始时合作社对养牲口户的困难户,因无本钱,采取垫付或代其担保缓付的办法进行支持,对运回一时卖不出去的货物,经合理议价后,由合作社收购下来。

3. 开展收购业务。合作社除收购当地核桃、杏仁、杏干等产品外,还组织群众割荆条,刨药材等副业生产,扩大收购,增加群众收入。在群众冬闲季节,合作社开了一个大煤厂,组织当村四十名强壮劳力,组成一个背煤大队,由本村煤窑往煤厂背煤,背煤百斤一万元。

4. 事事为人民,一切为解放。河北村是河套沟的交通枢纽,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大军经常过往或宿营,不断需要饲草,开始是由各户准备,需用时由村干部领着部队挨门挨户去称,既麻烦又耽误时间。合作社为减轻群众负担,保证军队的迅速行动,主动把分散在各户的整碎谷草,收购集中在合作社,供部队随时使用。有时部队到村,粮库粮食供不应求,合作社也主动借支。

河北村在“民生合作社”的大力组织与扶植下,很快恢复了战争中的创伤,稳定了群众的生产与生活情绪,得到群众赞扬:合作社为人民,农副双增产。农闲了人不闲,生活得改善。

四、扭转单纯营利分红观点,执行办社方针,遵守政府法令,开展多种经营,解决群众困难。

柳林水合作社,建于1947年立冬。该村共一百一十八户,四百七十九口人,有山坡地九百四十九亩多,平均年亩产八斗七升,加林木收入折粮六十四石,年平均每人一石八斗五升多。1947年天旱减产两成,时至立冬群众感到日子不好过,经贫农团团长王国兴提倡,由杨万全为主任,发动群众刨知母凑集股本,成立起“柳林水农民合作社”。当时仅有五十七户,每户拿出一万元入股。

两个月后,共收知母一万五千多斤,暂解各户添补冬衣的困难。此时贫农团又把两头牲口折价二百八十万元,向合作社入股,由莲花庵至张坊搞运销,一去驮煤回来驮商品。在合作社带动下,村里二十多头牲口也搞起运销。对于运销户在外临时欠账问题,合作社为他们出面应诺。翌年旧历正月,合作社结帐时,除各项费用开支,每万元股金获利四万七千元,社员见入社获利如此之多,将红利大部继续入股。开春,政府给该村贫困户生产贷款一千万,合作社向村干部建议,贷款(粮)分到你,你二斗他三斗也就花了,不如入社扩大经营。后经村干部征得群众同意,按困难程度造册分配到户入了股。合作社资金增多了,又卖了两头骡子,扩大运销增加销售,解决附近三村的粮食、食盐、布匹等日用品必需品的需要。

至9月结帐,将贷款本利还清,六十八户社员共获利三千五百万元。同时,在村中解决土改遗留问题时,

合作社又把贫农团入股的两头牲口及应得红利五百六十万元拿出来，补偿给错划的中农户。由于该社存在着单纯以营利分红的错误观点，在经营过程中毫无半点公共积累，此时感到了资金不足，经营困难。

在上级社的指导帮助下，该社明确了办社方针及经营管理办法，建立起合作社盈余分配，除弥补积欠损失外，应提存百分之十至二十为公积金，百分之五至十为公益金，百分之五至十为职工酬劳金，其余按社股分红的财务制度，纠正了单纯以营利分红为目的的错误观点。

遵守政府法令，开展多种经营，解决群众困难。1948年10月初，政府下达了封山育林、禁止砍山烧炭、垦荒种田的指示。当时使一些祖祖辈辈靠烧炭、垦荒增加收入的群众，感到入不敷出，出现了愁无生计的不安情绪。

正当群众议论之际，合作社在群众大会上，公布了他们为群众解难，扶植生产开展多种经营，收购荆条、药材、烧煤等业务的计划，得到了群众的拥护。会后，合作社首先开了一个煤厂子，发动几十名强壮劳力，由煤窑往煤厂背煤，每百斤脚力二万元，每天收煤万余斤，还组织几十人割荆条，每天一人能割荆条一百斤，可换十五斤盐，一人一天刨知母十来斤，能卖二万元。

当时坨里已经解放，山外的骆驼也开始到柳林水搞运销，群众一冬光割草卖给驮户，就收入一百二十多万元，煤厂还积下约一千篓牲口粪，准备来春分给社员。群众感觉到，搞这些副业不比烧炭收入低，熟地多上粪就能多打粮食，要比开生荒合适得多。

该社还计划，把全村七十多窝分散在各户的蜜蜂，集中起来成立一个养蜂合作社，既可节省人工，又便于精心饲养管理和繁殖，并可增加一笔收入。如果各户分养，蜜收下来连吃带送人，根本卖不了多少钱。

柳林水合作社，扭转以单纯营利为目的的错误观点后，积极响应政府封山育林的号召，组织群众开展多种副业生产，增加收入，摆脱了多少年来山区人民靠砍山、垦荒维持生活的老习惯，给开展封山育林工作，做了一个好带头，政府号召向柳林水学习。

（《房山文史资料》第3辑）

## 白手起家建矿机 风雨同舟三十载

卓成栋

提起矿机，人们总不免把它同房山城联系在一起；不敢说有多深的感情，却又总令房山人民不能忘怀。究其是何原因，就连我这个在房山城关生活二十多年的矿机人，也说不太清，只知矿机的地位，从五十年代末就在房山人民的心目中逐渐形成了，而且与房山区一直有着深厚的渊源。

1958年初，煤炭部决定在北京修建一座生产水采和洗选机械产品，规模5000人左右的中型机械厂。当时多次派人来到京西勘察厂址，最后选中了房山城关东南这片低洼的荒沙地，即现在的厂址。按当时上级的意图，工厂要在三年至五年内建成。根据这一目标，工厂经过近一年的筹划，在人们执著的信念、自信的追求和顽强的意志面前，于当年10月掘起了第一锹动土，一场荒滩，建现代化工厂的大战由二百多名第一批创业者们揭开了序幕。

紧接着由于天灾人祸的影响，刚上马不到两年的工厂，又因国力不支于1960年被迫下马。然后在1961

年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指引下，千余名职工利用已经建起的四座厂房和已经运到的机械设备开始了简易的生产。

当时职工们住的是简易工棚，白天在寒冷的荒沙滩一镐一锹地挖土方砌车间。晚上则两个人挤在一个被窝里打呼噜。厂长和工人一样，每天都在现场摸爬滚打，修路基砸石子，然后又肩扛人抬将铁路一节节修到房山。那时节房山当地的百姓以及房山县的各界领导给予建厂的职工以无私的援助：冬天送来过冬的白菜，夏季送来黄瓜、豆角，收秋送来甜甜的大白薯，特别是在创业的岁月里，只要工厂一有困难，地方就千方百计地及时的给予解决或给予人力物力的帮助。尤其是厂址附近的农民兄弟，在建厂初期主动帮助创业者们，看堆、守家、推土、拉粮，工农一家气氛融洽。当年创业如今还在世的老工人说的好：“那时的农民兄弟真好。为我们建厂，他们处处帮了大忙，建厂的功劳也应有他们一份”。

1959年11月20日，北京日报以《一座年产采掘机械二万吨的中型工厂已经动工基建》为题，报道了北京煤矿机械厂的规模和建设情况。

1961年9月，刚刚恢复生产的工厂，仅以其有限的设备，靠的是广大职工的干劲和决心，就首先生产出皮带运输机和开滦IIA型水泵的样机，并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工艺试验，翌年便投入了生产。当时这么快就从基建转入到生产产品，就连当时的老职工都感到震惊，工厂所在地的房山城关地区的农民兄弟、县领导机关也都奔走相告，打来电话表示祝贺。“矿机正式生产了”！这信息的春风在房山县的大地上扩散，又从这里向全行业和全国幅射。于是来自全国和行业的支持大军纷纷从东北、西北、河北、北京等地向矿机涌来。一时间矿机厂人强马壮，大干的雄心更强了，大干的劲头更足了。

1962年经过一年调整后矿机更加充实稳定。1963年又研制出CB—3型金属顶梁，并通过了机煤炭科学院鉴定。1964年矿仅用100天就研制出第一台平巷装岩机样机，当时的煤炭部副部长种子云、贾林放来厂参观了样机，并视察了工厂。

上级领导的鼓励，地方各级领导的支持，再加上矿机人齐心协力的英勇顽强的奋战，终于于六六年创出年产值1882.5万元，利润157.2万元的建厂以来最好成绩。

就在这时“文化大革命”来了，人们象发疯了似的。如果说1958年“大跃进”人们以建设为荣，那么此时不少人以破坏为荣了，一切都乱了套！直到1971年，人们似乎回过一点味来，头脑逐渐冷静了。于是不得着手对自己亲手建设又亲手破坏得伤痕累累的工厂进行整顿。接着扩建工作又在矿机开始了。1971年生产出石油钻机，1972年生产出化工塑料注塑机，1973年生产出第一套液压支架BEEB型垛式支架，填补了国家综采机械的空白，并于1974年通过全面技术鉴定。

平地一声春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从此北京煤矿机械厂迈开了她青春的步伐步入了崭新光辉的阶段。

经第一套液压支架问世后，于1978年、1980年、1981年……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液压支架继续问世。改革使矿机插上了腾飞的翅膀。1985年2月13日中国煤炭报大幅刊登了长篇通讯《龙骨山下的一场变革》详实地报道了矿机厂进入八十年代后企业的突飞变化。人们欢欣鼓舞，精神振奋。这一年边生产，边创新，当年完成产值1.1亿元，利润1600万元。又是一个十年，而成就相差如此悬殊，这不能归功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优越，矿机正是寻着这条道路前进的。1987年国产第一套生型综采液压支架从矿机马达飞旋的车间一举打入美国市场，轰动了采矿界。北京煤矿机械厂的威名正在得到世界的瞩目。

每当我们漫步在这花园般的厂区、高大的厂房、现代化的设备、浓郁的林荫道、花香飘溢的家属区时，很自然地想起那些建者们，想起那些为矿机建设创建功勋和在困难关口支援建设的农民兄弟和房山地区的各级领导，没有他们的献身精神和无私的支援和帮助，矿机就不可能蓬勃的发展。

回首往事，历史不能忘记。回顾历史是为了展望未来；温故知新，教训要引以为戒，传统要发扬光大，弊端要加以清除。这就是矿机人的作风，这就是与矿机风雨同舟三十载的房山人民对矿机未来的期待。

在房山这块多情的土地之上，矿机人使这座现代化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其艰苦创业的精神将传给矿机人的子孙后代，在这片沃土中生根发芽，浇开四化的花朵。

祝愿北京煤矿机械厂在开拓的大道上同房山区人民一起为建设自己的家园，做出更加辉辉的贡献！

（《房山文史资料》第3辑）

作者系《宝藏》杂志副主编

## 对原房山县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回顾

张 珍

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房山县的广大农民，获得翻身解放以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以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的组织形式，进行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春季，全县实现了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农民由一家一户经营土地的个体劳动者，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主人，走上了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回顾我县波澜壮阔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光辉历程，会使人们深刻感到：广大农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 土改没出现新的两级分化的现象

### 使农民深刻理解互助合作的必要

房山县于1948年解放，1949年8月由原属察哈尔省划归河北省通县专区管辖。在省、地委的正确领导下，中共房山县委发动全县人民，从1949年开始，对新解放的一百二十九个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到1951年12月，连同老区农村，全县共二百五十八个村，全部完成土地改革任务。通过土改，广大贫雇农和部分下中农都分得了土地。同时，摧毁了伪保甲制政权，建立了村人民政权，并在绝大多数农村中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and 青年团、妇联会，民兵连等群众团体组织。从此，广大贫雇农和劳动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真正得到了翻身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

但是，翻身农民是一家一户进行生产劳动的小农经济，经受不住天灾人祸的打击，致使有的翻身农民，在欢庆翻身解放不久，就又失去了土地，去为土地较多的富裕户做雇工，有的又开始借高利贷，受到新的剥削。如我县老解放区的霞云岭村，在1950年冬，就有十四户农民因生活所迫卖地二十七亩一分。在1951年春，又有二十二户卖地四十七亩四分。在新解放的平原地区，有的村甚至出现了党员干部只顾个人发家致富，或雇用劳力，或出租土地，产生了新的剥削行为。

新的两极分化现象，引起了县委、县政府和各级党组织的高度重视。在广大农村广泛开展了爱国主义、组织起来的宣传教育活动，并通过发动爱国丰产竞赛运动，积极引导农民组织互助组，以换工或齐工找价的

方式，帮助困难户搞好农业生产。有些村还组织起经济互助的信用社，用以抵制高利贷的发展。受到互助实惠的贫困户深有体会的说：“毛主席、共产党不但帮助我们翻身解放，还想办法让我们过好日子。”

### 互助组大发展

#### 个体农民开始尝试集体劳动的新路

1950年以来，为了迅速恢复农业生产，扭转两极分化局面，县委和各区委(当时全县共划分六个行政小区)围绕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结合农村建党、整党工作，广泛发动开展大生产运动和爱国丰产竞赛运动，号召农民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为了把农业生产搞好，动员共产党员和劳动模范带头，按照“自慰两利”原则，在春种，秋收大忙季节，组织临时的、长期的，男劳力的，女劳力的等各种形式的互助组。据统计：全县在1950年组织起季节的和长期的互助组共八百二十四个，参加劳动力达四千一百八十八人；组织临时性的短期互助组有二千四百九十六个，参加劳动力有一万七千多人。1951年农业生产互助继续发展，据年底统计：全县有长期互助组九百五十九个，参加劳动力达四千九百九十八人；短期互助组有二千七百六十七个，参加劳动力一万八千九百九十多。1952年农业生产互助组大发展，全县共有长短期互助组五千九百三十个，入组农民达到全县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农业生产互助活动的蓬勃发展，明显地推动了农业生产。例如1952年，全县农民户户参加互助组，使这一年的全县农业生产搞得有声有色。全县粮食生产比1951年增产一千八百零五万斤，超过计划增产任务的一倍以上，使房山县获得全通县专区的甲等模范丰产区的光荣称号。本县三区(即长沟地区)获通县专区乙等模范丰产区的光荣称号。全县评出县级丰产互助组二百一十二个，评出县级劳动模范二百四十七名(全部是互助组长和组员)。其中评选出出席河北省劳动模范六名。他们是：李堂(西关上村)，黄德元(北正村)、任显维(四马台村)、赵仲起(半壁店村)、谷秀云(大峪沟村)、仇文启(西安庄村)。

为了发展和巩固农仆生产互助组，县委和各区委都把它当成大事，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经常研究，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

1. 以爱国丰产运动推动发展互助组。当时以抗美援朝为政治任务，动员农民组织起来，开展爱国丰产竞赛。尤其在春耕、秋收时节，发动农民组织各种劳动互助。1951年春，县委推广了南甘池村组织带小孩妇女成立娃娃互助组的经验，使有喂奶任务的女劳力，也能参加大田劳动。

2. 发动劳动模范带头组织互助组。特别是通过开展灭蚜虫、捕蝗虫等抗灾斗争和大规模的比庄稼活动，使农民亲眼看到组织起来的好处。通过比庄稼，各区都树立了生产搞得好的典型组。1951年全县还树立起四个模范组典型，号召全县向他们学习。四个模范组是：双柳树村的刘永良组、南甘池村的赵永花组、黄山店村的邢玉芬组、四马台村的任显维组。

3. 保护长期互助组的专有财产，为农民长期坚持互助树立旗帜。当时，通过各种会议经常宣传长期互助组购置及其财产情况，用以坚定农民长期发展互助组织的思想，使农民感到发展集体财产无限光荣，从而使互助组在思想上和经济上得到巩固。

### 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 探索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途径

根据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为了积极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共房山县委主要领导在1952年和

1953年，在长期互助组的基础上，试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初级社。所谓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就是各户的耕地，按土地等级或按常年平均产量分等定股，作为土地股年终分红的依据，劳动力按实际参加劳动天数，即劳动日，作为劳力股的年终分红的依据。当时土地和劳力分配比例，一般都定为劳五地五或劳六地四。即初级社全年获得的纯收益，土地股分全部收益的五成或四成，劳动力分全部收益的五成或六成。这样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2年全县试办了两个，一个是北正村的黄德元为社长的农业社，另一个是半壁店村赵仲起为社长的农业社；1953年，通过大张旗鼓的宣传贯彻党的建设社会主义“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全县办初级社的试点，又发展到二十四个农业社。

试办的初级社，由于县委领导的精心指导，村党支部和党员肯于认真工作，均获得了明显增产，为农民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树立了样板。例如北正黄德元合作社，当年建社，当年粮食生产就比本村其他互助组增产81%，从而使农民大开眼界。农民认识到：集体生产，耕作及时，肥料充足，庄稼长得好，增产大有潜力，打破了农业生产到顶的保守思想。这年赵仲起合作社，由于盲目引进“河南白”弱冬性小麦品种，越冬期受了冻寒，造成麦收减产，而秋季玉米，谷子还是获得了增产。1953年试办的二十四个初级社，取得了社社增产的好成绩，从而使农民群众看到了初级社集体生产的优越性。当时农民反映：“互助组比单干强，合作社又比互助组强。”有的农民高兴地说：“要想好过，赶快入社。”

## 广大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高涨 全县出现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涨

由于试办初级社的成功，由于广泛深入地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广大干部，党员和贫下中农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积极性明显提高。因此，在1953年冬，全县初级社发展到一百三十个，入社农户占全县总农户的5.1%。到1954、1955这两年，全县出现了初级社大发展的合作化高潮。据统计：1954年秋季，全县初级社发展到五百五十六个，入社农民共一万三千四百零一户，占全县总农户的41%。当时全县有七十多个乡，达到了乡乡有社。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会是笔直的。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经历了一个由低潮到高潮的过程。由于前两年在总路线精神的推动下，全县的初级社迅猛地从二十多个发展到五百多个，入社农户由5.1%发展到40%以上，其中有一部分互助组条件不成熟，思想酝酿不充分，骨干力量不强，也在大势推动下转了社。致使有少数初级社建起来后，有的集体生产迟迟搞不起来，有的评土地，评劳力，评农具、评牲畜的“四评”工作意见分歧。因此，根据中央指示，上半年普遍开展了整社工作。整社的基本内容是：已经组建的初级社，可以开个口子，让思想准备不足的内入社农民先退出去，对退社的政治上不歧视，经济上不克扣，平等相待，有的还可以敲锣打鼓欢送。按此精神，全县各区、乡逐社进行了审查、整顿，落实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原则。结果，全县共有三十三个社转为互助组或单独生产，连同个别退社户在内，全县共有退社户一千三百四十五户，占入社总户数的7%。同时，还清洗了一百零一户已入社的地主、富农。到1955年10月统计，全县尚有初级社五百二十五个，入社农民一万二千一百八十六户，占全县总农户的37.13%。

1955年10月，县委传达贯彻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和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央的基本精神是：要求各级党委要批判不敢大胆领导群众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右倾保守思想，要求各级党组织对合作化运动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迎接农业合作化的新高潮。同时，要求各级党委要紧紧依靠贫农和新、老下中农，要认真在合作化运动中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农村要普遍根据农民各家各户的现实生产，生活水平，重新审定和划分阶级。把土改时确定的贫雇农和下中农、上中农，重新审查、划分为贫农、新下中农、老下中农、新上中农和老上中农。凡生产搞得好的，有新的剥削行为、

生活明显富裕的贫农和下中农，经过严格审查属实的，有的定为新下中农或新上中农，个别剥削严重的，定为新富农。与此同时，对尚未加入初级社的农村党员，也逐个作了审查和教育，指明要作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必须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办社。县委领导在学习毛主席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七届六中全会决议的基础上，反复检查了在 1955 年的春夏之交的整社中的右倾表现，把不应该收缩的社给收缩解散了，把不应该让退社的农民让退出了初级社。检查了在执行“自愿互利”方针和依靠贫下中农的阶级政策等方面的缺点和问题。在提高认识，明确方向的基础上，县委重新制订了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面规划。给各乡党总支具体分配了发展农业合作化的任务和实现全乡合作化的时间要求，并突出强调各乡、村党组织的中心任务是发展、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做到“书记动手，全党办社。”

经过广泛深入宣传贯彻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决议和毛主席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精神，经过重新划分阶级和重新制订与讨论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规划，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觉悟大大提高，广大党员干部带头办社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如夏村王家疙瘩有两名党员原来还没入社，他俩主动把自己领导的互助组同另外两个团员办的互助组合并在一起，转为一个二十二户的初级社，来不及向村党支部报告，就开始集体种植小麦了。大韩继村有十三名未入社的党员，主动同一百多户农民群众商量，一起向老社报名，要求立即入社。全县各乡村普遍掀起了入社、办社高潮。据统计：一九五五年十月至十二月，不足三个月的时间，全县入社农民由一万多户发展到二万零二百七十七户，占全县总农户的 61.6%，初级社由原来的五百多个，发展到六百六十五个。全县农村基本实现了初级农业合作化。

1955 年底，党中央发出试办高级社的通知。所谓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取消土地八股分红，完全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当时，《人民日报》、《河北日报》也发表各地试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消息。我们房山县的高级社试点还没有搞，全县各乡、各村在初级合作化的基础上，社会主义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广大干部、党员和农民群众，纷纷要求办大社、办高级社。在 1956 年的春节前后，各乡各村在干部带领下，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成群结队，向县委表决心，后来发展成为向县委报喜：全村或全乡实现了高级合作化。全县从 1956 年 1 月开始，各乡各村普遍掀起小社并大社、转办高级社的新的合作化运动。到 3 月底，仅仅两个多月时间，全县原来的六百多个小初级社，合钟为八十七个大社，并转为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八十七个大社中，有联乡社一个，拥有一千四百二十六户，一乡一社五十九个，联村社一个，一村一社二十六户。全县加入高级社的农户达到三万三千五百五十七户，占全县总农户的 99.75%。当时全县只剩下八十五户单干户。至此，在 1956 年的春天，成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全县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的第一个春天。

（《房山文史资料》第 4 辑）

作者系原区畜牧水产局书记

## 六十年代的房山“背篓商店”

王绍清 侯之扬 辑

“背篓商店”在原房山县黄山店人民公社所驻地，位于房山县城西部，距县城 30 里，全社范围地势北

高南低，山峰重叠，沟谷交错，大的沟壑就有 32 条之多。

解放前，这里没有商店。因民穷路险，就连小商贩也极少涉足。农民买卖东西要跑几十里的山路到山外的集镇。当时这里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有女不嫁黄山店，十年就有九年旱；吃水贵如油，买卖东西真发愁。”

解放后，黄山店设立了有 6 名职工的合作社分销店。但对所属其它村落分散居住的群众，买卖东西还是不方便。1958 年，这个店的负责人王砚香，带领职工，发扬艰苦奋斗，一切为了人民的革命精神，有计划有路线地身背六七十斤重的背篓，攀山越岭，送生产资料和生活日用品上山，收猪、兔、土产及废品下山。以这种收售结合的办法，方便群众，支援农业生产，被当地农民誉为我们的“背篓商店。”

1965 年，“背篓商店”成为北京市财贸战线的一面旗帜，中共北京市委发出了《关于号召学习“背篓商店”的通知》。同年 6 月 12 日，中共中央华北局转发了这个通知。6 月 15 日，《北京日报》发表了题为《充满革命精神的“背篓商店”》的长篇通讯，详细报道了“背篓商店”的先进事迹，同年 8 月，北京出版社将《北京日报》的这篇通讯，印成小册子在全国发行。其事迹被拍成电影《红色背篓》，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六十年代王砚香带领“背篓商店”职工到长流水村售货

（王绍清 提供）

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我们把有关“背篓商店”的史料辑录出来发表，激励人们学习“背篓商店”那种艰苦奋斗、一切为人民的革命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 史料一：

### 中共北京市委

#### 关于号召学习“背篓商店”的通知

**各区委、县委，各财贸单位党委，党组，总支、支部：**

房山县的“背篓商店”不愧为毛泽东思想挂帅的红旗单位。这个商店的职工把商业工作看作是一种革命工作，不是为做买卖而做买卖，而是为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工作。他们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时刻关心群众的生活，千方百计满足群众的需要。他们把困难揽在自己身上，使群众得到方便。他们正确地执行了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从生产出发，从群众利益出发，积极地扶植生产的发展，增加社员的收入。而为群众服务得怎样，对生产促进得怎样，正是衡量我们商业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志。他们做了在许多人眼里看来是不值得做的小事情、小买卖，实际上这些小事情，小买卖是生产需要的，是人民需要的，也就是革命需要的。他们这样坚决地去做，是完全正确的，应该的。当然，他们的工作也不可能没有缺点，但是总的说来，是做得很出色的。他们所以能够做到这样，归根到底，是由于

毛泽东思想挂帅，以毛泽东思想来改造思想，指导业务。经验证明，只有我们的同志真正认识商业工作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不是为做买卖而做买卖，而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买卖，把做买卖同整个革命事业的伟大理想和目标联系起来，真正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商业工作才能做好。

市委号召全市一切商业单位、全体商业人员好好向“背篓商店”学习，首先是学习他们的革命思想、革命做法和革命风格。希望各区(县)、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同志，真正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发现、培养，创造更多的先进单位，立标兵、树旗帜，推动首都整个商业工作不断前进。“背篓商店”的同志，其他先进单位也是一样，则要懂得毛主席所说的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和不断变化的道理，坚持不断革命精神，力戒骄傲浮夸，及时向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 and 任务，解决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奋勇前进！

中共北京市委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日

### 史料二：

#### 中共中央华北局转发北京市委 “关于号召学习‘背篓商店’”的通知

河北、山西省委，北京市委，广内自治区党委：

现将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号召学习“背篓商店”的通知和“充满革命精神的‘背篓商店’”一文，发给你们一阅。

“背篓商店”的职工，数年如一日地攀山越岭，背篓上山，脚踏实地地为生产，为人民生活服务的革命精神，很值得学习。商业部门的职工，特别是县以下供销社的人员，一定要发扬革命精神，使工作真正地面向农村，下决心钻到农村去，钻到深山沟里去，及时收购，积极推销，大力帮助农村开展副业生产和发展多种经营，以便有力地起到促进工农业互相支援、共同发展的作用。

中共中央华北局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二日

### 史料三：

#### 充满革命精神的“背篓商店”

“背篓商店”是北京市房山县周口店供销社的一个分销店，也是黄山店公社范围内唯一的一家分销店。这个山乡小店，只有六名男女职工，常年背篓上山，又收购，又卖货，群众亲切地叫它“背篓商店”。

黄山店公社地处群峰环抱的山沟里，全公社五百四十多户，二千八百多口人，分散居住在山沟，山腰的五十多个居民点。这些居民点离分销店，远的二十多里，交通很不方便。分销店六名职工，在王砚香同志的带动下，发扬革命精神，几年来，经常身背六七十斤重的篓子，攀山越岭，送货上山，使许多村庄的广大社员，能够在自己的村里买到日用工业品和交售零星的农副产品。1958年以来，这个分销店一直被评为市供销社先进集体，1964年被评为北京市五好先进集体。

他们是怎样为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的呢？

## 从生产出发，支持生产的发展

黄山店公社山多地少，地力薄，粮食不能自给。分销店坚决支持群众与天奋战、誓夺粮食丰产的愿望，总是及时地把农具、农药送到生产第一线。1964年夏天，长流水大队七十亩谷子生了粘虫，生产队晚上打电话告诉“背篓商店”，第二天早晨天刚亮，六六六粉、喷雾器、喷粉器就送到了。他们先后三次为生产大队送农药、喷雾器，协助生产队迅速消灭了虫害。收割的时候，谷子亩产量达到三百多斤。社员说：“这要在解放前，我们别说吃谷子，连草也没有了。还是社会主义好。”

黄山店的山沟里，是一片果树林。柿子、核桃、杏等产品，占黄山店公社收入的三分之一。分销店把支援当地发展林木生产，当作一项重要任务。他们经常提前准备好手锯、剪枝剪刀、喷雾器零件、农药等物资，一旦发生虫害，就及时送货到队，到田。一次他们送货回来，发现下寺大队一棵核桃树落下的叶子上有虫子，就爬上树去，查明是一种繁殖很快，危险性很大的毛毛虫。他们及时汇报公社，并且通知下寺大队，对核桃树普遍进行了检查，喷洒了农药。分销店还帮助各个生产队储存了一部分农药，发生虫害，随时可以用。群众反映：过去是虫子等药，现在是药等虫子。

黄山店分销店主动为生产队出主意，当参谋，帮助生产队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济，增加生产队收入。近几年来，这个地区的群众改烧煤炭，砍毛梢子的少了，荆条产量减少，编织水果筐还要由外地调入荆条。群众说：“荆条是越割越多，不割就没有了。”但是，要增加荆条生产量，必须解决毛梢子的出路问题。分销店同志们积极寻找销路，一九六四年冬季发动生产队收割毛梢子，一部分卖给煤矿，一部分由队里留下熏肥，并县选择荆条资源多的山谷，建立了二百多亩荆条生产基地。去年柿子丰收，生产队劳力紧张，不愿编筐包装出售。分销店帮助生产队干部算了收入帐，并且协助生产队安排劳力。结果，去年一年，组织生产大队编织篓筐二千多个，保证了柿子的质量，还增加收入三千四百多元，平均每人一元多。

## 既顾到国家的利益，也顾到群众的利益

这个地区出产花椒。花椒的季节性很强，晾晒得好，籽脱得净，质量就好。有一次长流水生产大队交售了一百多斤花椒，色泽很好，就是籽太多了。如果按一九椒（就是含籽百分之十）收购，国家吃亏；如果按二八椒收购，生产队不满意。分销店不是从价格上死“卡”，而是组织职工帮助加工，簸出了二十来斤花椒籽。花椒卖了一级价，花椒籽生产队又可以榨成油分给社员，既照顾了国家利益，也顾到了群众的利益。

又有一次，长流水大队社员王孝交售一口重一百六十九斤的大肥猪，当时言明按出肉率定等，并且按三级猪预付了货款。屠宰后的出肉量，比二级猪最高出肉量还多二两。尽管卖主不在场，他们还是按一级猪补给了货款。

## 为群众着想，满足群众的需要

上山下山，又购又销，社员日常生活中需要的一些东西，分销店同志都背篓送上山去；群众出卖的零星的荆条、药材，鸡蛋、皮张、头发，废品等，他们就背下山来。他们说：“艰苦的路我们不走，群众就得走；我们一个人走一趟，省得群众十人、二十人都走一趟。”

通过背篓上山，分销店职工看到了、听到了呆在分销店里准于知道的群众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他们看到群众上山背东西费衣服，就想办法采购布垫肩供应社员；冬天群众整修梯田手指裂口，他们就把九分钱一盒的胶布送到地头；生产队拌和农药需要胶手套，他们就反映给基层社义务代买。

1961年春,有三十五户社员响应公社党委的号召上山定居,加强果树和畜牧生产的管理。分销店也不辞辛苦,经常送货上山。住在锯齿山上的贫农许士海,给生产队看管羊群,想买一口水缸,可是没有时间下山。分销店知道了这种情况,主动派两名职工,轮流把一口近百斤重的水缸背上山去。

他们发现社员远道去理发,很不方便,就供应社员理发厨具,并且传授理发技术。看到社员去周口店焊补铁桶,就组织职工学习焊桶技术,为社员焊补水桶、铁壶。

### 不嫌麻烦,做好一分钱的小买卖

为了便利群众,在不损坏商品完整性的条件下,他们采取了“拆”、“数”、“裁”的供应方法。成盒成包的商品,可以拆零的就拆零供给;论斤论两的商品,也数个供应。比如鞋眼,一分钱买两个;整张的纸裁成小张供应。一分钱的买卖,一天不管有几次,几十次,他们从不嫌麻烦。对于只值一分钱的零星东西,比如一个子弹壳,一小缕头发,一根兽骨等都收。

一次王砚香到平塔窑生产队送货,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向奶奶要钱买铅笔,奶奶当时身上没钱。王砚香知道这个老奶奶是贫农赵宝利的母亲,全家八口人只有一个劳动力,生活不宽裕,感到自己有责任帮助她。他问老奶奶有什么废品可以卖,老奶奶说没有。王砚香帮助老奶奶在院子的墙头上找到了几根羊骨头,就换给了一支铅笔和一块橡皮。老奶奶高兴得合不上嘴,孩子喜欢得欢蹦乱跳。

### 顽强的意志艰苦的历程

黄山店分销店的职工们,从走出柜台,背篓上山,到形成制度,坚持下来,经历过几番思想斗争,战胜过许多困难。

早在1957年,黄山店分销店响应上级号召,就有过零星送货活动。但是,比较经常地背篓上山,还是从1958年开始的1958年,黄山店公社掀起了生产建设高潮,社员投入紧张的生产劳动。为了让社员节省下山买东西的时间,专心生产,王砚香提议经常背篓上山。但是有的职工顾虑重重,怕吃苦,怕寒伦,怕影响购销任务的完成。讨论几次,意见不一致。王砚香自己带头先干,他背了一篓商品来到长流水大队,受到社员的热情欢迎。不到两小时,背篓里的商品差不多全卖完了。队长激动地说:“你这一来,给我们带来了多少个工啊!”社员们一再叮嘱:“砚香,以后要常来呀!”从这以后,分销店背篓送货上山,逐渐开展起来了。

不久,对背不背油盐酱醋等价值低、分量重的商品,以及要不要一年四季长期坚持下来等问题,又发生过争论。有的职工认为,背点价钱高的商品,一趟卖几百元,还值得;背价钱低的商品,费劲不小,卖钱不多,不值得。经过公社党委和上级供销社的思想教育和他们自己在实践中的感受,后来大家逐步体会到了送货上山的重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商业不能光从赚钱多少考虑,大买卖要做,小买卖也要做,只要对生产有利,对群众有利,哪怕是一分钱的买卖也是有意义的。因此他们没有辜负山区人民热情的期待,终于把符合群众需要的背篓上山送货,购销结合的经营方式坚持了下来。

贵在经常,贵在坚持。山路难行,何况背篓上山,负重几十斤,往返几十里,有时天气还故意和人为难。但是,重重困难都被分销店职工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精神一一克服。黄山店分销店的职工说:“这几年的确遇到不少困难,但是这些困难没有吓倒我们,反而锻炼了我们,使我们的肩膀更硬了,干劲更足了。”七年来,店里人员几经变动,送货的背篓却一直都没有放下。连前几年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的那些日子里,也没有动摇。一年四季,常年累月,不顾烈日酷暑,不顾雨雪风寒,他们按照四条路线,每周外出二、三次,三、四次,背上背下。尤其1963年以来,送货更勤了,除了部分挑选性比较强的商品以外,许多日用的东

西，社员都可以在山上买到。群众说：“现在‘炕头’变成柜台了！”据匡算，近两年上山送货的销货额，大约占分销店全年销货额的百分之十左右；收购的鸡、兔、蛋、药材等零星农副产品和废旧物资，除了在黄山店门市部收购的以外，其余的大约有百分之八十是他们从山上背下来的。同时，他们并没有放松黄山店门市部的业务，而是坚持门市买卖和上山工作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他们这种全心全意为生产、为人民生活的思想以及吃苦耐劳、坚持不懈的革命精神，博得了山区群众的一致赞扬。

几年来，黄山店分销店工作做得比较出色，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和其他一系列方针政策，在上级党委领导下，不断实现思想革命化、工作革命化。但是他们并不满足于已有成绩，决心以不断革命的精神鞭策自己，向兄弟单位虚心学习，取长补短，建立和健全管理制度，继续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特别是要进一步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联系实际，武装自己，不断提高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更好地为山区生产和社员群众生活服务。

(摘自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五日《北京日报》)

## 史料四：

### “背篓商店”纪事

#### 闻风而动

#### ——“背篓商店”纪事之一

本报记者 本报通讯员

已经晚上十一点了，黄山店公社党委还在开紧急会议，研究县委紧急电话会议布置除玉米钻心虫的事。

“王砚香能在这里就好了”。公社党委书记因为考虑到急需农药，打电话到分销店找王砚香，听说他到周口店基层社开会去了，很盼望他能够回来。这时候王砚香汗流浹背地正从二十多里外的周口店赶来了。大家不免奇怪，他怎么知道公社开紧急会议呢？原来是这样：王砚香在周口店基层供销社的招待所里已经睡觉了。基层社主任从床上把他叫醒，告诉他县委刚刚开了紧急电话会议，发现有的公社发生了玉米钻心虫，希望全县各公社都立即检查，发现虫害立即扑灭。王砚香再也没有困意，不管夜深路远山道难行，蹬上自行车赶回黄山店公社，接受党委布置的任务。

第二天一早，“背篓商店”的职工背着农药分别随着公社组织的检查虫害工作组到几个生产队去。果然在两、三个生产队发现玉米钻心虫正在蔓延。“背篓商店”的职工立即把背去的农药放下，又回来背了一趟，帮助生产队把这次虫害及时扑灭。

闻风而动，雷厉风行，这是“背篓商店”职工为山区生产服务的一个突出特点。几年来，黄山店公社各生产队农作物和果树，差不多每年都遭到这样那样虫害的袭击，有的来势凶猛，蔓延迅速，农药供应稍不及时就会造成灾害，但是由于“背篓商店”这种闻风而动的作风，供应农药非常及时，给生产队提供了及时消灭害虫的有利条件。如去年夏天，周口店基层供销社电话告诉“背篓商店”，山南边天开公社发现谷子生了粘虫，希望他们注意。“背篓商店”职工知道这种虫子蔓延快，对谷子危害也特别大，两三天工夫就能把谷子吃得只剩下一个光杆，当即就打电话给各生产大队，希望他们赶快检查。十二里外的长流水大队果然发现有七十亩谷子发生了粘虫。消息传来，“背篓商店”一方面立即报告公社领导；一方面一批一批把农药背上山去，协助生产队迅速把粘虫消灭了，救了这七十亩谷子。对这件事全队社员至今念念不忘，他们说：“这要在解放以前，我们别说吃谷子，连草也没有了”。

“背篓商店”职工这种闻风而动的作风也表现在为山区人民生活服务方面。他们发现人民生活上有需要他们急需做的事,也不失时机马上行动起来。有一次,售货员李环到四马沟去送货,回来的时候,听一个正在山坡上放羊的老人说,贫农社员隗永常家,因为大人忙着做饭,一眼没看见,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从炕上摔下来掉在粥锅里了,有严重烫伤,不能吃奶。李环听到以后,立时想到自己的责任,晚上回来以后就准备了代乳粉和白糖,第二天一早就送到十多里外的四马沟,隗永常夫妇正为孩子病重不能吃奶着急,接到“背篓商店”售货员主动送来的代乳粉和白糖。隗永常的妻子感动得热泪盈眶,隗永常也激动地说:“你们真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售货员,我要念毛主席的好”。

“背篓商店”的职工,对于为生产和为人民生活服务,不仅闻风而动,而且不怕困难、不辞辛苦,不办成功不罢休。地处山坡上的涑沥水生产队,在国家的帮助下,1963年春天解决了引水下山问题以后,社员希望也能象平原地区一样,吃上自己种的春韭菜。“背篓商店”的职工闻讯以后,就去周口店基层社和县供销社给社员找韭菜籽,因季节已较晚,均已没有存货,他们又用电话联系了附近的几个基层社和一些分销店,也都说没有了。“背篓商店”的职工考虑到种春韭菜是山区人民多年的愿望,过去没有条件不能实现,现在有条件了,不能让他们失望。于是他们又抽出两名售货员,串生产队去找。这样做虽然谈不上有商业利润收入,但是他们仍是采取积极态度。他们由近而远,串一个生产队又一个生产队,一直由黄山店公社串到二、三十里外的周口店公社,一共走访了二十多个生产队,终于给涑沥水社员找来了韭菜籽。

(载《北京日报》1965年7月6日)

### 热心做小买卖

#### ——“背篓商店”纪事之二

本报记者 本报通讯员

一天下午,我们正在“背篓商店”门市部隔壁的房子里同商店负责人王砚香谈话,青年女售货员李金藏,用一张杏树叶捏着拿来一个象小拇指粗的大蝎子和两个很小的小蝎子,都被踩得奄奄一息。李金藏说,“王砚香,你看看这三个蝎子值多少钱?”

我们才忽然明白,原来他们是在收购药材。

王砚香把这三个蝎子接过来,一边仔细端详,一边象是对李金藏又象是自言自语地说:“按规定,只收晒干的蝎子,这种蝎子不能收,要是不收,让社员再拿回去晒干,出门就会扔了。”然后他对李金藏说:“收下吧!值五分钱,放到仓库里边窗台上晾起来”。后来我们才知道,仓库里边的窗台上已经摆满了包着蝎子的小包,有的包里只有一只蝎子。

收购蝎子,只不过是“背篓商店”收购的几十种药材当中的一种,收购药材又只是他们整个购销业务当中的很小一部分。不嫌弃小买卖,热心做小买卖,是“背篓商店”整个经营活动当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每天,在门市部的柜台前,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会一个小学生拿来一两个子弹皮换了一支铅笔;一会一个若太太拿来一个鸡蛋换了一点盐或几支针;一会有的人又拿来一点药材卖几分钱或换了自己需要的小商品……。这些小买卖,是夹杂在几元、几十元的大买卖之中进行的,大买卖加大量的小买卖,使“背篓商店”生意倍加红火;小小的门市部从早到晚顾客不断,尤其是到了中午和傍晚,社员休息,学生放学的时间,门市部的柜台前总是顾客盈门,男女老少,熙熙攘攘,有买有卖,非常热闹。

他们背篓到了山村,也是又卖又买,热心做大买卖,也同样热心做小买卖,到了哪个村子,就使哪个村

子立时活跃起来，尤其到了几个较大的村庄，摊子摆开，就象小市场一般热闹。6月25日，我们跟着“背篓商店”的职工到了距离黄山店十二里远的山村长流水。这个村共七十一户人家，三百多口人。从上午十点在村头的一棵大树下摆开摊子，群众就蜂涌而来，直到下午二时一直不断：有的买盐，有的打醋，有的买日用小百货；有的卖药材，有的卖鸡蛋和各种零星废品等。最后我们作了一个小统计：社员买东西的大约一百五十人次，售货额共为七十九元九角六分；卖东西的共一百八十一人次，共值金额四十三元四角三分。这当中除去一部分几元一宗的买卖以外，大量的都是几分钱一宗的小买卖。这些买卖虽小，但是给全村社员的生活，带来了方便。

小买卖作用大，一点不假。仅今年5、6两个月，“背篓商店”已经一点一滴的收购了一千元的药材；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已经零星收购了三千多斤碎铁和近二百斤杂铜这给国家增加了财富，也给社员的生活解决了一些问题。许多社员用这些收入解决了吃油盐酱醋和给学生买了本子、铅笔的零花钱的问题。黄山店贫农社员许振兴，就用这种零星收入，攒了五块多钱，给儿子买了一双球鞋。

这样大量的小买卖，虽然给“背篓商店”的售货员带来不少麻烦，增加了不少工作量。但是，我们从来没看见他们嫌过麻烦，要问“背篓商店”的职工为什么能这样，这个商店的职工说得好：为人民服务就不能嫌麻烦，人民需要我们怎样做，就应当怎样做。

(载《北京日报》1965年7月8日)

## 买卖公道 说话实在

### ——“背篓商店”纪事之三

本报记者 本报通讯员

“背篓商店”的职工背篓送货上山时，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形：有的社员准备买布或者买鞋，在背篓里没有挑到合适的，就把钱交给“背篓商店”的售货员，请他们回去给挑选合适的下次夹时捎来，显得非常信任，就好象托咐给自己家里人一样放心。还有的时候，在黄山店门市部的柜台前，从山上下来的小顾客，掏出一张大给人写好的纸条递给售货员，请售货员帮助挑选布匹，鞋子等商品。

“背篓商店”的职工为什么这样受社员的信任呢？这需要通过仔细观察，在他们日常一件件细小的经营活动中去寻找答案：

有一天，一位中年妇女，来门市部给弟弟买结婚用的东西。她买了几样别的商品以后，还想挑一对同样花的茶碗。王砚香拿出一部分茶碗任她挑选，她挑了一对白底红花的。王砚香发现，其中有一个在碗边一上有个小裂纹，仔细看可以发现，不影响使用，但有碍美观。于是王砚香主动告诉顾客，请顾客考虑是否换一换，尤其是作结婚用，别回去落埋怨。可是顾客挑来挑去，还是觉得这一对茶碗好看，表示有点残也认啦！王砚香考虑到商品残损是商业部门的责任，不能加在顾客身上，就主动把这个茶碗的售价适当降低了几分钱。

一天早晨，我们刚起床，发现王砚香和售货员白金海二人已在门市部隔壁的房子里忙着打算盘。一打听，原来他们昨天收购了长流水大队社员王孝一口肥猪，当时言明，按出肉率定等计价，并且先按三级猪预付了货款。这头猪屠宰以后，一过磅，实际出肉量达到一级，当时虽然卖猪的社员不在场，他们也绝不欺骗社员，按一级猪作了价，给社员王孝补了价款。

在门市部的副食品部，有时候卖桔子。有些顾客在准备买以前总爱先问一声：“酸不酸？”只听“背篓商店”的售货员有时候回答：“酸”。有时候回答：“刚来的，我们还没吃过，要不，您先买个尝尝。”他们的

回答是实实在在的。

在“背篓商店”的售货员当中，也有个别人在这方面曾经有过缺点。如有一次，一个售货员背篓送货上山时带了一部分代乳糕，因销售不畅，这个售货员为了快点卖出去，向社员说：“这是特意照顾山区社员的，还不买点。”回来以后，另一个售货员就把这件事反映给王砚香。王砚香马上找这个售货员谈话，进行了批评。这个售货员承认了错误，并且表示以后一定改正。

俗话说：“日久见人心”。“背篓商店”的职工就是用这种不允许说一句假话的态度做买卖，多少年如一日，终于在山区广大社员的心目中赢得了真正“童叟无欺”的信誉。长流水生产大队社员吴奎的母亲，有一次“背篓商店”的售货员送货时，她让售货员回去以后给她挑二十多尺蓝布。并且说：“你看着好就行”。问她对“背篓商店”怎么这样信得过，她说：“他们办事实，准没错”。

我们问“背篓商店”的职工，他们做买卖这样实事求是，童叟无欺，是因为什么。他们问回答说：“我们社会主义商业就应该实事求是，每一次买卖都要完全对人民负责。我们认为哄骗群众是个品质问题。”

(载《北京日报》1965年7月10日)

### 新“生意经”

#### ——“背篓商店”纪事之四

本报记者 本报通讯员

据说，在“生意经”当中，有这样一条：揣摩顾客心理。揣摩顾客心理的目的是什么？过去所有的售货员说，是为了投其所好，别让买卖跑了。这次，了解到“背篓商店”职工在这方面的做法，才恍然大悟，那个售货员说的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生意经”。

“背篓商店”的售货员揣摩顾客心理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先看一件事情吧：

5月中旬的一天傍晚，一块走进来五位顾客，说准备挑选结婚用的商品。售货员从这五位顾客的年龄、相貌和言谈话语中，判断他们的关系大约是：一位是将要结婚的姑娘，一位是她母亲，两位是她的亲朋，还有一位是男方的亲属。对于挑选商品分别所持的态度是：这位农村姑娘含羞低头不语，她母亲没有主见，主要是两位亲朋说话，男方的亲属付钱。他们先买了一件女毛衣，又买了一双女布鞋和一双球鞋，又买了几尺灯芯绒。这时候，售货员敏锐地察觉，男方的亲属在挑选商品和付钱时的表情，已经不象开始那样痛快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别让买卖跑了”的“生意经”，售货员应当帮助女方说话，好多卖些商品。可是售货员不是这样想。他考虑到男方已经花了几十元，再多花会不会造成结婚后生活困难？他决定设法让男方少花钱，这时候，女方的亲属主张再买一些平绒作衣服，售货员说：“咱们都是庄稼人，下地劳动还是穿次一些的布衣服好”。结果女方改变了主意，买了价钱比较便宜的布。

“背篓商店”的售货员，揣摩顾客心理的目的，是为顾客过日子着想，使顾客少花钱，又买到适用的东西；不是必需的东西，哪怕是几分钱也最好不花。前一个时期，市内有的商店的售货员来“背篓商店”学习，在山村摆摊售货的时候，手里摇晃着糖，逗引站在面前的孩子说：“快回家跟大人要钱去，买糖吃！”“背篓商店”的职工对这种做法就是不赞成的。有一次在涞沥水生产队，有一个傻子，别人鼓动他买糖吃，他一下掏出一元多钱要买糖，“背篓商店”的职工为他今后生活考虑，经过劝说，只买了几毛钱的。他们说：“山区社员的生活水平比不上市内，他们的钱首先是用来买油盐酱醋、鞋、布等生活必需品的，不能整天给孩子买糖吃，咱们这样逗人家的孩子，大人是不高兴的。”“背篓商店”的售货员把背篓送货上山的商品分成两种，

一种是社员生活必需品；一种是特殊需要的，如水果、糖、饼干等，一般社员常常是在有病人或走亲戚时才买，对这些商品，“背篓商店”的售货员不作更多的宣传。

但是，“背篓商店”的售货员，为了帮助社员购买生活必需品，态度则是极为热忱的。今年4月的一天，有一次长流水生产队一个十多岁的男孩来黄山店门市部买球鞋。他挑了一双可意的，可是一数钱差三分，非常着急。售货员白金海也为孩子着急，他忽然看到孩子把来时穿的破布鞋扔在门外，就主动给他拣回来当废品收购，正好可作价三分。可是白金海把这双破布鞋仔细看了看，感觉还能凑合着穿，当废品卖挺可惜，劝小孩把破鞋拿回去再穿，欠的三分钱他可以先垫上。这个小孩表示坚决不要这双破鞋了，白金海只好把破鞋当废品收购了，孩子穿上新球鞋，喜欢得欢蹦乱跳。

“背篓商店”的职工在向我们介绍情况时，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有什么“生意经”。但是，我们觉得他们确实有自己的“生意经”。要问他们的“生意经”到底是什么？我们认为也很简单，就是为人民服务。

(载《北京日报》1965年7月13日)

## 好“班长”

### ——“背篓商店”纪事之五

杜昌吉

“背篓商店”所以成为一个充满革命精神的好商店，当然主要靠党的正确领导和这个商店全体职工的努力，但是也是同这个商店有一个好“班长”——共产党员王砚香分不开的。这个商店从1958年起开始背篓送货上山，6年多以来，人员几经变动，一次又一次若人走了换新人，但是，在王砚香的领导下，始终保持着一个紧密团结，干劲充沛的革命集体，为革命做生意的精神越来越好。王砚香是怎样当“班长”的呢？

## 以身作则，事事干在前头

还是在背篓进货上山进入第一个冬季不久。一天夜里，随着呼啸的北风，下了一场雪，到处一片白茫茫的。有两个售货员在院子里一边扫雪一边念叨。一个说：“今天不能背篓上山了吧？”另一个说：“看吧！让去就去！”王砚香听见了，他知道，如果在这点困难面前就退下来，背篓送货上山就不可能坚持下去。但是他没有批评自己的同志，而是委婉地说：“今天天气不好，门市上的事情也不少，你们俩在门市上照应一下吧！今天我一个人上山就行了。”说罢，背起背篓就走了。这是无声的命令，这是最有力的督促。从此以后，凡是规定送货的日子，一般的风雨天气大家从不犹豫，背上背篓就走了。

处处以身作则，事事干在前头，这是王砚香一个很突出的优点。什么工作最艰苦，他就首先抢着去干什么工作。背篓送货上山比在门市部站柜台售货累得多，他就抢着背篓上山，每年他虽然都有一些时间外出参加会议，但是背篓送货上山的次数却不比别人少。收购猪是一件脏活累活，当社员送猪来的时候，只要他在门市上，总是干在前头。在日常生活当中，凡是吃苦受累的事，他也是抢着干。如商店的伙房太热，需要开天窗，他就带头担水和泥，上房干泥瓦匠活。

### 遇事商量，虚心向同志们学习

王砚香说：“一个人的能耐是有限的，只有靠大家，事情才能办好。”王砚香在经营业务上可以说是内行了，但是在决定商店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从来不自以为是，独断专行，总是虚心听大伙的意见，然后作决定。今年4月份，有的售货员提出来进女短袖上衣，他也同意，但是他认为这是第一次进这种商品，最好还是多听听大家的意见。果然有的售货员表示反对，他考虑了两方面的意见，决定先进几件试销，结果很快卖出去了。大家的认识一致了，然后才多进这种商品。关于送货上山的定时，定点、定路线等办法，都是同全店职工一起研究决定的。王砚香还注意以人之长比己之短，虚心向大家学习。王砚香认为售货员白金海收购药材的业务比自己强，遇到自己不懂的，就向白金海请教。王砚香认为青年女售货员李金藏、李玉珍、郑春藏都是初中毕业，文化比自己高、就虚心向她们学习文化。

### 用火热的阶级感情培养新一代

“背篓商店”三个青年女售货员：李金藏、李玉珍、郑春藏，都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初中毕业生。由于她们都是从小生长在平原地区的城镇里，而且体力劳动的锻炼不够，刚来的时候，她们当中有的人怕艰苦，不够安心。因此，如何帮助她们在这里扎下根来是一个问题。王砚香表示：党把青年交给了我，她们的家长也信任我，我一定对党负责，把她们带好。

王砚香首先从思想上提高她们的阶级觉悟。一方面同她们一起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毛主席著作，一方面利用一起背篓上山的机会，同她们讲山区人民在旧社会的生活苦难和社会主义山区发展的美好远景，以及供销合作社对建设山区所担负的光荣任务，激起她们为山区人民服务的思想感情。现在这三个女青年都开始树立了为山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且相互之间进行“三比”，一比工作；二比学习毛主席著作；三比艰苦朴素。其次，王砚香还有计划地帮助她们过体力关。办法是：先不背篓空身跟着走，然后让她们两个人背一个篓，装的重量也慢慢增加，走的路程也是先去近的，路程逐渐增加，经过一个相当时间的锻炼，爬山比较熟练以后，再爬比较高的山。在这个过程中，她们仍然需要坚强的意志才能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有时候，王砚香同她们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读《愚公移山》，大家边读边议，从中吸取精神力量。就这样，使这三个女青年逐步变得坚强起来，不仅树立了比较明确的为山区人民服务的思想，还可以背着几十斤重的背篓翻山越岭，把商品送往各个山村。

“背篓商店”是一个革命的好商店，王砚香是一个革命的好“班长”。

### “背篓商店”售货员日记摘抄

白金海(男、共产党员)

×月×日对待自己的工作，本领必须过得硬。背篓上山是我们工作需要的，一定要有背篓的过硬本领。每逢下乡的时候，就是练硬功夫的好机会，山越高，路越不好走，越要向上跑，向前冲，天气越热越要练，只有这样才能练就过硬本领。我一定要沿着“背篓商店”的老同志走过的艰苦的道路前进，特别是要学习王砚香同志坚持六年如一日背篓送货上山的革命精神。

为了练负重爬山的硬功夫，每次我回家休假的时候，中间过一座山，宁愿扛着自行车爬山抄近路走。昨天我扛着车子爬山碰着一位解放军同志，他小声说：“过得硬”。我听到这话以后，觉得离解放军的过硬本领

还差得很远很远，以后要加紧锻炼。

×月×日今天我到涞沥水生产队去送货，一位贫农老大娘给我讲起解放前她当妇联主任和敌人斗争的情况，使我受到一次很深刻的阶级教育。老大娘没儿没女，只有老两口。我决心要做贫下中农的儿子，忠心耿耿为他们服务。我对这个老大娘说：“以后您缺什么东西，就给商店打个电话，我们就给送来。”

#### 李金藏(女，共青团员)

×月×日昨天，李玉珍、李环我们三人到葫芦棚大队去送货，当我们爬那一段陡坡的时候，累得我喘了大气，腿都懒得抬了，我们坐下来休息，念起毛主席语录来。毛主席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这时候，我联想到了河南省石板岩供销社的同志们说的“山高不过我们的脚板”这句豪言壮语。同时又想到葫芦棚的社员正等着用我们送去的盐做菜、用我们送去的布裁衣……想到这里，全身立时有了劲，一口气爬上山去。

×月×日县供销社的王主任，在百忙中教我们编草帽辫，好让我们教社员编草帽辫，找副业门路，增加社员收入。而我现在生活在农村、工作在农村，却没有主动想方设法给社员出主意想办法增加社员收入……这说明我还没有真正树立起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 李玉珍(女，共青团员)

×月×日以前，我想我们背篓送货上山，带一些油、盐、酱、醋，也知道是人民群众需要的。但是累得要命，卖钱不多，觉着不如背百货布匹，又轻便又卖钱多，工作情绪有些低落。今天晚上我翻开了毛主席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篇文章，主席说：“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对照起来才发现自己的想法是不符合主席思想要求的。油盐酱醋人民生活必需品送到了家门，就省得他们下来，耽误生产。我们送货上山虽然出了一点汗水，腰酸一点，腿疼一点，这又算得了什么。能解决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这是我们革命者最大的快乐，最大的幸福。

#### 郑春藏(女，共青团员)

×月×日今天有三个同志下乡了，门市上留下三个人。工作紧一会、松一阵子的，显得还不算太忙。这时候，有一个中年妇女，穿着整齐的衣服，背着个口袋，里边装的象是粮食，她把口袋放在柜台上，我看见她的口袋有个小口直往外漏粮食，就在柜台下找了根旧麻绳扎起来，她感激地连说“谢谢”。这件事，给我一个启发，就是以后站柜台也要随时想着帮助顾客解决困难，方便顾客。

#### 李环(五十九岁，刚开始学文化不久，这是他写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

我学习《为人民服务》以后，进一步懂得了要为人民而生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道理。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我的心里更明亮。决心干到老、学到老，人老少年心，学习毛主席著作更有劲。

(载《北京日报》1965年7月13日)

(《房山文史资料》第4辑)

## 六十年代的顾册铁业社

卓成栋 王桂莲

顾册铁业社是1954年12月份由房山地区铸犁铧、焊洋铁壶、打铁、钉马掌等个体手工业者合并组成的铁业生产合作社，原场地设在房山城关南街。1958年在房山县顾册成立炼铁厂，1959年铁厂下马，铁业社由城关南街迁到顾册炼铁厂原址，更名为顾册铁业社。

当时的铁业社规模较小，人员不足百人，只能生产一些常用、小型的农机具。生产形式仅属于小手工作坊类。由于生产工艺落后、设备陈旧，生产效率低，建社初期生产产值仅几万元，最高时也不足20万元。

进入六十年代后，该社积极响应“工业支援农业”的号召，积极开发适合本地农村生产的各种小型和新型的农机产品和工具，使企业得到逐步地发展，从而也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该社六十年代初研制的扬场机、铡草机、轧场机、碾米机、切薯干机及锨、镐、锄、镰等小农具成为农村的抢手货。那时房山地区几乎村村都有该社的农机具，家家都有该社的小农具。其中该社研制的扬场机曾获北京市农机改革特别奖。该社的其它革新成果，也曾在北京农业展览馆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展出，有的成果还送到中南海怀仁堂，请中央领导观看。

由于该社在技术革新中创出新路，全国很多省、市、自治区派人来厂参观学习。西藏自治区的学习小组，还把该社革新成功的锻造弹簧锤带回了西藏。六十年代中，阿尔巴尼亚和越南代表团也曾到该社参观过。

顾册铁业社在当时引以为荣的，不仅是艰苦创业勇于革新的突出成绩，更令人称道的是他们一心一意地为农业服务的可贵精神。在工业为农业服务方面，走出了一条创新的道路。用当时当地农村社员的话来说：“铁业社和我们农民是一个心眼，走的是一条发展农业的道儿。”的确，顾册铁业社从建社到60年代中期，主要产品以农村需求的中小农具和农业机械为主。但他们不以完成国家基本指标为满足，为农民算经济账。只要农业需要，即使再忙，也要给予帮助。当时该社的领导曾向全社职工算过这样一笔账，“我们完成了国家下达的指标，对上级我们交了账，可对农业还没有交账，为农业服好务，只有交了农业账，我们才算真正完成了任务。所以算账应算工、农两本帐，没为农业服务好，赚钱再多也白搭”。

正是解决了干部职工的为谁服务的方向问题，他们才增强了“为农业多动脑筋”的干劲。当时房山县委一位在一个生产队蹲点的书记打电话给铁业社，说需要用于耨密植小麦的小方锄。第二天，该社就把连夜赶制的200把送到地头。该社派技术丰富的老工人到农村蹲点几年共研制出适合当地农业生产的农机具20多种，长期组织维修队去生产队帮助抢修农机具等。不管是农村需要什么，只要一招呼，他们马上就会行动起来，解决了无数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从而也赢得了信誉。

顾册铁业社用高标准为农业服务，不但解决了安于为农业服务的根本方向的问题，并且促进了企业自身的建设和生产的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突破了“铁匠打铁没有样，越打越像”的老常规，使铁制农具中小农具的生产，机械化半机械化程度大大提高。结果，产品质量明显提高，成本大幅度下降，既提高于自己的水平，又有效地支援了农业生产，因而受到了广大农村的欢迎。先后四次被评为北京市工业系统的红旗单位，他们的事迹也上了电影。1965年北京日报还以一版头条的显著位置报道了该社支援农业的事迹，并配发了短评。该社同年被房山县正式命名为房山十二面红旗单位之一，享誉京郊。

（《房山文史资料》第5辑）

作者王桂莲系原房山城关镇纪委书记

## 六十年代的北市村

卓成栋 王桂莲

北京西南郊的南韩继，可谓名闻遐迩。然而提及北市，则知之者甚少。就是这个不知名的普通村庄，六十年代中竟谱写了一曲在农业战线赶、超北京市标杆南韩继的壮歌。从而以优异成绩，一举进入房山著名的十二面红旗的行列。

北市村地处房山城关南二里许，1949年土改，1953年成立初级社。当时仅有80户，人口400多人，土地1331亩，驴、牛等牲畜20多头。在落后的农田管理耕作下，夏粮亩产最高时仅达110斤。为了提高每亩单产，县委书记李明同志于1953年亲自到该村蹲点，指导社员如何搞好初级社，如何种好田，如何提高亩产，促进了该村的各项工作。经几年的努力，到1956年高级社时，小麦亩产已达到150斤，生产资料也有了五辆马车。

1956年高级社成立，北市村和附近的顾册、双孝、辛庄、牛口峪、西坟六个村为一个社，统辖1082户农民，进行合作化运动。由于大社核算，管理困难较大，1957年3月又大社化小，单独核算，北市村又成了单村的经济核算实体。

在村社的正确领导下，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兼搞并发展副业生产。发展了砖窑，开了豆腐坊，成立了麻绳厂，组织车辆运输，全村获得了较高的收入，年分值达到1.92元，在整个城关地区是最高的，农副业收入也成为全县的标杆单位。

1958年城关人民公社成立后，全村社员干劲更大，在村中青壮男劳力参加公社组织的大炼钢铁、兴修水利等工作后，仅依靠在家的妇女劳力搞农业生产，秋后也获得了大丰收，粮食亩产双季达到600多斤，全村除留足口粮外，向国家交售余粮25万斤。

1959年大力发展养猪事业，全村400多人平均一人一头猪，被评为北京市畜牧生产先进单位。大队干部在市群英会上受到市委、市政府刘仁、万里等十三位领导的亲切接见。

1960~1962年，我国蒙受三年自然灾害，北市村人在困难面前，继续发扬人定胜天的精神，使农副业生产继续保持发展。1962年，市连续召开19天的四级干部大会，认真贯彻权力下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经济发展原则。使原人民公社下辖管理区，权利在中层的管理体制得到改变。由于权力下放到大队，更适合基层农村经济的发展，极大地调动了村民们的积极性。1962年北市村农业生产达到了解放以来的最好水平，粮食亩产仅次于当时很有名望的南韩继村。农业生产继1959年畜牧生产获北京先进单位后，又荣获北京市先进单位称号。自此以后，北市村人便和市农业标杆南韩继村上了劲头，直到1965年，上半年夏粮收获后，北市村终于以夏粮平均亩产407斤的水平超过了南韩继的夏粮亩产394斤(超13斤)，实现了北市赶、超南韩继的夙愿。为此，北京日报1965年8月21日以头版头条刊登了记者采写的题为《学南韩继为革命种田思想，发扬敢于超先进的革命精神，北市超过了南韩继》的报道，并为此配发了《力争后来居上》的重要社论。

在当月北京市委和市委召开的小麦生产会议上，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志芳受到了彭真、谭震林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彭真等市领导还亲自来到了北市大队，视察庄稼的生长情，鼓励大队领导努力为革命种好庄稼。

同年北市村在县召开的三级干部大会上被授予农业战线上的红旗单位称号，北市村真正成为房山县十二

面先进红旗之一。

翌年,北市村在北京市召开的农业先进表彰大会上,再次被评为北京市农业生产先进单位。为此,北市村的先进经验在北京日报等报刊上多次刊载,在京郊引起强烈的反响。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北市村取得的成功之处有两点,一是该村有一个优秀的领导班子,每在关键时刻都能带领全村人们艰苦奋斗,走出困境。二是该村常年以来一直坚持科学种田,把科学做为生产的原动力,尝到了真正的甜头。

对于该村领导班子的情况,早在1962年,北京市委主办的刊物《支部生活》就刊载了该村党支部书记王志芳及领导班子其它成员的廉洁奉公、不计名利、带领全村人艰苦创业的事迹。王志芳1962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并荣幸地同市长彭真等领导同志一起合影留念。在这种殊荣面前,村党支部为自己制定了“好处让,困难上,先大家后小家”的约法三章。工作以艰苦奋斗为荣。非生产开支一分也不多花,生活中按最低标准办事,严格政策界限,甚至连买一包图钉、村中民事纠纷都要由党支部开会决定。尤其在关键时刻党员干部带头冲在前面受到了社员们的称颂。如1959年村中兴修水利时,雨季水库放水,冲垮了村北一条干渠的堤坝,党支部书记王志芳带头跳进大堤决口处,堵住了大水,保护了农田。三年困难时期,村中发展副业无房屋和场地,王志芳又让出自己的住房和宅院,而自己却搬进村边的小土房去住。正是这种党员干部无私奉献的精神,焕发出一种无形的凝聚力,使全村抱成一个团儿,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在合作化的道路上不断地前进。

北市村的科学种田工作起步也是较早的。合作化初期只是对大田实行套种间作,后来又采用了科学的育种、选种。1955年开始对小麦进行合理的密植。经过近三年的努力,夏粮亩产由原来的70~80斤一下子提高到150斤。当时这一成绩曾在全县引起轰动。

科学种田不但提高了单位亩产,而且也开阔了村民的眼界。村里成立了科学研究小组开办了十亩试验田,专门进行育种、播种、管理、选种的各项科学实验。村里经常请县里农业专家来村里讲课,传授科学种田的经验。当时县农机局的技术员陈永泰长期在村里蹲点,也带出了一批农业科研人员。村中科学种田最成功的作法是对小麦移栽,玉米人工授粉,大田间作套种和培育优良品种。1959~1962年,为了抓好该村这个科学种田的点,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罗玉元同志也在村中住了很长时间。由于科技进入农村,促进了农业生产,不但本村提高了亩产水平,而且还带动了周围甚至地区的科学种田水平,在全县造成了积极影响。

(《房山文史资料》第5辑)

## 农业战线上的好后勤 ——记六十年代房山农机供应站

王树田

房山县农机供应站始建于1962年2月,全站当时仅有职工14人,设有农机配件、排灌、保管、财计四个小组。地址分设在房山(南库、北库)良乡两地。

同年4月,县人委决定,将商业局、供销社、工业局以及农田水利等6个单位分别经营的450多种商品,

统一由农机供应站专营。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机供应站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服务功能不断增加，到1965年全站已有52名职工，其中，党员12人，团员11人。肩负着全县32个公社，1773个生产队的水利物资、半机械化农具、农副产品加工机械、拖拉机配件、农用汽车配件等四大类，3705种、约473500多件的供应任务。群众说：“上至高压线，下至皮麻棕片，雷管、炸药、导火线，要有葱姜蒜，真像个杂货店！”

供应站全体职工在党支部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各行各业都来支援农业”的指示，坚持突出政治，面向农村，面向生产，在大力支援农业抗旱保收，促进全县农业的发展，加快实现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等方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被誉为“农业战线上的好后勤”。并于1965年8月被评为全市的标兵单位，成为当时十二面红旗之一。1966年2月被评为全市“先进生产单位”，赵振隆同志出席了市委召开的表彰大会。1965年4月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以“破除单纯做买卖的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题，播发了农机供应站为方便群众、方便生产的先进事迹。1965年7月北京电影制片厂以“郊区农业大跃进”为题，拍摄了农机供应站先进事迹的纪录片。同年11月《北京日报》还刊登了农机供应站为解决社队购机难，出租脱粒机、扬场机、水泵的事迹的报道。

他们的主要事迹有以下几方面：

## 自力更生 勤俭创业

1962年建站后，一下子就接受这么多物资的供应任务遇到了不少的困难，突出的是人手少，没技术，不熟悉商品。商品多，又没库房。由于经营的指导思想不够明确，在部分职工和干部中产生了畏难情绪。他们说：“人手少、技术低，不接受这么多物资行不行？”有的说：“没有金钢钻，就别揽这瓷器活儿”。供应站曾一度出现注重排灌设备、轻视配件的倾向。商品从进货到销售，也缺乏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在销售中，串等、串号，商品变质，手续不清，长短货物，货物多付错付等现象时有发生。针对以上问题，党支部及时对职工进行农机供应为农业、为生产、为群众服务的三大观点教育。从抓每一位业务人员的思想转化入手，讲形势、看展览、听广播、上教育课，号召全体干部职工鼓干劲、争上游、自力更生，干部以身作则，带动群众，推动了各项工作，转变了职工的思想认识。没有房子自己盖，没有技术以能者为师，做到精一（精通一门业务）、管二（一人兼管两项业务）、懂全盘（熟悉全站业务），消灭白帽子（不懂业务）。

全站很快掀起了学业务、学技术、苦练基本功的热潮，职工互相学，走出去学，请技术人员来教，组织参观等。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全站上下都做到熟悉各种机具、配件，消灭了“张冠李戴”的现象。人手少，他们就不分上下，不分白天黑夜，工作一齐干。零配件没有库房，职工没宿舍，暂借几间房作办公室兼宿舍，还亲自动手拆旧房、盖新房。白天坚持工作，晚上义务劳动。从1962年至1965年上半年，全站职工共参加义务劳动5175天，每人每年平均41天。为国家节省了开支，增强了职工的主人翁意识。

## 满足农业需要 坚持送货上门

由坐守柜台到送货上门，这是一个经营思想和经营作风的大转变。在不断改善服务质量做好供应的同时，他们发现很多生产队因为坏机买件不及时而耽误生产，党支部及时提出送件送货上门。起初，有的同志不理解，认为“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就可以了，全县这么大的面积，要送货下乡，送不过来。”再者，“全送货下去，门市干什么呢？”党支部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有利于农业生产出发，做好思想发动工作，要求职工政治挂帅，把住第一线的困难，当好“农业的好后勤”。并与职工一起算工作、劳力帐，合理地安排

了门市业务，抽出力量送货下乡。同时，根据送货的重点单位，调整工作布署，做到大家心中有数，坚定了送货上门的信心。结合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全站把主动送货上门当成一项制度，哪个单位缺件，只要打一个电话，不管白天黑夜，风雪雨天，都及时送货。

如1965年6月29日，琉璃河公社立教大队抗旱浇地时，配电盘突然烧坏。售货员赵文英(女)接到电话时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了，她想如果明天再送去，一是影响生产队浇地，二是明天门市部无人也不能营业了。她便和常侃把东西拴在自行车上就出发了。立教距房山30华里。还要穿过几条水渠、河道。天已经黑了，一不小心就摔跟斗，弄得满身是泥，车骑不动了就推着走，终于及时送到了生产队。

1965年10月8日，城关拖拉机站的一台拖拉机在大次洛村耕地，五铧犁的地轮坏了，一个地轮加上工具100多斤，保管员王艺俊用车推着走，路上摔了跟斗，腿都摔破了，但他全不顾，坚持把东西送到保证了生产需要。

在送货中他们不嫌东西少，价低。如石楼大队需用6个接线嘴子，仅7角多钱；罗家峪大队需用一个碾米机碾套，价值一元多钱，都及时给送去。仅1965年就进货3555次，送件11394件，价值43685元。

### 技术下乡 服务到现场

为适应农机发展的需要，农机供应站抽出部分专业技术人员，建立一支技术服务队，到生产第一线，一手抓维修，一手抓管理，帮助社队培训技术人材，建立各种机械管理制度。全县当时有排灌设备1353处，脱粒、扬场、农产品加工机械857台，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由于使用时间还不长，机手缺乏使用、维修、保养的经验，机械故障多，利用率低，坏了得不到及时维修。为了使农用机具正常运转，发挥效能，方便群众，服务队经常深入农业生产的第一线，维修到现场，保证机械的正常运转，仅1965年就为社队修好机器758台次，培训机手648名。

南召公社务滋大队有500亩样板田，只靠一眼机井灌溉。浇水时，机器坏了，干部和社员很着急，服务队赶到现场后，改装修理，很快使这台水泵投入了作业。霞云岭公社银水大队第四生产队，当时没有电源，但该队有一台社员称为死机器的锅驼机，已有几年没使用了，附近有河，用不上水，服务队帮助认真检查了机器，缺零件千方百计寻找加工，为了一个小件，要跑几百里路，终于把机器修好，解决了浇地问题。长操大队，1965年6月接通火电，需用一台高扬水泵，但市、县均无货，农机站的同志先后找了几个有关厂家，并请有关各方支持，终于买到了水泵并帮助安装好。解决了全大队2000多口人饮水、500多亩粮田及5000多棵果树的浇水问题。1963年8月兴礼洼的7800多亩庄稼被水淹，供应站连夜冒雨送去10套电机泵以及各种零配件，保证几个大队及时排除田中积水，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农业损失。

### 开展机具租赁 解决购置困难

1963年以来，供应站先后组织520多人次深入社队了解机具购置、使用方面的需求情况。还利用县里召开三级干部会(县、公社、大队)的机会，将脱粒、扬场、饲料加工、排灌等机具搬出库房，当场操作表演让干部和群众看，效果很好。但在深入社队走访中又发现，有的生产队有电、有水源，就是资金紧张。也有的生产队觉得买机器不合算，一年中用不了几天，站党支部对此进行了研究，决定开展机具租赁业务。虽然站上赔点钱，也得保证农业生产，经请示上级主管部门同意，立即开展起此项业务来。

1965年春，张坊公社南白岱大队因水渠较长，机器少，700多亩小麦浇不上水，早想买台水泵，又没有钱。供应站及时租赁给一台，使全大队小麦都及时浇上了水。大紫草坞公社前闫村大队有几百亩地，因为干

旱播不上种没钱买水泵，干部群众非常着急，供应站及时租给一台水泵，润了地，播上了种保证了急需。开展租赁业务以来，解决很多公社、生产队无钱购机困难，促进各村的机械化作业进程。

仅1965年一年，租赁给生产队水泵等190台套，电动机128台，启动补偿器30台，水管1907米，脱粒机35台，扬场机12台，各种配件5890多件。

## 开展赶超活动 激发工作积极性

在比、学、赶、帮、超活动中，农机供应站党支部既抓先进、树标兵，也抓后进人员赶先进。使之增强信心，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工作中，坚持月月检查，季度评比总结，利用黑板报、宣传小组、大小会等形式宣传职工中的“先进集体”“六好模范事迹。提倡虚心学，热情帮、边学边用。解决了全站各库房保管上存在的问题。拖拉机配件保管员沙永清主动向汽车配件库学习保管方法，坚持生活、办公在库房，起早贪黑、练习拖拉机配件管理的基本功。并在保管配件上总结出一套“五五”化的管理方法。党支部及时总结其经验，向全站各库推广，促进了农机供应站库房保管水平向新的层次发展。排灌组经过学先进、赶先进，职工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转变，在抗旱中和公社大队的社员一起，不怕苦和累，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买机器和需用送上门的地方多，几天几夜不合眼，有力地支援了抗旱工作。

在学先进、超先进、比技术、比贡献的热潮中，人人学技术，学本领，个个练出一身硬功夫。如拖拉机配件组拖拉机的753种配件，夜间提货不用开灯。全站从1964年开始，汽车、拖拉机配件保管工作做到无差错。赶帮超活动，全站涌现出了5个“五好组”，5名“六好”职工，7名有一技之长的技术标兵。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今天，我们把六十年代农机供应站革命工作精神以及先进事迹回顾一下，以供学习、借鉴，进一步激发我们农机战线上人员的斗志，搞好科学管理、强化服务意识。这对房山区的农机事业的发展，将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房山文史资料》第6辑）

作者系原区农机局干部

## 六十年代的惠南庄村

张 珍

六十年代初，南尚乐乡惠南庄村被房山县委、县政府命名为猪多、肥多、粮多的红旗单位。当时全村448户，2034口人，集体耕地2547亩，是原南尚乐公社的一个大队。农村人民公社化以后，特别是从1963年以来，村党支部重视养猪生产，由于发展数量多，农家肥料也迅速增加，所以粮食产量不断提高。到1965年，全村公养私养猪只累计达到2500头，实现了一人一头猪和一亩一头猪。粮食作物亩施万斤肥，秋播小麦亩施万斤优质底肥，大大增强了地力，为实行先进技术措施提供了物质基础。1965年在农业生产遇到严

重干旱的情况下，全村粮食亩产仍达到了 810 斤，比本村历史亩产最高的 1962 年增长百份之十点二，亩产第一次超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过长江”指标。

惠南庄村猪多肥多，粮食平均亩产“过长江”，在全县广大农村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一致称道惠南庄村党支部班子过得硬，支部书记杜宝珍同志领导有方，是名符其实的红旗单位。那么，惠南庄村在加快发展养猪生产中，是怎样做的呢？

### 找差距 解决关键问题

惠南庄村，地处拒马河畔，地势平坦，土质较好，自流灌溉，素有房山“乌克兰”的美称。这个村的粮食产量，在 1957 年就达到亩产六百多斤，在房山县处于领先地位。但是，直到 1964 年，全村粮食平均亩产一直在六七百斤上下徘徊。问题在哪里呢？党支部一班人带领全村干部到北京市郊区闻名的南韩继、红星、一渡河等先进社队参观学习。特别是到顺义县陈各庄大队参观学习后，村干部大开眼界，看到了自己有两个明显差距。一是认为本村自然条件好，粮食产量水平在房山在郊区都小有名气，外地来本村参观学习的越来越多，因而背上了满足现状的包袱，以致很少去外地参观学习，产生坐井观天，固步自封的思想。二是粮食产量长期处于徘徊状态，其重要原因是认为本村耕地土质肥沃，水利条件好，而忽视了大抓养猪积肥，影响了粮食增产。回来后村党支部决定，学习陈各庄，克服自满情绪，大抓养猪积肥，誓夺粮食高产。

### 书记亲自抓养猪 六访陈各庄

肥料是粮食的粮食。党支部认为发展养猪是惠南庄村实现粮食不断增长的关键，党支部决定由杜宝珍同志亲自挂帅，重点抓发展养猪生产，要求从大队到生产队、从党支部到青、妇、武各部门，都要把养猪生产列入议事日程。杜宝珍同志抓养猪，整日吃住在猪场，同饲养员一起劳动，在劳动中作思想政治工作，发现和解决各个生产环节存在的问题。为使全场干部、饲养员学到饲养管理的先进经验，他带领猪场干部、饲养员，先后六次到顺义陈各庄村参观学习。有时还住在那里，同那里的干部、饲养员座谈、取经。回来后，边摸索，边改进，很快使这个大队养猪生产，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 抓住关键环节 促进养猪事业大发展

惠南庄发展养猪，将外地经验与本村实际相结合，抓了四个关键性生产环节，取得了明显效果。

一是建立一支事业心强、懂生产技术的干部、饲养员队伍。为了提高猪场人员生产技能，他们多次举办学习班，学政治、学毛主席著作，学科学技术，交流饲养管理经验，使他们安心猪场工作，尽职尽责，以场为家。为了调动积极性，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多劳多得；在技术上，多数干部、饲养员掌握了识别种猪发情、配种、饲养妊娠母猪、管理仔猪以及作好防疫等技术。从而不仅解决了集体猪场的成猪和仔猪大量死亡的问题，而且走上了提高配种率、提高产仔率、加快催肥、增重速度的良性循环的道路。

二是发展优良种猪，做到自繁自养。惠南庄的猪场，是在 1958 年办起来的，集体饲养种猪有些基础。但种猪数量少、品种杂，不适应发展需要。通过加强领导，改进饲养管理措施，又对部分种猪进行品种更新。到 1965 年，全场集体饲养优良种猪达到 206 头，占全村种猪总头数的 87.2%，所繁殖的仔猪，不仅满足了本村的需要，而且还支援了兄弟社队。由于种猪品质好，仔猪饲养十个月即可达标出栏，很受群众欢迎。

三是积极扶植社员个人养猪，贯彻落实“公养私养并举”的方针。为了帮助群众发展养猪，解除社员户

养猪怕赔钱的顾虑，大队采取三项保护措施：（一）实行社员养猪保险，社员交纳少量保险费后，由大队负责包防疫，包治疗，包因病死亡的猪价赔偿。（二）各生产队建立积肥专业队，要求户养猪必须实行圈养，生产队负责起棚垫圈，按各户养猪头数给以积肥报酬奖励。（三）对困难户积极帮助，缺圈的由生产队帮助建圈，缺资金的由集体猪场先赊猪秧，售出肥猪后再归还仔猪价款。对个别贫困户，由大队赠送猪秧。三项措施实行以后，全村社员户养猪积极性相当高涨，基本做到了户户养猪。1965年全村四百多户，共养了605头猪，既增加了个人收入，又为生产队增加了农家肥料。

四是千方百计解决饲料问题。全村猪只数量的迅速发展，饲料问题越来越突出。村党支部从多方面想办法，解决饲料问题。如1964年秋季，全村各队搞白薯青贮24万斤，青贮薯秧14万斤，搜集各种树叶5万多斤。1965年猪只进一步发展，本村人多地少，饲料不足。他们利用菜园等边角废地，沟帮渠埂和大田套种等办法，种植豌豆、黑豆等，折合耕地300多亩，共收获豆类及豆秧10余万斤。秋季又搞了大量青贮，收集大量的作物秸秆。通过这些办法，有效地解决了猪饲料不足问题。

由于惠南庄村党支部大抓养猪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成绩显著，受到市、县领导的重视，曾于1965年被评为房山县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杜宝珍同志，是我区农业战线的老模范。早在1954年至1957年，就评为河北省劳动模范，1954年被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1966年至1967年被评为出席北京市的劳动模范。1978年和1984、1985年被评为房山县劳动模范；1981年被选为第一届房山县政协委员、常务委员。

（《房山文史资料》第6辑）

## 一个不断进取的大牲畜配种站 ——六十年代房山十二面红旗之一

张 珍

六十年代初，享誉全县的十二面红旗之一的房山县大牲畜配种站建于1963年春。它的中心任务，是为全县农村搞好大牲畜配种工作。建站以后，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全站六名职工，为了充分发挥仅有的五头优种公畜的作用，主动学政治、学技术，创造性的开展工作，积极采用人工授精技术，推广驴生骡。到1965年10月，以人工授精的方法，共配种1281头母畜，为发展农用畜力做出显著成绩，受到县委、县政府的表彰，并树为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建站仅仅三年，被树为全县典型，其成功的经验是什么呢？

### 一个明确的服务方向

大牲畜配种站的根本任务是，为增加农业生产动力而加快繁殖大牲畜。但是，建站初期，对采用什么方法为大牲畜配种，在干部、技术人员中，有两种不同意见。一是主张用传统办法，拉着公畜走村串队，搞本交，说这样便利群众，节省畜主往返时间。二是主张积极采用现代技术，人工授精，繁殖牲畜。为了统一认

识,全站人员以“采用哪种办法配种有利加快繁殖优种大牲畜”为题,开展了讨论,多数同志认为:人工授精繁殖牲畜,一头种公畜每天采取的精液,能配五、六头母畜,五头种公畜一天可配种三十来头。如果用本交办法,一天最多只能配十头母畜。通过对比,大家提出人工授精有四个好处:(一)配的多,准确率高,繁殖牲畜快。(二)可以减少种公畜饲养量,可节省饲料等开支。(三)有利于推广优种,提高大牲畜质量。(四)有利于减少传染病。这样就否定了搞本交配种的传统方法,决定积极推广人工授精的科学方法。全站统一了认识,为加快繁殖大牲畜奠定了基础。

### 一支热爱配种事业的技术、干部队伍

要搞好大牲畜配种工作,必须让全站职工热爱这项事业。开始搞人工授精时,有的干部、技术人员,对人工授精不感兴趣。认为整天捅驴屁股,是丢人、低人一等的工作。工作不主动,不安心,有的要求调出。党支部针对当时的思想认识问题,深入细致地做思想工作,全站人员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文章。并学习县委表彰事迹,谈感想、找差距、树雄心、表决心。不少同志主动检查了错误思想,把做好大牲畜配种工作,同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联系起来。认识到搞配种工作是革命的需要,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一定要干好本职工作。有的用白求恩的精神对照检查自己。通过这次学习讨论,使全站的工作面貌焕然一新,抢工作干,迎着困难上,主动传授技术,自觉苦练过硬技术,形成风气。安翠兰是位刚三十岁出头的女同志,曾担任县公安局文书、农林局生产股长、公社妇联主任。开始搞人工授精时,思想不太通,曾一度想调出,通过学习提高了认识,她当众坚定地表示:“只要工作需要,可以搞一辈子配种事业。”原来她对配种技术一窍不通,这回她决心从头学起,积极练习组装假阴道,把手指头都磨破了。她头一次装假阴道,用了两个多小时,由于她不分上班、下班,有空就练,终于熟练地掌握了技术,只用五分钟就可把假阴道装好。同时,她还学会了直肠检查、采精、输精、妊娠检查等操作技术。同时,她服务热情周到,技术熟练,畜主都愿意找她给牲口做检查、配种。工人张启山,原来认为男同志搞人工授精名声不好。提高认识以后,对饲养种公畜非常认真,他每天要给种畜刷两次毛,用毛巾擦一次畜体,对采精后的种畜,喂些喜欢吃的草料,有时种畜病了,他昼夜守护,精心喂养,使种畜个个膘肥体壮。

### 一个技术过硬、不断进取的好作风

建站第一年,全站人工授精配了180头母畜,受胎的只有56头,受胎率仅占30%。经过总结经验找差距,找出三条原因:一是技术不过硬,对母畜发情期鉴定不准确。二是对种畜的饲料调剂不好,营养跟不上。同时,种公畜运动量不足。精液质量差,活精子只占30—40%。三是有些村的饲养员对人工授精半信半疑,不按时来站配种。为提高人工受精率,采取了四项措施:

1. 全站干部、技术人员参加劳动,到畜棚当饲养员,摸清种公畜所需营养规律,促其提高精液质量。通过实践发现:每头种畜所吃草料喜好不同,应当区别对待。从而打破了过去喂牲口的“寸草铡三刀,没料也上膘”的旧观念。如种公驴爱吃黑豆,不爱吃麸子;一号种马爱吃高粱和麸子。从此,改变了饲料单一化的做法,实行了单槽喂养,满足了种畜的营养需要,使种畜体质明显增强。

2. 为了增加种畜活动量,全站人员,人人练骑马。有的马性情暴烈,有时连踢带蹬,两腿直立,没人敢骑。经过反复训练,大部分职工都敢骑了。全站五头种畜,每天坚持骑溜两次,使精子活力提高到60—70%。

3. 搞单精与混精配种试验。经过反复试验,证明驴、马混精配种,妊娠率达到56%;双马混精配种,妊娠率达到45%;马单精配种,妊娠率达29%。从此,全站实行了混精配种。

4. 坚持直肠检查，准确掌握母畜发情期，做到适时配种。通过上述技术改进以后，使人工授精准胎率，由原来的 30%，提高到 50% 以上。

### 一个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

推广人工授精，开始阶段阻力很大。阻力主要来自部分农村干部和饲养员的传统观念。有的说：“先试试看，不行再搞本交”。有的根本不相信，说：“就凭人的两只手瞎鼓捣，要让驴下了骡驹子，我把脑袋输给你们。”有的牵着母畜一进配种站，看见是搞人工授精，扭头就走。

面临这种情况，党支部为使大家认识到：任何新生事物，总有一个从不认识、到认识的过程。发动全站人员坚定信心。坚持用事实说服群众。他们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以北市、牛口峪两村为重点，搞出人工授精成果样板。二是深入到生产队，向干部、饲养员宣传人工授精的科学道理和好处，有时请他们到站上，用显微镜看精子的活动情况，启发他们认识人工授精的科学道理。三是进一步改进作风，热情接待来站配种的饲养员，远道而来的，还安排吃住。

通过上述工作，使广大农村干部和饲养员，从心里信服了母畜人工授精的好处。全县各村主动来站人工授精配种的越来越多，有时要排队等候配种。就这样，人工授精繁殖大牲畜，在全县开了花。1963 年，全县只有九个公社、三十八个大队(村)到县站搞人工授精为大牲畜配种。到 1965 年扩大到二十个公社、一百二十八个大队(村)和六个厂矿。连那些距县站一百多华里的村，也纷纷来配种。为了方便农村为大牲畜配种，1965 年在全县先后建立起五个人工授精配种点，由县站运送精液，传授技术，使全县农村的大牲畜人工授精配种工作得到普遍开展。

(《房山文史资料》第 6 辑)

## 不靠老天靠实干 七沟八岭创高产

### ——六十年代的富合村

卓成栋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以艰苦奋斗的实干精神而享誉京郊的小山村——富合村，在 1965 年房山县召开的三级干部大会上，被授予农业战线上的红旗单位，一跃成为房山县的十二面红旗之一。

富合村地处房山区西南隅偏僻的山区，海拔近千米。交通闭塞，地薄山贫，过去有十年九不收的说法，全是靠天吃饭，有雨就有收成，无雨就一无所获。全村 50 来户人家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硬是靠自己的双手，在贫瘠的山地上创出了粮食亩产 400~800 斤的好成绩。轰动京郊上了报，声名远扬，参观学习者接踵而来。中央及市、县各级领导亲临山村视察，给这个太行深处的小山村带来了无限的生机。

富合人究竟是怎样创高产的呢？

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从历史渊源上讲，这里在抗日战争年代就是革命老区，土改早。群众觉悟高

基础好。该村1951年成立了互助组,1953年成立了初级社。1956年成立了高级社直至人民公社成立,尽管村里行政区划几经变易,但村民们始终团结一心,劲往一处使,把全部身心投入到自己家园的建设上,不图名、不图利,艰苦奋斗。

二是全村50多户村民散居在一坡三沟的半山腰上,在这样一个地理条件下,村子之所以能进步,靠得是一个过硬的领导班子。当时班子五名成员,村支部书记隗秉库、大队长隗福印、三名委员分别是隗福永、隗福义、隗福恩。他们是全村的领头人,是全村人的主心骨。他们一门心思扑在村子的事业上,以集体利益为重,心里只装大家,没有小家,深得群众拥护,工作干在前,生活享受在后,为全村树立了榜样。当时村里明文规定凡沾着吃喝用的一律自负。如吃饭不报销,买烟、酒、茶糖不报销,遇上兄弟村社或上级机关来学习、检查工作非要座陪不可,谁陪客谁掏钱。一次市、县领导来村中检查工作,村里决定杀一只羊来招待客人。事后剩下一块约有4斤多的羊肉存在库房盐堆里,谁知过了几年,那块咸肉都摺成了肉干,也没有人动它。为此在村子周围落下这么一个“可别像富合村那样把肉都摺的不能吃了。”这足以说明当时村干部的廉洁程度。另外,由于村民的觉悟高,大家相互监督,也起到了促进领导班子保持光荣传统的作用。比如一位干部因房子坏了申请砍伐一些树木建房。申请批下后,由于他整天忙碌着集体的事,无暇顾及家务,所雇民工多砍了一槐树,为此领导班子决定,叫这位村干部在全村社员大会作检查,并处以罚款60元。当时村干部和社员一样,出一天工划一道。村干部因公出差同样自己解决路费、伙食费,即使是村长也不例外。记得一次队长隗福印要去县里参加会议,他提前一天把手里的急事加班加点干完,第二天请假,去山上采一些五灵脂拿到乡里收购站卖了,换点钱做路费,然后步行出山参加会议。由于带头人的作用,调动了大伙的积极性,一心一意搞好生产,使全村粮食产量年年增长。

三是狠抓土地的基本建设,扩大粮食的种植面积。向荒山要粮。大寨有个七沟八梁一面坡,而富合的地势为“七沟八岭两面坡”、“缺树少土石头多,十年九旱无水喝。”在这样极差的条件下,创出了夺高产的奇迹。大寨人“三战狼窝掌”,富合“五战张石塘”。大寨有个铁姑娘队,富合有闻名京郊的“三朵红花”,硬是靠艰苦奋斗的实干精神,使不足百亩的田地增加到157.3亩。

四是科学种田合理施肥。六十年代大干农业的热潮中,富合人认定了只要适当多上肥,贫瘠土地也能长出好庄稼的道理,从积肥抓起,改良土壤收到了好效果。当时村民们为了多积肥,积好肥,杀绝了村中的狗做肥料,家家拆了自己的土炕,掏完厕所里的粪便,还要用水反复刷几次。为了多积肥,大力发展养羊,最多时达1500多只。他们长年累月用人背、驴驮把肥料送到山坡地里,土地肥沃了,粮食高产了,富合人却花掉了巨大的代价。

五是加强田间管理,在选种、合理中耕上下功夫,当时的目标是,田中不能有草,不能板结,一年下来竟记不清锄了多么遍地。由于选种十分讲究,要从自己打的粮食中选,还从兄弟村换些。有时为了弄到一批粮种,步行一百多里路出山背回来。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困难再大也难不倒富合人,他们始终坚持一个信念,靠天下白馍不成,只有干才有出路。而富合人的干,则是百分之二百的投入,才换来那诸多的荣誉和“富合人”的称号。

由于富合人出色的成绩和令人心服的实干精神,使富合的名字誉满京郊,仅1964年,全国各地就有二万多人来到这个深山小村学习参观。北京市市委书记刘仁也来到了这里,同村民们合影留念,鼓励富合人继续努力,取得更大成绩。1965年北京市市长彭真同志也乘直升飞机来到富合,因无平坦处降落,没有亲到山村。彭真市长还亲自批准,对富合村进行表彰,一次奖励了八匹马和一架风琴。村长隗福印、书记隗秉库相继被选为市政协委员和市贫协委员、劳动模范。富合村自1961年至1965年中先后受到县市各级奖励。奖杯、奖状挂满了会议室整整一面墙壁。

1965年5月房山县召开三级干部工作会议,总结表彰先进。富合村从那时就成为房山县十二面红旗之一了。

# 热心为群众服务的大安山信用社

## ——六十年代房山十二面红旗之一

王硕儒

大安山信用社，地处群峰环抱的深山区。自1954年建社以来，信用社干部经常活动在六沟、七岭、三面坡的三十八个居民点上，千方百计为山区群众和，农业生产服务。他们工作做得认真、细致、周到，存贷方便，深受群众好评。自1958年以后，一直被评为县金融系统的先进单位，1964年被评为房山县的红旗单位和北京市的“五好”集体。

为解决山区群众居住分散、存贷不便等问题，大安山信用社一直坚持背包上山，走村串户，流动服务，方便群众。如1961年，为了发展粮食生产，县委号召群众上山定居。为及时了解和解决上山户的困难，信用社主任安振春爬了八道山、七道沟，往返跑了七十多里山路，对上山定居的十五户群众进行了访问，并对其中缺粮的五户及时发放了口粮贷款。同年年终分配决算时，信用社会计赵成通冒着鹅毛大雪，起五更就踏着一尺深的雪路到宝坻洼村帮助分配。傍晚又带款去水峪村，因天黑雪大，山路崎岖难行，一路摔了许多筋斗，手被划破了，全身滚满了雪，到水峪村已是夜十点多钟了。群众见他很累，都劝他休息，第二天再办。他说：“大家辛苦一年了，过春节等着用钱，我一个人累点算什么！”仍坚持办公到深夜。为了便于群众存款贷款，除信用社流动服务外，还在各村建立了七个服务站，基本上做到了存贷不出村，到期存款送上门。

1956年，该社群众存款余额仅有五千元，而群众贷款达七千余元，因此欠下银行贷款两千余元。同时，还有一部分群众在生产、生活上困难很大，解决不了。在这种情况下，该社没有伸手向银行申请更多的贷款，而是依靠群众，扩大业务，大力组织群众储蓄。他们广泛宣传政策，认真贯彻“存款自愿，取款自由，替储户保密”的原则。表扬鼓励勤俭持家，节约储蓄的好人好事，做群众的思想动员工作。如中山大队一户群众，1958年把一千元存款全部取出。信用社分析：这户一不困难，二有在外工作收入，为什么取出全部存款呢？为了弄清情况，信用社派人往返跑了十多趟。通过侧面了解，正面接触，发现他怕搞“一平二调”，存款归公。针对这种情况，请老储户帮助他思想工作，解除了顾虑，他把一千元又全部存入信用社。由于信用社坚持多做群众的思想发动工作，使群众养成了“余钱就存”的良好习惯。经过1956、1957两年时间，大安山信用社全部还清银行贷款，达到资金自给。随着集体经济的发展，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该社的存款越来越多，到1965年6月底，存款余额达到262302元，比1958年增长十一倍，除对集体和个人的全部贷款都由信用社自己资金解决外，还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

大安山信用社，十余年如一日，经常深入到户，访贫问苦，发现群众有困难，就地帮助解决。1964年西窖村群众张庆怀得了重病，家庭生活困难，信用社得讯后立即派人前去访问。张庆怀在旧社会给地主扛活、走窑20余年，解放后才翻了身，但全家九口人，只其一个劳力。为帮其治病，给予贷款130元。1965年3月，又得知张庆怀病重，信用社会计赵成通走了十二里山路，专程去慰问他，发现他有个药方买不到药，就把药方带回信用社，正赶上领导让他去市内参观，赵借机在市内跑了三个药店，终于把药配齐，回社后立即送往张家，并又给张贷款看病。张非常感激地说：“旧社会我在门头沟走窑，病了八个月，没人管，后来是我岳父把我背回家的”。越是困难越帮助，一帮到底。元港村群众王国相，全家十二口人，过去只有两个劳力，年年超支，生活困难，经常借贷买口粮。从1954年至1962年，给王贷款42次，827元，帮其买口粮、

治病、养猪。到1962年，他家七个孩子有四个参加了劳动，生活有了好转，还清了全部贷款，困难基本解决了。关心群众生活，更主要的是帮助群众发展副业生产，增加群众收入。如中山村群众杨文群，全家八口人，一个劳力，生活困难，信用社从1956年就贷款支持他养猪，八年贷款130元，帮他养猪24头，收入1200元，不仅还清了贷款，1963年还盖了三间新房。据1964年至1965年9月统计，共贷款支持群众养猪412头。其中西苑村有92户在信用社帮助下养猪197头，截止1965年5月，出售肥猪131头，有50户养猪后还清了贷款，有的户还存了款。从1954年到1965年的十一年中，大安山信用社共发放个人贷款174612元，有80%的社员得到了支持。到1964年底，原确定困难较大的户174户，已有41户达到一般群众的生活水平。为促进农业生产，每年春耕开始，信用社都及时深入到村了解资金需要。仅1964年，应帮助10个生产队贷款7831元，买化肥五万余斤，调换种子一千余斤。在日常业务活动中，信用社处处从生产出发，事事为生产着想。1965年夏锄时，社干部去西苑村下乡，路上遇到群众下山买锄，回社后，他们认真研究，帮助群众解决农具问题，经与铁匠炉联系、协商、信用社为其代卖。这样，信用社干部下乡就背上小锄，五天串了五个村，为六十多户群众送锄七十余件，同时对缺钱户及时贷款，受到群众的称赞。一次到中山村下乡时，发现这个村积压四千余斤原铁，就积极帮助推销出去了。

1965年，大安山地区受到严重旱灾，部分村庄的农林副收入减少，信用社的存款一天比一天少，贷款日渐上升。在这种情况下，经大安山公社党委同意信用社会同供销社一起，在中山、元港两村进行发展副业生产的试点。通过调查研究，确定了副业生产项目。如中山村，只有60多户人家，不足两个月时间，砍木棍7000余根，割荆条9700余斤，刨药材250斤；元港村仅刨药材就3000余斤。这样，增加了群众收入。为推动全公社的副业生产，公社党委在元港村召开了现场会，介绍两个村副业生产情况。会后，各村副业生产活动相继展开，到1965年10月上旬，全社增加副业收入26000余元。

在副业生产中，信用社的干部深入现场，参加劳动，发现问题，及时帮助解决。如在中山村劳动、在瞧煤涧村煤窑劳动，发现群众缺鞋、缺窑衣、缺焊锡等，都及时帮助购买，缺钱的给予贷款，很受群众欢迎。

（《房山文史资料》第7辑）

作者系原区信访办主任

## 立下愚公志 山沟变良田 ——六十年代的庄户台大队

王硕儒

霞云岭公社庄户台大队属深山区。全队265户，1354人，耕地1772亩，人均占有耕地1.3亩。过去，这个大队山高坡陡，沟壑纵横，地瘠民贫。进入六十年代，全队社员在大队党总支的领导下，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大搞闸沟垫地，扶唇长堰，坡地改梯田，扩大了耕地面积，粮食产量不断提高。特别是1964年冬，

全队社员以大寨人“三战狼窝掌”的精神，硬凭自己的双手，闸起鱼骨寺、井儿峪、台港三条大沟，全长20多华里，投工21万多个，打石坝1100多道，垫地200亩，使从前的干河沟变成了“粮食沟”。在1965年秋房山县的三级干部大会上，庄户台村被授予农业战线上的红旗单位，成为房山的“十二面红旗”之一。

庄户台大队是怎样搞闸沟垫地的呢？

## 关键在领导

1963年春，公社党委曾提出改造鱼骨寺、井儿峪、台港三条大沟的建议。大队党总支书记杨怀元立即召开党总支扩大会议（吸收各生产队长参加），进行深入讨论。但是，直至1964年春，先后讨论九次，意见并未统一起来。主要是部分干部背上三个思想“包袱”：

一是满足现状。这个大队从1957至1964年，在农田基本建设上成绩很大。曾闸大、小沟42条，扩大耕地527亩；扶唇长堰720亩；坡地改梯田108亩，粮食总产量由39万斤提高到67万斤，亩产由220斤增至408斤。1958年前，全队每年缺粮10万余斤。1964年，除按标准留足各项消费，留储备粮、机动粮22000斤外，向国家交售余粮50000斤。同时，林业、畜牧都有很大发展。荒山造林1830亩，零星植树70000余株。在此种情况面前，是继续前进，还是保持已取得的成绩？出现两种态度：一部分干部主张应该继续闸沟垫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一部分干部认为：“队里有粮，社员有吃有穿，对国家有贡献，已经很不容易了”。

二是认为困难大，投工多，收效少，社员难以承受。有的干部说：“闸小沟，垒梯田还能搞，像鱼骨寺这样的大沟，宽的地方二十几丈，窄地方也有三、四丈，长十几里，这么大工程三年、五年也搞不完”。有的干部说：“山有山道，水有水道，要把水道都堵住，就得冲地，闸不好会前功尽弃，把老本也得拐走”。分管畜牧的干部怕闸了沟没走道，牲畜、牛羊没法上山。有的说：“要扩大耕地，不如开坡地，投工少，收益快”。

三是有的干部强调一个生产队搞不了，大队统一搞又不好搞。沟内原有的自留地、十边地无法解决。大队党总支一班人认为：干部思想不统一，归根到底是思想认识不高，还缺乏大寨人战天斗地的实干精神。1964年10月，党总支再次组织干部学习、外出参观，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听取意见，以提高干部的思想认识。曾组织干部学习毛主席的《愚公移山》和报刊发表的《大寨之路》一文。通过学习，以大寨作为一面镜子，联系思想，联系实际，反复讨论，鼓起了干部的勇气，不少干部说：“愚公移山，决心那么大，信心那么强。大寨人能三战狼窝掌，咱们也一样有决心、有信心治好这三条沟”。有的说：“咱们老根据地的人，过去打日本、打反动派走在前头，搞社会主义也不能落后”。六队队长杨天伍说：“闸出的土地不怕分不均，就怕没的分，哪队多打粮食，对国家对集体都有利”。大家表示：“要学大寨人，走大寨路，决心闸大沟，多垫土地”。贫农周永才说：“我扛了多半辈子长活，闸过不少地，那是给地主、富农干；现在闸地是给自己干，前怕狼后怕虎什么也干不好。水冲了怕什么，冲了再闸，只要有这么一双手，拿出跟反动派斗争的精神，这三条沟再大，也能闸出好地来”。

## 群众力量大无边

干部思想统一之后，又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把治沟计划变成群众的实际行动。为此，庄户台大队党总支充分进行组织发动工作，分别召开了党员、团员、民兵、妇女和贫协等部门会议，传达了党总支、大队管委会关于治沟计划和土地分配、沟内原有自留地、十边地的处理意见，广泛地开展讨论，以统一各个组织的思想认识。然后，开展全民大讨论。重点讨论了闸大沟行不行？闸大沟怎么搞法，是生产队搞还是大队统一搞？大队统一搞，闸出的土地怎么分配？沟内原有自留地、十边地怎么解决好？

大讨论从学习毛主席著作《愚公移山》及走大寨之路入手，党、团员、干部深入到各组参加讨论，听取

意见。由于第一步工作有了基础，党、团员、干部的引导，社员的思想认识很快统一起来，纷纷表示要立愚公志，作大寨人。有的社员说：“闸三条大沟，就得全大队统一搞，闸出的土地不管谁种，对集体对国家都有利。”在沟内原有自留地、十边地的社员表示：“大河涨水小河满，原有自留地可以调换，十边地就不要了”。

在统一社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落实大队的闸沟计划和各生产队的工程任务，确定了开工时间。

从11月7日开工，各生产队共投入300多劳力，采取了生产队包段，劳力包片，干部带班的办法。工程一开始，队与队之间就开展了劳动竞赛。每天社员带星星上工地，晚上出星星才回家，中午带干粮。有些社员手被震裂了，仍不肯休息一会儿。70多岁的贫农任成奎主动去垒堰。他说：“只有这么干，我们山区才算找到了增产的方向，这是为后辈子孙造福的事”。50多岁的妇女杨振英，一天工也没歇，一直坚持在工地。民兵是工程的骨干，他们在“大干、苦干，决心改变旧山沟，拦洪水、垒良田，建设山区要争光”的战斗口号鼓舞下，争困难，挑重担，把崩顽石、起大石的任务承担起来。仅用了16天就闸完了鱼骨寺沟。经过33天的努力，三条大沟的搂石垒坝工程就全部完成了。共闸出土地200亩，按照社员讨论的意见，本着耕种方便的原则，分配给生产队耕种。沟内原有自留地都作了调整。

闸沟垫地完成，怎样种好新垫的土地，社员献计献策：“挖大坨，换新土，重施肥”。1965年春，这个大队在新闸的三条大沟内又开展了一场新的战斗。兵分三路，一部分劳力在沟内挖大坨，一部分劳力上坡背土，一部分劳力运粗肥。每个坨都放上一筐好土，施上粗肥，然后在上边点种双棵玉米。第二、五生产队搞得最细致，普遍搂了一遍石碴，从山上背下一筐一筐的好土，厚厚的垫了一层，再挖坨施粗肥，跟土拌匀，点上玉米。这样，把三条废沟全部变成了粮田。

庄户大队闸沟垫地又打了一个大胜仗，但丝毫没有满足，觉得距离党的要求仍相差很远，跟大寨比，跟富合村比，还有很大差距。有些梯田、坝埝还需进一步加工整理。他们根据差距，发动群众制定了1966至1970年的五年建设规划，按照新的奋斗目标，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 两个兄弟企业的兴衰

高庆斌

1986年底，制桶厂兼并了顾册农机厂。兼并前，两个厂同属当时的县工业公司管辖，都是县办工业，又都是集体所有制性质。但是，说这两个企业是兄弟企业，除了这些原因外，还有一个许多人并不知道的理由，这就是——两个厂本是同根生。

1954年上半年，由梁莹牵头，20来个修车的组成了房山地区第一个手工业生产互助组。翌年，铸铍的、焊洋铁壶的、打铁的、钉马掌的等先后加入，并于当年下半年转为“铁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铁业社”，就在房山南街20号院，隶属房山县手工业联社。

1958年，“铁业社”下放城关公社经营，改名为“城关农具修配厂”，这一年，全国大炼钢铁，城关公社成立炼铁厂，厂址就是现在的制桶厂南厂（原顾册农机厂）。1959年炼铁厂下马，为利用炼铁厂的场地，“修配厂”的大部分由房山南街迁往顾册，只有自行车修理车间仍然留在南街。1961年，修配厂划归县手工业

联社管理，五、六个打铁的和南街的自行车修理车间从修配厂分出，与生产车马套具的皮麻社合并成立“城关综合社”，所在地仍在南街 20 号院，这就是制桶厂的前身；顾册部分更名为“顾册铁业社”，成为顾册农机厂的前身。

六十年代初，顾册铁业社曾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当时，党和国家号召“工业支援农业”，该社努力创造条件，自制了轧场机、扬场机、铡麦机、小米机、薯干机等各种农机具，并不断根据农民的意见改革完善，很受农民欢迎。该社生产的扬场机获得北京市农机改革特等奖，在北京市厂际竞赛中，该社连续四次被评为北京市工业系统的红旗单位，成为著名的“房山十二面红旗”之一。该社的事迹上了电影，1965 年 10 月 15 日，《北京日报》在第一版以《得了红旗不自满，用高标准找差距，顾册铁业社一心一意为农业服务》为题报道了他们的事迹，并为此发了“短评”。该社的革新成果在北京市农业展览馆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展出，有的成果还送到怀仁堂给中央首长看，全国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都派人来学习“取经”，西藏的一个藏胞还把该社的弹簧锤带回了西藏。1966 年“文化大革命”前夕，阿尔巴尼亚和越南的参观团也到顾册铁业社来参观过。而城关综合社在这段时间却一直默默无闻。1966 年，“综合社”改为“综合厂”，仍以修理自行车、钉马掌和生产车马套具为主。1972 年转产医院用的病床和民用烟筒并建立了摩托车修理部。1974 年在南关西沙河滩（现制桶厂北厂）开始土建，1975 年 10 月搬迁，开始设想制桶。1976 年制造安装设备，培训人员，1977 年试制成功，但当年只生产桶 8327 只，全厂仅完成工业总产值 61.1 万元，利润总额 3.7 万元，而顾册农机厂则当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135.8 万元，利润总额 31.7 万元。

1978 年在我国实行改革后，产品经济开始逐步向商品经济过溢，使两个兄弟企业发生了截然不同的转变。改革后，农民分了责任田，开始在减少投入和增加产出上做文章，农机产品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同时，国家又不再对农机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和对农机行业实行补贴政策，使顾册农机厂产品不对路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该厂多次更换产品，生产过马车轴，做过取暖炉，加工过小拖拉机驾驶楼，还做过汽车后桥，也电镀过力车条和包装钢桶。但是，所有这些产品，或是由于产销仍不对路造成产品积压；或是由于产品质量差而失去了用户，或是由于消耗过高而使生产经营难以维持。从 1978 年到 1986 年仅八年时间，该厂就换了六位领导人，但仍未使该厂摆脱困境，资金越来越紧张，管理工作越来越混乱，请求调离的职工越来越多，形成了恶性循环。到 1986 年底，亏损达 19.4 万元。

再看制桶厂，1977 年试制包装钢桶成功后，恰好赶上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生产连年发展，经济效益不断提高。1981 年，正式更名为“制桶厂”。到 1985 年，年产桶达到了 10.88 万只，完成工业总产值 540.3 万元，利润总额 55.6 万元，这一年，他们得知主要用户“向阳化工厂”扩建，扩建后年需包装桶将达到 30 万只，立即着手筹建新的制桶生产线，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新生产线于 86 年 10 月正式投入使用，使全厂的年产桶能力由原来的 10 万只提高到了 30 万只。

新生产线建成后，产量成倍增加，1986 年一至三季度，只完成全年计划的 25%，第四季度新线投入使用后，到年底累计完成年计划的 125%，一个季度就完成了全年的计划。但是，场地不足，不得不借用顾册农机厂的场地存放原材料；劳动力缺乏，全厂第四季度平均每人加班 56 天。两个兄弟厂，一个生产飞速发展，但受到场地和劳动力不足的制约；一个无对路产品，生产经营濒临绝境，但占地面积 100 亩，有职工 140 多人。1986 年底，当时的上级主管部门县工业公司认真分析了两个厂的情况，做出了一个大胆而有远见的决定：由制桶厂兼并顾册农机厂。

1987 年是兼并后的第一年，这一年制桶厂实现工业总产值 1547.2 万元，比 1986 年两厂之和提高了 97.6%；实现利润总额：155.8 万元，比 1986 年两厂之和提高了 180.2%。

1989 年，他们又投资 130 万元对原来的旧生产线进行了技术改造，使生产能力翻了一番。现在的制桶厂，已成为拥有职工 442 人，占地面积 76796 平方米，建筑面积 17224 平方米，固定资产原值 576.7 万元，

净值 411 万元,年生产能力 60 万只钢桶的中型骨干企业,1989 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2503.7 万元,利润总额 20.4 万元,上缴利税 220.7 万元,利润总额跃居全区区办工业企业首位。

(《房山文史资料》第 4 辑)

## 坨里高线引起的国际风波

卓成栋

房山煤炭业开采的兴盛时期早可以推至 1905 年,天津大盐商王贤宾集资修建房山的第一条高线输煤线路(高空索道运输)。这条空中运煤线全长 50 多华里,1907 年始建经三年竣工投入使用,使房山三安子、南北窖的煤源源不断地运到坨里。比当时的人拉马驴驮煤效率提高了很多倍,因此促进了房山煤业的发展。但是围绕着这条高空运煤索道的修建对内对外都引起了很大的风波,对内是运输沿线当地以原始驮运的村民发生的倒线运动,经官方阶办一年多才平息下去,对外则引起了国际性的纠纷。

坨里高线的建造是因清光绪三十一年,天津大盐商王贤宾看到良乡至坨里的铁路建成后提议建一高线运输、马耳山北麓南北窖一路的煤炭到坨里后用铁路再输送到各地有利可图。于是他和另一盐商李子赫同华胜运盐公司经理陈梓臣出面,向天津长芦盐商游说鼓动,盐商们被说动了心,纷纷向天津的外国银行借款,很快筹集到三百万两白银,组建了坨里高线公司。承运坨里经英水、北窖、中窖、南窖至清港一线四十八村所产的小窑煤。高线建成后果然促进了房山煤业的开采,但到 1911 年 2 月,清长芦盐运使张弧察觉,公司股款为盐商们以各自官准运销盐的直隶,河南两省六十个县的专卖许可权向外国银行抵押借来,直接危害了清政府的“盐引”政策和盐务权利,遂向朝庭指控,财政部便将坨里高线收为官办。王贤宾偷鸡不成,其余盐商也是竹篮打水,此时拖欠德华、江理,道胜等外国银行的本息高达九百余万元。除华卫贍借款把自己的一份还清外,其余十户束手无策。因此在当时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国际纠纷。

根据国际法和各国法律,此案本来属于中国法律管辖的一般债务纠纷,因德华等银行在中国注册,应为中国法人。坨里高线公司是一个有限责任的企业法人,其所欠债务应由公司财产拍卖偿付。但高线已被收归国有,公司并无余产清算,而十大盐商息借洋款原以官准的“盐行”许可权抵押,违背盐业专卖的国家政策。外国银行明知犯法,却仍然借款,借贷双方均属故意行为,合同应当自始无效,责任各自承担。但是借款银行倚仗强权,并不向中国司法当局寻求诉讼解决,反而自各自的驻华领事交涉。德、法、俄三国领事竟以原借款盐商无力偿还,应由政府代赔的强盗逻辑出发,把一桩属于中国内政的经济案件搞成外交事件。清政府明知窝囊,却像断了脊骨的奴才一样,乖乖地答应了代赔的无理要求,随即将大清银行白银七百万两,奴颜卑膝地一一悉数代为还清外债。政府与大清银行息借合同的条件是以天津长芦盐场的一项课税,以及六十县官运售盐的余利做为抵押金。如此处理,清政府丧失大笔财税收入,而十大盐商仍旧负债累累。

王贤宾集资之后,曾将诈骗来的股金挥霍一番,如今拖累众商,给自己种下杀身之祸。王后来在抗战沦陷时被暗杀,围绕坨里高线的国内外的风波至此才完全平息下来。

(《房山文史资料》第 4 辑)

## 城关的小楼煤矿

卓成栋 王桂莲

房山自古多煤炭，主要分布在大房山两个地区，一是百花山向东斜南翼；一是猫耳山北岭向南一线，全部都集中在山区。解放初期由于交通不便，两处煤炭的开采，虽然能缓解了山区沿线的民用烧煤，但在平原地区的燃煤问题仍然没能较好地得到解决，大多数地区仍然沿用原始的庄稼秸秆作为民用生活的燃料。就拿房山城关地区的几十个村庄来说，直到六十年代末，由于小楼煤矿的出现才缓解了该地区几万人民的生活能源的紧缺。

所以，凡在城关地区提起小楼矿，人人都感到亲切。尤其是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后，它已经在城关地区人民心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为当地人民所青睐，其重要原因是解决了城关地区历史性的烧煤难问题。

早在1967年，房山城关地区，由于学大寨要求农村秸秆还田，肥沃土地，几万农民兄弟能源遇到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小楼煤矿开始动工筹建。当时的城关公社从本地区的十几个村庄中抽调70多名农民，利用当时国家统配煤矿房山矿在小楼一口风井开始了采煤作业。当时农民办企业尚属新鲜事物，办矿从公社到大队甚至到每一名被选为矿工的农民积极性很高。建矿初期领导，工人吃住在现场，没有洋设备，土法上马。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开通巷道后便迅速投入了生产，1968年一年就用人刨镐招、车推绳拉的方法采煤三千多吨。于是，小楼煤矿出煤了，成了当时城关地区的一大新闻，正当人们都为能用上小楼矿自产煤炭取暖作饭而兴高采烈时，好景不长，由于农民管矿，农民挖煤，不懂业务，自身素质差，再加上小煤窑形式的开采安全，生产都不具备条件，从建矿的第三年1969年始到1972年先后发生了三起重大工伤死亡事故，给人们高兴的心情上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于是，建矿者们才开始反思，靠原始的方式下井挖煤原来真的不行，但矿已开办，不能停工，又不能止步不前。这时的矿领导班子便下大决心要科学的治理这个新生成的乡镇小矿了。他们先从安全生产入手，把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不懂技术业务，向兄弟大矿学习，没有人才，花高薪聘请，同时利用自筹资金对矿井进行改造，建立完善了地质资料及数据，全矿上下形成了统一的安完指样系统网络，使该矿在生产上出现了生机，安全上得到了有效的保障。煤炭产量也逐步的提高，到1977年，煤炭产量已达到2万吨，使一直亏损的矿井生产局面得到扭转，第一次开始盈利。

进入八十年代后，乘改学的东风该矿政策劳动组织，实行四定四包和以作业组为核算单位的联产计酬责任制，月月按四定四包标准验收、核算工资和奖金。在用人制度上采取自由挑选优化组合，同时还实行安全奖和联保责任制，使各个作业组，互相监督、互相制约，遵章守纪，群管群治收到了安全与生产共同前进相互依存的条件，一直保持无死亡事故的成绩。为了保持这个荣誉，该矿采取了超前防治的手段，于1977年、1983年、1984年先后投资二十多万元，打通了两条安全巷道和扩建了两个延伸斜坡开采面。同时改善了充电设备，消灭了明火照明，明火放炮。由人拉镐刨的生产方式发展成为半机械化生产，成为地区乡镇煤矿的标杆矿。1983年因安全生产成绩显著，被评为煤炭工业部安全生产先进集体。1985年又被农牧渔业部评为安全生产地方煤矿标杆矿井。1989年该矿连续十七年无重伤和死亡事故，又被能源部评为安全生产先进单位。

目前，该矿已形成生产能力近2.5万吨、固定资产96万元、半机械化开采的地方煤矿的先进矿井，年产值最高达百万元。累计向城关地区交售原煤近50万吨，有效地支援了城关地区的各项经济建设，解决了

城关地区几万人民的用煤难问题。单就城关地区人民用煤向外地购买所用脚费，二十年来就节约了近 400 万元，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发展和稳定。难怪在当地人们中间盛传着这样一句话为，“要想烧暖炕，就靠小楼矿。要想省点油，全靠去小楼”。这充分说明小楼煤矿在城关地区举足轻重的地位，也说明城关地区的人们对小楼煤矿的深厚感情。

（《房山文史资料》第 4 辑）

## 房山、良乡生产推进社建置始末

王绍清 侯之扬

生产推进社建于解放战争年代，是在新、老解放区完成土地改革的基础上，为领导与扶植广大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开展大生产运动而建置的。

房山生产推进社，建于 1948 年 4 月。地址在革命根据地“西庄村”，并以西庄医药合作社为基础而建社。属北岳区平西专区银行领导，由县长亲自筹措组建。调三区副区长韩巨泰任主任，调六区城联主任方锡智任副主任。下设：药社、纺织两个直属生产单位，由齐奉先、赵振书分工负责，会计任成衡，管理员隗福堂，纺织师傅隗有清(女)，纺织工人 10 名。随着解放区域的扩展，是年 10 月迁址张坊，12 月 14 日房山全境解放，副主任方锡智调政府工商科。1949 年 1 月先后在张坊、长沟建立两个分社，张坊分社主任齐彦田，长沟分社主任苏子恒。1949 年 2 月，生产推进社迁入房山城内西大街路北(区联社)。下设两个股，信贷股(部)、业务股(部)和总务室，共有 15 人。入城后，直属药社又恢复为三区“医药合作社”，纺织厂在张坊撤销。是年 5 月主任韩巨泰调政府工作，同时调来政府后勤指挥部秘书穆林山任生产推进社副主任。此时，华北全部解放，北岳区党委及行署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指示各县推进社一律改组为“县供销合作总社”。房山生产推进社于 6 月开始改组为“房山县供销合作总社”，同时撤销长沟、张坊两个分社。至此，生产推进社结束了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使命。

良乡生产推进社，建于 1948 年 10 月。1948 年 8 月，良乡县政府在河北村选派实业科科长王炳华，参加丁北岳行署在涞源举办的生产推进社干部训练班，为期四十天。结业时又接续参加了北岳行署 9 月 22 日召开的农贷会议，会期五天。回县后由王负责组建“良乡生产推进社”(在班各庄村)。王炳华为第一负责人，赵璧臣为第二负责人。工作人员有罗玉国、陈广勤、孔繁培。当年先后在黑龙关由宋合负责组建鞋厂一个，在河北村筹建山货栈一处。

1948 年 12 月 13 日，良乡解放，次日生产推进社随政府机关进城，接管了伪合作社，社址设于饮马井路西。1949 年初在良乡城内建被服厂一个，负责人李泽民。5 月王炳华调北京“裕民山货栈”工作，刘玉长任生产推进社副主任。全社共有干部 8 人，于本年 6 月改组为“良乡供销合作总社”。

### 生产推进社的性质与任务

生产推进社是国家银行投资的国家企业，县以上不设组织，直接由银行专区办事处领导。县以下可根据

需要设办事处，不限于行政区划可一个区设一个，或几个区设一个；供给按银行供给标准，并由银行供给；县无银行机构，生产推进社的工作，由县长直接领导。

生产推进社的发展方向是，要随着合作经济的发展与吸收农村合作社资金，或私人资金，逐渐成为国家扶植的合作经济的企业，成为农村合作经济的枢纽。

生产推进社是为革命、为人民、为生产服务。

它的任务：一是办理农贷。当时华北地区确定办理农贷由银行负责，但银行当时没有下层，将来要向城市集中，推进社要准备接替银行，办理农村信贷；二是办理农村供销。它有责任把农村的主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贩运进来，也有责任把农民的剩余生产产品销出去。国营商店要逐渐向集中方向发展，生产推进社要逐渐接替过来；三是以经营方式推动农村合作事业，逐渐将“面对户”的业务，提高到“面对社会”的业务。

### 一、农贷的发放与收回

农贷发放的目的，是扶植农民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农民生产资料的供应问题，还解决农民在生产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供给。

在农贷使用上必须做深入的调查研究选择重点，根据群众要求，发展生产的条件和现有力量，制定发放计划。不搞行政分配、突击发放和平均主义。出贷对象要有重点，事业上要有重点发放地区，发放时间也有重点。

1、出贷对象：以积极从事生产的劳动人民为对象。有困难而勤劳守法从事生产的人可以贷，经过改造的地主、富农，生产上有困难的也可以贷，对懒汉、烟鬼、地痞坚决不贷。老弱孤寡不能从事生产也不能雇工经营生产的不贷，生产资料能够自行解决的不贷。

2、事业上的重点：主要放在水利，牲畜和农具上。(1)兴修水利、安装水车等水利事业，要大力扶植。(2)牲畜贷粮款可以办，但应考虑到从哪里买，若从“蒋占区”或牲畜多的解放区买来，可以多贷，若仅是内部调剂，贷来贷去，只有把牲畜价钱提高，增加不了牲口，就不贷或者少贷，繁殖牲畜的可以贷。(3)水车、大车、小车、犁耧以及锹、镐、锄、镰等农具需要贷款，但有些不一定直接贷给农民，可以扶植铁匠、木匠和工具作坊及制造厂。私人实在没人经营的，可以直接经营，但必须企业化，农贷手续要根据需要由银行统一规定，力求简便。

3、地区上的重点：一般放在生产条件充分(生产落后的地区也要照顾)，生产价值较大而资金缺乏的地区，但必须与事业上的重点结合起来。适于兴修水利的地区，则多放水利贷款；适于制造农具与农具特别缺乏的地区，则多放农具贷款；适于繁殖牲畜与牲畜特别缺乏的地区，则多放牲畜贷款。

4、时间上的重点：什么时候需要贷什么款，什么时候需要制造什么农用工具，各地都有一定规律。什么时候多贷，什么时候少贷，什么时候贷给什么人，都要了解清楚，必须强调依时间按季节，使农贷川流不息。

及时收回农贷，才能确保农贷川流不息地为生产服务。要靠它扶植生产发展，越扩大对人民越有利，必须消除部分干部群众的废债思想。无论干部、群众、荣军任何人都须照章办事，到期收回。如有特殊情况不能按期归还者(如：边缘区、游击区逃来之难民以及灾区之贷户)，由于生产需要，还需要继续扶植的，亦须交清利息，另办手续，再行展期。

### 二、生产推进社的业务经营

#### 1、生产资料的经营。

生产推进社的生产资料经营，大部力量是放在改良制造与贩运农业与手工业工具上。经营方式主要依靠私人，扶植私人。推进社本身要做好调查研究和组织工作，直接经营须根据群众是否需要，有无条件，做出计划经上级批准，制造的东西要讲究式样、质量、成本，特别是讲究销路。

#### 2、生活资料的经营。

生活资料的业务经营主要是供给群众生活日用必需品和运销群众的生产剩余品。其具体条件：(1)农贷

资金有余,无余资而又必须办的,可向银行借款(银行有扶助的义务)。在经营中有些东西可以开展代销业务,但运销群众的东西,首先要看有无销路。(2)群众确实需要而又必需的东西。(3)当地购不到或销不出的东西,群众力量不能办而又不适合商店(公营)办的事情,推进社要办,但要与商店结合。

### 三、整理与发展合作社

在生产推进社未建之前,根据地为了改善边区人民生活加强对敌斗争,建立了不少合作社,成为广大群众的经济组织。它在调剂群众的经济,供给军政的需要,对敌经济斗争上,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开始建立者大部是村农会,是利用土改部分胜利果实组织起来的,在社务上缺乏民主管理,尚有部分合作社存在着单纯营利分红的观点,财务制度不健全,发展缓慢。由于当时各县对农村合作社尚未成立组织机构与检查基层工作的县联社机构,所以,县生产推进社一建立,就担起了领导和推动农村合作事业发展的责任。在办好农贷、业务经营的同时,通过整理农村合作社,进一步发展合作事业。在整理过程中,对现有合作社采取办得好的合作社(能为群众解决问题,而又盈利的),推进社就与它建立业务关系,农贷也可交办,让一定的利(如贷给私人年利八分,贷给合作社可以六分、七分)。对办得不好的合作社,通过分析找出原因进行改造,改造好的社建立业务关系。没有合作社或已经垮了的不能急于求成,盲目发展。起初,选择条件比较好的群众,做推进社的业务员。经过考查锻炼后,由他们再去组织合作社,做到组建一个就能成功一个巩固一个。

(此内容系节录 1948 年 9 月 22 日北岳行署召开的农贷会议报告)

## 房、良生产推进社的状况

### 房山生产推进社

#### 一、农贷的发放

当时房山生产推进社农贷工作,一区由霞云岭沟合作社负责,二区张坊沟及平原。三、五、六区,由生产推进社直接负责。

1948 年 4、5 月间,由三区拨来春耕贷粮,贷款分别贷给一区宝水、龙门台、霞云岭、下石堡等 23 个村小米 68,630.4 斤,贷给二区六合、十渡、千河口等 14 个村小米 8,255 斤,贷给三区惠南庄、蔡家口等村小米 24,655 斤,贷给五区部分村庄 1,610 斤,贷给六区部分村庄 410 斤。

其中,玉米 178,898.9 斤,分别贷给一区各村 125,962.12 斤,贷给二区各村 14,162.10 斤,贷给三区各村 27,568.3 斤,贷给六区各村 11,205 斤。

农业贷款 2,250 万元,分别贷给一区各村 526.7 万元,贷给二区各村 381.6 万元,贷给三区各村 426.7 万元,贷给四区 55 万元,贷给六区 199 万元。推进社直接贷出(9 户)74.8 万元,合计贷出 1,658,9 万元。

#### 二、农贷收回

1949 年 1 月 1 日收回 1948 年各区春耕贷粮小米。一区收回 67,588,11 斤,未收回 1,044.9 斤,旧贷转新贷 22,566.3 斤;二区收回 8,255 斤,其中旧贷转新贷 326 斤,三区收回 24655 斤,其中旧贷转新贷 7,843.6 斤,五区收回 94 斤,欠收 1516 斤,六区收回 201 斤,欠收 209 斤。

1948 年收回春耕贷粮玉米为:一区收回 123,849 斤,欠收 2113.12 斤,其中旧贷转新贷 22,579.15 斤,二区收回 14,162.10 斤,其中旧贷转新贷 2,178.4 斤,三区收回 27,568.3 斤,其中旧贷转新贷 12,610.8 斤,六区收回 10,556,11 斤,欠收 646.5 斤。

收回 1948 年各区春耕贷款为:一区各村贷款全部收回共 521.8 万元,二区收回 3,646,150 元,欠收 169850 元,三区收回 2,419,800 元,欠收 1,847,220 元,五、六区共计收回 741500 元,欠收 72.8 元。

以上贷粮，贷款利息全部收清。

### 三、发放副业贷款

1948年春，发放一、二区副业贷款382.4万元。其中，牲畜贷款182.4万元，手工业贷款200万元。

### 四、发放救济贷粮贷款

1948年5月，二区张坊村因被敌人放火受灾，救济受灾的48户、174口人，贷给玉米1870斤，贷款161万元。

### 五、签订秋季定贷供种契约

1949年9月(此时县生产推进社虽改组为供销合作总社，县银行已建立，但结贷业务尚未交出)，在平原土改后的第一个秋季，为扶植农民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不误农时，种好麦，政府决定信贷部门要做好秋季定贷、借种工作，支持农业大生产的开展。仅据当时信贷股定贷借麦种(不完全统计)，与四、五、七区18个村552户社员和农民，签订了23张“定贷借种契约”，借麦种总数20,344斤，定贷品种有小米、玉米、豆子、花生、籽棉和棉花等六种。

借种契约条款：1、作价日期：均按到期当地市价作价。2、待遇：社员借麦按到期当地市价低于百分之二，贷价按当地市价高于百分之二，非社员双方贷均按当地市价作。3、坚持信用：借方坚守到期日作价交货以免双方吃亏。

(合作社信贷业务及人员，于1950年1月初归属县银行)

### 六、业务经营

1、大力开展收购业务。生产推进社向药社投资400万元，扩大医疗机构增加当地药材收购业务；在张坊建立山货栈，收购群众积存的木炭万余斤和大量山木棍、荆条，通过380多万元的副业贷款，扶植一、二区农民开展副业生产，提高了群众生产积极性，活跃了山村经济。

2、建立收煤站，组织运销，恢复山区小煤窑的生产。生产推进社1948年10月迁址张坊。我解放区为迎接1949年大生产运动的到来，变冬闲为冬忙，大搞副业生产和冬季造肥运动。在县长杜恩霖直接领导下，推进社为支持山区冬季副业生产，在马安、张坊设立两个收煤站，迅速恢复蒲洼、宝水一带小煤窑的生产，组织畜力由马安至张坊运煤，使冬闲的人畜力有活可干，并解决了三区一带村庄的烧煤困难。特别是南五村平原一带，因有了煤烧省下来的禾草、黍秸冬季积肥给春季大生产打下物质基础。

3、送药驱瘟，生产救灾。1948年春，四马台等26个村发生严重流行性传染病。县生产推进社为配合以一区区委和医药合作社及全区24名医生组织的“医治委员会”的抢救工作，通过地下关系，从敌占区用土特产和银元换回大批中、西药，由副主任方锡智会同药社医生齐奉先，携带药品亲临灾区进行支援，有效地扼制了这场瘟病的蔓延。

生产救灾。1948年雨季，二区东西太平、六合三个村，被洪水冲毁的龙堤灾情极为严重。生产推进社为扶助三个村恢复生产，投放小米9000斤。组织群众刨药材，砍木棍，推进社大力收购，很快地修复了龙堤，恢复了生产。

#### 良乡生产推进社：

良乡生产推进社建社较晚，刚成立两个月，良乡全境解放。仅六个月就改组为“供销合作总社”。据几位当事人回忆，它的业务经营，与房山生产推进社相同。

1、建立鞋厂。为解决军、干人员穿鞋难问题，减轻群众负担，生产推进社在黑龙关建立鞋厂。在敌人经济封锁的情况下，派采购员爬百花山梁绕门头沟，进北平城采购制鞋材料，选拔当地做鞋能手从事生产。

2、建立山货栈。生产推进社为平抑物价，繁荣山区，在河北村的旧盐店和旧益记建立山货栈，收购宛平四区和本县五区英水、北窖一带的红煤和荆条，收购房山一区各种山货。

3、整理与发展合作社。生产推进社在县实业科的配合下，对各村“农民合作社”进行了整顿，使之明

确了经营方向,克服了单纯盈利分红的观念;结合各村解决土改遗留问题和违反办社原则问题。退还和作股分给社员等办法也妥善地得到解决。整顿后开始面向生产,变消费为供销。当时东班各庄合作社已开始收购荆条 2000 斤,换回食盐 5000 斤;佛子庄合作社兼营大车客店,办理山货代销业务,并给社员群众联系单位,销出柿子 40 万个,荆条 3 万多斤,扶植私人运销,合作社垫货,卖回来归本。各社树立起三服务观点。

4、接管伪合作社。进城后,首先接管了良乡县伪合作社的物资帐目及部分工作人员。

5、支持春耕生产选购优良籽种。1948 年底,北京刚解放,京汉线尚未恢复通车。为支持 1949 年农村春季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推进社负责人王炳华,携带巨款徒步去石家庄选购优良棉籽 6 万斤,随大车一路押运,平安返回,还从外地选购优种花生 10 万斤。

6、组建村社扶植抗旱打井。1949 年春负责人王炳华在去南梨园下乡组建合作社的同时,配合良乡一区抗旱,扶植南梨园、炒米店、元武屯三个村,积极开展打新井、锥旧井的工作,促进了水利建设。

(《房山文史资料》第 5 辑)

# 房山境内第一条柏油路——京周公路

## 房山公路分局路史办

京周公路初建于 1955 年,东起北京市广安门,西南至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全长 48.17 公里。其中从南岗洼以南至龙骨山一段,属房山区管辖,是房山境内的第一条柏油路。

周口店龙骨山,是我们人类祖先——“北京猿人”的故乡。它对于研究人类起源和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都具有极其宝贵的价值。1953 年,设立展览馆。自当年 8 月开馆至次年 6 月,仅 10 个月的时间内,前往参观的就约达两万人左右,春秋两季的节假日,每天参观的人数竟多达七、八百,其中有不少的国际友人。

但是,当时的交通条件很差。从北京去龙骨山参观的人,如乘坐火车,则苦于琉璃河至周口店一段没有固定班次,所以不得不设法乘坐汽车。而从北京至周口店的道路,除靠近市区一段铺有水泥混凝土或砾石的路面,尚较平坦外,其余全是土路,坑洼不平,弯曲狭窄。晴天行车,颠簸摇晃,黄尘滚滚,致使乘客泥土满身,面貌难认;雨天,土路泥泞湿滑,行车更难。就房山城左右,就得过几道河流,雨季水涨,车不能通。这样的交通状况,不仅给科学家和参观者带来极大的困难,同时,对于我国的国际声誉也颇有影响。

这种情况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们的极大关注。1954 年初,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提议并报请政务院(即后来的国务院),从北京至周口店龙骨山修筑一条柏油路。当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尚不充裕。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修筑一条标准的公路的确不易。但政务院根据上述情况,毅然予以批准。于 1954 年 6 月进行勘察。

由于这条路线途经北京市、河北省(当时房山、良乡两县尚属河北省)两方管辖的地带,所以勘察工作组则由交通部公路总局潘文植、华北交通局公路处李尚智、北京市市政建设委员会韩同桢、北京市建设局杜荫福等人组成。1954 年 8 月 29 日,政务院根据勘察报告方案,决定由财政部拨专款 332 亿元(人民币旧面额)责成交通部按三级路的标准操办,将测设工作交由交通部公路总局设计局第五设计分局负责,而施工任务由交通部公路总局第一工程处以承包方式进行施工。

1954年12月初,施工单位派出人员,在良乡成立工程筹备处,开始进行施工的筹备工作。1955年3月下旬,工程技术人员和施工机械陆续到达工地。4月,经过试点施工后,便全面正式开工。

这项工程共配备各种施工机械118台,劳动力1300人(修路工人429名,其余为当地民工)。在施工中,采用了机械化大流水作业的施工方法和包工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并加强了施工单位的经济核算制度,使施工人员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得到充分发挥。因而施工管理工作不断得到改进和完善,各道工序安排合理,施工机械调配恰到好处。所以不仅节约了开支,降低了成本,而且充分发挥了机械的效能。仅在路基工程中,机械化施工程度就高达90%以上。从而使京周公路的修建成为当时全国机械化施工程度最高的一项,机械化程度之高是我国筑路史上前所未有的。这种机械化流水作业的施工方法,不仅合理地调配与集中使用机械,充分发挥了机械率,加快了施工进度,更重要的是摸索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机械化施工方法和经验,并培养了大批技术力量,为以后公路建设和机械化施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项工程,由于全体施工人员的齐心协力,团结互助,艰苦奋斗,克服了种种困难,仅用了五个多月的时间,于当年10月1日,全线主体工程基本完成,并通了车。11月底按照设计数量全部竣工,交付使用。并于当年初冬栽植了白腊路树。

但是,这项工程由于任务大,时间紧,并且在雨季照常施工,各地采来的材料质量标准也不一致,致使工程质量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路面面层因所用沥青来源不一,各项指标均有差异,不好控制,造成部分路段路面表层脱落;部分填土路基的土壤含水量较大,发生局部沉陷;有三座中型排架桥均发生桩柱不正及支架沉陷、预留沉落度不够的现象;部分涵管安装得偏高或偏低,致使上游水位升高,淹没农田或泄水不畅。因此,施工单位抽出部分人员和机械,于1956年4月至7月,对上述出现的问题,按实际与可能分别进行了整修。

这条公路的路线,除广安门至长辛店段仍循旧线外,其余不少的路段进行了大段的改线。其走向是:东起广安门,西跨芦沟桥,南转长辛店经南岗洼后,进入房山境,再南经哑叭河村西和吴店村东,西转经良乡北关、苏庄、闫村、大董村、马各庄、饶乐府,到房山新东关,又西南经顾册、周口村,再往西北经周口店,到达龙骨山。全线路基宽8~9米,油路面宽5~6米,属三级路标准。全线建有中型桥四座,小桥十一座,过水路面十一处(其中附有排水孔的三处)。

京周公路的建成,大大提高了行车速度,增强了人们旅途中的舒适感,为前往“北京猿人遗址”的科学家和旅游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它是房山境内的第一条铺有沥青路面的高等级公路。由于有了它,房山地区得以加强与首都北京的联系,城乡物资交流才有了通畅的道路,它对我房山工农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为改变房山地区交通面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尔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运务日趋繁忙,各种车辆急剧增加,京周公路已不适应这种新形势的发展,于是从1965年起,对京周公路的路基、路面和沿线建筑物先后进行了规模大小不同的改善和提高,现将其历次工程分别叙述如下:

京周公路大董村坡至马各庄长约1.5公里的路段,不仅地势低洼,还要经过四道河流,河上虽建有过水路面,但雨季水涨,车辆难于行驶。为了确保京周公路畅通,房山公路管理所决定对该段进行改建。该工程,除局部路基改线外,还将长1465米的路基进行了加高,并在四道河流上,加修了永久性钢筋混凝土桥梁(共40孔400延米长)。全部工程任务由市政二公司承担,1965年1月开工,当年8月31日竣工,共投资115.4万元。

继大董村坡至马各庄段改建之后,房山公路管理所又于1968年8月至1969年1月,对京周公路顾册村北路段进行了0.5公里的改线工程,其中包括新建1座3孔21.1延米,荷载标准为汽—13,拖—60的永久性钢筋混凝土桥,并加高了桥两端的路基;1969年3月至7月,将京周公路的太平庄过水路面改建成为1座4孔36.9延米,荷载标准为汽—15,拖—60的永久性钢筋混凝土桥,并将桥头引道同时加高。

随着交通量的日益增大,三级标准的京周公路经常出现车辆拥挤堵塞现象。因此,1969年,北京市革

委会决定扩建京周公路。其具体项目为：芦沟桥至周口店段的路基和路面，分别展宽到16米和12米，并对沿线的大、中、小桥梁和涵洞，同时进行加宽或改建。这项工程由市政二公司负责施工，房山县革命委员会也组织民工1200人参加。此项扩建工程于1969年12月开工，到1971年4月竣工，共投资1385.1万元。房山境内段共完成土方32.1万立方米，路面30万平方米，大、中、小桥梁12座(荷载标准为汽—26，拖—100)，涵洞66道，京周公路经过这次较大规模的扩建，路基宽已达15~16米，路面宽12米，平曲线最小半径300米，最大纵坡为3.3%，路线等级由三级升为二级。以后，又经过逐年精心养护和必要的小修维护工程，京周公路的路况得到不断地改善与提高。

总之，京周公路的建成，不仅标志着我国文化和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而且它的发展过程，更说明了我们党和政府为了繁荣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and 关心文化古迹，而对发展公路交通极为重视。目前，京周公路路基坚固，路面宽阔平坦，沿线设施合理齐全，行车平稳，车速大为提高，两侧树木成行，林荫夹道，环境优美，令人心旷神怡。南来北往的车辆，川流不息。据1989年统计，交通量已达12914辆/昼夜。它不单是参观“北京猿人遗址”的必由之路，而且是首都与房山以及外省市物资交流的重要通道。自从有了这条柏油公路，房山与首都和外省市的往来更加便利，而工农业生产也因此有了较快的发展。它已成为房山公路交通的大动脉之一，必将为今后房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巨大作用。

(《房山文史资料》第5辑)

# 原房山县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回顾

张 珍

原房山县和原良乡县在1958年3月两县合并，由河北省划归北京市管辖，并把北京市门头沟区的河北小区所辖的几十个村镇，划归房山地区，建立周口店区，作为北京市的一个远郊区。到1960年，周口店区又更改名称叫房山县。

周口店区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发生在1958年下半年。当时，我在区委农村工作部工作。在全区农村公社化运动的前前后后，有许多群众性的活动及经验教训，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为了供后人借鉴，现将一些片段情况，作一简要回顾。

## 一、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前夕的社会政治环境

1958年，周口店地区也和全国一样，是个不平凡的一年。全地区的广大干部、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共同感觉到当时的浓厚而激烈的社会政治环境，催入奋进，心潮澎湃，甚至使人明显觉得稍不积极前进，就会被飞速前进的历史车轮甩掉，就过不了“社会主义关”。要自觉、主动的认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来得急，声势猛，要努力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要勇于投身到运动中来，不能充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绊脚石。

### 1. 大跃进的号角

房山地区农村实现完全按劳分配的高级农业合作化以后，从1956年春夏开始，广大农村大搞农田水利，打井修渠，平整土地，大搞积肥，旱地变水浇地，改变农业生产条件的群众性的生产运动，一年比一年高涨，这充分显示和发挥了高级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到了1957年的夏秋之交，农村中少数富裕中农感到入社吃

亏，要求退社。于是在部分高级社内出现了拉大车、要牲口的退社活动。甚至个别闹退社的农民，动手殴打乡社干部和县下乡工作组干部。为了保卫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回击闹退社的歪风，在全区农村中开展了以“社会主义好不好？”“高级社比初级社优越不优越？”“党的组织和各级干部能不能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为题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批判。通过大辩论，击退了退社风，扫除了右倾保守思想，大长了社会主义正气，使农村广大干部、共产党员，广大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使农村更进一步出现了热火朝天的更大规模的兴修水利高潮。在大搞水利的高潮中，到处出现了打破社界、村界、乡界，劳力大集中，大协作，人们不要报酬，实行大兵团作战。当时的县委、政府及乡社党组织，在高潮中还一再发动新的高潮，提出“先进的再先进，后进的赶上来”，限期实现农田水利化。

为了鼓励农民大搞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再进一步扩大战果，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题目是《乘风破浪》。1月6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在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奋勇前进》。两篇社论中，提到在反右派斗争和农村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的基础上，从1957年冬季开始，出现自带工具、口粮，无偿地到外地进行水土保持、兴修水库、修建渠道，打破社、乡、县界，以至省界的共产主义精神。社论引用了毛泽东同志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的要在十五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过英国的口号。社论号召人们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社论吹响了全面跃进的号角。

在全面跃进精神的推动下，房山县委根据通县地委的部署，多次召开乡、社干部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彻底扫除右倾保守思想，树立跃进思想。通过逐级发动，使各级各界的干部群众认识到右倾保守思想是农业大跃进道路上的拦路虎、绊脚石。深刻了解了右倾保守思想的危害性和危险性，要时刻警惕并注意识别右倾保守思想的种种表现。当时，县委、县政府要求各乡、社要定出发展农业跃进的长远规划和当年跃进计划，定出什么时候实现粮食亩产四、五、八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要求。所谓四、五、八，即亩产粮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跃进规划刚作出，后来从外地传来消息，说有的地方谷子亩产达到两万斤；有的地方亩施五万斤肥，深耕三尺，分层施肥，亩产小麦一万斤。1958年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秋后算账派输定了》，其中引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错误提法。当时，区委、区政府为了赶上形势，一方面要求乡、社修改跃进计划，一方面发动乡、社干部、群众进一步清除右倾保守思想，层层召开誓师会、跃进会、比武会。每个会必有一批先进人物上台发言，或表决心，或向人挑战。当时的口号相当响亮动人。如“全党全民总动员，男女老少齐参战，甩掉保守争上游，定叫任务提前完”，“山高不过脚心，地硬硬不过决心”，“头可断，血可流，跃进目标不能丢”；还有极有针对性的口号，相当普遍。如“盖那乡，甩那社，把那乡、社拉在后边”之类的口号。当时人们的头脑已经发热到了极点。

## 2. 总路线的催促

1958年3月，党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市、区委传达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精神。5月，中央开会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党的总路线。通过学习总路线，各级党组织都把是否正确对待“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作为衡量干部、群众对待社会主义的政治标准。如果有的干部、群众说话稍有“不够积极”，或态度不够端正的，就必然受到批判，甚至被通报批评或给予处分。把干劲鼓得不足，是否勇于争上游，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弄得人人自危。当时各级领导也公开讲：干部不行的要换掉，闹资本主义的要换掉，干劲不足的也要换，要扫清拦路虎，搬开绊脚石。为了贯彻执行总路线，区乡党委多次召开会议，要求干部、党员检查右倾保守思想，制订贯彻执行总路线，发动更大跃进的措施，号召干部、党员要当英雄，当好汉，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当时广大干部心想，我们是首都北京的国家干部，应当走在全国各省市的前头，毛主席号召高举总路线的旗帜，更大规模的开展大跃进，我们是共产党员，革命干部，不能退缩，

不能松懈,应当积极行动,带头苦干。如果不积极贯彻执行总路线,不自觉、主动清除自己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是对党不忠实,对不起党的培养。因此,当时的许多行动,多是出于自觉自愿。

### 3. 外地“经验”的引导

在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里,外地“经验”相当多。北京是首都,不甘心落后,所以,学外地经验,赶外地速度的劲头特别足。如学外地的“诗画满墙”,就是各个农村街道,都在墙上写上各种诗歌,或画上有有关跃进口号的图画。还有什么“四通八达”的经验,就是发动群众把一些院墙拆掉,把过窄的街道展宽,这叫四通八达。还有劳动群众组成大兵团,仿照军队的作法,把男女劳动力统一编成团、营、连、排、班。叫行动军事化,劳动兵团化。还有两点很突出。一是1958年盛夏,推广安徽省阜阳专区大摘滚珠轴承化的经验。周口店区要求各乡、社的大车、水车、石磨石碾都要换成滚珠轴承,全民发动,突击三天三夜完成任务。在这几天内,人人分配任务,人人都要亲自动手磨滚珠。当时机关干部,也要搞夜战完成磨滚珠任务。乡、社集中群众磨好的滚珠,组织技术人员按在车轴上,水车上或碾磨上,这就叫实现了农具半机械化。结果真正按上滚珠的车辆并不多,带有很明显的形式主义。二是学习外地的浮夸风。1958年初的农业大跃进,各乡、社的农业生产发展计划还比较实事求是,粮食亩产订到四百斤、五百斤。而到了秋季种麦前,亩产几百斤的计划就交不了账了。1958年8月北京市召开一次农业誓师大会,领导再次号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破除老经验的迷信,破除农学家的迷信,破除农业操作规程的迷信。说外地种麦有深翻三尺的,我们提倡深耕一尺半,高产田要深翻三尺。外地种麦每亩施十五万斤肥,我们至少施十万斤肥。外地小麦亩产有达到一万斤的,我们计划亩产一个斤、双千斤。我们一定要争上游,插红旗,拔掉白旗。后来《人民日报》报导徐水将可“发射”亩产山药120万斤,一棵大白菜500斤重、小麦亩产12万斤,棉花亩产5000斤的“卫星”。当时的形势是:只要外地有了“经验”,你自己的计划就要修改,发言表态就要表决心,不然,就过不了关。可见,盲目相信外地的所谓经验,促使了各级干部在农业生产上的浮夸风。

### 4. 毛主席的视察,中央的决定,推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8月6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到河南省新乡地区七里营乡视察,对七里营刚刚建立的人民公社,表示了极大支持。毛主席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报刊发表毛主席视察人民公社的消息以后,我们搞农村工作的同志,都有一种共同的认识,这是毛主席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又提出了新的目标。同年的八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徐水人民公社颂》一文。文章在肯定人民公社取得的“伟大成绩”的基础上,强调指出:“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周口店区的广大干部,共产党员和广大群众,通过学习毛主席视察人民公社的消息报导和上级一系列的指示及报刊介绍的典型经验,从内心感到把高级农业合作社立即组建成人民公社,已经势在必行,并且应该抓紧时间,绝不能落后于其他区县。因此,周口店区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从1958年8月中下旬开始酝酿,制订建立人民公社方案。经过区委讨论批准,从9月1日开始建立人民公社,到9月5日,仅仅五天时间,在全区2000多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全部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组建人民公社的高潮中,全区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那种高涨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积极性,形成马上就要进入共产主义的洪流,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全区上下一片欢腾。

#### 二、全区实现人民公社化后的欢腾跃进景象

周口店区于1958年9月5日实现人民公社化,立即向北京市委报了喜。据统计:全区436个行政村,共计328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一个国营农场,共建成七个大型人民公社。入社农产84152户,农民340283人,耕地75.8万亩。每个公社平均拥有农户12000多户,48600多口人,10.8万多亩耕地。全区七个大型人民公社的名称及所辖地域是:房山人民公社,包括现在的房山街道、石楼镇及周口店地区;良乡人民公社,

包括现在的良乡地区、长阳镇(当时是长阳国营农场)及大紫草坞、崇各庄、坨里、葫芦堡、官道等乡;琉璃河人民公社,包括现在的琉璃河地区,窦店镇及交道、南召、窑上等乡;长沟人民公社,包括现在的长沟、张坊镇及东营、岳各庄、南尚乐等乡;河北人民公社,包括现在的河北镇及班各庄、南窖、长操、史家营等乡;马安人民公社,包括现在的十渡镇及蒲洼乡。这七个大公社建立的时候,都分别召开了几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庆祝大会的热烈气氛至今记忆犹新。各村公社社员都由干部带队,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呼口号。高举“人民公社好!”“热烈庆祝人民公社建立”等横幅,人人手持小彩旗,队伍浩浩荡荡。各村、各厂代表在大会上发言、表决心。当时的发言口号极为响亮动人。如“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坚决要把公社办,共产主义定实现!”“人民公社是金桥,共产主义是目标!”在大会上,各村各单位及广大农民,纷纷向公社献礼,用以表示为早日实现共产主义增砖添瓦的决心。所献的礼物,有木料,有人民币,有各种铁制农具及铁锅、铁盆。记得房山人民公社建立时,干部、群众献给公社的各种铁器及废旧钢铁,堆到大会会场,好象一座小山头,甚至还有献元宝、金条的,摆在大会主席台前。

全区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当时广大干部、群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继1956年春天实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化以后,又一次新的重大的社会变革,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胜利,人民公社实行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将大大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并向着美好的共产主义目标迈进。为了适应人民公社化新形势的需要,要求干部,群众要破除小农经济的思想残余,要树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产主义风格。为了充分体现和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认真贯彻执行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掀起更大的跃进高潮,全区公社化后,在1958年的下半年,出现了什么事业都要大搞、大办的高潮,共产风和大跃进风刮的更加猛烈。按个人记忆,可以归纳成以下十个方面的大搞、大办。

一是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全区400多个村,都普遍办起了公共食堂,农民群众实行集体吃饭。当时认为这是人民公社优越性之一,把农民吃饭问题彻底解决了。农村干部认真不认真办好公共食堂,是衡量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标准之一。

二是大办公益福利事业。公社化后,各公社发动各级干部纷纷组织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为了解放妇女劳动力参加集体劳动,老年人,特别是孤寡老人,到敬老院吃住,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三是大搞协作,无偿平调劳动力,大搞水利建设。调劳力大搞协作的范围不同,有的由区里统一组织修建水库,有的由公社组织劳动力搞平整土地,水利工程,有的全村统一行动,整修渠道、修筑梯田。凡统一搞的大协作,都组织成大军团作战,集体吃,集体住,几十天也不回家。

四是大力办工业。为早日实现公社工业化,发动公社、管理区办工厂、开矿山,把原高级社或各村办的工、副业摊无偿的收归公社或管理区所有,由公社或管理区经营,这就是公社工业化的大发展的成绩。

五是大力搞平调。公社为了兴修水利,为了突击组建工厂,只要公社需要,包括个人或集体有的树木、工具、公款,就不受任何限制、也不办任何手续,随便使用,不给任何代价。

六是大力炼钢铁。公社发动各管理区或各村及机关、学校,到处修建小土高炉,组建大炼钢铁专业队,开展群众性的大炼钢铁运动,为全国实现年产1070万吨钢铁的任务作贡献。在大炼钢铁活动中,有的地区有铁矿石,就采矿炼铁,有的地区根本无铁矿石,就发动群众到处收集废旧铁制器材,回炉炼铁。公社要求各级天天汇报炼铁进度,凡完不成任务的都要当即检查、受批评。

七是大力搞运输。各公社都积极组织运输队。当时各公社都没有汽车,就把各村原高级社的畜力大车,无代价的调到公社或管理区,组成大车运输队。

八是大力搞副业。公社化后,全区开展一次全民总动员,大搞45天的副业生产运动,区向公社,公社向管理区分配了副业生产收入任务,限期完成。大搞副业,各管理区、村出动多少人完成收入多少元,天天要向上级汇报。凡完不成任务的,当晚要向领导作检查。后来为了汇报能够过关,有的就天天汇报“超额完成”。

九是大办猪场。全区公社化后，发动公社，管理区大办千头、万头猪场。办这么大规模的养猪场，没有猪源，就从原高级社的猪场和各家各户的猪圈抽调种母猪和种公猪。当然建猪场所需木料、石料等，也是从各村调用。

十是大搞深翻土地，大搞高产实验田、卫星田。公社化后，正是秋收种麦时节，全区从区委书记、区长到部、委办局的领导干部，人民公社从党委书记、社长到各部部长，都分头到各村大搞高产实验田、卫星田。全区种麦任务近四十万亩，通过各级领导干部带头搞高产实验田、卫星田，要求全部深翻一尺以上，有的领导干部为争取先进自定计划实验田要深翻五尺以上。高产田的下种量也是相当可观的。有的每亩下种一百斤、二百斤、三百斤。每亩小麦计划产量更是高得惊人。有的计划亩产小麦一万斤，有的计划亩产五万斤、十万斤的，最高的有的计划亩产三十万斤。当时的社会气氛是，如果谁的计划定低了，谁就是右倾保守，就是没有大跃进的精神，就要受到批判。这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错误论调造成的浮夸恶果。

### 三、全区七个大型公社向三十个小型公社的演变

公社化后，为了巩固健全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提高干部、群众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1958年9月建立七个大型人民公社后，从1959年开始，一直到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之前，即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开展了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为中心的整顿巩固人民公社和整风整社运动。在运动中，以大鸣大放为先导进行大整大改。在这三年的社会主义教育，整风整社运动中，每年都各有重点。1959年，根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和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以反右倾、鼓干劲为重点。整顿巩固人民公社，根据毛主席“不能剥夺农民”的指示，突出纠正了公社化中的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错误作法。并通过召开公社党代表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公社党委的领导机构和公社管理委员会机构，健全了人民公社的民主管理体制，制订了人民公社章程，明确了公社、管理区(或大队)、生产队三级各自的职权范围，实行统一领导、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各计盈亏的管理制度，推行了“三包一奖”生产责任制。改变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公社统一核算的作法。1960年，根据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在农村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开展了以两条道路斗争为纲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党组织普遍开展了整风运动，掀起了全党动手，大办农业的高潮，以搞好农业生产、因地制宜抓好工业生产为前提，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1961年，上半年以学习河南省信阳地区整顿三类社队的经验，开展向三类社、队夺回领导权的斗争。同时，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应当下放到三、五十户的生产队，而不应当以大队作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精神，县委(注：周口店区于1960年改称房山县)派工作组到长沟人民公社岳各庄村搞试点调查，了解群众意见，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益处。同时，华北局，北京市委和房山县委组成联合调查组，由市委农村工作部长赵凡同志和房山县委书记李明同志带队，到我县房山人民公社，石楼管理区吉羊大队搞了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调查。吉羊大队是个有875户农民的大村，从1956年至1958年是一村一社，统一核算。公社化后，改为大队，大队下设七个生产队，每队平均125户。发动群众讨论的结果是：农民群众和广大干部，一致要求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其好处是：生产队有了支配生产的自主权，有了决定分配权，社员利益直接，心明眼亮，便于干部指挥生产。吉羊村就是这次由社员讨论决定由大队核算改为生产队核算的。根据中央发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又根据县委领导深入农村的调查结果，全区在1961年下半年，普遍把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30~50户左右的生产队，并且宣布30年不变，除个别先进村，仍实行以村或联村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外，绝大多数都以村为大队，大队内建生产队，作为核算单位。与此同时，全区七个大公社，除霞云岭公社未动以外，其他六个大公社，一般都以原来的管理区作为人民公社。这次公社规模的变动，共划成30个小型人民公社。取消了原来的管理区。马安人民公社和河北人民公社划成小公社后，县委在马安公社和河北公社撤销的基础上，又建起了马安工委和河北工委，作为房山县委的派出机构，协助县委执行各项工作。

1961年下半年还有两件大事，受到群众的拥护。一是撤销公共食堂。公社化后，曾一度把农村办不办公共食堂，视为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到1961年提出办不办食堂，要由群众讨论决定，不愿意吃食堂，不叫机会主义，不叫反对社会主义，也不叫反对人民公社。从此，农村的公共食堂就逐渐地解体了。二是1961年中央发出《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重申平调账主要从人民公社成立后算起，谁平调谁退赔，从哪里平调的退赔到哪里，平调单位应该向群众作检讨。中央指示，任何时候都不能剥夺农民，只有彻底退赔，才能恢复广大农民对党的政策的信任，才能使农民心情舒畅。因此，1961年下半年，全区上下广泛深入地开展了清理平调账的活动，较好地解决了全区的平调问题。这项纠正过去错误的活动，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房山文史资料》第5辑）

## 房山煤矿矿名的演变

潘惠楼

房山煤矿地处大石河畔的河北乡境内，是房山县境内的第一座国办矿井，也是北京矿务局的首批矿井之一。从建矿至现在（1991年）已有七十年的历史，其间房山煤矿的名称发生过多次演变。

房山煤矿的前身是由官僚资本家金少伟与海军次长龙济光合伙创办的，矿名为济伟煤矿，由前农商部于1921年颁发的矿照，矿权人为金少伟。当时矿井建在今河北乡南车营村后的大槽沟半山腰，因煤质不好，又多是采空区，只开凿平峒300米，经济困难，至1926年被迫停工。经重新勘察后，又在河北乡杏元村黄院沟内选择了新井口，这就是现在房山矿的西区井口。济伟煤矿又招收以曹汝霖、刘孟飞（曹汝霖之女婿）、王泽民等为首的新股东118名，集资15万银元，于1929年秋在黄院沟开凿平峒。平峒高六尺，宽七尺，长500米，到1931年适一槽见煤，产品销路甚佳。于是在1931年8月，济伟煤矿召开第三届股东会议，经股东酝酿决定，将矿名改为协中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另请矿照，矿权人仍为金少伟，经理为刘宗涛。至1933年，该矿可日产400余吨，有职员300名，工人700名。

抗日战争爆发后，此矿地处平西抗日根据地边缘，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游击区。经理刘宗涛南下，由刘孟飞接任经理。1938年5月，八路军挺进平西，在房山县长操村建立民主政府，该矿被抗日政府接收。1938年9月日寇进攻，该矿复入敌手，仍由协中煤矿经营，但由于敌我争夺，该矿根本不能正常生产，至1945年时，仅日产30余吨。日本投降后，矿山获得解放，1945年年底，我人民政府将协中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接收，归当时的平西军区十一专署领导，改名为新华煤矿，经理石明金。解放战争期间，此矿又是敌我双方争夺焦点，由于敌人进攻，我方政府管理机构经常发生变化，1946年5月，此矿又归我四分区民运部领导，矿名为裕民煤矿，经理王达。1946年1月，又由我察哈尔省易县振兴实业公司领导，改为振兴煤矿。1947年，该矿借边币100万元，重新开工，日产煤30吨。1948年1月，该矿又由我北岳军区实业公司管辖，改为振兴办事处，经理李春森，副经理刘树森。1948年8月，北岳实业公司召开工矿会议，将振兴办事处地址移至本矿，经理付万睦并领导地处门头沟区的大台煤矿和清水洞煤矿。

1949年5月，平西煤矿公司成立，该矿属该公司五个矿井之一。当时该矿地属良乡县，遂称良乡东矿。

为何称之为东矿呢?因为在该矿开采过程中,距矿西边约一里处有一座伟业煤矿,其规模、产量、人数曾一度与协中矿不相上下。协中矿在东,伟业矿在西,因此人们称东矿和西矿。直至1958年4月房良合并为房山县,该矿所在地划归房山县,矿也随之改为房山东矿。平西煤矿公司改为京西矿务局后,房山东矿是矿务局当时在房山地区的唯一矿井,矿井已无东西方向可言,于是又将矿名改为房山煤矿沿用至今。

京西矿务局接管房山矿后,即着手对矿井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开始从河北乡磁家务附近的水平矿延伸工程。至1958年,房山矿与水平矿在井下贯通,运煤火车线路也从坨里修至磁家务,房山矿所产的煤可从井下走水平矿直接装火车外销。从而房山矿分成两部分,即原房山矿杏元村黄院沟井口所在地为西区,磁家务水平矿井口所在地为东区。1960年5月,房山矿党政工团机关从西区迁至东区。

七十年历史,房山矿数易其名,至今已发展成为拥有4400名职工、近5000万元固定资产的现代化水采矿井。

(《房山文史资料》第5辑)

作者系北京矿务局史志办干部

## 房山板石

卓成栋

提起房山的物产,多数房山人均以“仙乡”盛产石炭(煤之古称)和汉白玉而自豪,孰不知房山还有另一种板石资源而称誉海内外,倍受客户的青睐。

房山板石资源在一些历史文献中有记载。在《日下旧闻考》中写道“青砂石出自马鞍山、白带山”。其中白带山一带,即房山板石的出产地。自白带山向西向北一带山岭、面积约有几十平方里,山石构造为青色页岩。其岩石可用工具一层层剥开,厚度为5毫米至20毫米间,面积大者可达几十平米。这类板石质软且韧,历来就是建筑的优良材料,可代瓦做房顶,可替木做地板,也可做壁砖、阶条,质稍软者可出石砚、磨石等。

房山板石开采最早可推至清代,县城西十余公里的长沟峪,西北三十余里的河北东庄子、班各庄、黄山店等地均有开石作坊,称“石板山”。当地百姓,上山采石时,先剥离表土,然后剥去腐石,见光亮平整洁如镜的新石后方始开采。开采方法,顺页岩的条理用铁楔将板石一层层撑开,再依据所需尺寸凿出所需形状,驮运下山,这为粗加工。

如用于作房屋的盖板,待粗加工后,按尺寸大小即可选用,使用寿命远远长于现今烧制的筒瓦或平瓦,而且用石板做屋顶,造型古朴,浑厚,别有一番风格。

如用于做壁砖或地板,板石还需再经过深度加工,劈成几毫米的薄板,表面经过机械磨光,磨出板石的自然纹理,才成为正式的产品。目前,板石已和大理石一样作为高大建筑物的外表装璜用料。用它装饰的建筑物不但美观,而且具有一种天然的素雅感,并日渐成为建筑装饰材料工业中的佼佼者。

房山板石业,清末至民国期间多为民间开采,工艺方法落后,用途面狭窄,加上料场处于大山之中,交通运输又不方便,也影响了板石业的发展。解放后由于我国建材工业的不断发展,板石资源也逐步引起了建

筑界的注意和兴趣。特别是七十年代末以来，板石加工有了长足的发展，开采量有所增加，特别是板石精加工的出现，也使这一古老的民间建筑材料进入了国际市场，并日益受到重视和建筑部门的欢迎。

据北京矿务局板石厂、北京外贸、河北外贸、房山外经委等部门的统计、房山板石材料出口创汇每年达20万元左右。房山板石正远销澳大利亚、法国、英国、日本、美国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为房山人民赢得了国际声誉，为首都北京，为伟大祖国赢得了荣誉。

（《房山文史资料》第5辑）

## 原房山县手工行业发展记略

傅强 黄少敏 李文勃

原房山县手工业合作社是在个体手工业者自愿结合、互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52年下半年，农业生产互助活动在全国蓬勃发展。原房山县广大农民在党提出“组织起来”的号召下，纷纷组织生产互助组。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零散活跃在房山城内的八个修理自行车的个体手工业者（梁瀛、梁儒、顾振义、许志高、陈贵生等），由梁瀛（后任城关铁业社主任、颇册农具修造厂副厂长）牵头，自愿结合到一起，组成了一个合作社。主要经营修理自行车业务。他们以“合伙作业、年终分红”的方式自己管理自己。1953年春节过后，经互助组成员的联络，分散在城关附近一些打铁的个体户，也参加了这个互助组。这年，通过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个体手工业者对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比较明确认识，参加互助组的人逐渐增多，由原来的八个人增加到十七、八个人，营业范围增了修理打造小农具等业务。摊子大了，大家有了成立生产合作社的愿望。

这种愿望和互助组的发展壮大，适应了党和国家关于逐步由互助组向合作社过渡的形势，受到房山县供销社的高度重视。当时县社下设手工业科，负责手工业的管理。郑玉山同志任手工业科副科长。经郑玉山同志与互助组负责人联系、协商，组成了由梁瀛、郑丰珠、郑怀西、郑伯兴、顾振义为主要成员的“筹委会”，于1953年11月成立。筹委会在县社手工业科的领导下，根据现状与合作社形式的具体要求，制定出社章和有关制度。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工作，于1954年1月15日正式成立“河北省通县专区房山县城关铁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城关铁业社）。这就是当时房山县第一家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城关铁业社民主选举了领导机构——理事会和民主监督机构——监事会。梁瀛同志被选为理事会主任。合作社实行民主管理，理事会负责生产、供销等业务，监事会代表全体社员对理事会的工作实施监督，如检查财务、账目等。当时，全社共有18人，固定资产近3000元。地址设在房山城南门外路西苏家大院，共租用17间房。生产、办公、门市部都在这里。生产方式仍属手工操作。隶属房山县供销社手工业科领导。从此，结束了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合伙经营的历史，走上了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生产经营统一管理的集体化道路。

城关铁业社的成立，推动了手工业向现代机械化生产的进程。房山南关有个郑家铁铺，他有一台当时比较先进的车床，1954年9月加入城关铁业社。使该社有了第一台车床。

郑家铁铺的车床是一台英制四尺皮带车床，以手摇大轮为动力。据现在区工业公司生产科工作的王德政同志回忆，1951年，他到郑家铁铺学徒时就已有了那台车床。该车床床面长四英尺，加工能力受到限制，

他们将床面加长到八英尺(2.44米),便能车马车轴那样的长件,达到更好地为农业服务的目的。当时,车一根马车轴需用四个小时,加工费8元。加入铁业社初期,没有机械动力,这台车床至少需要两个人操作,一个人手摇大轮为动力,另一个人操作机器,效率很低。尽管如此,每天的业务量还是很多,这台车床成了唯一的宝贝疙瘩。

城关铁业社成立后,生产经营越来越红火,逐步实现机械化生产。到1957年下半年,铁业社不仅添置了车床、钻床、卷丝机、柴油机,还买了一台10千瓦发电机。当时的社址在房山城内南大街路东(现南大街十八号)。大院门口,晚上亮起了房山的第一盏电灯。当时,县政府都没有电灯,很多老百姓也没见过电灯,十分羡慕。每当晚上,有不少人纷纷围到他们那里去“观灯”。直到1958年5月1日房山通电,由他们一花独放才变成“百花”盛开。

六十年代初,城关铁业社的修车门市部从城关铁业社分出,发展成“城关综合社”,继而发展成“房山县制桶厂”。城关铁业社的大部分迁往顾册,更名为“顾册农机厂”。该厂由于在农机具改革,支援农业方面成绩突出,连续四次被评为北京市工业系统的红旗单位,成为著名的“房山县十二面红旗”之一,也是房山县工业系统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1986年底,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顾册农机厂并入当时的房山县制桶厂(即现在的房山制桶厂)。

(《房山文史资料》第6辑)

# 京易御路

## 房山公路分局史志办

在河北省易县梁各庄西面的群山中,有座金瓦红墙的宫殿,白玉石雕的牌坊。这就是规模巨大而中外驰名的清皇家陵园——西陵。为了这一处墓地,建了一条宽12米、长120多公里,从北京至易县的“京易御路”。

“御路”直通陵区,陵区位于易县永宁山下,拒马河环其北,易水带其南,水秀山清,林壑幽美,周边长达百余公里。陵区共有帝陵四座,后陵三座,王公、公主、妃子园寝七座,一共十四座,葬了七十六人。主陵叫“泰陵”,是雍正皇帝(胤稹)的坟墓,建于1730—1737年,居于中心位置,其余各陵分别在东西两侧,等级严明。陵区总建筑面积达五万多平方米,共有宫殿千余间,石建筑和石雕百余座,构成了庞大的建筑群体。

“京易御路”始建于公元1730年,距今已有二百余年。它的原貌已不复存在,经我们沿途走访,查清了它的走向。它自北京西南经长辛店、南岗洼进入房山境,再经黄管屯、哑叭河至“黄辛庄行宫”。又经鱼儿沟、固村、官道口、墩台、于庄到芦村西北过大石河,经吉羊、二站之间到韩村河、太和庄、南正至“半壁店行宫”。又经南尚乐,在柴饭铺过拒马河,再经镇江营村南,到涑水县境内的义和庄,再经大赤土、墩台、魏村、下车亭、东文山至“秋兰行宫”。然后经二十里铺进入易县境的北桥头、七里亭、营房、易县北关、后部、下庄到达“梁各庄行宫”。过“行宫”后即进入陵区,这就是“京易御路”的全部走向。

“御路”上共设有四处行宫(房山境内有两处),均建于乾隆十三年。行宫是帝王巡幸和每岁谒陵的驻跸之地,受西陵总管管辖。每处均设千总一、外委一、旗兵二十;绿营设经制一、外委一、汉兵十名,以负日常守备和传递皇家信息之责。

“御路”既走皇差也过白差。皇差是指帝王外出巡幸和每年的谒陵活动。每当皇帝出动，皇后、王妃、文武官员，都要随驾前往，沿途州、县百姓都要派大差、服徭役。成千上万的农民被驱赶，被迫去修桥铺路，还要“黄土垫道，清水泼街”，要求平整清洁，一尘不起。这还不够，到了行宫，这支接天连地的庞大队伍的一切繁杂服务事项，都得摊派在当地百姓的头上。据清档案记载：乾隆四十五年的正月、五月、九月，一年竟去西陵进谒三次之多，可想当时沿途百姓所遭灾难多么沉重。白差就是帝王、皇后们的出丧。皇家的丧事更为隆重，他们迷天信神，为了保住金銮宝座，规定死人不准走活人道。这样白差就须沿着皇差大道的一侧，另修一条临时性的白差大道，道宽也是12米。除此之外还规定棺槨不准进行宫，这样又得在事前定好的地点，用高级布匹搭造芦殿、黄幄，并极力造成玉阶金瓦、朱碧辉映的效果。芦殿供暂停皇帝灵柩之用，搭造极为考究。房山境内就有过这样的两处临时性设施。

一个皇帝死了，为他抬运棺槨的杠夫就有几千人，轮流倒换。每班一百二十八人，名曰一条龙大杠。杠夫是从宛平、良乡、房山、大兴等县拉来的青年农民，他们高矮一致，胖瘦略同，个个身强力壮，穿驾衣，戴翎帽，十分整齐。送葬前要“演杠”十天，“演杠”时抬着与棺槨重量相同的木板，板上放一碗水，行走时水不准洒出。出殡时，皇家倾巢出动，一百二十八人抬着所谓的“吉祥轿”（灵柩装饰成轿子模样），皇亲国戚，帝后妃嫔，文武百官，武装兵卫，以及花花绿绿的仪仗队，组成一支庞大的绵延十余里的送葬队伍，浩浩荡荡，徐徐前进在这条大道上，真是前后幡旗蔽日，左右刀枪如林，场面极为壮观。据史载：清朝末期，国势衰败，民不聊生，皇帝的葬礼也不得不大为缩简。尽管这样，光绪帝的葬礼，还花费了白银四十五万两，送葬队伍达三万余人，车一千三百四十辆。

这条“御路”自建成之日起，皇家频繁地沿此路往来，经常车毂隆隆，飞骑驰骋。它虽为皇家所修，但平日百姓可以自由行走。它自东北向西南，斜穿房山平原地带，长达百华里。当时它对房山道路交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今日的房易（房山至易县）公路基本沿循了此线，而且其线型更加合理、通畅。

#### 资料来源：

- |                   |          |
|-------------------|----------|
| 1.《房山县志》          | 民国十七年本   |
| 2.《良乡县志》          | 民国十三年本   |
| 3.《日下旧闻考》         | 北京古籍出版社  |
| 4.《清东陵与西陵》        | 北京史地丛书   |
| 5.《清西陵》           | 西陵文物保管所编 |
| 6.中国历史档案馆明清史馆存档资料 |          |

（《房山文史资料》第6辑）

## 北京采煤史上最大的事故

潘惠楼

北京采煤史上的最大事故发生在1937年，即房山县兴宝煤矿的井下崩水事故。

兴宝煤矿即今北京矿务局长沟峪煤矿的前身，是由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曹汝霖及王克敏等投资兴办的，始建于1933年，位于长沟峪煤矿老井口。此煤矿曾设有把头制和关门锅伙，对矿工剥削压迫尤为残酷，井下经常发生死人事故。人们视下井为入虎口，宁可逃荒要饭也不愿去此矿做工。但矿主并不因劳力缺少而发愁，因兴宝矿距琉璃河火车站较近，矿主发现劳力短缺就让人贩子去琉璃河。这里是京师南下通衢，经常聚有远道而来或四处流浪的农民，人贩子见到后就坑蒙拐骗，把这些无依无靠无家可归的人领到煤矿做工。一旦在矿井中发生事故，矿主把这些尸首随便掩埋或拉入山沟喂狗，也很少有人追究。

1937年夏，京西连降大雨。斜井开采的兴宝煤矿，井下水越来越大。但资本家和矿主为多赚利润，仍然逼迫工人冒险排水作业。当时排水用的两台水泵根本抵不住井下涌水。进入7月，井下135水平南石门发生透水，工人们报告后，资本家和矿主让工人用铁板做安全阀门堵上，继续采煤。矿工们感到实在危险，纷纷拒绝下井。狠毒的资本家和矿主就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让把头驱赶工人下井，另一方面又放风对工人说，只要下井把水泵抢出来，每人每天可发给一块大洋。结果工人们正在135水平工作时，南石门突然崩水，有72名工人被淹死在井下。一名在后面驱赶工人的把头和这个把头的儿子去井下找他也未能幸免。

兴宝煤矿崩水事件发生后，舆论哗然。矿工们为死者鸣冤叫屈，死者亲属及朋友要求抚恤，兴宝煤矿乱成一团。但资本家和矿主根本不管工人的死活。正值此时，卢沟桥发生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很快进入房山，矿主和资本家则乘兵荒马乱溜之大吉，兴宝煤矿从此倒闭。

解放后的1950年房山劳改大队在煤田八部开采一年。1958年由京西矿务局接管划归房山煤矿为长沟峪坑口，恢复生产。经过一年零两个月的筹备，到1959年5月25日，工人们进入了当年崩水的南石门，发现昔日矿井内水泵房的管子上、水泵上、巷道淤泥里，很多遇难矿工的尸骨，有些尸骨还可以看出当时抢救水泵和在水中挣扎的情景。而当年资本家让工人堵水用的所谓安全阀门，不过是一块4毫米厚的薄铁板。

1960年2月，长沟峪矿正式移交生产。从此，自房山矿划出正式成立长沟峪矿。1960年4月又在周口店超岭开凿泄水平峒，翌年10月与原矿井正141米水平贯通。1963年7月超岭地区工业广场正式建成，长沟峪矿遂迁至超岭，老井口随之作废。

(《房山文史资料》第6辑)

## 陪同黄炎培副委员长视察石羊农业合作社

罗玉源

1956年8月间，我在原良乡县委农村工作部工作。当时接到河北省委通知，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老先生要视察良乡县农业合作社的情况，具体事项由河北省驻京办事处和良乡县委联系。经商定，由我陪同黄老视察良乡一区石羊乡两个农业合作社。这两个社由东石羊王忠、后石羊王广贵组建，全体社员在毛主席关于合作化高潮的鼓舞下，积极组织起来，参加农业合作社。到1956年视察时，全社已有47户180多口人，拥有540多亩土地和部分牲畜，农具，树木等。当时的合作社还是以劳力、土地按股份分红的分配形式。翻身得解放的广大农民，刚一参加农业合作社，就齐心协力，积极劳动。

这两个社地种得好，庄稼长得旺。他们在种好地的同时，还建起了砖窑、运输队、豆腐房等副业生产。这样，既增加了社员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又起到了推动农业合作化发展的作用。黄老在视察当中，详细地听取了合作社领导的汇报，而且还深入到田间、地头、砖窑、豆腐坊考察，访问了社员户。视察之后，黄老满意地说：“这两个合作社的发展情况，体现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指示的正确，看到了农民组织起来的优越性。

黄老不辞辛苦，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给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陪同者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正是8月间，炎热阴雨连绵的天气。视察时，刚下过雨，路途泥泞，很难行走，有时坐车，路滑爬窝，边走边推，黄老不怕劳累和陪同者一起推车。他关心群众，爱惜庄稼，路不好走就绕行，也不要轧坏庄稼，实在绕行困难，轧坏了庄稼还按价赔偿。黄老艰苦奋斗的作风，使人难以忘怀。视察从早八点钟到下午四点钟，长达八个小时，没吃县、乡、社、户一饭一菜，饿了就吃点自带干粮。总之，陪黄老视察，不仅感到他和蔼可亲，还看到了老一辈革命家高尚的精神品质，这件事虽然过了三十七年，可永远不能忘怀。

（《房山文史资料》第7辑）

作者系原北京市农业学校党委书记

## 房山石墨的开采

潘惠楼

房山矿产资源丰富，其中以煤炭为大宗。除煤而外，还有石墨、滑石、叶腊石等矿物资源。

石墨性质与煤炭相同。多伴生于煤田附近。房山的石墨开采，主要在周口店迤北约6公里的车厂村。车

厂村位于猫耳山下，煤炭资源丰富，居民多以采煤为业。1939年，村民在村北约3公里的山沟内采煤矿发现石墨，当地人称之为铅粉，有好事者运往周口店出售，被日本人玉井发现。玉井遂邀北京城内日商凌藤事务所经理成山在周口店设点大量收购，致使附近村众争相挖掘。成山又在周山店设厂加工，将石墨进行分选，分为粒状，末状两种规格，用草袋装运送往北京等地，数量约计两千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人撤走，留在周口店石墨约千吨，由当地人销往北京。解放以后，又有私商褚还珠与周口店人沈德禄合资开采，往北京出售。后因利益问题意见不合，遂停止开采。

1952年，北京市成立京西矿区政府，周口店及车厂村划归京西矿区政府管辖，村民遂组织开挖石墨生产。1953年销往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石粉加工厂、铁工厂、化工厂等约有700吨。货分优次两种，优质品在周口店火车站交货，每吨40元；次品在车厂村石墨矿窑交货，每吨20~27元。到1953年底，尚积压300吨。1954年，车厂村成立石墨生产合作社，年产石墨400吨。因成本较高、规格难于统一，故影响销路，生产难以为继，遂于1954年4月停采。只销出560吨，到年底仍积压219吨。1955年，车厂石墨矿由农业、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再次开采。生产规模扩大并较正规化、建矿井一个，巷道深约250米。但生产方式仍然是土法炮采，凿洞深挖，如同小煤窑。以木柱做为支护，用铁镐刨下装筐背出，放在窑口风干，然后装袋，运往周口店火车站。矿洞内设有通风道、泄水道、安全通道。夏季遇水停产，秋后再恢复生产。工人劳动强度较大，全年生产期约8个月。采出的石墨仍然分选。优质品为硬质发亮、细腻无渣、油性较大，可用于制作炭精棒、电池芯、铅笔芯以及翻砂，而次品则只能做为翻砂使用。1954年，国家矿产公司曾专门化验，以备出口，结果含碳率不符合国外要求。

1955年，石墨藏量逐渐减少，开挖成本太高，加之京西矿区政府撤消，车厂石墨终至停止生产。

(《房山文史资料》第7辑)

## 房山私营商业发展兴衰史

侯之扬

房山私营商业发轫于元、明而盛于清。以房、良的煤、灰、石料供给京师，致工商业方显露头角。清末民初，国内受商战之影响，路政有所发展，京汉铁路在房、良境内，自琉璃河至周口店，良乡至坨里先后修筑两条支线，因而开扩了煤、灰的销路，招来了山西、四川、江苏、浙江、湖南及天津、青岛等省、市的工商企业家，云集房、良兴建煤矿，大办商业。后来本地财主也纷纷开矿办店与之竞争，促使房、良工商经济形势一变再变。全境生产基地，交通要道，出山之口随之先后建立集镇、商市二十处，各定集日，远近交错，衔接不断。同时涌现出大量的小商小贩，追集赶市，串村叫卖。

“七七”事变前夕，房、良两县共有座商522家，40多种门类，已自然形成了以集镇为中心，担担、推车串乡的小商小贩为脉络的商业网。逢节遇年，集日庙会，买卖更加红火。

1937年“七七”事变，是年9月两县平原沦入日军之手，土匪四起，商店被洗劫一空，商会变成了维持会。直到秋后沦陷地区的商号才逐渐恢复，但元气大伤且农村经济崩溃，购买力大大减弱。再加日军的经济封锁，致使交通堵塞，货源渠道被切断。唯一通往北平的渠道，日伪军又盘剥甚严，资本稍厚的商户有的

转移有的弃商避居，一般中小商迫于生计不得不惨淡经营。

1945年9月抗战胜利，集镇商业刚刚恢复国民党又发动内战，农村经济再次遭难民不聊生，经商运货，路站盘剥，重税勒索，商业获利甚微。再加国民党政府的币值不稳，物价飞涨，货一出手所收货币几如废纸，致使商业交易不得不以货易货，小商大多破产，较大商号有价无货，囤积停售，整个房、良交易市场呈现混乱，市井生意极度萧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八年抗战三年内战、已经萧条不堪的国民经济亟待恢复。房、良两县城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先后建立了烟酒专卖、粮食、木材和花纱布、百货公司等国营商业。在两县广大农村建立了31个联村供销合作社，设立固定网点135个，平均每4个村就有一供销社，并附设油坊、酿造、点心加工厂、店25个，收棉站5个，轧花厂6个。拥有合作社员151,987名；占两县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占应入社人口的81%。至1952年底已建成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农村社会主义商业阵地。在商品供应上，由1951年完成社群需求的50%增至70%，其中生产资料供应，从1951年社群需求的30%增至80%，收购从1951年完成社群农副产品的25%增至85%。稳定了物价，繁荣了市场，结束了千百年来“谷贱伤农”的局面，改善了人民生活，促进了农业的恢复与发展，取得了广大社员群众的信赖。通过合同方式有计划的收售，引导小农经济由盲目发展走向计划发展，由分散走向集体。

通过国合商业的建立与发展和“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运动的政治思想影响，出现了广大人民群众不愿与私商打交道的局面。自由市场日益缩小，私营商业零售流转额逐年下降。在主要集镇出现“合作社忙死”、“私商闲死”的现象，私商从业人员情绪低落，思想混乱，有的申请歇业，有的坐吃山空，有的迫切要求找出路给予安排。

1953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第十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心贯彻“一化、三改”的方针。房良两县开始了在国营商业领导下，由供销合作社负责通过供销业务，来实现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7月供销社贯彻“稳步前进，着重改造，全面安排市场”的方针，两县首先对私营商业进行了全面普查。当时房山私营商业共有1077户，有从业人员1492人，资本额为220,158元，其中：座商307户，从业人员609人，资本额为156,949元；行商18户，从业人员18人，资本额为11,315元；摊贩752户，从业人员865人，资本额为51894元。良乡共有私营商业1695户，有从业人员1908人，资本额为304,694元。其中：座商116户，有从业人员272人，资本额为128,158元；行商207户，有从业人员215人，资本额为57360元；摊贩1372户，有从业人员1421人，资本额为119176元。

1954年9月，两县对所属89户棉布商经过审查和根据个人转业条件，其中部分转为农业，其余采取代国家经销的形式，实行了全行业改造。

同年10月两县集镇供销社开始零售“踏步”，缩减零售门市部和大摊，增设对私批发业务，增加批发品种，降低批发起点，退让部分商品缩减合作社经营额，对资金困难的私商户，经与银行商定，由财委审批给予部分贷款，以支持其经营。

1955年供销社在“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改造”的方针指引下，为掌握两县私商不断变动的情况。又进行了第三次普查。普查结果：房山全县有300户，387名农兼商的私营人员，已自动转入农业。全县私营商业尚有588户，754人，在这些商户中，有81%的户能够维持下去，有10%的户过肥，极个别困难的有8户；良乡全县实有私营商业918户，1142名从业人员，大多为行商摊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弃商参加了农业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

供销社继续“踏步”再次退让，并通过组织经销、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代购代销、公私合营四种形式，在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同时，进行了积极地改造工作。到1955年底，两县改造私营商业及饮食共717户，

952人，占总户数的47.6%，占总人数的50.2%，其中饮食业实行了全行业改造。

到1957年底，两县私营商业已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25个，人员579名，其中：资本家41名，资本家代理人10名，私方人员367名，职129名，公方代表42名，资本额158,498元；组成合作商店10个，从业人员88名，其中公方代表2名，资本额7981.65元；组成合作小组12个，从业人员74名，资本额2292.01元；服务业10个，理发社、照像社、洗染社，从业人员158名，其中公方人员3名，资本额共为6954.60元，另外归供销社管理的小商贩共有430名。

1956年公私合营后，房、良两县对在公私合营企业中的35名资本家及资本家代理人，进行了妥善的安排。其中：安排到国营花纱布公司任副经理的1名，安排在公私合营企业中任正副经理的20名，安排在公私合营店，担任组长的11名，任加工厂厂长的1名，任会计的1名，还有一名安排为业务员。

另外，对小业主及小商贩也根据其德、才条件适当进行厂安排。其中：在公私合营企业中任经理的2名，任副经理的20名，任门市部组长的1名、会计1名。同时根据工作需要经政府批准接收公私合营私方从业人员196名，其中：过渡到国营公司46名，过渡到供销社150名。

1958年初，在完成对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根据商品经营的归口和组织形式的不适应，以及为压缩行政人员节省开支，加强经济核算和企业管理，对合营、店、组进行了适当调整。有的合并，如房山磁铁、副食、棉布三个合营，分别并入杂货和百货合营；长沟国药合营，合并房山城美国药合营，改为国药门市部；有的合营改为合作商店或合作小组。如长沟棉布百货合营改为百货合作商店及合作小组，饮食合营改为合作饭店，交道杂货合营改为合作商店，窦店饮食合营改为饭食合作小组，琉璃河货栈合营及旅店合营，分别进行了归口合并。

调整后两县公私合营为17个，从业人员448名，合作商店17个，从业人员117名，合作小组14个，从业人员110名，服务行业11个、从业人员166名。房、良城内之公私合营划归国营公司。

1966年，“文革”开始后，公私合营、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等组织被砸烂，牌匾被摘掉，部分人员被轰回家。1976在落实政策期间，将私方人员的股金和定息一次结清，全部退还本人并对年岁已高的按退休作了安置，在此期间已亡故者，按退职处理。

公私合营、合作商店、组，明被砸烂，实际暗渡国、合商业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出现了多种经营形式、多种经营渠道，这就改变了过去统得过多，独家经营，渠道单一的状况。作为现阶段一种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个体私营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据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和个体劳动者协会《光彩之路》编写的房山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十年回顾一书中数字统计，截至1993年5月底，全区注册登记的私营企业111户，从业人员1208人；个体工商户12,448户，从业人员19789人。其中：手工业2294户；运输业1191户；建筑业11户；商业6064户；饮食业1367户；服务业646户；修理业871户；其它行业4户，注册资金达九千多万元。

我区私营商业拾遗补缺，经营灵活多样，在改革开放中对繁荣市场方便群众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诚为国营集体商业的有力助手。

（《房山文史资料》第7辑）

## 乾隆年间的一起煤窑官司

潘惠楼

清乾隆年间，是京西采煤业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煤窑多，因采煤引起的纠纷也很多。当时的直隶总督方承观，就曾亲自勘察房山县煤窑争并在向皇帝的奏折中提议，应加强对京西煤窑的管理、立定章程条例、以有所遵循，遏止煤窑诉讼争端。然由于采煤利益的驱使，见利忘义、作奸犯科、滋扰闹事者仍大有人在，其中发生在房山县杏元村三合槽煤窑的一场诉讼，就曾惊动朝野，历时三年，累及十数人。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乾隆三十三年，民人张进兴在杏元村蔡兴地内，开挖旧有三合槽煤窑一座，窑上事务交由郭君玺经营，蔡兴及村人朱祚等均入有股份。张进兴死后，其子张德润、张德亮在京城内开设花厂，不谙窑务，且多年在城内居住。郭君玺见有机可乘，竟将煤窑余利私吞，并伙同民人崔老另开设椿树窑一座，其取煤道路在窑内与三合槽窑相同，出煤之地即系三合槽窑出煤处所，并不需费用工本，只不过煤窑窑口不同而已。至乾隆五十一年春，张德润兄弟闻知三合槽煤窑出煤兴旺，即屡向郭君玺索利，郭君玺不给。于是张德润通过同街素好正黄旗满洲补司务爱仁阿，找到熟谙窑务的王廷珍，由王廷珍率张德润兄弟等人于十月初三赴房山县三合槽窑，与郭君玺算帐，郭谅不能隐瞒，只得付给张德润京钱五千。返京后，张氏兄弟酬谢王廷珍，恐不能年年与王廷珍去窑上收取利息，遂与王商议把窑争回。王廷珍答应帮助，并提出煤窑争回后，降一半股份分给自己。张氏兄弟同意，即邀集海淀花园太监刘泰、杨永年，琉璃厂工头杨官德到家，由张伯祥代写了窑业股份分王廷珍一半的合同。又恐郭君玺不服，将合同日期倒填，写在张德润等去三合槽窑与郭君玺算帐日期之前的九月六日。王廷珍还答应煤窑争回后将拿出部份窑业股份送给爱仁阿、张伯祥、张邦胜，并每年给刘泰、杨永年、杨官德送煤斤。于是王廷珍开始争窑，首先令张伯祥代写张德润卖窑的假合同。

王廷珍持假合同到房山县衙告状，郭君玺不服。王廷珍又到顺天府上告，郭君玺认为这是王廷珍有意陷害，与张德润对质，张氏兄弟承认卖窑是真。郭君玺见事态不妙，找到张德润妻兄刘国贤，嘱其致意谓：“窑上事务可与张德润重新商量”。刘国贤贪图郭君玺贿赂，纵恿张德润翻供，捏称卖窑合同是王廷珍窃去的，王廷珍也不服，死死咬定卖窑合同乃张德润亲自立下的。双方各执一词，顺天府久断不下，只好派人重新调查，行文房山县，饬令业主蔡兴等人到案，将纠纷所涉及之人一一隔离，严加审讯。直至乾隆五十三年春，终将真相查明。依照罪行分别予以处理。将霸占煤窑的郭君玺、制造假合同的王廷珍、贪利翻供的张德润，各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将贪图煤窑股份的爱仁阿、张伯祥、张邦胜及贪图煤斤的刘泰、杨永年、杨官德各杖一百，徒三年；将收受贿赂，纵恿翻供，插弄是非的刘国贤杖八十，从重枷号两月。另外又将郭君玺所侵吞窑利及王廷珍争窑所得酬谢全部追交入官；将三合槽窑现存之煤变价入官；将椿树窑用石堆砌，永远封闭。

（《房山文史资料》第7辑）

## 赵家院煤窑官司

易克中

清光绪三十二年冬(1906年末至1907年初),日本驻京部队和日商合谋,利用汉奸挑起一场旨在侵占房山煤窑的风波。但在清顺天府府尹袁树勋和房山县吴知县的严正斗争下,风波很快得到平息,日方的阴谋未能得逞。

房山县长沟峪一个叫赵润的人在自家场院私开了一处小煤窑,窑巷挖通了附近天成窑的煤巷,并使地面的邻居房屋受到震动。天成窑韩窑主向房山县衙门呈控,吴县令亲临现场调查,当场决定将两家小窑永远封闭,并让赵润写出具结文书,保证不再开挖赵家的院窑。本来,如此处理可结案,但赵润不甘心,竟同日商信义洋行勾结,企图借助洋行背后的日本军队撑腰,迫使地方官取消封窑禁令。头一步,赵润同信义洋行日商越智倒填日期,签订“借款、供煤合同”,合同内称日商出借银两若干,赵则向日商供应煤炭。越智拿着这纸“合同”找到日本驻屯北京的步兵副官渡边宽,由渡边宽出面与清顺天府交涉。在致顺天府的信中说:信义洋行是日本驻军的“粮台之商”,不久前又被委托承办日军用煤,但因同信义洋行订立供煤合同的赵家院煤窑被地方官府查禁,使信义洋行无法供煤。此前,日军营已照会西路厅要求追查,迟迟未得答复。信中竟对顺天府施加压力:“现值天寒,一日殷一日,敝营需用(煤)亦甚至要,不得迟延。即希转饬西路厅,从速查办,当以该煤窑许可开采,以便承办敝营需用之煤,……”。

顺天府立即通过房山县查清事实真相,对渡边宽的谎言予以揭露:“赵润与信义洋行所订立合同,预先借银,承揽售煤,迹近诓骗”。对日本军方侵犯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针锋相对地提出反建议:所谓赵润欠信义洋行银两之事,应由该洋行自行清理。如果该窑主赵润不认,(可)由该洋行呈诉本衙门,即可严查究办。未便因该洋行所托,准其开封”。

如此办法,渡边宽不肯接受,“又复晓晓牍请前来”,不断向顺天府纠缠。府尹袁树勋即向外务部长官致函,通报对此事的意见是:此案“显系该窑主赵润从中插弄,捏造是非,承揽信义洋行煤斤,有意撞骗,乃该兵官听其一面之词。”对此袁树勋态度鲜明地表示:“本衙门实难照办”。从而拒绝了由渡边宽出面软磨硬泡的无理要求。

但是这伙人还不甘心。第二步,由信义洋行出头,采取赖着不走并施加武力威胁的手段。在渡边宽的唆使下,越智公然带领日本兵手持枪械,闯到房山县衙门,恫吓县令,迫使其答应把赵家院煤窑开封。吴县令不为所动,“坚不应允”。越智故意扩大事态,领兵半夜撞打该村村正家的大门,声言为赵润报复。此后,在越智离村前,留下一个叫是枝盛吉的人赖住在赵家,并在赵家门上钉出一块信义洋行的招牌,对外宣称“此窑已卖与该行”等等。房山县几次派人催离,但是枝盛吉却有恃无恐,洋洋不睬。无奈,吴县令据实禀报顺天府,袁府尹决定采取果断措施,以挫败日方企图侵占我煤窑,从而控制京西煤炭开采的险恶用心。他在向外务部门通报函中指出:“查房山非通商之地,该商何得挂牌?前者屡次声称赵润欠债,原不足信,今乃忽称卖与该行,无非藉端硬占该窑。“弟思近京煤窑,时常聚讼,向无外人干预。倘此次稍一松动,日人插手,以后纷纷效尤,必致滋生事端”。事已至此,怕也无用,顺天府派出军警前去强行撤掉钉在赵家门上的招牌,并严令是枝盛吉即日离去。谁知是枝“不但不遵,竟敢挥拳动武”,要大打出手。军警当即将其制服,并于以拘押,送交津海关道,转交日本领事馆。

袁树勋考虑到，绝不能让日方恶人先告状，便在致外务部函中建议：“伊如以敝署拘执日商为问，尚祈贵署峻词诘问，年前日商带同兵弁，威吓官长，应如何究办？彼自理屈词穷矣！”

果然，在袁府尹和吴县令等人有勇有谋、有理有节的斗争下，日方未敢再行滋事。这一场维护与侵犯我国主权及合法权利的斗争，以日方的失败而告平息。

因此案涉及太监走出内务府到社会滋事，清廷及顺天府又对掌管刘泰、杨永年的奉宸苑郎中长庆、主事皂住各罚俸一年；将管理奉宸苑事务尚书金简、御前侍卫公丰申、济伦卿朱尔杭阿各罚俸六个月；将乾清宫太监总管王承义、肖云鹏、杨进玉、刘成、吕进忠、肖德禄各罚银六个月；将圆明园总管太监刘进忠、吴天成各罚月银一年；将圆明园事务大臣和砢、德保、伊龄阿及郎中职衔巴宁阿各罚俸三个月。

至此，这场错综复杂、沸沸扬扬的房山杏元村三合槽煤窑官司，终以数十人受到处理而告结束。

（《房山文史资料》第7辑）

作者系北京矿务局史志办干部

## 合作化时期的吴春山

卓成栋

吴春山，1901年8月14日生于崇各庄乡岗上村雇农家庭，给地主扛活二十八年。1945年吴春山任农会委员，积极参加“二五减租”。1949年春土地改革，他积极参加斗地主、分田地，成为一名骨干，当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农会主任。

1952年，党号召走农业互助合作的道路，并带头在原河北省良乡县办起了第一个互助组初级社，成为良乡县、河北省农业劳动模范，曾受到毛主席三次和周总理七次接见。

1955年，吴春山被选为岗上村党支部书记。十年动乱时期遭到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没有屈服，1969年6月又恢复了工作，继续担任岗上村党支部书记，1971年被选为中共房山县第四届委员，1977年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北京市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市政协委员。

1979年吴春山主动退位让贤，当了村里的顾问。1983年11月2日，因患心脏病，医治无效逝世，终年83岁。

原属河北省良乡县的岗上村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于新中国成立的前夕。当时担任村农会主任的吴春山，积极响应“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号召。于1950年初，便率先组织起了仅有3户村民参加的互助组。他们起早贪黑在分得的十余亩土地上，精心耕作，用辛勤的汗水换回了好的收成。当年秋后，这个互助组竟在自己的努力下取得粮食平均亩产200斤，比单干户产量多了一倍。于是吴春山的互助组便在地区出了名。

当年冬天，他被评为当时河北省的劳动模范，并参加了河北省第一届劳模大会。

会后，吴春山回村努力地发展自己的互助组，扩充组员，改善土地管理。当1952年党中央作出《关于

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后，吴春山便在岗上村组织起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吴春山农业生产合作社”。不但在当时的良乡县，甚至河北省都是数得着的最早合作社之一。当时吴春山生产合作社仅有10户，零零碎碎的土地总计约100亩，6头毛驴，资金仅有旧币8万元(约人民币8元)。

在这种情况下，吴春山果断决策，组织大伙勒紧裤带抗旱打井。仅用不足一个月的时间，打出了三眼井。然后用井水挑水点种，补齐缺苗，保证不误农时，完成了全社的春播任务。这一年全社的社员齐心扑在追肥、中耕、除草上，一直忙到大秋。功夫不负苦心人，农业合作社的粮食亩产量又在岗上冒了尖，100多亩地产粮3万多斤，花生近万斤，皮棉2500多斤。

这一成绩非同小可，不但产量超过了吴春山原来的设想，而且它显示出合作社的合作起来的威力。电台、报纸都相继报道，介绍了吴春山和他的合作社的事迹。同年吴春山获得了农业部的丰产奖励，国庆节吴春山登上国庆的观礼台，见到了毛主席。

到今年冬天，吴春山农业生产合作社扩大到48户，村中的贫下中农一半多入了社，使岗上村的互助合作运动走到了良乡县的前头。面对这种局面，吴春山不但没有满足，而且更加积极的投入。他将自己出席河北省劳模的奖金五百万元(合人民币500元)给集体买了两匹马，以壮大合作社的经济实力。那时大牲畜是一种代表合作社实力的标志。因此吴春山便从培育大牲畜入手，壮大集体的力量，1953年他用奖金买的牲畜其中一匹就是一头母畜，就是利用这匹母畜，使合作社的牲畜自繁自养地发展起来，最多时达400多头，吴春山根据自己的实践总结出一套饲养牲畜切实可行的经验，对合作社的牲畜兴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吴春山养牲畜在饲养院一住就是十多年，草料的喂养都是十分的考究，不能马虎，按季提供不同的饲养草对牲畜的饲养极为有利。吴春山常说：牲口不认爹和娘，但要草好料巧的肚肠。他常关照饲养人员“书靠讲、地靠榜；牲口全靠人喂养”。所以草料、饲养者、甚至棚圈都对牲畜的成长喂养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通过实践，吴春山总结出的一套喂养牲畜的经验被乡亲四邻称为老社长的“骡马经”在地区有很大的影响，1964年的《北京日报》专门报道了吴春山的“骡马经”。

岗上村村民们对老社长吴春山的另一个重要印象就是他勤俭持家，不愧为一位十分合格的带头人，当家过日子的优秀家长。他常说：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一分钱也要掂量着花，不能蚂蜂吃窗户纸，一嘴一个窟窿，更不能金手银胳膊，一走一哆嗦。

他给干部订了个规矩：干部办公要节俭，集体的钱是村民的血汗，不能乱花一分钱。村干部开会、办公，没有发过一分钱补助。村里不设招待费，无论什么人来村里，从来没有集体招待烟、酒、茶、糖，更没有招待过吃喝。一次一个车把式自己做主买了两根鞭梢和一根带有五朵红缨的长鞭子，找会计报销。吴春山知道了，指出他违背了每个车把式每月只能买两根鞭梢的规定，坚持不给报销。结果车把式自己掏了腰包。

1953年，吴春山的初级社又取得了丰收，社里有了余粮，当时正是粮食统购统销开始，粮贩子还在活动，四处高价收粮，可吴春山坚决把粮食卖给国家。他说：“不能图点钱就忘了国家”。送粮车队受到县委书记及机关干部的夹道欢迎。又如卖棉花，按规定应卖到当地的沿村供销社，可岗上村北边不远是长辛店，属北京市，而且收购价也高。于是有人建议卖到长辛店，可吴春山又否定了这个意见，照章办事把2600多斤皮棉交到良乡县的沿村供销社。吴春山办任何事儿都是这么一板一眼。他常把“要想富，先栽树”这句话挂在嘴上，那时没钱买不起树苗，大家凑钱到南边买人家磕树磕下的树枝，回来掐段插在荒沟里。

他不但爱栽树，还爱树，谁要是破坏了树就像捅了他的心窝子。一年，村干部武德龙在河东放骡子，啃了集体栽的树，吴春山硬是叫他从集上买回100棵小树栽上才算完事。

吴春山做为村子的当家人，认识到要改变岗上村的面貌，发展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从1952年他就开始带领合作社员们打井，改变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在七条沟上垒起72道坝阶，垫地200多亩、建成能蓄水10000立方的小水库，使旱地变成了水田。在岗上村经吴春山的手先后打机井11眼，建扬水站5处，使水

浇地扩大到 800 多亩。使村子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到 1957 年粮食亩产突破了 300 斤。1964 年亩产超过了 400 斤，达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要求。

吴春山从一个普通的农民，到成为一个村子的带头人竭尽全力为集体服务，一门心思扑在村子的事业上，两袖清风，严于律己从不占集体一点便宜，不搞特殊化，不以权谋私。五十年代初，吴春山合作社一天比一天规模大，有人建议办公室买块玻璃板，垫着好写字，想给吴春山买辆自行车，出门、下地方便。老吴听到这些风声，召开党支部会，批评这种摆阔气、讲排场的思想。他说，好逸恶劳，图个人享受，好不了，是败家子。有一回集体分蔓菁，分的人给吴春山拣了几个大个儿的，他发现后立即退回大堆，掺均后重分。春天他修房子，用集体的花秸子，总要过秤，然后到会计那儿按价交款。吴春山公私分明，就连自己在河北省劳模大会得的奖金，都被他用来为集体买了牲口。既使上级领导来村检查工作吃了几个桃子，他都主动付给桃子钱，说这算我请客，不让集体开支。

如今，老支书的一言一行，时时鼓舞着村民努力奋斗。吴春山虽然离开了我们，可他那种精神正在我们新一代人身上发扬光大。

（《房山文史资料》第 8 辑）

## 解放初期的全国劳动模范卢翠英

张 珍

周口店地区办事处周口村六十五岁的卢翠英是解放初期的全国劳动模范。1950 年曾受到毛泽东主席邀请，参加了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大会。

解放后，她在党的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搞土改、闹生产，在发动妇女争先进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曾先后出席过房山县劳模会，察哈尔省和河北省的第一次劳模会，通县专区、北京市以及在建国一周年时召开的全国劳动模范大会，曾与毛泽东主席及国家其他领导合影。

卢翠英自幼是个穷孩子，十二岁就随父亲上窑背煤、拣煤核。旧社会的穷苦生活，使她从心底拥护共产党，盼望解放翻身。因此，1948 年解放后，她冲破父母的阻拦，积极地参加了房山县举办的土改骨干训练班学习。她掌握了党的新区土改政策，学会了发动和领导群众的方法。从 1948 年底到 1949 年 2 月，积极参加了本村的土地改革斗争。在土改运动中，卢翠英担任村代表，村妇联主任，通过实际工作的锻炼，在政治思想上和工作能力上得到很大提高，于 1949 年 3 月 1 日，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以与她同时入党的其他两名党员为基础，建立起周口村党支部，卢翠英当选为首任村党支部书记。

解放后，卢翠英冲破轻视妇女的农村封建残余势力的束缚，用参加生产劳动的实际行动，争取男女平等。土地改革以后，经常参加县、区召开的生产会议，积极发动本村的春耕生产运动。在群众中大力宣传：“劳动光荣，人民当家做主了，就得发展生产，发家致富”。还在妇女中宣传：“要想达到男女平等，就得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劳动，不能再围着锅台转了，不能靠男人吃饭。”1949 年春夏农业生产中，她第一个走到田头，在她带动下，村里有二十个妇女下田劳动，走上了妇女同男人平等劳动的道路。房山县妇女联合会向广大妇女发出号召：“学习卢翠英，向卢翠英看齐。”

解放前的周口村每年收成仅够半年的食用。全村人多是靠男人走窑、卖工、烧灰谋生，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卢翠英按照党的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指示，把妇女们合在一起搞生产，腾出男人卖工挣粮食，帮助穷苦人渡过春荒。她找到本村卢玉兰、李淑琴等五个青年妇女，组成了拨工组劳动生产，栽了60棵树，刨了1.3亩地，挑水点种了13亩花生和五百棵瓜。替下了55个男工上窑背煤，挣回四石多玉米。接着，在夏季生产中，又发动了263名妇女，自愿组成24个临时互助组，参加了送粪、刨坑、点种等农业劳动。全村2383亩耕地，其中妇女锄过的有一半。替下男工1500个，共挣回玉米50石。被房山县五区评定为大生产运动模范村，区政府把生产红旗插到周口村。

在党的领导下，她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凡是县里或区里布置的工作，她都认真贯彻，事事走在前头，在带领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中，总要多干。抗旱挑水点种玉米时，别人一担挑两桶水，她一人一担挑四桶水，还要走在别人前边。这村过去每年秋收，偷秋现象相当严重，为了护好解放后的第一个秋收。卢翠英提出，决不能让大家的劳动果实丢失。她除了安排民兵昼夜巡逻外，自己也每天，同民兵一起，昼夜巡查。由于护秋抓得紧，庄稼一棵没丢。在劳动生产中，她不会做的农活，就虚心向老农学习。她不会扶犁耕地，就主动找老农请教，很快掌握了扶犁耕地技术。当有人赞赏周口村农民生产成绩大时，她总把功劳推给大家。省、市、县奖给她的新式农具等，全部交公大家使用，授给她的奖章，她带回来，让核心组的人轮流配戴，说成绩是大家创造的，荣誉也该大家共享。

卢翠英入党后，做到了个人服从组织、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卢翠英从1949年春担任本村党支部书记，到1952年周口村划归北京市辖区后，与邻村云峰寺村合建周口村小乡，卢翠英升任乡党总支部书记。到1956年小乡建周口店等六个大乡，卢翠英又任党总支副书记。1958年大跃进，卢翠英又被派遣到周口店炼铁厂任指导员(当时是军事化)，她与别人一起建土高炉，学习炼铁技术，参加炼铁。1959年春到年底，卢翠英先后又调到城关制砖厂任厂长。新建城关盲人厂，新建大韩继砖厂。在1960年初，她又调到霞云岭大公社妇联会工作，在深山区一干就是三年，从不叫苦叫累。

1962年冬，国家为克服暂时困难，精简人员。卢翠英毅然服从了精简的决定，回到原籍参加农业社劳动，她面对今天的幸福生活，一往深情地说：我能有今天，全凭共产党领导，我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房山文史资料》第8辑)

## 怀念龚澎同志

罗玉源

龚澎同志于1958年和我在房山县委农村部工作。当时房山、良乡两个县刚合并，她来房山前，在外交部任新闻司司长。龚澎同志在战争年代冒着风险在虎穴中工作，解放后又在特殊的外交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有名的才女外交家。

龚澎同志来房山工作，主要是为了体验农村工作的实际情况，为了工作方便，龚澎同志还兼任了房山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职务。她从1958年到1959年近两年时间里，给我和农村工作部全体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回忆起来，实感难以忘怀。

龚澎同志来房山时，全国已处在宣传、贯彻党的总路线的时代，群众运动热火朝天。今天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兴修水利，深翻土地，创高产、放卫星；明天搞大炼钢铁，搞共产主义大锅饭、农村食堂化，搞人民公社越大越好。在这场群众运动中，有的干部曾一度出现头脑发热、不实事求是的浮夸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农村工作都作为县委的参谋部门，如何适应这场运动，既要领导群众使运动深入地开展，又要扎扎实实地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使干部群众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龚澎同志到农村工作部不久，就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她一面宣传教育群众要全面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坚持实事求是；一面向县委和上级党委反映农村的实际情况。为了使调查研究更深入更实际，经农村工作部部务会议研究，请示县委同意，由龚澎同志和我负责，确走城关公社北市大队为调查研究试点大队。龚澎同志经常深入到社员群众家中了解情况，还深入田间和大队干部、社员一起参加劳动。经过一个时期的调查研究在北市大队写了房山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章程(草案)，社章中明确写出了农村人民公社要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生产队的规模不能太大，以二十户左右为宜。同时明确了各级领导部门，都不能随意平调生产队的土地和财产。这个社章在当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既调动了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又抑制了随意平调生产队土地、财产的现象，对推动运动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经过试点的大量工作和干部社员群众的努力，北市大队被评为房山县先进大队，后来被房山县树立为十二面红旗之一。

1958年，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前左二）  
在周口店区体验生活（张珍 提供）

龚澎同志来房山工作的后期，正是国家困难时期。为了战胜困难，她在工作和生活中，从不搞特殊化，生活艰苦朴素，在机关和部里同志一样坚持工作、同吃住，在农村和社员群众同劳动。有一次，北市大队进行“三秋”种麦劳动，从早上八点到十一点多，大队干部给煮了点青玉米和花生，让参加劳动的部里干部吃，龚澎同志都婉言谢绝了。中午回县委机关大食堂和干部们一起吃饭。下午，同志们都劝她休息，她仍坚持继续参加劳动。她说，生活虽然苦，劳动累点，但心里平静，因为大家都一样地苦和累，为了今后的幸福，苦中也有乐。

1959年中秋节，机关的食堂改善生活，吃饺子。龚澎同志给大家讲了一段李自成吃饺子的故事，她说：农村贫苦家庭吃饺子是最高享受，可是李自成吃了四十一天饺子，吃倒了江山。我们是共产党都应廉洁自律，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自觉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使党心、民心团结一致。

龚澎同志俊美潇洒，可她经常上身穿一件蓝色列宁服，下身穿一件便服。有时下农村参加劳动，衣服脏了，就自己洗。她烫着发，怕群众看不惯，说她是外国人，就经常戴一顶蓝色帽，表现得朴素大方。

龚澎同志在繁忙的工作中，和同志们团结一心。有时为了让同志们轻松一些，就主动给大家买电影票，让大家看看电影。她平易近人，与同志们同心同德，努力完成上级交给的一切工作。1958年夏，龚澎同志的爱人乔冠华同志来房山看她，机关同志为乔冠华同志准备了些一土特产品，龚澎和乔冠华同志从良乡火车站，坐火车回到了北京。

龚澎同志来房山虽然时间不长，但在工作和生活作风上都给我和农林部的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离开我已三十多年了，每次想起她，都让人难以忘怀。

（《房山文史资料》第8辑）

## 房山第二大国营煤矿——长沟峪矿

卓成栋

房山地区第二大国营煤矿——长沟峪矿座落在大房山麓的南翼煤田上。前身是解放前私人开设的小窑，因大雨造成井下矿井被淹，造成煤窑一直瘫痪。直到1950年当时房山县劳改队组成开采队伍，在小窑基础上进行了一年多的浅部重新试采，但因能力不足与煤窑瘫痪多年，矿井功能无法很快恢复，故1951年又放弃了矿井的恢复工作。

直到1958年京西矿务局接管后，才下决心恢复煤矿的功能。于是从当时的房山矿和矿务局抽调骨干，进行煤矿投产的前期准备。并且利用原旧煤窑的斜井经过锚固和修整，安装绞车、增加安全防护设施，疏通了大巷，排除井下险情，开始投产。同时列为当时房山矿下属的一个矿井。后又经国家投资，对矿井原有规模进行扩建，在矿井5里之外的超岭开凿泄水平峒3203米与原矿141米水平贯通，使该矿年生产能力直线提高，到1960年2月该矿工程移交，长沟峪煤矿独立，这个有悠久采煤史的老矿又焕发出新的青春。当时从长沟峪山谷深部开采的原煤要通过5里长的索道运到山口的超岭，不但运输和交通困难，而且由于长期开采煤炭，矿办公区和生活区无法维持水源，于是，矿机关于1963年迁至超岭，原煤运输由空中改为井下，并又在超岭旁测修建了新煤仓，机电车间，运销科，生活区等，使昔日零散的矿区形成了整齐划一的格局。

长沟峪煤矿已经探明井田面积12.16平方公里，煤层系北岭向斜构造的侏罗纪煤系。地上含有煤层11层，可采厚度达32.45米，工业储量3352.2万吨，可采量为1910万吨，矿井年设计能力为30万吨。矿井开拓方式为平加暗斜井，集中底板运输巷采区石门开拓煤层群。

该矿自建矿以来至1985年间，累计生产原煤1410万吨上缴国家利税6729.3万元，生产方式先为斜坡后退式，后改为仓储和长炮孔采煤法。又经过技术改造和者矿挖潜，1980年后该矿年生产能力已超过原设计能力的两倍多达到80万吨，到1985年达到109万吨，到1990年，产量最高时可达年产130万吨。

由于该矿煤质好，灰分低，低位发热量可达到2592千焦/克，产品深受用户的欢迎，国家一些重点企业先后把该矿的原煤产品列为冶金喷吹煤。特别是该矿的13槽侏罗纪煤炭成为北京矿务局首批进入国际市场的优质煤炭。并经常出口日本，煤炭产品成为客户信得过产品。

目前该矿拥有职工4000多人，固定资产达到4380多万元，设备1000多台，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矿区占地面积59万平方米。且地理位置优越，有公路，铁道直达矿区。

(《房山文史资料》第8辑)

# 房山农业银行的发展历程

王卓见 阎惠英

1994年5月8日房山农业银行恢复工作已整10年。10年中，房山农业银行在支持本区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城乡贸易往来，支持高、精、尖科技向农村辐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房山农业银行的形成

1949年1月，由晋察冀边区第11区察哈尔平西办事处帮助建立了房山、良乡人民银行。后来由于行政区域隶属关系变化，房、良银行又有几次较大的变化。根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1954年3月建立了房山县农业银行，当时由人民银行代管，农业银行行长由人民银行副行长兼职。1955年11月，农业银行合并为人民银行。1964年3月，房山再次建立了农业银行，业务虽然分行了，但是营业机构没有单设，1965年9月又宣布撤销，业务又重新划入人民银行，合并为一个机构。

1979年2月，国务院决定恢复中国农业银行，1980年1月1日恢复了市农业银行机构。房山人民银行改为农行建制，采取“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管理体制。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和房山县的实际情况，银行从扩大业务范围入手，1984年5月8日正式宣布银行机构分设，从此房山县农业银行开始形成。

房山县农业银行自分设以来，管理全县的农村金融和信用合作事业，是房山县业务量最大、基层机构和职工人数最多的综合性专业银行。据统计，1994年6月来，房山农业银行共有机构网点55个（不含信用站），其中银行分理处9个、信用社31个、储蓄网点15个；共有干部职工871人，其中银行380人，信用社491人；行社各项存款余额14.3亿元，各项贷款14.8亿元。房山农业银行已成为房山区农村资金融通、结算、现金收付的主要渠道。

## 围绕党的中心工作 支持农村经济发展

房山农业银行已发展成实力雄厚的专业银行。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一）从1954年到1955年11月为第一阶段，即完成了恢复本县经济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这个时期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围绕这一时期规定的基本任务，房山农业银行通过各项信贷活动广泛聚集社会资金，大力支持全民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发展，促进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加强货币信贷管理，有计划地调节货币流通、稳定市场物价，为“一五”时期经济的顺利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

从1954年3月到1955年11月是全国范围内第一次建立农业银行，虽然时间不长，但是给以后建立和恢复农业银行打下了良好基础。

这个时期房山农业银行的主要任务是：一是运用多种手段聚集资金，有效地解决本地区各方面的资金需求；二是积极帮助初级社和贫困农民解决生产和生活困难。发款重点支持购买种子、肥料、农药、小农具、牲畜和农民生活中的口粮的资金不足。1954年到1955年，累计发放农业贷款367万元；三是发放贫农合作基金贷款，

帮助无力缴纳入社合作基金的贫苦农民,这样既解决他们生产、生活困难,又帮助他们尽快走上农业合作化道路;四是扶植供销合作社的发展,试办农村供销社信用部。当时,房山的农业主要是种粮食,没有什么副业,更没有工业。农村商业主要是供销社和一些小商贩,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存款和贷款,业务范围和业务量都很小。通过上述工作的开展,对于打击农村高利贷活动,巩固和发展房山农村经济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二)第二阶段为1964年3月的建立至1965年9月农业银行的撤销。

这个阶段农村经济的特点是农村经济经受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挫折,在认真贯彻“以农为主,以副养农,综合经营、全面发展的农业总方针”的努力下,农村经济由连续下降开始转向回升。与这个时期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情况相适应的农业银行、信用社在信贷支持上,认真执行房山县农业生产的基本任务“继续贯彻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并举的方针”促进农、林、牧、副、渔全面丰收。开展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运动、加强农业科学实验,开展植树造林山区建设加强副业生产的领导。在农贷资金安排上,仍以支持社、队购买化肥为主,对农药、水电费、小农具、籽种、副业生产的流动资金也给予支持;对解决耕畜、大车、小型排灌机械的更新大修、中型农具和农副业加工设备、大牧畜和养猪等设备的资金需要也给予了适当支持。同时对放款手续制度也进行了改革,方便了社队的开户,结算和贷款。

这个时期行、社的贷款自主权是很小的,往往是由于社、队搞各种“大办”或是强迫分配各种经济效益差的生产资料,使大量农贷“沉淀”收不回来。

(三)从1984年5月至今为第三阶段,即农业银行发展、壮大时期。

这个阶段国家经济生活的特点是:经过20多年的挫折,党和全国人民对中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科学社会主义有了更深的理解。确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实行政治的和经济的全面改革。正确的理论和政策,使农村经济得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农村金融事业的发展。据统计,各项存款由1984年的2亿元增至13.5亿元;各项贷款由1984年的1.5亿元增至12.9亿元。十年(1984年—1993年)累计发放贷款72.7亿元。存款和贷款总额均占全区各金融机构的60%,已成为支持房山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渠道。

1. 房山农业银行始终坚持“存款立行”的思想,以“文明优质服务,高效廉洁办行”的宗旨、为客户提供各种优越条件来扩大信贷资金来源,使行、社各项存款始终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10年净增存款11.5亿元。

2. 房山农业银行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农业倾斜”的政策,有效地支持了房山区农业的发展。1984年至1993年末累计发放农业贷款7.2亿元。重点支持了本区“星火计划”“丰收计划”和“米袋子”、“菜篮子”工程的实施和农业科技项目的推广应用以及发展“两高、一优”农业。在支持粮食生产的同时,还积极支持副食品生产和林牧业生产。10年来累计发放贷款2.84亿元,使全区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

3. 发展乡镇企业是农民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房山区的乡镇企业从1983年开始迅猛发展。对全区乡镇企业发展,行、社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和综合的金融服务。10年来累计发放乡镇企业贷款21.8亿元。重点支持了房山区的建材、化工、旅游等行业和市级技术改造项目、国营大中型企业和区重点骨干企业。同时还帮助企业挖掘内部资金潜力,促进了企业上规模上水平,为房山区经济的腾飞奠定了物质基础。

4. 积极支持农村商品流通、保证农副产品收购资金供应。10年来,累计发放商业贷款23.2亿元,支持了农村商品流通和供销社的改革,保证了城乡贸易往来的资金供应,从未出现过向农民打白条现象。

房山农业银行的十年艰辛,成绩是显著的,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和奖励。1987年获全国农金系统企业管理“二级企业”称号;多次荣获中国金融工会、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分行和区委、区政府授予的“文明单位”、“文明优质服务单位”等光荣称号。

(《房山文史资料》第8辑)

作者均系区农行干部

## 全民所有制的良乡公社试点

张本荣 张 珍

在 1958 年的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起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对此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是一场严重破坏农业生产力的运动。然而，对当时北京市委要求周口店区委（房山、良乡两县 1958 年 4 月合并称周口店区，到 1961 年又改称房山县），把刚刚组建起来的良乡人民公社作为创办全民所有制公社的试点的情况，就鲜为人知了。下面就将良乡公社作为创办全民所有制的试点公社的始末，作一简要回顾。

1958 年，房良地区和全国农村一样，充满空想狂热、浮夸和蛮干的气氛。当时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人们认为：生产规模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好，越公越好。因此在实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化后仅仅一年的广大农村，又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良乡地区在 1958 年 8 月底，一哄而起，把相当原良乡半个县的辖区，合并建成一个大公社。规模相当大，共有 119 个行政村、10 多万人口、23 万多亩耕地。公社的领导班子也非常庞大。由张本荣同志任公社党委书记，李顶荣同志任公社主任。副书记、副主任有马良民、罗兰堂、张廷库、许亮等。这是一个熟悉农村工作、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领导班子。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么庞大、繁杂，包罗工、农、商、学、兵多项内容的巨大的农业集体，如何组织群众有秩序的生产、生活，如何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如何分配劳动成果，如何使各行各业正常有效的运转起来，这一系列的新问题都得我们去解决。

良乡公社刚建起一个多月，公社党委为了发动群众，掀起生产高潮，准备开一个五万人的庆祝大会。公社主要干部都分配到各村，组织群众参加大会。正在这时，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这天晚上，周口店区区长曹庶民同志亲自来电话通知，良乡的庆祝大会暂时不要开。市里有重要安排，就是让长阳国营农场与良乡公社合并。因此，需要把庆祝大会推迟召开。因大会的一切准备都已就绪，干部又都已下到村里，公社机关只有书记一人，又正是深夜，已来不及变更了。区委又再次请示市委按计划开会，但市委把合并工作提前了。

1958 年 9 月 20 日，良乡公社召开庆祝大会，长阳农场的领导班子成员如副场长田军、沙明金、周奎选等都出席了大会。区委领导第一书记李明、书记张令德、区长曹庶民等也亲临大会。会前就为与长阳农场合并问题，区委跟张本荣传达了市委指示精神。并在庆祝大会前，将参加大会的干部中的部分人民代表召集到良乡中学礼堂，宣布了中共北京市委关于良乡公社与长阳国营农场合并的决定。全体代表一致通过。尔后，庆祝大会才开始。根据市委和区委的安排，大会报告仍由原良乡公社党委书记张本荣作。原长阳农场党委书记、场长王宗续在大会上讲话。从此，集体所有制的良乡公社与全民所有制的长阳农场，就合二为一了。

合并后的良乡大公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公社的工作仍由原良乡公社的领导班子主持。如公社党委会、生产工作会议、宣传工作会议等，全是原良乡公社的那伙干部参加。原长阳农场的干部，一个也不到良乡来。过了近两个月，市委农村工作部长赵凡带领刘明等同志，到良乡公社重新安排良乡大公社的领导班子。这次明确：良乡大公社由王宗续任党委书记兼社长，张本荣任副书记、副社长。副书记、副社长还有马良民、沙明金、田军、周奎选。大公社的领导班子成员宣布以后，王宗续向赵凡部长提出，良乡公社的规模太大，应当安排两个一把手。赵凡部长当即批驳说，一把手怎能安排两个呢？可让张本荣多负些责任吗！所以，这次班子分工时，把公社的思想政治工作、人事工作等，全分给张本荣来抓。王宗续强调不懂农村工作，因此形成公社的工作主要还是张本荣抓，王宗续主要管农场。

因为全民与集体两种性质的经济实体，不好合在一起。到了1959年春，市委又提出，国营农场和农村集体要分开经营搞生产。从此，原良乡公社和长阳国营农场又重新分为两个独立单位。公社领导班子，又重新做了安排。公社党委书记仍是张本荣，社长改为马良民。

到了1959年11月间，一次区全委会上，李明通知张本荣去长阳农场开会。路上，李明说：还得跟长阳农场一块搞。在长阳农场的会上，赵凡宣布，在良乡公社搞全民所有制的试点。北京市每个区县都搞一个公社。集体向全民过渡的，由市里作一个试办全民所有制公社的方案。最后，赵凡问张本荣，你有什么意见，张说没意见。李明再次叮嘱态度要积极。会后，要搞一系列宣传活动，宣传试办的重大意义。宣传试办全民所有制公社在分配上的政策。分配原则是：承认差别，缩小差别。农村农场的生产，该怎么搞，就怎么搞，不要耽误生产，要把生产搞上去。怎么叫承认差别，缩小差别呢？以安庄村和良乡三街为例，安庄村生产条件差，收入水平低，自己分配人均年收入只有30多元；而三街村生产条件好，收入水平高，人均年收入80多元。全公社算出一个平均收入数字，即人均60元。这样，要限制三街年终分配不要超过60元，而安庄村的30元，可人均分配60元。实际证明，这样的分配原则，多劳不多得，少劳不少得，好坏不分，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形成出工不出力，甚至出现私分瞒产现象。

1961年上半年，中央出了一个“十二条”，提到：试办公社核算的，搞得好的，可以继续搞下去，搞得不好的，可以退回来，改为大队(村)或生产队核算。良乡作为全民所有制试点公社，属北京市委与各区、县委共同抓的试点，中央分管的谭震林直接抓，在中南海亲自听北京市试点公社书记的汇报。这说明良乡这样的试点公社广要退回来不易。“十二条”贯彻后，良乡公社城关管理区副书记刘宗凯给谭震林寄了一封信，提出：良乡公社搞全民所有制，不具备条件，应退回到大队或生产队核算。此信又转到北京市委赵凡那里。赵凡又转给常浦同志。常浦同志让秘书王兴业到良乡座谈听取意见。良乡公社党委找了几位村党支部书记，座谈良乡适合不适合办全民所有制的问题？这些同志本来都是坚决反对搞全民所有制的，但因都害怕挨批，又都一致说办全民所有制好。这下把刘宗凯吓了一跳。我们正为刘宗凯担心时，上边要求“十二条”要普遍传达贯彻。在市委的一次会议上，赵凡讲话时说：“你们良乡的刘宗凯，‘十二条’学得好”。我们的心这才踏实下来，并对赵凡同志是非鲜明的态度，十分钦佩。

在落实“十二条”过程中，北京市各区县搞的全民所有制试点公社到底怎么办？在一次市委召开的全国所有制试点公社书记的汇报会上，当刘仁听到办全民所有制国家投入了不少钱时，批评说：“这是用金钱腐蚀人家。为什么好好的集体所有制非搞全民所有制呢？”接着问王宗续说：你们良乡公社怎么办？当王回答说：我们还在犹豫。刘仁说：“公社是你搞的，不要听别人的，我支持你。”这次汇报会总的精神，是市委农村工作部领导还是要坚持把全民试点公社搞下去。各试点公社的书记怕挨批评，都说“全民”好。会后，赵凡又到良乡召开管理区书记座谈会，多数书记提出：良乡搞“全民”不够条件，影响群众积极性。散会后，又找张令德、张本荣单独谈话。张本荣说：全民所有制是发展方向，但目前的良乡公社规模太大，村与村的差别太大，农村与国营农场的差别太大，不好领导，积极性不好调动。如搞试点，规模应小一点。如果在长阳国营农场周围，收一些农村参加，这样好办一点。市领导当即批评：张本荣你糊涂。

1961年的9、10月间，中央下达了农村工作“六十条”文件。根据“六十条”精神，市委宣传部长张大中和李明，带领市、县委干部在坨里管理区搞调查。根据农村干部和广大农民意见，决定停办全民所有制公社。长阳国营农场，仍独立办场。把良乡大公社改建良乡工委。由吕永珍任良乡工委书记，张本荣、李元宝(市下放干部)、吕镒任副书记。把良乡大公社下属的七个管理区改建为七个小公社。它们是：坨里公社，崇各庄公社，葫芦堡公社，官道公社，大紫草坞公社，良乡公社，长阳国营农场。这些小公社都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到了生产队。至此，长达三年时间的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试点宣告结束了。

# 房山滑石的开采

潘惠楼

房山矿产资源丰富，种类繁多，滑石即是其中的一种。滑石，通常是由含镁的岩石变质而成，为单斜晶系，常呈片状、鳞片状或致密块状集合体。颜色多为绿色或白色，象玻璃光泽。

房山滑石产地，主要在周口店以西的黄山店一带。其中黄山店最为集中，涑利水、黄元寺、四马沟等地亦有蕴藏。据原小矿区 1955 年春调查勘测：黄山店村滑石资源分布在两处，一是以村北北沟山为中心，向西南延长约 2 华里，向东接黄道沟，绵延十余里，断续蕴藏。另一处是以黄道沟为中心，向东约 15 华里，向南约 5 华里，向北约 5 华里，藏量非常丰富。涑利水村滑石藏于村东拦羊树梁，向东约 3 华里，向西约 1.5 华里，向南约 8 华里，藏量比较丰富。黄元寺村滑石分布在小栈沟，向东约 5 华里，向北约 1 华里。四马沟也有蕴藏。

房山滑石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即已发现。民国初年，在编写我国第一部地质专业志书——《西山地质志》的过程中，中外地质学家曾对房山地质做过广泛调查。三十年代，黄山店店主赵宽曾出资进行滑石开采，雇工 10 余人，陆续挖掘一年，产量约 200 吨。销往北平城内，主要供应化妆行业，用以做爽身原料，制造扑粉、香粉、痱子粉。1937 年日本侵略军占据房山之后，对房山矿产资源进行调查，尤其对龙骨山一带地质关注。时有一日本商人玉井常驻周口店，发现滑石，遂在周口店设点收购。玉井从黄山店店主赵宽手中，购买滑石 200 吨，转售北平。那时房山滑石生产只能是时采时停，生产规模无法扩大。至新中国前夕，滑石生产已奄奄一息。

新中国建立后，大力开展副业生产，发动农民找矿、献矿。房山滑石生产开始扩大规模。涑利水村和黄元寺村先后成立互助组，进行滑石生产。当年涑利水村产滑石 129 吨，黄元寺村产滑石 60 吨。在村里产地交货，每吨可售价 12~13 元，用户为北京的化工厂，由厂方组织收购运输。但因滑石质地太软，油性较小，两地遂于 1951 年停产。1951 年，黄山店民众也组织起生产合作社，再次生产滑石，当年产量 50 吨，运到北京的化工厂，每吨售价达到 132.50 元。1952 年年产滑石达到 500 吨，每吨 28.50 元。

同年 8 月，房山西部山区大部分划入京西矿区。对开发矿业资源尤为重视，并设置矿务科专门管理矿业，帮助指导生产和销售。1953 年，矿区政府成立工农业生产服务推销处，推销京西矿产，为滑石开辟了新的用户。当年黄山店滑石产量猛增到 700 吨，运到厂内，每吨售价 27.30 元。1954 年，京西矿区政府开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化运动，在黄山店成立了滑石生产社，增加了滑石生产的投入，将滑石生产开发列入了发展计划，明确由京西矿区生产合作社联合推销处周口店办事处负责经营销售。当年黄山店滑石生产猛跃到 6200 吨，销出 5940 吨。从产地至周口店火车站用人力背运和马车运输。从周口店火车站向厂家交货，每吨售价约 20 元。产品主要用户为国营华北郑州制药厂和北京、天津的化工厂。滑石销量的 90% 为国营工厂用，另 10% 为私营化工厂用。1954 年 11 月，涑利水和黄元寺也组织成立了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分别恢复了已停止 3 年的滑石生产。当年涑利水产滑石 103 吨，黄元寺产滑石 30 吨，均到周口店火车站交货，由矿区生产联合推销处周口店办事处推销。到 1955 年初，房山滑石生产分布于黄山店、涑利水、黄元寺三个村庄所在地。

至 1955 年，房山滑石的生产方法均为土法人工开采。其生产过程为：打眼——放炮——支柱——背运

出矿洞——倾倒堆放场——加工粉碎过筛分选——装袋——运出销售。产品分为绿白色、纯白色和乌白色三种。绿白、纯白块状柔脆者为上品，乌白色和夹有石心(如石灰石、黑石、黄石、马牙石、白石等)的为次品。房山所产滑石，通常绿白色占10%，纯白色占30%，乌白色占60%。绿白色滑石多产于黄山店，纯白色多产于涞利水，乌白色则三地都有。运出装袋时采用混合装袋，袋由买方负责，一般为单层麻袋，每袋重100公斤。随着工业的发展，滑石在我国已大量用于造纸和橡胶等行业。中医用于主治清热、利湿、小便淋伤热痛、暑热烦渴、利泻等疾病。化妆业的爽身粉、痱子粉等已把滑石做为主要原料。

房山所有滑石生产矿井，均为季节性生产，7~8月因矿井水大停产，进入9月雨渐少但农业正忙只能生产半月。1956年国家矿产资源政策进行调整，集体矿业生产单位并入国营，私营矿窑关闭。1958年京西矿区政府撤销，房山滑石生产随之停止。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 长沟峪旧煤窑记事

侯国智

### 长沟峪旧煤窑的分布

清乾隆以前，周口店以北的长沟峪这条由西南倾向西北的山沟里发现了煤。并向西北延伸到杨家大岭之后，直到南窖村，由公家(称“公本”)和私人(称“私茬”)开出大大小小百十家小煤窑。

有个叫肖左臣的人，家有五个儿子。他五儿子也在别人的窑上卖苦力。一天，他到自家地里摘豆角，发现地阶根有一小堆煤末儿。用手一掏，原来是个耗子打的洞口。他惊呆了：“我地底下也能开煤窑?!”于是他飞跑到家，招呼四个哥哥都来到现场，用黑枣树做两对柱子，一夜挖出一万多斤煤末。当时一万斤煤能卖十块大洋，买两石(约320斤)米。他们给窑起个名字叫“耗子窑”(耗子被称为窑神爷。在井下偷吃矿工的干粮，矿工不敢打他。每当窑里要出事时，耗子吱吱乱叫乱跑，给矿工发出警告。)

小煤窑鼎盛时期，驮煤的骆驼大约有一千五百峰，成“把儿”的骡子(每“把儿”七头)不计其数。周口店地区的商业，沾灰煤窑的光，也十分繁荣兴旺。

这一地区的煤窑，以杨家大岭为界，长沟峪在岭前(西南)。岭后头有庙儿鞍，经小折洛、大折洛到绛蓬山。爬半坡肋到蔡氏鞍，其间有个小饭铺。蔡氏鞍俗称冷风口，风特大。就是六月天，驮煤的牲口走到这里也让风吹的打转转。由蔡氏鞍往上到小岭，过了小岭山沟向西直通南窖村。南窖早年有运煤的高线斗子(缆车)把煤运出来。

### 长沟峪煤的概况

老窑工讲：“天下煤十三层”。这里煤层的走向是从西向东酌。十三层也叫十三槽。槽分垂直方向槽，水平方向的卧槽，卧槽也叫天棚地盖。也有斜槽，俗称侧棱坡。

对糟邦的分类的说法是：铜锣邦、火石邦、糟邦。铜锣邦最硬，特别难打通。当时打出一“帽头”子石渣，给一帽子头制钱。火石邦先得用火烧，加热之后好打。糟邦用镐就刨得开。

长沟峪的煤也有好几种。见下表：

	煤的名称	形 状	性 能	产 地
1	大炉子	象大盐粒	爱爆、火头儿好	东水泉大李家窑
2	二炉子	象小麻籽	爱爆、火头儿好	东水泉
3	小炉子	象肝禾叶儿带亮皮儿	较 软	东水泉
4	鱼儿溜		质 次	
5	蚂蚁酥	白 煤		二李家上、中、下坑儿窑， 粟子树窑
6	红煤	煤上带红色条纹	最好，发热量大，大 红儿旺，红灰到头	康沟儿红煤槽（靠南窑村）
7	青煤蛋子	色发青	软煤，不耐烧，发热少	大营窝 石板枰

## 采法与工具

小窑有“背门子”和“拉门子”的区别。

“背门子”是用口袋、篓子或“叉(chǎ)子”（一种用荆条编的类似簸箕样的浅筐）做运煤的工具。“拉门子”是把筐做运煤的工具。把筐放在筐床上。筐床是一马蹄铁形木制工具，上面有“筐脐”与筐相联接，两侧的下面钉装两片铁皮，以减少与梯架的摩擦。然后用七股线麻拧成的绳子做套，两端分别套在筐与人的肩膀上，由人把煤拉到矿井上来。

背煤工人的“三件宝”是：窑灯、窑帽、刮汗板。拉煤工人的“三件宝”是：披肩、窑套、屁股帘。

矿工一般不穿衣服下窑，所以得弄披肩、屁股帘护一护身体。有的矿工，十三年没穿过一双鞋，脚掌子跟骆驼蹄子似的。

窑灯开始是锡制的，有一斤多重，压在脑袋上太沉，后改成洋铁皮焊的。它由灯身、灯嘴、灯盖、灯耳、镊子与固定在头上用的带子组成。这老式的灯，点豆油，不亮。后来改用电石灯，比过去亮了。但也有崩瞎眼的。买一盏电石灯，要花两三斗老棒子（约合四十多斤玉米）。

矿井中的巷道是用圆木支撑的，有梁、有柱。柱子俗称窑桩。斜巷、竖巷就着用着梯子了。每架梯子五尺五寸长。有时巷道连用一百多架梯子。从井口往下看黑古隆咚，深不见底，特别瘆人。

## 煤窑的组织系统

旧时小煤窑，管理十分严厉，内部系统如下：



面锅，相当现在的伙房，因为山区缺水，所以还得设专门人去背水。

总管，相当后勤和对外招工部门。

柜房，相当财务科。正笔管先生记“鞭子账”（总账），花名账先生记矿工背煤的遭数与每遭的份量，以便给工人发放工钱。

场子，相当销售科，负责卖煤的过称记数，报给正笔管先生算帐收款。打更的是保卫煤场的。拉先的是收拾煤场并帮买煤的人抬煤口袋上驮的。木匠做一切木工活，管理木料，因为窑里要用大量的木头做巷道支撑，当时也有用木头换煤的主顾。

伙计，是管矿工与直接采煤生产的。里秤给背上来的煤过秤。那个地方叫“八道”，所以称八道头儿，克扣工人是他的本职，十分霸道，一点理不讲。头儿是监督下井工人干活的，就是工头。看班的管大屋子和关门屋子工人的起居作息，催逼工人下井，就是“拿摩温”一类的人。看边的是管自己窑与别家窑的关系的，他们有时带着武器，防止别的窑偷采自己窑的煤，是资本家的看家狗。斧子手是管巷道木架组装的。水工是往出掏水的。而矿工是背煤拉煤的苦力，他们是“吃阳家饭，干阴间活”，混身上一抹黑，被人蔑称“窑煤黑子”。

## 矿工的工作与生活

在旧社会，长沟峪的附近贫苦农民，在农闲时多到煤窑去背煤，俗称“走窑”。

想走窑的人，先要去柜房间要不要你：“头儿，问问苦！”

柜房的人看你骨瘦如柴、面黄体弱不愿意要你，就说：“下不去了，转个家儿吧。”就把你打发走了。

如果看上你了，就说：“抹牌去吧。”就是让你去面柜领打饭的小牌牌，批准你下窑。

面柜把粮食的斤两刻在小木牌上。一斤一道，半斤两道，十二两三道（十六两制）。你拿多少牌，有人下账，等你背煤挣钱后算还。

一般矿工住在大屋子里，“对面笑”的大火炕，脚对脚地睡。炕上那脏劲就甭提了：一滑拉就一掏煤末子和烂土。人多得都“白菜帮儿”睡。来新人，得由看屋子的头儿用脚蹬墙硬挤出个窝窝来。屋里臭味更甭说了，因此常闹“窝子病”（即传染病）。

背门子的巷道特陡，有的“弧”（陡坡）一百多架梯子，人肩上背百八十斤的煤要一步一步爬上来，那汗流浹背可是一点也不假。身上的汗随它流去，可脸上的汗流到眼里看不清方向怎么行？只能用刮汗板去刮了。

有的煤层特别薄，人钻到里边连身子也转不过个儿来。赶上在这地方挖煤，得两个人合作，一个人钻进去，拉进去一只铁匣子，装满煤由另一个人拉铁匣子那边那条绳子拉出去，把煤倒在篓子里，这样拉来拉去装满两篓子，再背出去。

有时放炮也不通知，震得煤粉飞得哪儿都是，呛得人出不了气儿。有不少人干几年就又咳又喘，得了矽肺病。有时放炮把灯震灭了，什么也看不见，只能等别人来了对上火再走。

有时窑里塌方，矿工被夹了“馅饼”。有时崩水，把人淹死、憋死。日本人来那年，兴宝煤矿崩水，一下淹死七十二口子人。

窑里一出事，头儿就把花名账烧了，让你死无招对。花名账上只写名子，不写姓，也不注明籍贯，就是防备出事给窑头赖账方便。如果苦主儿不依不饶，最多给十块现洋，一具“狗碰头”棺材了事。矿工每天要爬完一定的遭数，干出一定的定额，才准下班吃饭。里秤负责在八道口过秤。秤有两种，一是磅秤，一公斤算一市斤。杆秤也叫麻毫秤，“对双加八一撇达”，二百八十斤算一百斤。其实到底是多少，就凭里秤那一嗓子吆喝！说多少是多少，不准提出任何异议或表示不满，否则就会招来一顿臭揍！每个班还要扣伙煤30斤，实际是六十斤。十三、四岁的孩子来背煤，背一遭儿还不够扣伙煤的哪！有的工头还故意让孩子去老窑里找篓子找筐什么的。进了乱七八糟的旧巷道，找不着回来的道儿。

## 关门屋子

到每年九月庙，口西总管就去张家口外怀来或延庆、沙城招工。实际是放高利贷，诓人来做苦工。谁使了他的钱，就等于卖给了窑上。招工时说得特别好听：“一坐去小车儿，上来拉把煤儿，吃大米白面猪屁股蛋儿”！实际是下窑坐窑筐，还得带根七尺左右长的圆木，以便做窑桩用。在当地活不下去的人被骗到窑上，立即被扒光衣服，塞进关门屋子，由火头儿看看，逼着你下井。头三天不着炕累死累活地干也完不成定额，又打又骂先杀杀你的威风。

有人想省吃俭用快点还了“阎王债”，早点跳出火炕，面锅就故意给你做好的吃，多记伙钱。你要不吃，把菜饭倒在泔水缸里，照旧记在你的账上。

有的矿工病了，干不了活儿，窑上不养“大爷”，病人拖出去扔在荒山沟里去喂狼、喂狗。长沟峪的狗吃死人吃得红了眼，见了人就呲牙！我本家有个叫侯老强儿的长辈人，就因为吃了招工的人一斤切糕，被送进关门屋子。后来实在干不了那里的活儿，跑出来饿死在琉璃河的杨家场房里。

## 窑头与县官

开窑的都肥了。肖家、李家、刘家那时一家开十几口窑，洋钱叽里咕鲁往他们家里滚。

李家阔的时候，大作活、小作活、奶妈、丫头，呼奴唤婢。出来走道儿迈方步，年轻的出来也拄个“文明棍儿”。李化南娶了三个老婆，洋钱在屋里堆成金山银山。

窑头肥了，县太爷也阔了。逢年过节，或借个什么因由儿，窑头就成百动千地给他饷钱。七七事变前东

北籍的一个王县长：在家花一万大洋买的官，在房山干了三年，净赚三、四万块大洋钱。

矿工别跟窑头打官司，那是孔夫子搬家——尽是书(输)。窑头跟窑头打官司，县长来了先封窑，谁腰粗给他饷的钱多谁赢。那是“衙门口儿朝南开，不给洋钱输了活该”。

### 工人的反抗

矿工吃不饱，有抗面锅的；“完不成定额”，有抗里秤的。

窑头最怕矿工“坐皇上”。一次为抗里秤，工人把窑里梯子掀翻了，以伙计做人质，占领矿井，不准任何人下井背煤，窑头最后吃不住劲了，认了输，服了软，让里秤卷铺盖滚了蛋，矿井才恢复了生产。后来才知道，这是八路的地下工作者领着工人们干的。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作者系原燕化集团公司动力厂技校高级讲师

## 关于工会工作的回忆

杜绍文

我从1953年9月至1964年底一直在房山县总工会工作。在这十年中，对工会工作的任务、作用和特点，经过了一个从不明确到明确，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1958年前房山工会工作的对象主要是商业、服务业、企业和文教卫生事业单位的职工，工矿企业只有周口店煤矿、石灰厂和房山装卸队，多数都是季节性的临时工。当时工会工作列不到县委的工作议事日程，也不被各方面重视，我自己也总觉得有劲使不上，曾一度思想上很苦闷，总希望有机会调做其它工作。

1958年房山划为北京市后，市内的一些中小型工业企业下迁到房山为区属企业，有些在房山境内的市属工业企业的党群工作划为房山区属地领导，同时区办工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全区有近三十个工业企业建立了工会组织，工会会员近万人。商业、服务业企业以及文教、卫生事业发展也很快，也有百余单位建立了工会组织，工会会员也达近万人，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在这种形势下，党对作为工人阶级群众性组织工会的地位、作用的要求随之也就提高了。我对工会工作的认识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通过对工会工作方针、任务和历史地位、作用的理论学习，也有了一定的提高，认识到工会工作是党的一项不可缺少的重要工作，从而思想稳定了，提高了做好工会工作的兴趣和信心，以及钻研如何做好工会工作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主动配合政府和企业行政，广泛深入地发动职工群众，全面地开展各项活动，使整个工会工作形成了一种轰轰烈烈的局面。在北京市十个远郊区、县中房山的工会工作同其它方面的工作一样，始终处于领先地位。1963年房山做为北京市远郊区、县的代表出席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京召开的全国县、镇工会工作座谈会，并重点发言。回忆这十年的岁月，主要有如下几点体会，值得怀念。

## 自觉地做一个忠实的合作者

1956年，进入了全面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工会工作的重点也应从以阶级斗争，监督资本主义工商业遵守国家政策、法令，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为重点转向到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当时我的思想认识并没有跟上形势发展的变化。一是工会同企业行政的关系没有从过去单一的监督作用转到在党的领导下，会同企业行政办好企业，发展生产，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方面来，因而同企业行政的关系有时还比较紧张。通过深入学习党的八大政治报告，逐渐的认识到全党的工作中心转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做为党的助手和人民政权的支柱，社会主义企业工会组织的任务同样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会同企业行政搞好生产，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各项经济计划指标，则是工会组织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工会怎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作用，还是个难题。不少工会干部说，安排生产计划、企业管理行政全办了，工会无从插手，有劲使不上。

经过一段学习和实践，使我逐渐认识到工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生产，不是代替企业行政，抓行政事务，而是应主动协同企业行政，做好对职工群众的组织发动工作，抓好典型引路。并且通过学习和典型经验的宣传，把这个认识变成了广大工会干部的共识。从而大家做好工会工作的积极性高了，工作顺劲了，信心增强了。全县各级工会组织都能自觉地积极配合政府和企业行政，广泛深入地发动职工群众开展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以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各项经济计划指标。

在竞赛中工会主要抓好两项工作，一是协同企业行政组织发动职工层层讨论制定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措施和竞赛条件，并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加企业管理，特别班组管理。在工业企业中主要是以不断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为中心内容；在商业、服务企业中主要是以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方便群众，支持工、农业生产，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损耗为中心内容。二是会同企业行政部门，抓好典型，总结经验，树立样板，做到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在竞赛中每年都涌现出很多先进集体和先进职工。为了大力表彰先进，推广先进经验，不断地把先进水平变为社会水平，县委、县政府每年都要召开一次英模盛会。为开好每年的英模盛会，工会做为会议筹备的主办单位，会前积极协调各企业主管部门，认真地做好评比和典型经验的总结工作，会后做好大会精神的宣传贯彻和先进经验的推广工作，以把先进水平尽快地变为社会水平，使先进更上一层楼，先进更先进。从而保证了我县工业企业和商业、服务业企业各项经济指标年年超额完成。当年影响最大的有两个典型。一是《背篓商店》王砚香，长年带领职工坚持背篓上山，把群众所需要的吃、穿、用的商品和农业生产资料都及时的送到家门，把山上群众所要出售的农、副产品包括重量一百多公斤的生猪都在家门收购背下山来，无论是寒冬、酷暑从不间断。使居住在黄山店地区山上的农民群众购买和出售商业物资都不用下山，在家门口全都办了，极大的方便了群众，支持了农业生产，深受山区人民的欢迎和称赞，人们都称他们是农业生产的好后勤。二是人称“铁脚板”的邮递员任成水，十五年如一日，坚持在山区做邮递员，走遍了房山西北部山区的大、小村庄，不分寒冬、酷暑，坚持把一封封信件和一个个包裹及时送到山区乡亲们的手中。深受山区人民的称赞。他们的先进事迹不仅在房山县引起极大的反响，而且在北京市也引起很大的轰动。特别是1964年他们在北京市召开的五好职工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多次引起全场热烈掌声，会后市级各系统纷纷请他们去做报告。1965年被拍成了《背篓商店》和《红色邮路》两部电影片，1966年在全国各地放映。

### 充分发挥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

在工会工作中,充分发动各级工会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积极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把思想政治教育同生产、文娱、体育等各项活动溶为一体结合起来进行。不断地向职工群众灌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提高共产主义政治思想觉悟,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增长建设社会主义的才干。

当时开展活动的主要形式,一是经常通过工会会员大会和工会小组会进行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历史使命的教育,从而不断提高广大工会会员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忘我劳动的积极性、自觉性和主人翁责任感。二是开办职工业余学校,学文化、学政治、学管理、学技术,从而不断地提高了职工的文化、政治思想、技术水平和企业管理素质。有不少人成了企业管理特别是班组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骨干,有些人被群众称为红管家、技术革新能手。三是广泛的开展文化体育活动,把思想政治教育寓于文体活动之中。首先充分发挥电影放映的教育作用。县工会俱乐部的两部电影放映机,一部坚持在阵地经常放映,一部坚持长年深入基层巡回放映,很受广大基层干部、职工的欢迎。其二,经常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全县有百余个职工篮球队和乒乓球队长年坚持活动,平时主要是在本单位进行活动或附近单位之间相互邀请进行友谊比赛活动。县工会每年都要举办一至二次全县范围的篮球、乒乓球竞赛活动,以推动全县职工体育活动的持续发展。同时县职工篮球代表队还经常去外区县进行友谊赛,国家的男、女篮球队均被邀来我县进行友谊表演赛,极大的丰富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当时县职工俱乐部的设施虽然很简陋但很活跃,每天都吸引着不少人参加活动,特别是休息日参加活动的人都在千人以上。有些较大的基层单位的俱乐部不仅有电影、体育等项活动,而且还有业余文艺演出队,自编自演本单位的先进事迹、先进人物。有的还时常参加县里组织的汇演或调演。实践证明这些活动切实起到了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从而更加提高了广大工会干部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群众活动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 充分发挥好党联系工人群众的桥梁作用

工会是党领导下无产阶级群众性的阶级组织。密切联系群众是工会组织的性质所决定的。多年群众工作经验,使我逐渐的深刻认识到,发挥好工会作为党联系职工的桥梁作用,关键是要真正地了解群众,切实的关心群众,能够向职工群众掏出心里话,动真情,使职工群众信任工会,他们心里有话愿意跟工会讲,有困难愿意找工会帮。因此,为更好地发挥党联系工人群众的桥梁作用和人民政权的支柱作用,各级工会组织时刻都注意了解职工群众的思想情绪,倾听群众的各种不同意见。对职工群众的正确意见、合理的要求,要认真准确的向党、政领导上反映,以求得及时合理的解决,维护职工的正当权益。对于那些片面的不合理的意见要求,则进行耐心的说服,讲清道理,从正面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从而不断地化解职工群众与领导之间的各种矛盾,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在及时掌握职工思想动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做为工人之家的工会组织还要特别注意关心职工群众的生活情况。除在单位工作中注意观察职工的情绪,发现问题及时给予解决外,很多基层工会干部还坚持利用公休日走访职工家庭。对于哪个职工家庭有病人,哪个职工经济上有困难,哪个职工住的是危房等等了如指掌。根据掌握的情况,会同企业行政共同研究解决。对于那些长期经济生活上有困难的职工给予定期性的经济补助,对于那些临时有困难的职工则根据不同情况给予帮助,对暂时经济有困难的职工就给予一次性的经济补助。有的职工无力修理危房就干部带头发动大家群策群力帮助把房修好,对于家有病人无人护理的家庭就发动职工家属发扬阶级友爱的精神帮助看护病人等等,以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安心生产。被群众称为职工贴心人的大韩继铸锅厂的工会生活委员陈润芝,当生活委员多年如一日,几乎所有公休假日都用于走访职工家庭或亲自帮助

职工解决各种各样的困难。正是有这样的一批工会积极分子，经常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职工家庭，使广大职工深受感动。很多职工激动的一再表示，一定要用努力工作，用搞好生产的实际行动报答党和领导的关怀。

## 充分发挥好广大工会积极分子的作用

工会工作面广而复杂，上至国家大事，下至职工群众家庭生活中的琐事，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全县专职的工会干部只有三十余人，而不脱离生产的工会工作积极分子有近二千人。他们同广大职工和家属朝夕相处，最贴近生活，最了解群众。因此，依靠广大工会积极分子是很好的完成党交给工会各项工作任务保证，同时也是党和工会联系职工群众的基础。对于工会积极分子的这些特点和作用，开始我思想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总是在增加专职工会干部上做文章，结果是此路不通。经过较长一段时间摸索和外地经验的启发，才逐渐认识到积极分子在工会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而才把精力转到怎样更好地发挥工会积极分子的作用方面来。同时在实践中使我逐渐认识到，能否调动起广大基层工会干部积极性的关键是活动的内容和工作的要求是否符合客观要求和职工群众的利益，凡是符合的都能得到全力的支持，吸引更多的人参与，他们便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工会的各项活动，把各项工作做的有声有色。县工会俱乐部仅有五名专职人员，每天放映电影、图书借阅、文艺、体育活动等大量的具体工作，同样也都是靠那些只尽义务、不取报酬的积极分子去完成的。

积多年来的社会实践经验，使我体会到一条最基本的规律是思想认识转变之时就是工作局面转变之日。世就是说只有思想认识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工作起来才能得心应手，得到各方面的响应和全力支持，形成轰轰烈烈的局面。否则将一事无成，只能是苦于无效劳动之中，碌碌无为。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作者系原区乡镇企业经委督导员

## 房良两县工商联的建立

王硕儒

建国后，随着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房山县在城关、长沟、张坊、韩继等镇，良乡县在城关、琉璃河、窦店等镇，先后组建了基层工商联、工商业小组或摊贩委员会（简称摊委会），成为各镇（地区）私营工商业者联合的人民团体。

1952年19月，在基层组织普遍建立的基础上，房、良两县开始筹建县工商联。由国营、合作社营企业和各基层工商联、小组或摊委会负责人联合建立县工商联筹备委员会。在县委统战部门和县政府工商部门的协助下，筹委会负责起草县工商联的组织章程，对全县工商业进行调查（通过调查，房山县共有私营工商业884户，从业人员1128名），决定县工商联会员代表名额及产生办法（房山县定为7户工商业推选代表1名，90名摊贩推选代表1名，国营、合作社营企业由单位推选），召开代表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截止12月中

旬，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完成。

1952年12月16至19日，良乡县召开首届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59名，正式建立良乡县工商业联合会。大会选举出良乡县工商联执行委员会委员15名，张纯实当选为主任委员，许亮、胡春波当选为副主任委员，在琉璃河、窦店等镇设分会或办事处。

1953年1月25日，房山县召开首届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5名，正式建立房山县工商业联合会，大会选举出房山县工商联执行委员会委员13名，王蔚生当选为主任委员，穆林山当选为副主任委员，吕敏、李兆祥、王质彬、李雅三、孟宪章、蔡增田、周宗有、郑玉森、梅廷章、张世永、薛龙当选为委员。其中常务委员7名。大会选举出工商联监察委员会委员3名，其中主任委员1名，委员2名。在常务委员会议上，决定县工商联驻会委员王蔚生，设秘书1名，干事1名。在长沟设分会，在张坊、大韩继两镇设办事处，作为县工商联的派出机构。

为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适应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3月1日至5日，良乡县工商联召开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出席代表62名，其中国营企业代表17名，私营企业代表45名，大会选举出良乡县工商联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15名。同年3月20日，房山县工商联召开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出席代表41名，李雅三委员传达河北省工商联会议精神，选举出房山县工商联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13名，王蔚生经选举连任主任委员，隗永高任副主任委员。

在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协助共产党整风前提下，于1957年5月，房、良两县分别召开工商联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房山县工商联会员代表增至61名，选举出李雅三为三届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良乡县工商联会员代表增至72名，选举出胡春波为三届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1958年4月，原河北省房山县、良乡县工商联合并为北京市周口店区工商联，李雅三任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

1958年10月20日至24日，在全民大跃进的形势下，周口店区工商联合会召开第四届(依房、良县届次排列)会员代表大会，应出席代表91名(其中国营企业代表15名，合营商业、服务业代表48名，店外生产厂家代表17名，小商贩代表6名，家属代表3名，过渡人员代表2名)，实际出席代表60名。大会主要议题是：总结工商联的工作，确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加速私营工商业者自我改造的任务。大会选举出工商联第四届执行委员会委员27名，李雅三任主任委员，杨景秀、赵引斋任副主任委员。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出常务委员会委员9名，即李雅三、杨景秀、赵引斋、高树森、王蔚生、冯卓如、郑述春、李述林、李兆祥。

1960年2月，周口店区建制撤销，更名为房山县。周口店区工商联随之更名为房山县工商联。1962年，为了继续贯彻党对工商界的和平改造政策，充分调动工商业者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于同年2月14至15日召开了房山县工商联第五届(依周口店区届次排列)会员代表大会。出席代表95名，其中国营及公私合营企业公方代表14名，工商业者代表58名，家属代表3名。在工商业者代表中，含少数民族代表3名，民主党派(民建会员)代表2名，妇女代表6名。大会选举出五届执行委员会委员29名。在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出常务委员会委员10名，李雅三任主任委员，杨景秀、赵引斋、王蔚生、李铸山任副主任委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房山县工商业联合会的工作被迫停止。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 房山第一个水泥厂的建立

付奎荣 口述 栗景鸿 整理

1958年6月，房、良两县与京西矿区合并为周口店区后，区委书记处书记张令德找到我，告诉我由于工作变动，准备安排我去负责周口店水泥厂的生产工作。既然是组织安排，我就同意了，被周口店区委任命为周口店水泥厂书记。

这个水泥厂是个旧厂子，厂长是翟元泰。原属京西矿区管辖，有一百多人，机器设备简陋，只有一台烘干机，一台提升机和一台磨。当时由瓦井村一辆拖拉机供应生产原料——当地的一种“红土子”，生产无熟料水泥。生产运转不很正常，缺少技术力量，每月生产二、三百吨200号水泥。

我来水泥厂后，首先摸清了情况。然后找到区地方工业局顾宪图局长和工业办的隗永高，申请增加技术人员和机器设备。

为了尽快恢复水泥厂的正常生产，提高水泥生产的质量，我又找到中国水泥研究院，将厂里原有的1日式烘干窑进行了改进。由于经验不足，两个月后生产出的水泥被窰店砖瓦厂使用后出现质量问题。但我并没有灰心，下决心要搞出高标准水泥来。

不久，周口店区委书记李明带着北京电子研究所第十所主任李铁来到厂子，询问生产进展如何。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主要是资金不足，困难不小。李铁对我说，我们都搞工业，好好干，有困难找他。

第三天，我来到北京电子研究所第十所（地址在酒仙桥），找到李铁，提出了厂子的主要困难就是资金问题，想请他给解决一下。李铁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当即找来财务和基建两处处长，商定借给周口店水泥厂五万元，用于解决水泥厂的困难。五万元，在当时，可是个不小的数字，对于我们这个水泥厂来说，确实是解了燃眉之急。

我当时真是又高兴又激动，与李铁告别后，当天就返回了房山。

资金问题解决了，我又带着厂技术员张凤军（山东潍坊人）四处取经，学习全市有关水泥厂的先进生产经验。如去市农展馆附近的幸福村水泥厂参观、学习；到琉璃河水泥厂，请来那里的职工家属来周口店水泥厂帮助生产。之后，又建起了厂里第一座1.2米高的立窑，并因地制宜，想方设法改造旧设备，降低生产成本。例如，将一台压面条机改装成了粉碎机，皮带运输机的轮子是用木头“车”成的。全厂职工也不分黑天、白天，成天奋战在车间。

到1959年秋，周口店水泥厂终于生产了高质量的水泥，水泥标号为400号，每天能生产水泥70吨，年产3万多吨。生产的水泥被广泛用于全市各区县的农田和水利各项建设当中。周口店水泥厂很快就在全市出了名，各区县有关单位纷纷来周口店参观学习。1961年春，北京市副市长、计委主任王纯也来到周口店水泥厂视察工作，对水泥厂的生产表示满意。

1961年10月，周口店水泥厂响应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号召，与北京市水泥厂（南大荒水泥厂）合并。12月，该厂停止水泥生产，转为矿石生产。纵观周口店水泥厂从建厂到停产期间，为全市各区县各方面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培养出了一批技术骨干，为以后再建水泥厂打下了基础。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 房山县交通管理部门的初期发展

孙寿郃

1958年,房山县(当时为周口店区),有机动车的单位5个,机动车14辆,驾驶员18名。当时,市属各区、县都相继建立了交通管理组织,周口店区的车务管理尚由芦沟桥交通中队代管。8月1日,公安分局给治安科的庞云富、丁尚文两位同志配备一辆日本造自行车,责成他们分管交通管理工作。至于都管什么,怎么管,上至局领导下到他们俩都不太清楚。当天下午他们俩就到我区第一条柏油路——京周路上值勤。这时正有市运八场的一辆货车驶来,庞云富伸手拦车,司机从车上下来问:“民警同志,有什么事?”庞云富心里打鼓,脸通红,不知如何查问。丁尚文忙说:“没事”。司机笑着说:“真没事我就走了。”这就是最初的交通管理状况。

1959年,市公安局任命十一处分管交通管理工作,要求各区县建立相应组织。周口店公安局在治安科下设交通班。班长是牛福金,宣传警是张风元,值勤民警有王殿甲、庞云富、蒋世良、隗福堂。随后十一处还派来了民警李如勤指导业务。李如勤带着张风元到芦沟桥交通队接管了车务手续。经过走访酝酿,6月建立了周口店区第一个机动车管理指导组。组长是宣传民警张风元,组员有窦店砖瓦厂的张殿明、良乡机场的吴殿全、良乡修造厂的李德全、房山煤矿的马春尚。

1960年2月,周口店区改称房山县。全县有车单位增至26个,机动车增至176台,驾驶员增至188名。春天,县政府抽调民警下乡工作造成警力不足,而且交通班没有给指导组以必要的业务指导。致使1—3月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高达10人,受到市局和十一处的批评。4月份,针对交通班警力不足的问题,县局决定成立交通队,编制为科级。将消防队战士扩充到交通队,定编为27人,但当时只扩至21人。田生田任队长,队部设在北门内路西一四合院内,共有10间房。另有民警借住良乡养路队道班和四〇一所。装备也有了很大改善,社会单位借给队里一辆K58型二轮摩托车。县局给每个交通警配备了一辆飞鸽加重自行车。

4月初,市安委会成立,要求各区县也必须建立相应的安全组织。田生田和县局主管副局长杜丰杰向副县长刘增勤汇报了市安委会会议精神。4月10日,刘增勤在县局主持召开了房山县安委会成立大会。主任是刘增勤,副主任杜丰杰。办公室设在交通队,主任是田生田。委员有良乡修造厂的刘应元,交通局的付英,市运十一场的张文俊,四〇一所的恒水清。对房山机动车指导组也加强了领导,由交通队长直接抓,组员增加了四〇一所的蔡复周。指导组定期组织年审、年检和安全竞赛活动。由于3月份后狠抓了组织、制度建设,压住了事故上升的势头。后九个月仅亡2人。全年事故情况是发生70次、伤61人、亡12人(1958年发生交通事故37次,伤27人、亡10人;1959年发生交通事故18次,伤12人,亡6人)。

1961年,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许多民警自愿离队回家,交通队只剩下10多位民警。6月底,十一处派苑志同志来队指导工作。他提出要搞“警民协作路”活动,发动沿路公社的力量压事故。“协作路”成员有城关公社的邢士龙、周口店公社的常荣、紫草坞公社的殷友树、良乡公社的安付、长阳公社的温庆仁。“警民协作路”活动规定以公社为单位,每月搞两次例会学习,每季进行一次考核,年终搞一次评比。1961年房山县发生交通事故252次,伤71人,亡7人。比1960年少亡5人。年底,苑志被调回市里。他在这一年的工作中出了不少好点子。由于经济困难,这一年房山县的车辆和驾驶员几乎没有增长。

1962年,我县机动车增到239辆,驾驶员增到258名,还出现了16名非职业性驾驶员。有车单位增到

36个，边远山区如霞云岭进了一辆嘎斯货车，蒲洼有了一辆解放牌大货车。但经济困难仍然很严重，分局局长批款权限是20元，副局长是5元。交通队的二轮摩托坏了没钱修，最后是十一场的张文俊把摩托车拉到他那儿免费修理，才保证了交通队唯一的机动车的运转。

在宣传方面，选出了上年突出的单位介绍经验。这些单位是周口店大队、大董村大队和顾册耐火材料厂。这个活动调动了基层单位的积极性，使宣传效果提高了一步。1962年全县发生事故253次、伤62人、亡6人，比上一年均有减少。受到市、县两级领导的表扬。

1963年，有车单位增到42个，机动车增到248台，驾驶员增到286名。警力不足的矛盾愈加突出。县局归还了借走的两位民警，又增调了一名值勤民警。重点加强了宣传工作的力度，由庞云富、张凤元两人抓宣传，除完成正常年审年检工作外，还要求对车管干部、驾驶员和车辆底数清。要做到见人知姓名、见车知单位。基层单位对此反映强烈，都说民警的记性好，对发动群众起到明显作用。这年全县交通事故仅亡2人，是建队后的最低年份。

1964年1月，十一处要求各区县建立非机动车登记站。房子不够用，又因交通队地处北关，道路狭窄，车辆拥堵。县政府让交通队过春节搬到交通局院内（今水利局、农机局所在地）。随后，十一处给交通队配备了一辆破旧的长江750侧三轮。驻区部队由两个增到7个，增选8394部队汽车团王副团长为区安委会委员，该团七连侯连长为指导组成员。这年房山县交通事故死亡8人。比上一年多6人。原因除车辆驾驶员增加、宣传工作没跟上以外，搬家、支农、杂勤占用警力过多也是一个原因。如有时县里抽民警当门卫，甚至让民警替电影院卖票。

1965年1月，杜丰杰主持召开了交通安全总结、表彰、动员大会。评出先进单位5个，重点单位8个。对重点单位要求交通队长和宣传警亲自走访，促其转化。会后交通队内部开展了挑战应战活动，气氛十分热烈。这年共发生交通事故55次，伤42人、亡7人。全县有车单位增至86个，机动车增至374辆，驾驶员增至428名。交通队被县局评为先进单位，杜凤兰、张凤元荣立了三等功。县局号召其它科所向交通队学习。

纵观房山县交通管理部门的初期发展情况，可以看出经过不断摸索与探讨，形成了较完整的管理体系，到文革前房山县的交通管理已初具规模，为我县交通管理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作者系房山交通支队民警

## 房山邮政事业的初期发展

王同进

1948年11月19日，良乡县城解放，由我军管会代表董景玉（后任良乡县邮政局长）负责接管了良乡县邮局。当时全局只有六名职工、房屋七间，没有车辆。良乡县国民党伪政府的电话室也同时划归良乡邮局领导。成立了良乡县邮电局，归北京邮政管理局领导。

1948年12月琉璃河邮局由我军代表姚明海接管,当时直接归北京邮政管理局领导。1953年1月琉璃河电话站划归邮局管理后,改为琉璃河邮电营业处,划归良乡县邮电局领导。

1948年12月14日,房山县城解放时,房山县邮政局只有五名职工,租赁房屋三间作为局房,没有任何运输工具。

原良乡县、房山县两个县邮局当时都是只投进城镇,农村没有支局、邮政所,无邮路,也不发行报刊。广大农村特别是山区长期不通邮路,消息闭塞。在房山县、良乡县邮局的业务功能只办理信函、包裹、汇兑、印刷品等几种业务。随着社会的发展,1953年建立了周口店支局,1955年建立了坨里支局、万佛堂邮电所,1956年建立河北镇支局,1954年建立窦店邮政所。

1958年良乡县邮政局、房山县邮政局合并成立周口店区邮电局,由河北省邮电管理局领导划归北京市邮局领导。1958年建立南坊邮电所、大安山邮电所、史家营邮电所、张坊邮电所、长沟支局。

1959年10月1日北京市邮局批准撤销周口店区邮电局,成立房山县邮电局,局长祁冬喜,副局长王同进、刁成波。开辟了房山至张坊的摩托车邮路和房山至河北镇的摩托车邮路,架设了由房山至各乡的电话线路,接办了由县委管理的机要通信工作。到1966年全局共192人,局、所14处,581汽车一辆,摩托车两辆,邮路18条,自行车22辆,磁石电话机1000门,人工电报电传机三台。办理业务范围有信函、汇兑、包裹、印刷品、挂号信函、机要文件、电报、市话、长途电话、发行报刊100多种,基本上满足了全县各界群众的通信需要。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

作者系房山邮政局干部

## 几项农村工作的回顾

罗玉源

1948年12月至1958年4月,我一直在原良乡县从事本村工作,现就几项农村工作做一回顾。

原良乡县于1948年12月13日解放,我于12月20日由原良乡县五区所在地黑龙关步行五十公里赶到良乡县城,到县委报到,参加学习。当时主要学习党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县委根据二中全会精神,提出新解放区主要任务是,掌握政权、建立组织、发展生产、安定民心。规定学习时必须遵守纪律。学习结束后我被分配到六区区委工作,当时区委驻在张谢村的一个庙里,房子很简陋。不久,又迁到六股道村。这时春节将近,经过区委研究要利用解放后第一个春节,宣传好党的政策,组织好群众生活。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全区27个行政村广大群众都欢欣鼓舞地过了一个祥和愉快的春节。同时为建设新政权,为支援前线筹措了粮草。

1949年1月22日北平和平解放,我所在六区27个行政村有多一半村承担了接收傅作义改编部队的任务,当时区里的主要任务就转到为改编部队筹集粮草,做好支援工作。本来安排土改等工作都暂时放下。

## 新解放区土改

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是广大贫下中农，彻底翻身得解放的一项重要工作，到1949年10月以前原良乡县276个村还有148个村没进行土地改革，原良乡六区就占27个村。为了全面完成土改工作，于1949年10月河北省通县专区地委召开了土改工作培训班，主要是提高土改工作组的认识，明确新区土改政策，确定了土改方法步骤。为了把良乡县土改搞好，通县地委还由蓟县抽调一部分干部协助土改工作。良乡县委于1949年11月召开了土改工作会议，明确了土改政策，要求各土改工作队成员，必须遵守新区土改政策，具体是：

1、新区土改只能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农具，同时还要给其留下和贫下中农相等的土地，使其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其经营的工商业要加以保护，不得侵犯。

2、只没收富农的多余土地和农具，不得收其他财产，要给留下相当中农的土地。

3、要严格区分富农和富裕中农界线，不准侵犯中农利益，明确规定富农的剥削量包括出租土地、雇长短工、放贷三项占总收入的30%。

4、坚决保护工商业，即使是地主、富农的工商业也不得侵犯。为了控制打击面还规定一般行政村地主富农不得超过8%，如超过需报县批准。会议还明确了土改的方法步骤利时要求。县土改工作会后我和师广润、崔德伯、韩德瑞、王惠明(女)等五同志为一大组，我任组长，师广润任副组长，负责于管营、梨村、鲁村、后石羊、东石羊、曲石羊，南刘庄七个村。我主要是分管东石羊村，因为该村比较复杂，原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黄侃就是该村人，当过伪军和土匪的也较多。经过将近一冬的工作，按县委部署圆满完成了土改工作。东石羊村有110户，按照政策规定划地主4户，富农6户，富裕中农20余户，其余都是贫下中农。对一户地主(王树池)一户富农的工商业得到了保护。最后通过验收认为是符合各项政策的，同时还建立了政权，培训了入党积极分子，建立了青年团、妇女、民兵、治保等组织，制定了生产计划，组织了冬季生产。

## 发展互助合作

1949年冬完成了全县的土改工作，农民由一家一户经营着土地，有劳动力的农民勤奋耕耘，辛苦劳动，使生活得到了保证和提高，少数农民因不勤奋，或者劳力不足生活仍有困难，个别的因天灾人祸出现了新的两级分化。如东石羊村许议，因妻子有病，把分得的土地又卖光，不得不靠出卖苦力、借贷维持生活。为扭转这一情况在农村开展了互助合作工作，具体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1年至1952年，两年组织县区两级干部深入农村宣传党中央指示精神，逐村发动群众搞好农业生产，动员农村党、团员、干部带头组织起来，在春耕、春种、夏锄、秋收季节，组织起临时或长期的互助组。当时的互助组是按照自愿两利，齐工找价的原则办组，即农民集中输流互帮。到1951年全县组织了不同类型的互助组1888个，参加的男女劳力4300多个。到1952年全县互助组大发展，有长年互助组741个，入组户数达到5117户，土地86972亩，季节性的互助组647个，入组户3541户，土地33769亩，到1952年底全县互助组经过一冬的整顿，有90%的农户参加了不同类型的互助组。互助组的发展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例如小营村曲祥森1950年组织了5户的互助组，20口人，有50亩地，由于推广了新技术，精耕细作，粮食亩产达到300斤，比一家一户耕种的增加一倍，到1952年增加到15户。年底就试办了初级农业社，为农村树立了榜样。

第二阶段，1952年冬至1954年，通过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加之典型引路，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提高了认识。县委、县政府及时在大苑村召开了办初级社的现场会，会上介绍了岗

上吴春山、大苑村张琪、小营曲祥森办初级社的经验。到1953年底全县办初级社34个,因为初级社是劳力和土地按股分红,既调动了有地劳力少的积极性,又调动了劳力多土地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很明显的好于互助组和一家一户的生产。例如东石羊王忠的合作社,不但农业生产增加,还办起了砖窑、豆腐房,增加了牲畜和农具,收入也增加了。

第三阶段,从1954年至1956年,县委、县政府深入宣传贯彻了党中央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学习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党中央的决议,重新制定了发展农业合作化的规划。提出了具体措施,经过一年的工作,到1956年中央发出办高级农业社通知,全县由初级社转入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共计47个,27655户,其中一乡一社的45个,一村一社2个。为了把高级社办好,及时地推广了劳动、生产、财务三大管理。在财务管理上推广岗上村勤俭办社的经验;在生产管理上推广了按生产队包工包产,小段包工,记件工的办法;在生产管理上普遍开展增产增收和增产节约运动。总之从1950年到1956年,从互助组到高级社,曾一度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生活。但也走过一些弯路,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例如1955年把不该解散的合作社解散了,1956年以后出现的盲目扩大高级社,认为越大越好。一度出现了浮夸风,还有一年一度的整风整社,有的伤害农村干部等问题。

### 粮食统购统销的试点

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的一项重要工作。1954年10月县委、县政府召开了粮食工作会议,部署了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为了搞好此项工作,决定由我负责组建工作组,先深入原良乡一区黑古台村搞试点。工作组成员还有马岱文、申克俊二同志。统购统销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具体要求做到四满意:一是,做到土地、产量、人口三核实,留足种子、口粮、饲料粮、征购合理,不征购过头粮,达到余粮户满意;二是,给自足户留足口粮、种子、饲料、不征购周转粮,自愿卖粮,不得强迫命令,做到自足户满意;三是,保证缺粮户的供给,作好勤俭持家,节约用粮,缺粮户满意;四是,做好思想政治工,坚持实事求是地完成任务,干部群众都满意。

为了圆满地完成任务,工作组于1951年10月29日入村,到11月22日历时22天,胜利地完成了征购销任务。全村74户337口人、其中余粮户30户,占总户数42%,人口1681人,余粮15420斤;自足户5户占6.7%,人口21人,不购不供;缺粮户39户,占53%,人口149人,缺粮13824斤。全村完成征购粮食32850斤、皮棉654斤、油料(花生、芝麻)2200斤。通过验收,做到了征、购、销合理,达到了四满意。最后通过总结主要经验是:首先作好宣传教育工作,开始就组织党、团员、宣传员42名,利用各种宣传方式,使党的政策家喻户晓,在群众中造成售粮光荣的气氛,通过爱国主义教育提高了觉悟。如村长沙方到沙风云家作思想工作,该户原自报卖余粮500斤,后又多卖200斤。又如沙风林俩口通过作他们母亲的思想工作,先后卖余粮1200斤。再就是作好增产节约计划,如沙祥就是通过作节约计划,多卖余粮380斤;沙风桐原报800斤,通过节约计划又多卖200斤。黑古台的试点工作取得了经验,为在全县贯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打下了基础。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

## 兴修水利 造福人民

马向凤 宿庭增

房山区南尚乐镇是我区粮食主要产区之一。史称房山的“乌克兰”，因有拒马河水自流灌溉，不靠天可年年丰收。

拒马河从十渡到张坊对面的铁锁崖进入房、涞、涿平原后，分南北两河，两岸历来受益。

解放前，因水源不足，争水闹事的事件不断发生。解放后，人民政府帮助这个地区整修河道，协调利益，建立了房、涞、涿水利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分配水资源。两河四岸相安了十几年，人称这一片地区是四十里地不靠天。后来，由于上游修了水库，不少地方沿河建了扬水站，加上雨水缺少，下游水流量越来越小时常断流。特别是从1964年以后，一年比一年严重，到了七十年代初达到了极点。这对南尚乐地区的农业生产形成了严重威胁。靠争河水是不能解决问题了，怎么办？当时的公社党委发动群众想办法。经过集思广益和大量的调查研究，查明西岸下滩一带地下水丰富，水层浅，打井易。东岸南尚乐等几个村，中浅层水十分缺乏。打深井当时既没有资金又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和设备。因此，决定在河西下滩一带打井，实行“多井汇流，西水东调”，确保中片粮食主产区用水。

“西水东调”工程之大，施工之难，费时费资之多是南尚乐地区以前没有过的。该工程西起王家磨、沿之联沟、石曹沟、过拒马河、泉水河、到岩山村，全长30华里。中间两次过河，四次入地下，两处倒虹吸，虹吸管道830米，最大落差60米。最长的地下石砌拱渠南尚乐段530米。沿之联沟到石曹沟口，共打大口井9眼，机井20眼（机井主要是备用）。总装机319千瓦，总出水量1.19秒立方米。可控面积2万亩，有效灌溉面积1.5万亩。近几年，辛庄、石窝、王庄等村，打了些机井，扩大了水源。但这个灌渠仍是南尚乐镇中片万亩粮田的主要水源。粮食由原来亩产800多斤增到1500多斤，总产翻了一番。

“西水东调”工程从1973年开始到1974年，就基本完成了南尚乐以西的第一期工程，并开始受益。以后的几年间，每年都用两三个月的时间打新井，开新渠，建涵闸，到1978年完成了全部配套工程。全部工程公社共投资110多万元（不包括谷物的损失），主要是材料设备费用。各村共投民工93万个（不包括车工）。

这项工程所以能顺利完成，现在仍使用如常，主要是由于当地农民有极大的兴修水利的积极性和历届党委对农业的重视。在治水兴农上，群众不讲价钱，乡村各级干部不辞辛苦。当地群众回忆起来，说这是一项既有益当前、又造福后人的水利工程；也是群策群力，团结治水，艰苦奋斗的典范。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

作者马向凤系原区人大副主任、宿庭增系原区监察局局长

## 我在十渡的几年

韩兴连

1971年秋，县委决定调我去十渡公社任党委书记，兼公社主任。由于那里的条件很差，生活很苦，组织上希望我去几年，努力改变一下那里的贫困面貌。我想，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和考验。于是二话没说，第二天就背着行李，来到了十渡。

到十渡的第二天，我和公社副书记田志峰同去十渡村的东套，看见有一伙农民正在种麦子，他们用镢耩一个小沟，后边的人撒上一把麦籽，再后边的，用脚一埋，不施肥，也不平地，就把麦子种上了。我就问一位老人：“你们怎么这样种麦子呀？”他说：“多少年来都是这样种。”我问：“这样种一亩地能产多少斤？”他说：“好年头能收百八十几斤。”他又看了我一眼反问我，“你是哪的呀？问这干什么？”田志峰介绍说，“这就是新来的韩书记。”这一介绍，大家都凑上来了，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起来了。他们说眼看着拒马河水，白白的流去，就是用不上，再说祖祖辈辈的都是这么种，你有什么新鲜的招术呀。我说，“为什么不搞点扬水站，把旱地变成水浇地呀？”那位老人说：“咱们这里的电只能照明，搞不了动力。”这位老人是原来的老支部书记隗合春。互相认识了以后，他说了好多问题，使我第一次感到老区人民的真情实意，也给我提出了课题。

情况了解清楚之后，回去召集领导班子，统一思想，下定决心，真抓实干。我和我们一班人用了五年的时间，走遍了十渡的山川河流，察看了所有的山泉、水源，勾划出改变面貌的蓝图设想。边想边干，边设计，边施工，到1977年共修建扬水站29处，开山修渠30多公里，开挖引水洞4个，共300多米，修建小水库3个，人畜饮水管线近万米，80%的土地变成了水浇地，粮食产量由原来的亩产200—300斤，一下子超过800斤过了“长江”，小麦亩产由原来的100多斤增产到600—700斤。

同时，把“两火一地”的电线，换成了三项高压线。修水力发电站六处，新建了灰窑、煤窑、木棍加工厂、炸药厂等，十渡面貌有了初步的改变，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引起了领导上的重视。

1974年底，市委在友谊宾馆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我在会上作了题为《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大干促大变》的发言。第二年春天，中央电视台派王新华等两名记者，在十渡住了半个多月，进行采访。同时《北京日报》派两名记者，经过两个月的调查采访，在《北京日报》发表了《还是当年那股劲》的报道，副标题是“泥腿子书记，泥腿子主任。”

7月，《北京日报》社由总编辑到科室人员一行26人来十渡检查采访。午饭后，当我领着他们沿着拒马河，来到后石门大队水输泵扬水站时，记者们看到，百十户人家，用一锤一鍤在悬崖上凿了一条1000多米长能引水1个流量的引水渠道，渠水通过水输泵，扬上60多米高的梯田，灌溉农田。那位总编辑说，这种精神，这种干劲比大寨还“大寨”，要很好地总结、推广。

1975年9月，市农口又在十渡召开了农村工作现场会，市农村组负责人王磊、王宪二位领导，亲自主持会议，郊区县公社及城区的主要领导出席了会议。原来在房山的老县委书记刘永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共90多人。会议开了三天，主要看了十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看完后总的评价认为，十渡的工作是扎实的，成绩是肯定的，这种精神值得学习推广。从此后到十渡参观、学习的人员，就络绎不绝了。

1975年9月，我接到了敬爱的周总理的请柬，邀请我代表十渡人民参加国庆招待会。县委给我派了一辆车，当天晚上送我住在北京东方饭店。第二天，市政府办公厅的负责同志给我们开了预备会，讲了注意事

项。晚上8点来到人民大会堂宴会大厅，幸福的时刻就要到来了，数万双眼睛望着主席台，等待着总理的到来。可是主持人说话了，他向大家抱歉，周总理身体欠安，今天不能到会，请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志讲话。小平同志说因总理身体不适，我代表总理向来自各条战线上的先进代表和国际友人表示欢迎，向大家问好。顿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10月1日下午2点，小平同志又在中山堂陪同西哈努克亲王接见了我们并与我们前排就坐的同志一一握手。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在北京医院逝世后，我应邀参加了总理的遗体告别，瞻仰了周总理的遗容。1月16日我又被邀请参加了周总理的追悼大会。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离开了我们，我受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邀请，9月15日上午，到人民大会堂，由早上6点到中午11点为毛主席守灵。追悼大会那天，我被邀请登上设在天安门上的追悼大会主席台。这一幕幕的往事是我一生永远不会忘记的。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

作者系区人防办干部

## 高庄水电站建设始末

马向凤 高永来 魏志华

高庄水力发电站位于南尚乐乡半壁店村西的山坡上。水电站建于1955年，五、六十年代曾起过很大的作用，有过一段光荣的历史。

五十年代，为了发展我国的水电事业，中央水电部搞了一批小水电的试点，高庄电站就是其中的一个。选高庄建电站的原因主要是这个地方自然条件优越、水源足，水质好，附近又有高坡，引水上山可以加大落差。高庄村南有五个大泉，称“富民五泉”。无论是夏季还是冬季，是旱年还是涝年，泉水流量都同样在半流量以上。

建高庄电站是水电部的试点，又是河北省第一座小型水力发电站（当时房山县属河北省管辖）。各级领导都很重视。机电设备主要是国家投资，共7万多元。水电部派来了陈乾元、段乐其等工程技术人员，进行设计指导。房山县由王奎玉副县长主抓。1955年4、5月份开工后，县里从有关部门抽调力量组成工程指挥部。由当时县财政科副科长王振亭负责。还有李培森、郑有勋、王永清、翟鸿儒等同志。并由附近乡、村抽调一些干部组成生产、技术、后勤、宣传等机构，专门负责电站建设的各项工作。建电站是民办公助，除机电设备外，挖渠、建池、电线、电杆等各项工程，由受益村分摊，分段负责。每个工补助5角钱。群众一听说要建电站、安电灯，非常积极，都争着出工。每天出动五、六百人，有时过千，由各村干部带队。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斗，任务基本完成，总用工14000个，修渠5华里（引水渠2100米，泄水渠400米），在下营村东建拦水坝，把水引入渠道。通过渠道把水引向山坡，逐步提高水位。电站前建蓄水池，不发电时提闸放水，发电前关闸蓄水，晚上发电。

1955年底，电站建成发电时，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除附近乡村干部、群众代表，参加电站建设的

民工外，水电部、河北省政府、通县专区的主要领导及房山县委、县政府的领导都参加了庆祝大会，共计2000多人。会上水电部部长傅作义剪彩并讲了话。傅作义部长及省、专区的领导对高庄电站的建设给予很高的评价。电站建成后供当时的半壁店、纸房、独树、岩上、高庄、下营、石窝7个村2000多户照明用电及北京大理石厂(当时在高庄村)生产用电。装机容量48千瓦，发电量420千瓦。到1956年年三十晚上，7个村全部通电，灯火通明。广大群众兴高彩烈，齐声欢呼“电来了”、“灯亮了”。对从来没使过电灯，没有见过电灯的农民来说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觉得比过年还新鲜。有的整夜不睡觉，在电灯下谈古论今。有的群众说：“这下我们先过上社会主义生活啦。”因当时不用说农村，就连房山县城也没有电灯。电站建成后附近几十里地的群众都来这几个村看电灯，对使上电灯的村都很羡慕。

为纪念高庄电站建成，1956年春，半壁店、纸房、扬庄子三个村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称“照明农业生产合作社”。

电站建成后，又建立了管理机构，电站归房山县直接领导，第一位站长是县政府派出的李培森。1957年李培森调走后，电站由半壁店村负责管理，站长是村里的赵仲亮。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电费很低，一个灯头一年只收四、五元。当时确实极大的方便了群众的生活，对生产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963年国家电网通电以后，由于用电户逐年增加，同时对电站的管理也差，水电站的电不如国家电网的电充足，对水电站的管理也有些放松。特别是后来水渠上游几处建砂石厂、扬水站，渠道淤泥越来越多，没有及时清淤，水越来越少，发电越来越小，后来就停止发电。1966年电站的电机被公社调走，在郑家磨建了新的电站。从此，这个一度很有名气的高庄发电站结束了它的使命。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

作者高永来系原区绿化办副主任

## 房山第一个职工俱乐部的建立与发展

杜绍文

房山第一个职工俱乐部建于1956年，当时房山没有综合性职工文娱活动场所，只有一个小图书室。为了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县总工会于1956年初请示河北省总工会筹建一所房山职工俱乐部(当时房山县隶属河北省领导)。经省总工会批准，在房山的中心地带西大街路南(现房山人民商场的位置)，购买了已关闭的酱醋作坊和杠房两处院落，约2000平方米。其中能用的旧平房13间，经整修后建起了图书报刊阅览室，新建了一个约120平方米的综合游艺室主要用于乒乓球赛和周末舞会，以及举办展览等。建起简易篮球场、宣传橱窗，购买一部16毫米电影放映机，建起了露天放映场。随着俱乐部设施和活动项目的逐渐增加，参加活动的职工人数日渐增多，每天三、五百人不等，每周六参加活动的职工人数就更多些，活跃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1958年，房山县划归北京市，称北京市周口店区。工业、商业、服务业和文化、教育事业都有了较快

的发展，职工人数显著增加，俱乐部原有的设施远远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当时区工会请示市总工会支持一部 35 毫米电影放映机，建起了周口店区职工俱乐部电影放映队，除在俱乐部阵地放映外，还深入到各较大基层企业单位巡回为职工放映，受到了广大职工群众的欢迎。同时还依靠区工会自身的力量，健全和完善俱乐部的各项设施，重新整修了篮球赛场地，增加了照明设施，从而昼夜都可以进行篮球比赛活动。扩大了图书阅览室，增加了各种书、刊和画报，每天阅览的读者络绎不绝。随着俱乐部设施和活动项目的增加，参加活动的职工人数日益增多，特别是每周六、日每天都在千人次左右，遇有放映好电影片或篮球比赛时，日参加活动的约有 2000 人次以上。可以看出当时俱乐部的活动非常活跃，很有生气。但是在“文革”期间一切活动终止了，场地全部被占用。

当时俱乐部活动搞得很好，主要是做到了“四坚持”：

一是坚持长计划，短安排，做到活动有序。各项活动每月都要做出具体安排，并列表公布，一目了然。使俱乐部的活动不仅活跃，而且井然有序。

二是坚持两个结合，做到互相促进，不断提高。一方面做到点面结合，以点带面。通过组织全县集中的体育比赛，带动了群众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各单位群众性活动开展。一方面用“请进来，走出去”的形式做到内外结合，以外促内。每年都要组织县职工篮球代表队到各兄弟区、县去进行友谊赛。同时邀请兄弟单位来我区进行友谊赛活动，国家男、女篮球队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篮球队都曾应邀来我县进行过友谊表演赛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既活跃了职工群众的文化生活，又提高了我区运动员的技术水平，增进友谊，进一步促进了我区职工体育活动的蓬勃开展。

三是坚持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开展活动，自觉地为政治服务。一方面通过幻灯，橱窗展览等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中心工作，宣传先进单位、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以先进带动一般，推动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还举办各种不同内容的报告会。有力地推动了学先进，赶先进竞赛运动的开展。如邀请长辛店二七车辆厂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老工人杭宝华、左士俊来我区分片巡回报告，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职工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积极性。还通过举办展览和各类技术能手表演赛，促进了职工间互相取长补短，提高了技术水平，很受广大职工群众的欢迎。

四是坚持充分依靠积极分子搞好俱乐部各项活动。体现了群策群力，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精神。工会俱乐部是职工群众自己的活动场所，要搞好各项行动，只靠几名专职人员是远远不够的，大量的活动要依靠有各种专长和不同爱好的积极分子去完成。每年的各项比赛活动，从计划安排各项准备到比赛的全过程，都是依靠那些只尽义务，不计报酬的积极分子去组织实施。不仅如此，就是俱乐部的内务活动，如场地管理、维持秩序、收门票、场地卫生等也是靠这些积极分子主动去做，而且做的井然有序，体现出我们职工主人翁的责任感。

周口店区工会俱乐部从 1956 年成立到文革初期停止，经过近十年的工作。不仅极大地活跃了职工群众的文化生活，增强了群众体质。而重要的是把思想政治教育同文娱、体育等各项活动融为一体，寓教育于娱乐之中，充分发挥了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

（《房山文史资料》第 11 辑）

## 高庄玉塘米琐记

张玉泉 高永来

据《房山县志》载：“高庄村南万泉庵北，有大泉数眼涌出，灌稻田三顷余，产稻甚美，俗称玉塘米。”其中“突出一泉，其水甚清，灌稻田米色如玉。”万泉庵山下有几处清泉，以靠北侧一泉为著。清嘉庆帝的御笔碑“天下第一泉”尚存。民国时期河北省水利厅曾立“富民泉”之碑尚存。山泉水盛清冽，无论早涝多久，泉水照常上溢，流量不变。

在山泉四周有一亩三分地(现改为鱼池)种的稻米，称“玉糖米”自清代早期就定为进贡米。清康熙年间，内务府派一名正黄旗人名叫周三省的，来到这里给皇上开庄子，名曰“御米皇庄”。

周三省有四个儿子：大儿子叫周元荣，是周家的掌门人，住前街正中，座北朝南的大院里，高大的门楼上挂有黑漆金三牌匾，写有“七品皇庄”的字样，是乾隆御笔。周元荣主管皇庄的全面工作，重点管好一亩三分的玉塘米；二儿子叫周恒荣，主管下滩一带稻田和收购；三儿叫周立荣，四儿子叫周贞荣主管玉塘泉四周的稻田。

周家在北京设有大粮库，库内分别立有“元”“恒”“立”“贞”四个大粮仓，高庄玉塘泉的米入“元”字仓，专供皇上食用。剩下附近村产的米，分入其余三个仓内，五塘米绝对不能与其它米混装。

玉塘米“颜色晶亮”可煮晒七个过儿，最后成糝。捞出饭来清香可口，米汤呈青玉色很稠。据有关专家分析，主要原因是生长期长，又是在12度泉水恒温下生长的。

玉塘米的品种，早期为“燕国青”，分“大燕青”和“二燕青”两种。抗日战争爆发后，引进了日本的矮秧大粒的品种，名叫“小日本”。每年采用扬场选种法，即每年稻谷入场后用簸箕扬，把最远的单存起来当籽种。

玉糖米的种植方法是清明泡籽，即放置在瓦罐中发芽；谷雨落地，即埋在秧盘里，秧盘上好大粪或槽厩粪；小满栽秧，栽上秧便天天放水灌溉。过了十来天，拣好天亮盘，使料碴，即把畦里的水放净，晒几天再施肥过去用豆饼，后来用从日本引进的“肥田粉”，当地群众叫“打马飞”。一般追一、二遍肥之后再浇一、二遍秧，就等寒露节割稻子了。

附近周家安有四座水碾子。玉塘泉的稻谷，要放在水碾子上碾四遍，每一过儿都要用扇车扇一过儿，这样碾出的米粒粒晶莹闪亮，香味诱人，才能入库。

高庄玉塘泉及四周的稻田，绝大部由住在前街的高姓佃户耕种。每年每亩向皇庄交1.2石好大米。皇庄与佃户每年都有契约(合同)，违约者要遭到严重惩罚。如遇有灾年也不减租。对玉塘米的收购历来都有优惠政策，皇庄子在收够粮租之后，多余的部分以高出市场价一半以上收购。解放前河北省政府还以90斤稻谷顶100斤粗粮办法奖励农民交售。解放后1950年实行统购统销时，每年每人可留3至5斤大米自己食用。交售给国家的每1斤米，可换回1斤好面粉。这充分调动了高庄一带的农民种好稻米的积极性。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

## 回忆参加修建官厅水库

刘振祥

1952 年秋，我通过参加河北省中等学校教职员思想改造运动之后，留在了县委机关，在组织部工作。这时，通专地委来通知要求良乡县出 1500 名民工，参加修官厅水库的会战。副县长许庆山传达了上级要求和本县计划，随即抽人下乡组织动员民工。组织部派我参加了这一工作，并分工去三区（琉璃河区）的交道小区去组织民工，这个小区包括交道、兴隆庄、普安屯、刘平庄等 10 多个村庄。由于全县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支持，1500 名民工很快抽齐了。

具体的组织情况是：全县 1500 名民工，共划分 15 个分队，分队设正、副队长。正队长一般由脱产干部担任，计有张月波、李静、魏忠、魏洪提、范永权、魏世忠、张万和等区干部。全县民工组成一个民工大队，统一由专区指挥部领导，指挥部政委由通县地委宋副书记担任，指挥部主任由专区水利局王党民担任；良乡县大队的政委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王茂发担任，大队长由一区区长李明担任。县大队下设治保、宣教、青年、卫生几个股，分别由杨维秀、刘振祥、范永权、王培秀负责。卫生股成员是由各区抽调的中医组成，郭恩波大大就是其中的一位。

1953 年 3 月，全县 1500 名民工乘火车开赴官厅水库。行至怀来县的土木车站后，又步行 30 里到达官厅水库库址。水库库址当时是一片荒凉的沙滩地，地上盖了一排工棚，棚内从东到西有一条人行道，两边住入，头顶头或脚对脚。大队部住的也是工棚，只是睡铺距地面高一些。库区南端即官厅，东西两山之间正好是个缺口，拦洪大坝就建在两山之间的缺口处，先是处理地下水打好大坝的基础，目标是在 6 月 20 日上汛前建起高 475 公尺的大坝，这在当时算是全国第一大水库。同时，大坝东边要建起一条溢洪道，西端要建一条南北长 500 米，宽 8 米的隧洞，平时让水从隧洞流出，洞的出水口有个静水池，把水蓄起形成落差，计划搞发电厂，我们民工的任务是担土筑坝。工地上，河北省十几个专区十多万劳动大军，日夜战斗在工地上，从住地到工地民工们列队高唱：

“太阳出东方啊！  
嗨！照在大地上！  
扛起咱们的大铁锹，  
嗨！快到工地上！”

那一边又传来了民工们的歌声：

“太阳一出来，  
放出红光，  
红光照耀在永定河上，  
永定河流水曲曲弯弯奔流向南方。  
这里有祖国的好儿郎，  
官厅的任务咱们来担当。  
有工人也有农民，日夜在那里忙。”

在工地上民工们担着土高唱：

“挑起来土筐一阵风啊，  
为了那大坝早拦洪啊！”

到了夜里，整个工地灯火辉煌，真是银蛇飞舞一样。每个山口处都安着高音喇叭，播放着《刘巧儿》等当时流行的曲目。随着乐声，整个工地上数以万计的民工发出了起伏此起彼伏的高声呐喊，好一派动人的景象。卫生股的大夫们也来到工地，找个僻静处搭个床板做医疗室。郭恩波大夫针灸很好，哪个民工有点小病，躺在床板上，扎上几针就好。

对于官厅水库的修建，各级领导非常重视。朱德总司令、郭沫若同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成员和水利部长傅作义、河北省副主席高树勋、以及通专的有关领导等都曾带队来官厅水库工地视察慰问。当听说工地民工因吃土豆过多，不少人得了夜盲、色盲症，很快调来了肉类和蔬菜，还派来文艺宣传队和卫生队，教民工唱歌、跳舞，帮民工除治身上的虱子。

6月下旬，我们胜利完成了修建官厅水库大坝的任务，从此结束了永定河泛滥成灾的时代。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

作者系区政协第一、二届委员，原中共房山县委工交部副部长

## 房山的七种名特优药材

王绍清

中药是我国人民长时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结晶，被誉为“国宝”。房山地处京城西南部，位于华北平原和太行山山脉交界处。据有关资料载：有较大山场107座，产中药材209种，故有“一多三大”之称。即：中药材资源品种多、山大、地盘大、地理自然环境差别大。在209个药材品种中，植物药材72个科属，171个品种；动物类药材32种；矿物类药材4种，菌类药材2种。产地山区较多，半山区次之，平原较少。山区多数山场均在海拔800米至1800米，少数山场在1800米以上；气候常年平均在9—11度；无霜期在150天以上；一般土层厚，有机质含量较高，给草本药用植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息环境。几种药材驰名京津保地区乃至全国，为名牌产品，其中包括：

蝎子：又名全虫。喜生墙隙、山石隙中，有雌雄之分，燥湿相育，有活血之功。蝎子是房山药材之“状元”，产量居本市之冠，具有个大、整齐、不碎三大优点。抽沟凹拢两层皮，有“房山大青蝎子”之称，为名牌产品。

葛根：又名葛春生。苗蔓长一、二丈，七月授粉，花紫色似豌豆不结实，根形状如手臂，紫黑色。五月采根暴乾，入土深埋，有消渴清热解毒之功。葛根为房山药材之“王”。在本市名列榜首。葛根有效成份黄酮、葛根素，与其它地区同类产品相比，含量高。八十年代是同仁堂制药厂点名收购的产品。

五灵脂：即寒号虫屎。是房山历史名产。民间讽刺懒人为寒号虫，但也有种种传说。据有关资料记载：“寒号状如小鸡，四足有肉翅，夏月毛采五色，自鸣若曰，凤凰不如我。至冬天，毛落如鸟雏，忍寒而号曰，

得过且过。”其屎恒集一处，气甚燥，粒大如豆。采之有如糊者，有粘块如糖者，此物多杂沙石，以酒加工，此药入肝甚速，有散血、活血等功效。寒号隐居在僻静山洞内，采集此药，需腰系绳，进入洞中，方可采集。

黄芩：苗长尺余，六月开紫花。根如知母，六月采根日晒，其味苦寒而无毒，解放前劳动人民将茎叶加工，代茶饮用，俗称“山茶叶”，为清热泻火之药，驰名京、津、保地区。全国中药材集散中心——安国采购药材人员曾专程赴房山收购。

栝楼：三、四月生苗，蔓叶似田瓜叶，有长藤。七月开花，浅黄色，结实在花下，为青黄赤色，有甘润降痰消渴之功。全区产量约百万斤，驰名市内外，为房山“拳头”产品。

黄精：黄精为上房山三宝之一。二月采根，阴干后，久服延年益寿，也是上房山和尚送礼之物。

益母草：产于河套沟山中。五、六月开小花，花内有籽。农民采集后，用土法加工制成益母膏，治产妇、妇科诸疾，在旧社会当地有神方之说。

这几种名、优、特产药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边区实行严厉经济封锁和囚笼政策，晋察冀边区以及房、涞、涿县合作社业务部，及房良二区合作社将收购的药材出口（出边区为出口），运往敌占区销售，换回军政物资及食盐等。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良乡北窖村发生灾荒，严重缺粮，北窖村合作社组织农民开展副业生产，其中熬益母膏运往敌占区，换取粮食，解决了一部分灾民燃眉之急。建国后，房山供销合作社为农民创收，将收购中药材作为一项主要任务来抓。从1949年至1990年，四十一年共收购药材14373200多斤，1977年曾达734340斤，自1988年收购量有所下降。

（《房山文史资料》第11辑）

## 房良两县耕地被“旗圈”

王硕儒

房山、良乡在历史上为两个县，直至1958年4月才划归北京市一个区（县），即今房山区。

据史料记载，清王朝定都北京以后，满族统治者对占有田产，安置“从龙”入关的八旗官兵，解决粮食军需的燃眉之急，在京畿地区以跑马圈地方式，强行夺取了大量的耕地，在历史上称为“圈地”。

根据《清实录》记载，顺治元年十二月，清廷已在朝议“清察无主之地，安置满洲庄头”的问题。同月二十三日（公元1645年1月20日），清廷谕令户部：“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与；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地土，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区划。然此等地土，若满汉错处，必争夺不止。可令各府州县村，满汉分居，各理疆界，以杜异日争端。今年从东先来诸王、各官兵丁及见在京各部院衙门官员，俱著先拨给田园，其后到者，再酌量照前与之<sup>①</sup>”。这是清王朝第一次发出的正式圈地令。

圈地的具体办法是：由“户部遣满官同有司，率笔帖式、拨什库、甲丁等员役，所至村庄，相度畝亩，两骑前后率部颁绳索，以记周四围而总积之，每圈共得几百十响，每壮丁分给五响，响六亩。响者，折一绳之方广，其法捷于弓丈。圈一定，则庐舍场圃，悉皆屯有<sup>②</sup>”。可以想见，在这样的圈地中，随着八旗铁骑的

飞驰闪过，大片的耕地立即变为皇庄或旗地。

根据清廷的规定，京师周围五百里为圈地的范围，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北京郊区各区县。事实上整个京畿地区的绝大部分都被圈占了。房山县因圈占，土地“十耗其七”。良乡县圈占后，耕地剩余“十不及一”。

清初大规模圈地主要在顺治元年十二月至顺治四年进行的。根据康熙四年《房山县志》记载：房山县共有耕地 176737.2 亩，在顺治二年(公元 1645 年)圈给正黄旗民地 13055.2 亩；顺治三年(公元 1646 年)，圈给正黄旗下民地 25889.05 亩；顺治四年(公元 1647 年)又两次圈给正黄旗民地，第一次是 37475.8 亩，第二次是 28123 亩。三年共圈占民地 104543.05 亩。根据康熙四十年《良乡县志》记载：良乡县共有耕地 291824.259 亩，在顺治二年(公元 1645 年)圈给正黄旗下民地 85668.757 亩；顺治三年(公元 1646 年)，圈给正黄旗下民地 71245.561 亩；顺治四年(公元 1647 年)圈给正黄旗下民地 198056.473 亩。三年共圈占民地 354970.691 亩，超过了良乡县耕地的总量。共超过 63146.432 亩，实际还不只此数。超过的原因，笔者认为：圈地包括了非耕地，因为“圈地所及，不只耕地”，“郊野山林川泽”都被圈占了，自然也包括非耕地在内。

在圈地中，还出现了大量汉民投靠满洲贵族或八旗官兵为奴仆的现象，史称“投充”。据清代文献记载：“国初，投充名色起于墨勒根王，许各族收投充贫民为役使。嗣则有地土者，带地投充。奸蛊无赖，或恐圈地，而以地投；或本无地，而暗以他人之地投”(《养吉斋余录》卷一)。其中，带地投充，实为“圈地”的一种特殊形式。顺治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公元 1645 年 4 月 21 日)，清廷给户部的谕旨规定：贫民“如冈不能资生，欲投入满洲家为奴者，本主禀明该部，果系不能资生，即准投充；其各谋生理，力能自给者不准”<sup>③</sup>。此谕旨使“投充”合法化。伴着“圈地”之风席卷而来，“投充愈演愈烈”。根据《房山县志》(康熙四年)记载：房山县在顺治三年(公元 1646 年)，投充正白旗下商人龚见阳等人带去民地 233 亩；顺治四年(公元 1647 年)，投充正黄旗下高从善等人带去民地 20575.26 亩；顺治七年(公元 1650 年)投充正黄旗下曹文实等人带去民地 327 亩，投充镶黄旗下陈进忠等人带去民地 50 亩。三年投充共带去民地 21185.26 亩。连同正式圈地总计 125728.31 亩，占房山县耕地面积 7%。根据《良乡县志》(康熙四十年)记载：良乡县在顺治二年(公元 1645 年)，投充正黄旗下肖魁等人带去民地 1655.6 亩；顺治三年(公元 1646 年)，投充正黄旗下毕仁贵等人带去民地 4354 亩；顺治四年(公元 1647 年)，投充正黄旗下李其祚等人带去民地 16512.625 亩。三年投充其带去民地 22522.225 亩。从当时投充情况看，大体分为三类：一是民田被圈占，“庄头及奴仆人等”将民人“逼勒投充”<sup>④</sup>。二是“地已被圈，无处栖身，乃投充以种地；或地尚未圈，恐被霸占，因投充以保家”<sup>⑤</sup>。三是“无赖游手之人，身一入旗，夺人之田，攘人之稼”<sup>⑥</sup>。清廷的圈地和民人带地投充，其土地占有形式分为皇庄、王庄和旗地。凡属皇室所有、归内务府管辖的称为皇庄或内务府官庄；由清帝按照爵位等级分配给王公贵族的称为王庄；为八旗官兵所有的称为旗地。皇庄(官庄)又有粮庄和纳银庄之分。据乾隆十年(公元 1745 年)记载：房山县粮庄庄头 18 人，共领地 9638 亩，其中最多领地 900 亩，最少领地 11 亩；良乡县粮庄庄头 18 人，共领地 12150 亩，其中最多领地 3282 亩，最少领地 24 亩。此外，还有为皇室提供特殊服务的大粮庄，即在房山县设立稻田庄两所，一所设于康熙十二年(公元 1673 年)，有稻田 284 亩；一所设于雍正七年(公元 1729 年)，有稻田 795 亩。王庄，在房山县、良乡县皆有。顺治二年规定：“给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大庄每所地 420 亩至 720 亩不等，半庄每所 240 亩至 360 亩不等”<sup>⑦</sup>。旗地占房山、良乡圈地，投充地的大部分，其分配办法，“最初规定八旗壮丁每人给地 30 亩。参领以下官员各给地 60 亩。副都统以上官，各给园 180 亩，地 60 亩”<sup>⑧</sup>。由于清初的大规模圈地和民人带地投充。给房山、良乡两县的农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农民流离失所，苦不忍言。对此，清廷不得不承认，因而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停止圈地。顺治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公元 1647 年 5 月 3 日)，清王朝统治者谕令“自今以后，民间田屋，不得复行圈拨，著永行禁止”<sup>⑨</sup>。因有禁不止，圈地现象还屡有发生，清廷于顺治十年(公元 1653 年)康熙八年(公元 1669 年)又两次谕令停止圈地，但良乡县圈地并未停止。康熙十二年(公元 1673 年)，良乡县民李文光等人退出隐村

地 2737.2 亩<sup>⑧</sup>。二是拨补。即房山、良乡两县被圈占之地由外县未圈占之地拨补。房山县于顺治四年(公元 1647 年)由定州拨补绝户地 9883.296 亩,草场籽粒地 7022.3761 亩,定州卫地 23072.9516 亩,忠顺营牧马地 6019.8059 亩,共拨补地 45998.43 亩<sup>⑩</sup>。良乡县于顺治四年(公元 1647 年)由定州拨补绝户地 39409.12 亩,草场上地 9706.182 亩,草场实在中地 1786.663 亩,籽粒实在下地 1609.727 亩,恭顺侯入官地 9600 亩,定州卫实在地 19434.289 亩,忠顺营地 31267.18 亩,腾骧卫实在地 15220.764 亩,神武卫实在地 26184.849 亩,武功卫地 1749.8532 亩。以上除定州卫实地 19434.289 亩,于康熙十五年退回定州外,共拨补地 136534.3382 亩<sup>⑪</sup>。房山飞良乡两县拨补之地皆在定州,因路途遥远,不便耕种,经与定州协商,由定州农民耕种,交租给房、良两县,以分给被圈之家。顺治四年由定州拨补给良乡县的 39409.12 亩绝户地,由定州农民耕种,言明每亩租银 8 分 2 厘,共租银 3270 两 9 钱 5 分 6 厘 9 毫 6 丝,但良乡每年多次讨租,往来不便,时而构讼不休。后经良乡、定州双方议定,由定州代良乡缴课税 2950 两,其余良乡情愿减让,自康熙九年开始永不遵守。实际上落得个“徒有补地之虚名,全无得租之实惠”的结果。

注:

- (1)《清世祖实录》卷十二
- (2)姚文燮《圈占记》
- (3)《清世祖实录》卷十五
- (4)《清世祖实录》卷十五
- (5)孙嘉淦《孙文定公奏疏》
- (6)《清世祖实录》卷二十五
- (7)《清朝文献通考》卷五
- (8)《光绪大清会共事例》卷一千一百十七
- (9)《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一
- (10)《良乡县志》(康熙四十年)卷三
- (11)《房山县志》(民国十七年)卷四
- (12)《良乡县志》(康熙四十年)卷三

(《房山文史资料》第 12 辑)

## 旧煤窑“关民屋子”纪实

张玉泉

周口店是块宝地,地下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尤其是煤炭资源储藏量大,其次是石灰岩丰富。因此,据当地老人讲,清末以后,居民多以采煤、烧灰为业。光绪末年,周疏铁路支线修通后运输又兴盛起来。因此,周口店有三多:钻窑的多,“背脚”的多,采石灰的多。民国期间周口店的灰、煤窑分布在周门店的西北部达 74 摊之多。过去煤灰开采业的历史,也是资本家、业主欺压剥削矿工的血泪史。他们把煤矿变成“关民

屋子”，成为关押矿工、没有任何自由韵人间地狱。下面记叙的仅仅是若干个私人煤窑中的两个。

### 一

1934年，在周口店村北有个十亩平煤窑，大窑主是北京采的，二窑主是本地的范某，号称南霸。他分工管人，厉害得很，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井工都是他从张家口一带骗来的，到每户先给家人撂下三个月的工钱，说一个月能挣多少多少钱，只要人一进了窑厂，就关进了“关民屋子”。一进门先扒掉身上的衣裳，只给你一个屁帘子。院子用宽1米、高1.5米的葛针扎上，门口和四角外拴着大狼狗，院内外夜间有流动岗哨，靠近窑口有一个大通杆儿屋子，里面靠后墙有一拉溜的炕，屋内正中生个火炉。不管有多少人，通通光着腚，身贴着身子睡。如果再来人睡，根本就没地方躺，范某就用冻上冰茬的棍子往两个人中间一捅。睡得很香的人一贴冰棍，打着激灵拼命往两边挤，中间就有了缝儿，你再加进去。

窑口放个水缸，里面泡着拳头粗的麻绳，硬得像木棍，谁要是早出晚进，或不正经干活儿，一经看守发现，二话不说，攥上绳子照你身上一轮，打得工人身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工人们有了病能坚持就坚持，也不敢让他们知道，如果让范某和总管知道了，就把你弄死。有个工人屁股上长了大疖子，疼痛难忍，走路都费劲，被总管发现了，他说瞧瞧，上去就是一拳，打得这工人满地打滚儿。一个工人的手肿了，让总管知道了，就用木桩劈开一道缝，用木楔支上，把那工人的手塞进去再拔下木楔，把工人夹得死去活来，非常残忍。

矿工们不堪忍受，千方百计想逃。有一次一个工人逃跑了，范某带人去追，追得他无处可藏，这工人跑到龙骨山下国民党警察局三分所求救，这警察把他留下了，立刻交给范某，该工人被捆上扯回“关民屋子”，这工人被吓得蹲下泻尿。原来窑主跟警察是一丘之貉，串通一气。谁也不敢轻易地逃跑了。

只要你一进了“关民屋子”，就等于进了人间地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如果你能熬到第二年的五月关窑时，就算你命大。散伙时，只能给你点路上吃饭钱，平时一分钱留不下，只能“山上打柴山上烧”了，死了的连衣裳都没穿，拉到窑边的山沟里一埋了事。窑内窑外有二、三十只狗，死了人扔到山沟里，就被狗刨出来扯了。狗都吃红了眼，一个人出去手里拿东西也敢扑你。

等第二年8月初开窑前，范某再去另一个地方骗人，或雇人贩子去骗。骗来后再交总管看起来。

解放后人民当了家做了主，原来在十板平窑上被骗受奴役致死的工人家属，曾专程找到周口店打听范某家址，打算跟他算帐。不料，他未等清算早已下地狱了。

### 二

在长沟峪煤矿家属区一位76岁的老者，讲述了他在“关民屋子”里的亲身经历：

民国六年他16岁时，曾在长沟峪村西一家叫兰兴煤矿里拉煤。这家窑主让一个叫奚大架子的人贩子从河北怀来县一带去招工，以每年每人50大洋的价格成交，一下招来270人，带回关门屋子，交给总管。总管是专门管工人的，特别阴狠毒辣，人称他口西总管，是窑主从八达岭以西雇来的。后来换成一个叫金大头的总管也挺厉害。

从头一年8月入窑到次年的5月散窑，这二百多人因闹热窝子病干了10个月，窑主不给治，就死了多一半，散窑时还剩下三十多人。在窑口的一角，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有间小屋儿，工人们叫它“小阴子”或小阎王殿，后门直通大山沟。只要你有病，干不了活儿了，就把你放进那间小屋里，想起来给你送点儿吃的，想不起来就拉倒。只要你一进那间屋子甭打算活着出来，只要你一搏气儿便人不知鬼不觉地把你从后门扔进山沟里了，或用席头一卷埋到烂死岗去。小屋子十分阴森，一提到这儿工人就起鸡皮疙瘩。

“招工”来的人一般都签合同，家里凡有人的都要求一旦死了要还尸。不管还不还尸，死一个人窑主就给一份埋葬费，埋葬费大部分落在总管的手里，还尸也要根据家属的情况。不管什么时候死了，也得等入冬上冻后还尸。要求还尸者，先把尸装进“狗碰头”的白碴棺材里，放到烂死岗里码起来，等上了冻再由“骡驮轿”运回家去。所谓“骡驮轿”，是过去专门远距离运尸的，两条骡子一前一后，两骡之间的鞍子下搭两条杠子，杠子中间放下棺材绑紧，赶骡驮轿的把式或后头赶，或在前头领路途远的中途到专设的店里住宿，抬下棺材，喂上牲口，次日凌晨再起程。运尸的费用全部由死者家属负担。

兰兴煤矿有四、五百人，服务人员三十多个，管理森严，手段残忍。下窑者分四班，每班一昼夜上12个小时(每隔六小时换班)，每人拉煤必须达到一定数量，一进窑口就爬，根本站不起来。三天两头有死人的现象，在窑里有工伤死的，有累死的，也有病死的。死在窑里的，立即蒙上脸拉上来，名称叫拉“死耗子”，目的是尽量少让工人看到惨状，以免影响情绪。出了窑口就放一挂鞭炮，以崩去霉气，赶走丧魂。

有的工人不堪忍受这种虐待，逃跑了。逃跑者一旦被发现就用搭勾搭回来，在很长的一根竿子一头绑上锋利的铁钩，只要一勾上就勾进肉里，把你疼也得疼个半死。有的被抓着抬回来，扔到尿尿的冻池里，用你的体温把尿化了，慢慢就能把你淹没了。你如果不好好干活，装病或调皮捣蛋，就把你捆上放进“小阴子”里饿上两三天，从此你再也不敢装病或调皮了。

从此不难看出资本家、窑主们为了榨取工人的血汗，不择任何手段，真是恶毒至极。

(《房山文史资料》第12辑)

## 房良两县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王绍清

1948年12月14日、15日，房山、良乡两县全境解放。据史料载，房山城内摊商118户，良乡城内有摊商104户。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在这个方针指引下，房、良两县私营商业得到了发展，在经济建设中占了重要比重。据1952年调查，房山私营商业占全县销售总额的55.4%，良乡占51.9%。1953年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市场随之发生了变化，许多商品供不应求。当时，国家为防止私商囤积投机，又防止小生产者惜售及消费者抢购，采取对工业品实行包销定货，增加国营合作事业的批发业务。粮食、油料实行统购统销，棉花、棉布实行计划供应。除粮食由粮食局统管外，其它商品大部分由供销合作社为国家代购代销。这些政策的实施，使两县私营商业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而合作社事业日益发展壮大。1954年一季度，房山供销社零售额上升到78.2%，私营商业下降为21.3%；良乡供销社第三季度上升到66.6%，私营商业下降为23.8%。由于市场缩小，公私关系紧张，两县主要集镇一度出现“合作社在业务上忙死，私营商业闲死，群众买货等死”的现象，私营商业发生了困难。

1954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规定》明确指出，农村私营商业的改造，由供销社负责。两县供销社为贯彻这一精神，对私营商业进行细致的摸底，其情况是：房山有私营商业1077

户,其中座商307户,行商18户,摊贩752户,从业人员1496人,资本额210149元。良乡私营商业1695户,其中座商116户,行商207户,摊贩1372户,从业人员1908人,资本额304694元。

1954年9月,房、良两县按照上级指示对89户私营棉布商进行了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国营经销。为贯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对私改造”的方针,合作社在业务上采取“踏步走”,城镇地区合作社退让了部分商品的零售业务,给私营商业经营。为加强私营商业的经营管理建立批发部12处,为两县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

1955年3月,中共房、良两县县委按照河北省财经会议决定,成立对私改造领导小组,下设办事机构。要求国营公司、税务、工商、银行、工商联密切配合,广泛宣传。到1957年底,历时3年对两县2777户私营商业(除转农业者外)进行了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的形式有:公私合营24个,合作商店9个,合作小组12个,理发照相社7个,刻字洗染3个,对分散的小商小贩457户为合作社经销,27户保持自营。对私营商业的人员给与妥善的安置。2名安置在工商联任主任,7名任公私合营商店经理,大部分人员过渡到国营公司及合作社为职工,享受劳保待遇,股金按照规定到期全部还清,完成了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多方查证,现将房山公私合营情况概述如下:

房山城关杂货业公私合营,由私营座商广泰公、福源涌、吉顺成、荣福祥、庆合春等7户组成。资金总额8763.77元,股金8292.88元,年定息414.64元。资本家及资本家代理人股金5833.42元,年定息291.67元,私方人员股金2449.16元,年定息122.97元。从业人员28名,私方17名,公方代表2名,职工29名,工资总额1006.30元。

房山城关瓷铁业公私合营,由私营座商晋益长、天吉号、益合升及三家摊商组成。资金总额6449.66元,股金6449.66元,年定息322.48元。资本家及资方代理人股金3153.66元,年定息157.68元。私方人员股金3296元,年定息164.80元。从业人员14名,私方8名,职工4名,公方代表2名。

房山城关副食公私合营,由7户摊商组成。资金总额1966.95元,股金1368.84元,年定息68.44元。私方人员股金1368.84元,年定息68.44元。从业人员9名,私方人员7名,公方代表2名。

房山城关国药业公私合营,由私营座商恒隆泰、大生堂、南永合祥、广和兴组成。资金总额10709.13元,股金10623.97元。私方人员股金2246.59元,年定息112.33元。从业人员20名,私方人员10名,职工9名,公方代表1名。

房山城关百货业公私合营,由11户摊商组成。资金总额7742.28元,股金3763.7元,年定息188.20元。从业人员16名,私方人员14名,职工1名,公方代表1名,工资总额539.24元。

房山城关饮食业公私合营,由23户饭铺组成。资金总额1254.24元,股金1228.74元,年定息,61.44元。从业人员26名,私方人员24名,公方代表2名。

房山城关棉布业公私合营,由私营三环布店等13户摊商组成。资金总额2157元,股金869.75元,年定息43.49元。私方人员股金869.75元,年定息43.49元。从业人员7名,私方人员6名,公方代表1名,工资总额234.90元。

长沟杂货业公私合营,由私营座商三义昌、德益兴、天巨兴、三合成、福兴成、三义成、元记号、裕春祥、元兴号、德巨兴,杂货一、二小组,合作第二小组及7户摊商组成。资金总额21031.2元,股金16689.95元,年定息834.49元。其中资本家及资本代理人股金10983.65元,年定息549.18元,私方人员股金5656.30元,年定息282.81元。从业人员37名,私方人员24名,职工11名,公方代表2名,工资总额946.48元。

长沟棉布百货业公私合营,由私营座商华贞号、隆昌、百货业小组等14家组成,资金总额8053.06元,股金7190.56元,年定息359.53元。私方人员股金7196.56元,年定息359.53元。从业人员21名,私方人员19名,公方代表2名,工资总额605.40元。

长沟国药业公私合营，由私营座商利仁堂、太和堂、德和样组成。资金总额 5800.78 元，股金 5800.78 元，年定息 290.04 元。其中资本家股金 5170.18 元，年定息 258.54 元。从业人员 16 人，私方人员 5 人，职工 9 人，公方代表 2 人，工资总额 645.80 元。

长沟饮食业公私合营，由合作一、二、三组 35 户饭铺、饭摊组成。资金总额 1533.57 元，股金 1463.97 元，年定息 73.20 元。一般私方人员股金 1463.97 元，年定息 73.20 元。从业人员 36 名，公方代表 2 名，工资总额 1227.80 元。

大韩继杂货业公私合营，由 15 户杂货铺组成。资金总额 1059.44 元，股金 597.15 元，年定息 29.86 元。从业人员 9 名，公方代表 2 名，工资总额 359.9 元。

周口店油盐百货饮食合营，由私营合成杂货铺、益民百货店、福元昌杂货铺、老林春饭馆 17 户组成。资金总额 9036.95% 元，年定息 451.79 元。

（《房山文史资料》第 12 辑）

## 房良两县合并后的农村工作部工作

罗玉源 张 珍 张庆贵

1958 年春，房山、良乡两县以及原属门头沟区的河北小区同时划归北京市，建立周口店区。当时“两县一小区”的广大农村，刚刚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这次划归北京中领导，人民群众兴高采烈，社会主义热情十分高涨。认为农村实现了高级农业合作化，城市实现了全行业的工商业公私合营，好象已经到了社会主义，并看到了共产主义的曙光。所以，1958 年春夏之交，已经实现了取消土地入股分红、实行按劳分配的高级社的农民，还嫌自己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规模小，又在整村的、几个村的进行合并，创办大型的高级农业社。1958 年 7、8 月间，毛泽东主席视察河南省新乡地区，高度赞扬刘庄乡办人民公社的创举，发出了“还是人民公社好”的伟大号召。从此，全国又掀起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新组建的周口店区委农村工作部，就是面对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形势下开展工作的。

房山、良乡两县当时均属农业县。合并后的周口店区，有 70 多万亩耕地，山区占全区三分之二，农业人口 50 多万。面对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建立区委农村工作部是十分必要的。事实证明，区委农村工作部作为区委抓好农村各项工作和建设任务的参谋和助手，确实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回顾当年的农村工作，我们的印象非常深刻。

原良乡县委农村工作部由 10 人组成，部长罗玉源、副部长王树瑞、安成儒、李项荣和 6 名干事。原房山县委农村工作部由 11 人组成，部长吕镒、副部长袁德印、郭宴、隗合龙和 7 名干事。两个县的农村工作部共有 21 人。新建立的区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相继由吕镒、罗玉源、胡汉文担任；副部长有龚澎、王树瑞、杨德道、袁德印、黄启才、张占明。秘书是王洪元。干事先后有白璧、郎宝山、刘振祥、张庆贵、孟宪周、郝志常、张珍等。部长和干事总计 11 人，与原两县农村部干部数量相比，减少了 10 人，体现了精简原则。

农村工作部在区委统一领导下，上下一致，团结一心，互相协作，一人多能。特别是几位部长，谦虚谨慎，勤于思考，善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全部上下情绪高、干劲足，尽管当时工作忙飞累，经常是一天工作

十一、二个小时，又不休礼拜日，但大家心情舒畅。农村工作部的干部少、任务重，但多数能力较强，一般都是“三能”干部：能独立带队蹲点搞调查研究，能亲手写综合的或单行的文字材料，能与有关部门合作，共同与有关部门完成区委交办的几个部门共同的任务。

区委农村工作部的工作相当繁忙，往往新任务下来，要求急、要求高。为了防止手忙脚乱，顾此失彼，农村部最根本的工作方法，就是深入实际，抓住典型，掌握第一手材料，为准确、及时完成新任务打基础。所以，农村工作部的几位部长，除抓好面上工作外，还经常带人到农村蹲点调查，抓工作典型。当时农村工作部各方面的典型有：以勤俭办社、农林牧全面发展著称的岗上村；有年年粮食创高产的北市村；有大搞农家有机肥、变旱地为水浇地、抓耕作制度改革低产变高产的南韩继村；有大力发展养猪，走猪多、肥多、粮多之路，高产更高产的惠南庄村；有重视山区综合治理，在深山区创高产的富合村；有大力抓好大牲畜配种、提高畜群质量的北直河村；有原北京市的老典型、继续创业不停步的坨里村和上万村；有打破世俗观念、大力发展人工配种的原房山县配种站；有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献计出力，为农具改革服务的原房山县农机供应站。对这些典型，农村工作部多次调查推广，介绍他们的经验；对这些典型的社、队、单位的先进人物，都结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创业的新思路，农村工作部都掌握得一清二楚，为区委领导全面了解农村情况，提供决策依据、树立旗帜，起到了积极作用。农村工作部通过抓典型，形成了区委联系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桥梁，尤其区委书记李明聘请的24位农民参谋，他们来区里开会、办事必来农村工作部。

房、良两县合并划归北京市管辖之后，北京市委飞市政府对房山地区的工作相当重视和关怀，市委书记兼市长彭真同志曾多次视察房山的工作。我们记忆较深的有三次：第一次是视察南韩继村的高产典型，把南韩继村树立为全市粮食高产样板；第二次是视察北市小麦高产村，鼓励北市村要敢于超先进，号召广大农村开展“比、学、赶、帮、超”的生产竞赛运动；第三次是1961年夏季，我区山区暴雨成灾，山洪暴发，彭真同志乘直升飞机，视察洪水灾情，其中重点视察了十渡、霞云岭地区和富合村的情况，对我区发动干部群众开展抗灾夺丰收给予很大鼓励。

1958年至1960年，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同志被派到周口店区委挂职蹲点，任区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龚澎同志平易近人，工作扎实，和蔼可亲，经常在北市村、吉羊村飞石楼村蹲点调查，研究农村情况。1958年的7、8月间，全国农村出现了人民公社化高潮，她特别拥护毛主席在河南省发出的“还是人民公社好”的伟大号召，多次建议区委农村工作部领导要积极抓典型，推动我区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她身体力行，亲自为我区组织建立人民公社写了规划和公社章程草案。龚澎同志在房山蹲点挂职期间，她的爱人、我国原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同志曾两次来房山了解农村情况。每次来都是由罗玉源同志接待、陪同。有一次乔部长来房山，正赶上雨大河水猛涨，临走时罗部长用区委的加斯六九汽车送他，到良乡后，乔部长怎么也不让送到北京，执意去火车站乘火车回北京。龚澎同志在房山调研期间长期不叫北京她正在上学的儿子乔宗怀利用假期，曾两次来房山参加劳动，接受教育。

1958年大跃进初期，新华社总编秦川同志来房山农村蹲点，由区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十树瑞和宣传部的领导陪同在吉羊村搞调研，并亲自写调查报告，把我区大跃进的情况及时报告给党中央和毛主席。

从1958年9月全区实现人民公社化开始，利用每年冬春农闲季节，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整风整社运动。为了加强领导，北京市委抽调大批干部同我区里抽调的干部一起组成工作队、工作组，共同开展工作。每年市里来的干部，少则一百人，多则二、三百人。农村工作部的任务，一方面要投入干部参加区委组建的社教或整风整社办公室，负责掌握情况。另一方面协同区委组织部、区政府人事科负责接待，安排市、区干部组建工作队和掌握运动中干部工作的情况。

市、区社教工作队在社会主义教育和整风整社工作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和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用总结工作的方法，做到三落实：一是通过民主评议干部，对工作好的表扬，对工作差

的批评，对问题严重的进行处理，落实社队三级领导班子；二是通过发动群众，搞好冬季生产，落实新一年的生产、劳动和财务三大管理计划；三是通过民主理财，做到帐目公开，总结全年收入、开支、劳动用工，落实年终分配工作，做到分配兑现。

事实证明，区委农村工作部作为区委抓好农村各项建设和任务的参谋和助手，确实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四十年后回顾当年的农村工作，印象仍十分深刻。

（《房山文史资料》第12辑）

作者张庆贵系原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 房良合并后的第一次下乡

刘振祥

1958年4月，原河北省通县专区所属房山县、良乡县划归北京市，合并为周口店区。当时我在中共良乡县委农村部任干事。原房山县委常委吕镒同志为部长，原良乡县委常委农村部长罗玉源同志为副部长。当时的副部长还有杨德道、王树瑞、袁德印等。干事有王洪元、张珍、孟宪周、郎宝山、刘振祥、李贤、李信、张庆贵等。

当时正值春耕大忙，区委决定编成混合工作组支援春耕。我和良乡的几名干部随胡汉文（原良乡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与房山县的蔡景超、郑玉深等领导共十余人，分到去张坊、下滩的工作组。因为这是两个县合并后的第一次下乡，又是头一次进山，对我这个青年人来说，处处都觉得新鲜。

我们到张坊的第二天，分成几个小分队到各村检查春耕情况。我和良乡的两个同志，由乡书记徐建印带领到东关上村检查春耕生产。我们走河沟越走人越少，越走山越高，最后到了四面环山的一个小村子，徐书记说这就是人家不多的东关上村。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山上走，有的地方转弯时路窄只能一个人一个人的过，这跟电影中的“老虎嘴”很是相似，真是山高路险。

晚上我们住在一户老行家。这家的老大妈像见到亲人一样用小米饭、倭瓜粥、腌猪肉招待我们，并深情地跟我们拉家常。他们说：“现在不常见到你们了。战争年代，八路军、武工队跟我们可亲近了，推门就进，跟一家人一个样。今后你们可要常来呀！饿了吃饭，渴了喝水，晚了就住下，这里就是你们的家”。老人的一席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使我头一次感受到山高人亲情更深。

回到张坊后，各小分队碰了下情况，交换了意见，随后我们又来到了第二站——下滩乡。一位在房山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听说我要到下滩乡去，就高兴的对我说，下滩乡是房山的“乌克兰”，你好好看看去吧，比咱们良乡的平原还好哪！果然，一进入下滩乡各村（全乡包括下滩、土堤、蔡庄、镇江营、郑家磨、王家磨等村）的红果树成行成片，白色的银花遮满了天，树行之间种着小麦或水稻，我不由自主地叫起好来。房山的同志介绍说，现在的一片白，秋天就要变成一片红，红果压满枝头，那时还更好看哪。更为新鲜的是，这里用水方便，许多耕地靠自流水灌溉。原来拒马河从这乡经过，通过渠道，自流水环绕各村流入耕地。这里盛产小麦、水稻、玉米，土地肥沃，产量很高，被誉为房山的“乌克兰”一点不假。

下滩乡书记杨文辉、乡长赵秀热情地安排我们的食宿。当时每人一个月才半斤食油，而且我们都已由机关领取了，这次破例从供销社专门批了几斤食油，算是对我们的照顾。就这样，我们工作组十几个人算在下滩乡安营扎寨了。

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天等于二十年”等在下滩乡也反映了出来：听说庄稼浇人尿可以增产，各户早上就把尿盆放在自家门口，生产队派专人担桶逐户收尿，然后再浇入庄稼地里；说是要见缝插针夺高产，农民们连自家祖宗的坟头也不放过，一个个坟头除得光光的，从顶端到平地像螺丝转一样搞成小梯田点种上玉米，苗长出后逐棵浇大粪稀，并立上牌子写着：“祖宗要剃头，帮我们争上游”；说是加强果树管理，成千上万棵红果树，打药除虫涂白，几天时间全部搞完。各村都张榜公布本村的跃进指标。蔡庄村的指标低一点，土堤村便给蔡庄画了个老牛贴在墙上。蔡庄村支书蔡景升立刻贴出大字报，上边画了一架飞机，写着“土堤，土堤，不要吹嘘，你骑快马，我坐飞机”。下滩一位老太太把粮食装入大缸，埋在猪圈里，不料被猪哄开了缸盖，大口的吃粮食，很快有人将这一情况画出了一幅猪在圈里哄开缸盖吃粮食的漫画，并写着：同志们，快来看，老太太粮食在猪圈。

在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农村时常出现缺粮，不少农民喊粮食不够吃，我当即写了《不是缺粮，是缺少社会主义思想》一文，寄给《北京日报》。由于符合当时的思想潮流，很快报纸就登了出来。回到房山机关后，主管农业书记刘永国同志见到我笑着说：“振祥，小稿写得不错，不是缺粮，是缺少社会主义思想啊！”虽是表扬，但听得出话中有话，只是作为领导不便直言，因当时农村粮食不足已开始暴露出来。正因如此，一些农民把粮食藏起点儿，储粮备荒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次下乡时间虽然不长，且又过了四十年，但至今记忆犹新，耐人寻味。

（《房山文史资料》第12辑）

## “大跃进”时期的长沟人民公社

魏志华

长沟公社于1958年9月7日建立。建立公社那天，在南正村北的大场召开了有各级干部、部分群众代表六、七千人参加的庆祝大会。会上有区、公社领导讲话，多方面的代表发言。会后有高跷、太平鼓、秧歌等几道花会，非常热闹。公社成立后，社址就设在原长沟乡院内。公社党委的主要领导是：党委书记蔡景超，副书记隗合龙、袁德印、杨洪仁、柴振江。下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纪检会。管理委员会的主要领导是：主任隗合龙，副主任常训、杨翠秀。下设办公室、农业部、工业部、财贸部、文教卫生部、政法部（包括派出所）、劳动武装部、生活福利部、计划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另有共青团、妇联会。公社机关干部、职工60多人。公社下辖赵各庄、五侯、天开、北正、甘池、南尚乐、石窝、下滩、白岱9个管理区。当时的公社是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公社党委就是乡党委，公社管委就是乡人民委员会（乡政府）。那时公社的最大特点是“一大二公”，即规模大和公有化程度高。取消了原来高级社实行的“三包一奖”，实行公社核算。当时的长沟公社是由原来的赵各庄、岳各庄、长沟、石窝、下滩、张坊6个乡、90个村、83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的，有17030户，76648人，耕地133360亩。东起赵各庄乡的西东、郑庄，西

至张坊乡的东关上、穆家口村，总长 70 多华里，总面积 378 平方公里，山区、丘陵占多一半。

人民公社建立以后，广大干部、群众的政治热情很高。当时正在贯彻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同时认为建立了公社很快就要实现共产主义，人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掀起了大办农业、大办工业的热潮。农业上搞了几项大的农田基本建设，搞了一座中型水库，一条长 46 华里的“三八”大渠。天开水库能蓄水 1500 万立方，虽然渗漏不能常年蓄水，但从根本上解决了下游的洪涝灾害。“三八”大渠从张坊乡的片上及南尚乐乡的石槽沟两处引拒马河水，经张坊、南尚乐、长沟、五侯到赵各庄，这个大渠经过南泉水河、北泉水河、牯牛河，搞了 300 多米长的渡槽。后来因连年干旱，拒马河水源不足，加之管理不善，灌溉面积逐年减少，现在大部已不能使用。

公社化期间，乡村工业发展较快。公社较大的企业有白云石厂、造纸厂、地毯厂、修配厂、草炭厂等，社办企业职工 1000 多人。这不仅增加了公社的收入，支援了农业，也为以后乡镇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公社还购买了几台大、中型拖拉机，建起了农机站。公社化以前，不仅没用过拖拉机，不少人连看也没看见过。公社化以后实现了“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公社化期间，长沟还出现了不少先进典型，受到国家和市里的表扬。天开村的才德龙、惠南庄村的杜宝珍，曾出席全国民兵代表会议。下滩管理区的农业、石窝管理区的畜牧业都受到国家的表扬，1958 年出席了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长沟公社的农业也是市委的重点，多次在长沟召开了农业现场会议。

公社化期间，公社的工作非常紧张，生活很艰苦。不休星期天，没有节假日，经常打夜班。不论是一般干部还是领导，经常下乡调查研究，参加劳动，与群众同甘共苦。当时各村都是十路，好天骑自行车，雨、雪天路不好走，就靠步行。公社党委书记蔡景超，原来是房山县委常委、财贸部长，也整天骑车下乡，每天走几十里路。公社主任隗合龙，年龄较大，不会骑车，步行下乡。1960 年公社机关食堂撤销，机关干部到附近农民食堂吃饭，要帮助食堂做淀粉，经常吃淀粉窝头。对办公室打夜班的同志照顾一下，也只是每次打夜班自己从机关买两、三个冰茬柿子。虽然当时生活艰苦，但没有丝毫怨言，干劲仍然很足。修天开水库时，平时上两、三千人，突击时上五、六千人，各级干部带头劳动。寒冬腊月，不少人光膀子推小车，有时昼夜突击，两、三天不睡觉。

由于大跃进时期的人民公社是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对社会主义的性质并不真正理解，因此出现了不少问题。突出的是“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和强迫命令瞎指挥。主要表现，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分配制度上，取消了按劳分配，实行了“大锅饭”。公社化前高级社对生产队都实行“三包一奖四固定”。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公社化后取消了“三包一奖”，实行公社统一核算。生产大队、生产队的财产、树木、车辆等生产资料全部归公社所有，公社可以随意调拨。社员的自留地、自留树全部收归集体。对社员实行供给制，实行“五包”（包吃饭、包烧煤、包看病、包儿童上学、包养老）。听说吃药不要钱，不少人排队到公社医院看病，时间不长就把公社医院吃垮，被迫取消了“包看病”。有些重病号、老病号到北京大医院去看病，从公社借钱，有的是公社开信，医院找公社算帐。吃饭不要钱，认为到共产主义了，随便吃。外村、外县的人在车站等车，也到食堂去吃饭。后来改为供给制加补贴，伙食部分是根据国家留粮标准，将社员的口粮、菜全留在公社，公社按标准发给社员伙食证，社员凭证到食堂吃饭，公社按总收入的 10% 作为津贴，按人评定等级发给津贴。

二、吃饭食堂化。1958 年 7、8 月份开始搞食堂、办托儿所，是为了解放劳动力。公社化后把食堂作为政治问题，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问题，不论男女老少，都必须到食堂吃饭，反对食堂就是反对社会主义。有些人因说了些对食堂不满的话而遭到批判。有的户把家里的锅碗也砸了，这不仅浪费了粮食，也给群众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居住分散的村，吃一顿饭要走几里地，特别是老弱病残，生活更无法照顾，群众极为不满。实行食堂化，群众不做饭，社员养猪也大大减少，吃肉非常困难。办食堂也发生了严重的平调现象，全

公社借社员房屋 2800 多间,各种家具 10270 余件。特别是吃食堂时社员要把自己家里多年节约的粮食全部交给食堂,平调现象极为突出。

三、生产上的瞎指挥极为严重。公社化时期,生产计划、管理措施都由公社管理区决定,生产大队、生产队只是生产单位。推广先进技术不是因地制宜、实事求是,而是领导说了算。公社在南尚乐搞千亩丰产方,不是合理密植,而是越密越好。种麦深翻几尺,播种量每亩有的四、五十斤,有的二、三百斤,最多的七、八百斤。到 4、5 月份就倒伏,又绑麦,又拔苗,有的连籽种也没收回来。五侯管理区实行作物区域化,玉米播种定向化。西边几个丘陵村是白薯、花生区,岳各庄、五侯为玉米区,东西南章、七贤是多穗高粱区,属于什么区全村一律种同样作物。收种玉米、高粱时,西边几个村的劳力要走几里、十几里地到东边干活。收种白薯、花生时,东边几个村的劳力要到西边几个村干活。每天由管理区调拨、派活。农民每天干什么活,事先谁也不知道,给农业生产造成很大损失。玉米播种定向化,就是种玉米时人工点播,一粒一粒的摆好,籽种的方向必须一致,出苗后叶子按一定的方向生长。修天开水库、“三八”大渠、万头猪场,也有很大的盲目性,缺乏细致地调查研究,凭主观想象办事,其结果是劳民伤财。

另外,还有些地方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即把劳力按军队编成班、排、连、营,男女分组,集中吃住,集中干活。一家人要到几个地方去住,公社曾在潘庄村召开过现场会。

四、大炼钢铁。1958 年 8 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并作出了大炼钢铁的决定。于是,全国在“超英赶美”的口号下,开展了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长沟公社成立后,在岳各庄乡二龙岗村边建起了炼铁厂,筑起了小高炉,工人有 60 多人。当时长沟没有通电,买来发电机发电,昼夜不停。虽然炼出了铁,但因当时技术、设备所限,根本不能用。特别是因本地矿石很少,废铁又收不上来,到 1959 年初被迫停产,造成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当时的口号是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

由于大跃进时期领导上“左”倾思想的错误,取消按劳分配,吃大锅饭,一平二调,穷富拉平,以及生产上的瞎指挥,强迫命令,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生产和各项工作都受到很大影响。1958 年本来是个丰收年,但有些地方的粮食、果品未及时收回,损失不少。加上以后的自然灾害,形势越来越严重。到 1960 年农业减产,不少地方亏粮,实行“低指标,瓜菜代”,发动各村各食堂用玉米皮、玉米轴做淀粉。由于粮食指标低,副食少,吃不饱,不少地方发生浮肿病。农业减产,不仅给农村工作和农民的生活造成很大困难,同时对工业建设和城市人民的生活也有很大影响。

党中央对人民公社问题很重视,1959 年后连续召开几次会议,针对人民公社出现的问题,制定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市委、区委每年都召开一次大型农村工作会议,讨论人民公社的问题,开始整风整社,纠正工作中的错误,特别是从 1960 年 12 月开始,农村普遍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历时四、五个月。这次整风整社是以贯彻中共中央《十二条指示》为中心,开展了反“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的特殊风”、“强迫命令风”)进行全面退赔,对食堂也进行了全面整顿,使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到 1961 年 7 月,根据中央、市委的指示,历时三年的大公社解体。长沟公社解体后,把原来的 9 个管理区划为赵各庄、五侯、天开、长沟、南尚乐、张坊 6 个公社。原来的下滩乡与南尚乐乡合并。五侯、天开两个公社于 1964 年“四清”时又并为岳各庄公社。

公社体制变动后,经群众讨论,一部分群众退出了食堂,一部分党员、干部怕挨批评,怕犯右倾错误,仍留在食堂。到 1962 年农民食堂全部解散。

1962 年,经过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普遍推行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政策,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逐步提高。加之各级领导的扶持,农村形势逐步好转,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逐步得到恢复。

## “大跃进”时期的几个浮夸典型

张本荣 口述 张 珍 整理

1958年，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运动高潮中，党中央、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又掀起了贯彻落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房、良两县刚刚合并建立北京市周口店区也和全国一样，高举三面红旗的口号叫得最响，行动也很快。8月底9月初，仅仅十几天的时间，把全区二、三百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改建成为六个大型人民公社，即良乡公社、琉璃河公社、房山公社、长沟公社、马安公社和百花山公社。当时我任良乡公社党委书记。区委开始建立书记处，李明任区委第一书记，书记处书记有张令德、刘永国、曹庶民、张革夫四人，曹庶民兼任区长。

那时，全国都按党中央指示，反复深入开展反保守、反左倾、鼓干劲的政治运动。在多快好省总路线的指引下，要敢想敢干，超英赶美。在农业战线上，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以及“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全党全民齐参战，共产主义早实现”等“左”的口号，全国形势发展很快，普遍掀起了大跃进的新高潮。各级领导都要克服保守思想，防止右倾。搞得干部人人自危。工作上大鼓干劲，力争上游，并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放出大跃进的“卫星”。良乡公社从1958年秋开始，在大搞农田水利、大搞养猪、大炼钢铁、大搞食堂、大搞农具改革等一系列大搞活动中，迟迟放不出像样的跃进“卫星”，几次受到区委书记李明的批评。如在一次区委召开的工作会上，李明点名让我搞点什么“邪”的。因此，我们党委多次研究怎样打破保守思想，赶上形势发展，怎样放出使领导满意的“卫星”。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搞了不少浮夸的、形式主义的典型。其中最突出、造成损失最大的有以下几个：

### 四级书记的小麦高产试验田

1958年秋，我公社坨里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华，去河南省新乡地区参观回来后，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到良乡公社找到我，简要汇报了参观的情况后说：“张书记，咱们尽去外地参观，学习别人的经验，难道咱们就不能搞个高产典型吗？咱们不能放个“卫星”吗？我打算跟您一起，在我们村搞一个小麦高产点，计划亩产10万斤行不行？”我当时正想搞个出色的典型，想起李明书记提出让我搞点什么“邪”的，这一来迎合了我的需要。所以，我马上答应：“你回去党支部讨论讨论，搞个生产计划”。郭华同志在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一直是北京市抓的典型，是北京市劳动模范，完全可以信赖。他回去几天后，又到公社党委来汇报，说党支部讨论决定搞一个亩产50万斤的小麦高产典型。我听了以后，觉得事关重大，就问：“你跟坨里管理区张廷库书记说了吗？”郭华讲说过，他们同意。我说那好，把张廷库书记也算上，咱们搞个三级书记试验田，你回去找张书记商量好，弄个生产计划。等郭华回去又跟张廷库书记商量后，又提出搞亩产100万斤的小麦高产典型。亩产百万斤，这明明是个笑话，但我不敢泼冷水，没说不行，觉得这事应当向区委汇报，请示区委同意后再行动。我用电话向李明书记作了汇报，并提出请李明同志也参加这个试验田。李书记在电话里表示同意。于是，我马上用电话告诉郭华同志，说李明书记也参加这个试验田，并让郭华写出“四级书记小麦高产试验田”的牌子插在地里。

在郭华同志的具体指导下，为了实现亩产100万斤的高产计划，采取的种植方法是：在一块2.7亩的耕

地内，深翻5尺，把准备为200亩种麦用的200万斤粗肥，集中用在这2.7亩深翻的土壤中。通过深翻，把这2.7亩地堆成三个立体梯形的大土丘，这样可以种到五个侧面，即东西南北面和顶面，扩大了种植面积。同时搞密植，共播种小麦种子3000多斤。用人工降雨的方法浇地，即在每个大土丘上搭起高架，把水提到高架上喷灌浇水。当时因这块高产试验田的指标定的出奇，惊动了全市，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甚至全国的小麦专家、高级科技人员以及市农口的领导同志都来帮助策划和指导，并给予鼓励。如市农口一位领导同志说，你们只要管理好了，实现一百万斤指标可以嘛！在场的那么多专家、科技人员竟没有一个人否定。记得当时有个苏联青年代表团去上万村参观京白梨生产，路经这块小麦高产试验田看了看，觉得这样种法很新鲜，看了亩产100万斤的牌子，问我们用麻袋装上麦粒在这块地上能否摆一百万斤？坨里管理区的干部刘振邦同志对这样投入大量劳动力，浪费人工、种子的作法时说，这三个大土丘是血汗堆。为此，他被扣上反对大跃进的帽子，由坨里管理区调回公社，受到多次批判。虽然后来为他平了反，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对不起这位敢于讲真话的好同志。

这块高产试验田的最后结果怎样呢？由于小麦种得过密，全部倒伏，小麦只长了秸子，二亩七分地只收回一百多斤小麦，这是一次十分严重的劳民伤财的教训。

### 后闫村大队穷过渡的典型

后闫村是本公社大紫草坞管理区的一个小村，因为村小，户数、劳动力和耕地都少，村内未分生产队，所以叫小大队，生产搞得很好，亩产玉米700多斤。当时管理区的书记是罗兰堂同志，大队书记是裴振邦同志。

为了体现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共产主义优越性，我带领管理区和大队的书记，在这村搞了从生产到生活实行“九包”的典型。所谓“九包”，就是从生产到生活，全由大队和公社包起来，一切消费、开支都不要钱了。全村社员集体吃食堂，从幼儿园到小学，社员子弟上学不要钱，社员看病、吃药飞住院由公社负责支付，社员劳动不记工分，定时定量发生活费，生产所需的种子、化肥、牲畜喂养及农机具的购置等，都由大队和公社统一筹划。当时山于从公社、管理区到大队都没有像样的工副业收入，农业生产水平和收入很低，加上有些社员群众思想觉悟低，造成极大的浪费，结果使所谓“九包”很快就处于困境。尤其是包社员看病，使公社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每天都有不少社员到大公社去开介绍信，去良乡医院或北京大医院看病，记大公社的帐，不足一年时间，良乡大公社欠北京友谊等医院款高达几万元。这笔款公社根本无法偿还，最后都不了了之。

### 学稷山的卫生典型

小董村也属大紫草坞管理区，我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张玉田一起搞这个典型。

当时中央号召学稷山、赶稷山，实现农村卫生化。所谓学赶稷山，就是搞群众性的卫生运动，即在这个村发动群众，大搞农村卫生运动。提出人手一条毛巾，全村从社员各户的室内外到街道，一律用白灰涂墙，达到四白落地，街道痰盂化，从大街到各个角落，要求达到“四无”，即无蝇、无蚊、无鼠、无麻雀。小董村的群众性大搞卫生的典型，市曾在那里召开现场会，声势很大，名扬区内外。全市各区县主管卫生工作的书记、卫生部长、局长等都来参加会议。这个村的十部、群众投入了大量的劳动，支部书记张玉田说：我半个月没合眼，把人都累坏了。结果，这个卫生典型只是一哄而起，没坚持多久，就无声无息了。

## 坨里村大炼钢铁的典型

当时，为了超英赶美，完成全国 1070 万吨钢的生产计划，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办法就是搞土高炉炼铁。良乡公社为了争上游，党委从各大队抽调集中八百多名强壮劳力，在坨里村集体吃住。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无偿收集各村的砖石木料，砍伐各村的成材树木，建起了一百个土高炉，每个炉子都用柴禾点燃，社员日夜守在炉旁。当时根本没有炼铁知识和技能，八百人日日夜夜地辛苦劳动，结果一斤钢铁也没炼出来。

大炼钢铁运动是这样，其它工作也是同样，浮夸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等错误表现得相当充分，教训非常深刻。

（《房山文史资料》第 12 辑）

## 房山大炼钢铁运动的片段

刘振祥

要把我们的国家建成一个独立富强、不畏强暴、不遭侵略，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国家，就必须把工业搞上去。在建国之初，我国工业最大的薄弱环节是钢铁工业，而解决这一薄弱环节的办法是什么？当时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大搞群众运动”，这曾被认为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因此从 1958 年夏开始，一个来势迅猛、大搞炼铁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展开了。当时我在区钢铁办公室工作，下面是我回忆房山大搞炼铁运动中的片段。

根据上级要求，周口店区委研究决定：抓炼铁要书记挂帅亲自抓，主管领导全力抓，抽调专人重点抓，全党各条战线要同心协力共同抓。总之要全民动员，全力以赴抓炼铁。首先以原工业办公室为基础抽调干部设立了钢铁办公室，并抽调几十名中层干部分赴基层抓重点，当时的口号是，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而且要把钢铁当作“元帅升帐”，其他一切都要服从和让路。钢铁办公室负责上报下达和与各机关、基层联系。工作开始非常紧张，从区武装部调出张福深专门负责办公室专用电话。真是枕戈待旦，昼夜不停。电话不通急得他跟电话员说：“我的姑奶奶，你快给我接吧！”不料这句半开玩笑的话被区委书记听到了，立刻遭到批评：“什么话，太不严肃了。我们是执政的党，这不成！”并立即召来邮电局长（当时邮政电信是一个局）当面讲清，电话也一样，必须为大炼钢铁服务，其他都要让路，必须保证钢铁办公室电话的畅通。果然真灵，后来只要是钢铁办公室的电话，一拨就通。

区委工业书记张令德、工交部长秦芝儒、工业局长顾宪图等为全区主持工业的核心。我从农村部调到工交部任干事，给工业领导当助手，主要搞资料，全力投入钢铁办公室工作。

各公社大搞炼铁行动快，效果好，有规模的要算城关公社，副书记任显同在顾册蹲点搞十来个小高炉，而且炼出了铁。全区在这里召开了现场会，推广他们的经验，有些外国朋友也到顾册炼铁厂参观，他们看到小高炉上写着“超英炉”、“赶美炉”，比比划划不知在说些什么，似乎不太理解。现场会后，霞云岭、河北、坨里、崇各庄、长阳、良乡、窦店、琉璃河、长沟等地都行动起来纷纷建小高炉。长沟公社工业部长崔风瑞在二龙岗建起三八妇女炼铁炉出了铁向区委报喜，我们办公室总结了他们的经验并进行了报导。《北京日报》

很快发表了三八妇女炼铁炉出铁的消息。建小高炉需大量的耐火土、耐火砖、炼铁又需大量的铁矿石、石灰石和煤炭等，困难重重，但再大的困难也阻挡不了群众大炼钢铁的热情。崇各庄乡晓幼营村干子土(耐火土)成了建小高炉的必需品和抢手货，各单位纷纷来房山求援购买干子土，当时办公室抽出孙玉德专门应付此事。我们自己得天独厚有了干子土，陶瓷厂烧制出耐火砖，各公社集中能工巧匠，建炉问题就基本解决了。在市府的帮助下，区工业局建起了几十人的地质队伍，跋山涉水，日夜奋战，首次普查了全区范围的矿藏。四马台、大安山的白煤可以炼铁，陈家坟、黄山店铁矿石可开采炼铁，白云石山的白云石可以炼铁。时间不长这几处的山上就响起了轰隆的炮声，农民们开始开矿了。但各处的小高炉急等铁矿石炼铁，各村由于搞食堂化，吃大锅饭，各户的小锅灶已用不着了，于是出现砸锅炼铁的热潮。总之，不管效果如何，全区范围大搞炼铁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在大搞炼铁的现场上，高炉林立，烈火冲天。选料、碎料、运料、上料和在炉前操作的农民们不怕饥渴脏累，不怕烟熏火烤，饿了吃几口，困了合会儿眼，醒了接着干，什么工资、福利、劳保都没时间去考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我们办公室的同志也不轻松，办公室就是战场，没有节假日，日夜不能离岗位，就是房山城内的家也不能随便叫去。从银行抽到办公室的干部傅治权，几个礼拜都没回家次，虽然离家只几步远。当区委接到霞云岭公社汇报，上石堡建起几个小高炉，就是炼不出铁来，要求支援指导时，正是阴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办公室马上抽出齐玉和、赵振南、邢克良、张仲典、王润、刘振祥等近10名干部，由主管书记张令德亲自动员，要求立即出发赶到霞云岭公社帮助那里尽快炼出铁来。晚饭后，我们背上行李由熟悉路途的邢克良领路，大家边说边唱兴高采烈，经周口店进黄山店爬棺材山步行十多个小时，终于到达霞云岭公社。稍事休息后，我们又步行到上石堡的炼铁工地，立即投入战斗。根据顾册等地的炼铁经验，就地指导试验。经过一天一夜时间终于炼出了铁，大家惊喜不已，立即向区委报喜，我们这才算松了一口气。

工业战线大搞炼铁火热朝天，可农业战线却叫苦连天。农村青壮劳力都去搞炼铁，谁去收秋，谁去种地，可难坏了农业战线的同志。农村部副部长王树瑞向区委领导汇报时说：“现在农业正忙，可广大农村只有“三个军”了，这就是一个“余太君”，一个“娘子军”，一个“童子军”。区委第一书记李明和几位副书记，过去都曾是抓农业的一把手，他们熟悉农业，对农村现状，他们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可又束手无策。不仅如此，根据当时形势，对大搞炼铁还要进一步推向高潮。李明书记眼见中央领导亲自出面抓炼铁，北京市委彭真等主要领导到房山检查炼铁情况，又鼓励又鞭策，异口同声谈炼铁，这时他再也坐不住了，把工业战线几位领导和我们办公室的少数同志找了去。一是搬阻力，二是给任务。提出全区要搞到一千个小高炉同时点燃，同时出铁，达到声势大、震动大、效果大，一鸣惊人。后来虽经千方百计，竭尽全力去作，终因任务太大，困难太多，实在是力不能及，未能实现这一计划，不然将会造成更大的不可估量的损失。

回想那场声势浩大的大炼钢铁运动，给后人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

(《房山文史资料》第12辑)

## 我印象中的岗上村

杜绍文

岗上村位于房山东北约二十华里的崇各庄乡。1965年，该村被中共房山县委、房山县人委(政府)命名为十二面红旗单位之一。

说起解放前的岗上村，是个丘陵坡地多，土质瘠薄，十年九旱，粮食一年亩产只有几十斤，是远近闻名的“穷三多”(给地主富农扛长活的多、外出逃荒要饭的多、光棍多)村庄。

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岗上村坚定地走社会主义的集体化道路。自1952年办农业初级合作社以来，坚持自力更生、勤俭办社，开展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改变了贫困落后的面貌。六十年代的岗上村把过去的“穷三多”变成了粮食多、收入多、储蓄多的“新三多”。

1964年，全村129户、564口人、1787亩地。粮食亩产达到403斤，比人民公社化前的1957年提高了44%，平均每人占有粮食1082斤，提前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指标。总收入达到132233元，比1957年提高了81%，平均每户收540多元，人均125元(扣除按人头份从生产队分得粮、油、菜等实物后的现金收入)。大部分社员户家有余粮，家家安上了电灯，很多社员有了收音机，买了自行车，80%的社员在信用社里有存款。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

岗上村党支部班子，是一个热爱集体，密切联系群众，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好班子。党支部书记吴春山，一个心眼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处处走在群众的前头，人们都称他是“革命的老长工”。13名队干部当中有10名是在土改时期和吴春山一起成长起来的，形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领导集体。在我国连续遭受自然灾害的三年里困难时期，岗上村党支部带领社员群众自觉地为国家分忧。1960年春天，北京友谊医院请吴春山去做报告，他看到首都市场上非常缺少蔬菜，回村后的当天晚上立刻召开党支部大会，向全体党员讲明首都市场缺菜的情况，提出要解决首都市场人民吃菜的困难。经过充分讨论，大家认为上级虽然没有分配给我们种菜的任务，但为了首都人民的生活需要，一致同意拿出200亩粮田，播种一茬蔬菜，同时在一部分粮田中间套种蔬菜。以帮助国家一起渡过暂时困难时期。截止1964年底累计交给国家余粮85万斤，皮棉18500多斤，油脂20900多斤，蔬菜140多万斤。

岗上村不仅对国家贡献大，同时也没忘记对兄弟社、队的友谊和支援。该村大牲畜的饲草每年都有10多万斤的富裕，在三年困难时期，饲草同粮食一样的紧缺，有人找到村里要用8元钱100斤的高价购买，被他们拒绝了，后来坚持以平价4元钱100斤卖给缺草的社队。他们有育白薯秧的经验，每年都要多育四十铺炕的薯秧，均按平价支援给兄弟社队。吴春山常对干部们说：“咱们富了，不要忘记支援有困难兄弟社队”。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干苦干，不当伸手派，是岗上村人的传家宝。1952年10户贫农创办了原良乡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生产从耕种到收运靠人拉、肩挑，夺得了第一个农业丰收年。秋后除社员按股分红外，还留下5000多斤粮食作为公共积累，以便扩大再生产，从第二年起入社的社员逐步增多，社的规模不断扩大，他们依靠集体的力量和社员群众的一双手、一条扁担，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改良土壤。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到1964年，共打出砖石井27眼，修建库容10000立方米的小水库1座，扬水站5处，扩大了水浇地面积500多亩，垒大小谷坊坎、闸沟垫地72道，开边展堰增加耕地面积360多亩。从此，岗上村的生产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粮、棉、油、菜等产量一年一个新台阶逐年提高，1964年底集体积累资金达130万元。

生产发展了,日子富裕了,但岗上村人勤俭办社的光荣传统始终没有丢。吴春山经常对干部、群众说,“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一分钱也要掂量着花。因此,岗上村人对发展生产所需的费用,坚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处处精打细算。生产上所用的犁、耩、耙等生产工具,都是群众自己动手,能自己制的自己制,能自己修的自己修。同时,他们还有计划的培养出铁匠、木匠、瓦匠和电工等一批技术人员。岗上村不仅在生产费用方面处处勤俭,在非生产费用开支方面算的更紧,管的更严。村里明确规定:干部办公要节俭,村里不设招待费。无论什么人来村里,集体从没有招待过烟、茶,更没有招待过吃喝。村干部开会、办公从没有发过一分钱补助。因此,岗上村自办社以来,除1952年办社的头一年,为了发展养羊,向国家贷款1036元,1954年本息还清后,做到了从来上不欠国家的,下不欠社员的,而且集体积累一年比一年增加。

岗上村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始终坚持多种经营,积极发展林、牧、渔业生产。在林业生产方面,他们实行统一规划,林牧结合,合理布局,种抚并举。自己动手,利用树枝育苗,每年发动群众有计划的将所有沟、坡、道旁、场边和林子周围所有能植树的地方都栽上树。到1964年全村共植树20多万棵,其中果树8万多棵,每人平均230棵用材树,150多棵果树。那些年集体和社员户共建房近三百间,建猪舍近百间,兴修水利和架电线等所需木材,完全靠自己解决,没有向国家要过一分木材指标。岗上村所以造林能成林,而不同于有些村造林不见林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造林与抚育并举,造林与护林并重。为了保护好林木,由分管林业生产的干部负责吸收牛、羊倌、大车把式和护林员参加,组建成护林委员会,并发动社员群众讨论制定护林公约。公约规定,爱护树木人人有责,谁损坏了树木,损坏一棵要补栽活十棵。有一次,队干部武德龙的骡子啃坏了集体的树,按规定,他自买树秧补栽了100棵。从此以后,大家都很注意保护林木,形成了不仅人人造林,而且人人护林的良好风尚。

在畜牧业生产方面,他们十分注重大牲畜的饲养和繁殖。吴春山曾说:“畜牧半个家,耕、耩、驮、拉、造肥全靠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大牲畜的多少、强弱,是代表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力水平的一个标志。办社初期,岗上村只有6头毛驴。1953年吴春山用自己出席河北省劳模大会奖给他的五百万元(折合人民币五百元)奖金,为集体买了两匹马,以壮大农业合作社的经济实力,因此也就开始了岗上村自繁自养大牲畜的发展历史。到1964年累积发展了400多头大牲畜。除留足自用和自然淘汰外,全部以平价支援兄弟社队,每年平均出售20头左右。自己保持在80头左右,平均20亩耕地就有一头大牲畜。在发展大牲畜的同时,岗上村每年还向国家交售肉猪、肉羊各100多头(只)。随着畜牧的大发展,自然就造出大量的农家肥料,对改良土壤,增加地力,提高农作物的产量起了重要的作用,实现了农、牧业的良性循环。

岗上村畜牧业生产发展的成功经验,一是农畜结合,统筹规划。他们每年在安排农业生产计划的同时,安排畜牧业生产,根据畜牧业所需的饲草、饲料安排各种农作物的种植计划,保证牲畜每年都有足够的饲草、饲料。每年秋收时都设专人负责,将各种可做内饲草的秸秆分门别类的贮存好。二是精心喂养和选料结合。吴春山有句格言,“书靠讲,地靠耨,牲口全靠人喂养”。同时他经常说:“牲口不认爹和娘,但要草好、料巧油肚肠”。根据这些饲养要领和多年的实践积累了一套按不同季节喂不同草料的经验。三是繁殖与使役相结合,使役服从繁殖。具体作法是,春秋配料躲过大忙季节,下驹赶上丰草季节,使役服从配驹,千方百计不让母畜空怀。凡怀孕六个月的母畜,做到“五不”,即不出远门,不拉重载,不驮重驮,不拉碾磨,不架辕。

在副业生产方面,他坚持农、牧、副结合,就地取材,开办了粉坊、豆腐坊、油坊等。一方面为农产品深加工,以增加集体收入,同时又满足了社员群众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把农副产品加工的下脚料,用做牲畜所必需的饲料,从而又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他们还利用村建的小水库,在全县首先发展了养鱼事业。

今天回顾岗上村人的光辉业绩,不仅是为了怀念岗上村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更重要的是用它来激励后人,把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得更加辉煌,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富强。

## 石窝胜天渠修筑过程

马向凤

渡槽飞架南北峰，恰似巨龙腾半空，  
举目眺望长流水，口里不住赞愚公。

这是当时南尚乐地区流传的一段顺口溜，赞扬胜天渠工程的雄伟及其作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 and 力量。

南尚乐镇石窝村，有 700 多户、2700 多口人、2640 亩耕地。村南有 1600 余亩平川地，依靠拒马河水灌溉。由于连年干旱，加上上游修水库建扬水站，河水逐年减少，致使河水每到开春都要断流。石窝村是拒马河石槽沟三支渠下游，水流不出多远就干涸了。1962 年，小麦浇了一水，套种玉米也播上种，由于严重干旱，小麦严重减产，大秋也收成无几。那几年，年年闹粮荒。1962 年粮食总产只有 50 余万斤，单产才 200 多斤。为了改变落后面貌，做到旱涝保丰收，1975 年秋天，该村在县委和政府的领导下，组织社队干部去河南参观学习辉县的农田水利建设工程。社队干部进一步解放了思想，鼓起了干劲，一致认为人家能办到的事情，我们也一定能办到。经过调查研究，公社党委决定以石窝村为重点，大搞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由下营村引水上山，保证村南 1000 多亩好地旱涝保丰收。

任务目标确定之后，边发动群众，边备料施工。同时提出：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自力更生，不要国家一分钱，自己任务自己干。党员干部带头，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大干 180 天，一年任务半年完。在做好一切准备的基础上，于 1975 年 11 月动工，1976 年 7 月完工。水渠全长 2500 米，其中浆砌石明渠 500 米，暗渠 350 米，水泥管 50 米，跨跃两座山头，穿过一条公路（房山一张坊公路），筑起一座长 200 多米 11 孔块石拱渡槽，最大跨度 10.5 米，高 5.5 米。过路石拱共用 40×40 厘米的块石 7 万余块，折合石料 3000 多立方，用水泥 400 多吨，白灰 400 多吨，沙石料 21000 多立方，用工 6000 多个，其中义务工占三分之一。经统计，实际投资 15 万元。水渠修成后，又安装扬程 21 米高的 8 寸抽水泵 4 台，进入石窝大渠，每小时可通过水量 560 立方，使原来一水不保的旱地，达到每 7 天轮浇一水。同时，使 350 亩旱地改成了水田。由于有了这条胜天渠，保证了 1976 年种上应时麦，1977 年实现了农业大增产，亩产由原来的 400 来斤上升到 800 多斤，总产达到 150 多万斤，总产亩产都翻一番。

为了按时按质完成任务，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组成施工指挥部，下设生产指挥组、技术组、后勤供应组、宣传教育组。各自做好自己工作。建立了 150 人的专业队，主要在工地打石头，确定开三个大坑，干部带头，群众紧跟，义务从二三里外的起石坑往工地运料，谁也不甘落后，谁也不讲报酬。这样，每天早晚参加义务劳动的人 100 多人次，总计用工 4000 多个，其中义务工占三分之一以上。胜天渠的修筑为当时农业生产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提高经济效益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

（《房山文史资料》第 12 辑）

## 民国时期周口店的煤炭业和石灰业

张玉泉

房山区煤炭资源十分丰富,开采历史悠久,素有“煤炭之乡”之称。而周口店地区的长沟峪、车场、黄院的煤炭在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房山县志》载:“吾县煤区以十数,而以长沟峪为中心点”。房山的煤炭业上可追溯于辽金以前,烂觴于元明以后。《木岩寺碑记》(该寺创建于天监二年)有“取煤于穴”之文,可见辽之前就已发现了煤矿。《畿辅通志》中记载:“房山有煤窑九座,后又有常某知长沟峪之地质,其岩石皆系西高东下(俗曰煤槽),南托北台,其水必由东泄……察地形之,便于车厂村西开山通穴,以泄长沟峪诸窑之水,而窑业由此益盛”。当时煤的区域在大房山南麓有七个区域,而有六个在周口店范围之内,包括长沟峪、西庄与车厂、葫芦棚与下寺、长流水、黄院、周口店等。当时这些地方的煤窑可称做星罗棋布。据《房山县西北煤窑旧日名称表》提供长沟峪两侧山中就有窑42个,葫芦棚、下寺一带有窑18个,周口店、黄院一带有6个,共计60多个,名称五花八门。这些地方规模较大、产量较高的煤窑有大桶窑、大石塘、东水泉、杨树窑、泰和、槐树窑、马家虎、西天宫、康树窑、猪窝、和盛窑、天成窑、鸿兴窑、长兴窑、和义窑、永兴窑等。

这些煤窑所产的煤质量上数上乘。据《房山县志》载:“粗分之曰硬煤软煤。全县硬煤分十三槽,长沟峪就占7槽。即一是蚂蚁槽,二、三是黑煤大槽,四是腰石大槽,五是爆煤槽,六是红煤槽,七是封口大槽。”

矿业开采权当时分为三种形式:一、地主把所有权一次性出卖给开矿者;二、自有地(矿山)自己投资和劳力而取得矿权,任其开采与转移;三、租赁矿山开采有年限限制。由于开采方式较为落后,民国初年的煤产量较低。据有关资料显示,长沟峪冬季最多日产八百吨,年均产量在十二万吨上下,周口店、长流水、葫芦棚、下寺黄院、西庄、车厂等处也不下十二万吨左右。当时这些煤以售北京为多数,约占总数60%。销于天津次之,销于保定又次之。在京汉线修通周口店支线后,北京所用之煤多由房山输入(周口店地区产的煤居多),门头沟支线修成后房山煤的销路锐减。

周口店地区的山石多石灰岩,有关资料表明“西南自韩继、周口店至南观、万佛堂……的大灰厂沿山皆有之”,说明民国初至中期灰窑与煤窑同步兴起。当时周口店附近灰矿有二十家。比较有名的有吉兴、义成、裕兴、义合、天合、鸿顺、永顺、鸿庆等,还有辛庄村的大晃各窑。据《西山地质志》载:“民国四年年产量126103吨,民国五年年产量达125593吨。”冬季约有七、八百人从业,每人工价三、四十枚铜子儿,夏季倍之。石灰烧制方法大同小异,一般是烧野窑(笨窑)。如鸿顺厂每次烧五、六个窑全在河滩,每窑直径3—5米,高5—6米,一层煤一层石,每窑烧石灰可达20至40吨。每窑点火后十三天烧成,然后再停火十天晾凉才能拆窑。该厂雇用60多名工人,从事打眼、崩石、背石、码窑、清碴工作。烧窑工人大部分从河北省曲阳县雇来的。

民国后期,辛庄大晃各附近十几户灰窑生产厂家年产量达四万吨,含钙较高,灰质量较好,很受用户青睐。那里130多亩多山场,除本村马有章家占有一部分外,大部被外来户或租或买用来开灰窑。当时有刘甫坑、马贞坑、高家窑、岳家窑等十多个窑,互相竞争,所生产的灰基本上供不应求。二十多年前,人们曾在东辛庄大晃各灰厂意外的发现一种表面呈鹅黄色的石头,此石具有漏、瘦、皱、透的特点,是堆砌假山、美化环境的极好原料,专家为它命为“北太湖石”。

周口店地区所产石灰，大部分销往北京、天津、保定，“凡有大建筑者需最多，民间修建者为次之。”运输多通过周疏铁路运出，也有小部分车拉骆驼运。

周口店地区煤、灰业于民国初期兴盛后，带动了运输、饮食、服务等其它各业发展。对于繁荣这里的经济，维持当地人民生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房山文史资料》第13辑）

## 周口店洪顺灰窑发展始末

卓成栋

房山是灰石之邦，沿区境西、北一线的山脉中，蕴藏着丰富的石灰石资源，为本地区灰石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周口店位于盛产灰石山脉的大房山南侧山脊之下。早在清末民初这里的灰石业就已开始，到民国末年灰石业已发展到相当规模。仅西山一线就分布着六、七家较大的灰石厂，其中又以于1947年底到1948年初兴建的洪顺灰窑最具代表性。它便是原周口店公社大北帮灰窑，现周口店地区水泥厂的前身。

洪顺灰窑兴建的发起人有3个，一个是本地区周口店村的寇桐，另两位是河北固安的孙福庭、孙光远，后来石楼村的杜光普加入，共分三股，总计投入资金50万大洋。他们在周口店村西大北帮处买了山场，并于山坡上就地开挖窑穴，砌起当时称作“小野窑”的烧灰炉窑。凭其精心烧制的石灰产品和可靠的烧灰技术在地区声名鹊起，产品一度远销至天津、张家口、大同及北京远郊区，成为地区实力最强，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灰窑。

洪顺灰窑从1948年创建到1949年，仅一年工夫就生意红火。最多时七、八个窑口同时开烧，一窑下来可成灰30吨左右。按此推算，年可产石灰10000吨左右，多时达12000吨。1948年底洪顺窑人员增加到70人，每月30日按时发工资。工资最高的技工每人每月能挣60块大洋。

洪顺窑究竟靠什么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就把灰窑搞得这么红火呢？据现今仍健在的老窑工介绍，洪顺窑烧灰的第一道关是选最上等的原料。选灰石选取上好的“白羊角的好青石”，这种灰石颜色正，石质纯。其次是选用当地长沟峪产的好煤炭，一般发热量均在6500~7000大卡左右，烧起来火旺，能将灰石烧透。三是雇用技术好有经验的老窑工。选择窑址和砌垒炉窑，均由技术工人盯在现场，或干脆由他们动手操作，使灰石和燃料搭接得既合理，又能易燃好烧。因此，凡经过技术专门检测的炉窑产灰一般均多于一些普通窑。后来洪顺窑的技工们又对原来采用的“野窑”烧制方法进行了技术改造，即在堆垒方式和灰窑的高度上进行了一些改变，使炉窑的烧制容量加大，一窑下来，按同样方法操作，其产量比小野窑提高一成多。这种窑口，人们又叫它“窍门窑”。

这种炉窑由深凹在地下的窑门口点火，可以垒砌十层，高达15米左右，直径5米多。一窑自点火之时起，一般烧18~20天就可成灰。由于不间断的垒窑、烧窑，整个开采矿石和烧制产品是按循环方式进行，每天都有新窑点燃，旧窑出灰。周口店西山南坡一线到处是一片繁忙的景象。

解放前窑主对职工榨取掠夺，虽能保证工资，但基本生活条件仍无法保障。1949年洪顺灰窑所在地解

放后,各窑工人成立了工会组织,工人们的福利待遇有所提高,吃饭有食堂,洗澡有浴室,焕发了工人的干劲。1951年到1953年是解放后迎来的第一个发展高峰,年产白灰12000吨,按每吨灰4块大洋计算,一年近14万大洋产值,创洪顺灰窑的历史纪录。

1956年,呈上升势头的洪顺窑公私合营,划归到周口店村,灰窑交给周口店村的资产部分由政府逐步还清利息与本息。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洪顺窑又划归公社,并由公社将西坡众多的私营小窑与洪顺窑合并,统称大北帮灰窑。1960年公社又投入人力物力把原小窑的出灰上料方式进行了改进,窑口由原来的20几个改成50个窑口,产量由原来的1万吨提高到10多万吨。进入70年代,窑口又增加到70多个。这样一来24小时可以不间断的出灰,每天每窑可达70吨。一年下来石灰产量达到20万吨,最高时接近30万吨。八十年代,由于大北帮灰窑临近“北京猿人遗址”,对景区的环境保护不利,大北帮灰窑停业,选新址建成水泥厂,即现在的周口店地区水泥厂。

纵观周口店洪顺灰窑的发展史,我们可清楚地窥见地方工业由创业到进步的一斑。对于它的了解,无疑对研究当地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房山文史资料》第13辑)

## 回忆原良乡县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刘振祥

1953年我在中共良乡县委宣传部工作时,县委派我到岗上村去总结吴春山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办社经验。当时我是首次接触这方面的工作,觉得既生疏又很新鲜。县委办公室主任张本荣帮我拟定了从头到尾的总结提纲,我愉快的接受了这一任务。工作结束后,总结报告引起了县委和地委的重视,我从中也得到了很多有关互助合作的知识和经验,对于我后来的多年农村工作是个很好的帮助。

1954年初,我陪同县委宣传部长(县委常委)马有勋一起参加筹建农村部的工作,同时抽出县委机关会计郎宝山到农村部搞会计辅导工作。后来县委又从一区先后调出区委书记罗玉源、王树瑞到县委农村部任部长、副部长。从农村部的建立到房、良合并变区划市,我一直在农村部工作。五、六年的实践,使我对原良乡县的农业合作化情况特别是对1952年到1955年农业初级社的工作知道得较多较深。

一、领导高度重视。当时全党上下把引导组织农民走共同富裕的合作化道路,一直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毛泽东主席曾用《论语》的话对一些不积极抓合作化的干部提出批评:“群居终日,无所用心,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提倡说话办事想问题,要讲社会主义,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发展互助合作。

原良乡县1949年土改后,霍梁、闫振锋、张令德三任县委书记均亲自动手,抓点带面,发展互助合作。到1952年全县180多个村庄已普遍建起了临时性的、季节性的或稳定性的各种类型互助组,并在此基础上抓住了办得较好的岗上村吴春山、军留庄村李德生等几个互助组典型。在建立县委农村部之前,县委就把李顶荣、安成儒等熟悉农村工作的老同志安排在县委办公室专抓互助合作,主要精力放在岗上村,抓吴春山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资料方面,1953年前由宣传部刘吉祥、1953年由刘振祥协助县委领导掌握了解总结具体

情况。后来从县公安局抽调一位股长赵洪才任岗上村的指导员，负责保卫工作。在抓典型的同时，县委还制定了每个县委委员分工包社的制度，要求每个委员对自己分工的初级社要经常联系，掌握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县委第二书记、县长曹庶民作出了榜样，经常深入自己联系的社，调查座谈，然后写出有内容、有分析、有措施的书面报告。他的报告由县委予以批转下去后，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由于领导重视，政策正确，方法对头，良乡县的合作化运动得到了健康迅速发展。到1955年，全县入社农户已超半数，基本实现了合作化。办得较好的骨干社已成批成片。这些骨干社主要有：岗上村吴春山、军留庄村李德生、葫芦垡村徐忠、晓幼营村项玉昆、大富庄村杨生会、大苑村张旗、洛平村洪起、云岗村师文志、怪村刘忠、于管营村田思勤、白房子村屈祥申、纸房村叶永全、肖庄村张藻和李淑兰、吴店刘金安、元武屯村高建国、炒米店村杨维祥、窦店村刘汉章、交道村张永安、琉璃河村李文如、北章村王全、小店村孙国祥、两间房村赵凤桐、庄头村律振福等创办的初级农业社。这批农业社均实现了增产增收，增产在30%以上。吴春山、李德生等先进社在领导农民共同致富，改变贫穷面貌方面作出了榜样。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带着干部曾亲自到岗上村与吴春山调研座谈，苏联作家巴巴耶夫斯基也到岗上村参观访问，县委农村部副部长王树瑞直接到中央农林部作过汇报。军留庄李德生组织领导本村农民在低洼地里开稻田，使常年吃不饱穿不暖、全县有名的穷村一年变成了富裕村。1955年团中央召开的全国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作家魏巍曾以《永定河畔稻花香》为题，著文颂扬出席大会的李德生。后来通县地委第二书记、专员王宪又将自己十几岁的儿子送到军留庄参加劳动，报纸刊登了《专员送子务农》的报道，在全专区乃至全河北省传为佳话。

二、初级社较好的坚持了自愿互利和公平竞争的原则。岗上村百户有余，以吴春山为首，吴春荣、吴春旺、吴镇、吴坦、武志、武凤等十户贫农，于1952年组成了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紧接着军留庄村李德生、于管营村田思勤等也相继建立了合作社。参加合作社的各户完全是自愿入社，当时明确入社自愿、出社自由、不强迫、不勉强。入社的具体办法是：对于个人财产，锨镐锄镰等小农具自带自用自修；大的如骡、马、驴、牛、大车等作价入社，逐年偿还；土地按质量分为上、中、下三等折合计算每户的土地股数。开始在政策上允许按劳五、地五分成。吴春山等十户贫农都同意按劳六地四分配收益，即全年总收入除去交农业税等费用开支，留足来年生产费用，扣留公积金和公益金，所剩纯收入60%按个人劳动工分分红，40%按各户土地股分红。这样不同类型的户都很满意，互助互利，取长补短，各产生积极性很高。紧接着岗上村又以崔严、崔丰为首建立了另一个初级社。后来，两个社进行了合并，成为后来的吴春山农业生产合作社。

当时办初级社还要严格审核，经过批准才被承认，批准办社手续一律由县委农村部把关。良乡县政府办公室的王显会、高淑英到县委农村部统一办公，参与审批农业社的工作。办社的条件主要是：社员是否自愿入社；带头人是否大公无私，办事公道，群众拥护，有领导能力；社员中贫下中农是否占优势；社员中有无地、富、反、坏（开始办社时不允许这些人参加）；有无懂财务能记帐的会计等。实行积极、稳妥、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作法，逐步形成当年以土地股入社与劳动工分同时按比例分红的初级农业社。

三、为使初级社健康顺利的发展，除了县委重视，从思想上、组织上强化对农业合作化的领导外，在全县范围内还建立了互助合作网。互助合作网主要是按区（良乡县辖四个区一个镇）分片，根据居住远近，在一个中心社建立若干合作网，参加人员是本片各初级社社长。网上推选召集人，各社有那些经验、什么问题，定期在网上介绍交流，研究解决疑难问题。农村部的干部和各区（镇）领导也重点参加网上会议，但主要靠网片负责人。开会一般在晚上，社长们都积极自觉参加，因为都急于学习办法，有时会开到深夜，大家也无怨言。像岗上村吴春山农业社的民主理财、勤俭办社、三包一奖、吴春山的骡马经；军留庄村李德生农业社开稻田，全村从穷变富；于管营村田思勤农业社以农为主，多种经营，发展林木果树、马车运输等好经验，除县委召开会议推广外，更快更具体的是在网会上交流。另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建立会计

辅导站。为了加强初级社的财务工作,要求对已建和欲建的初级社会会计,必须参加会计学习班进行培训。为此,县委从财经战线抽调出近 20 名有财会工作经验的干部,专门负责初级社会会计辅导工作。其中张庆贵、李贤、李信、闫启才、柳有春、冯国栋等确定为农村部干事,侧重搞财务会计辅导工作。全县分区分片建立会计辅导站,各站聘请一、两名兼职辅导员作为站长,农村部郎宝山专抓这项工作。这对加强初级社的财务管理,巩固提高农业社管理水平,起了重大作用,也培养出了大批的管理人才。现在全国闻名的窦店大队党支部书记仇振亮,就是当年参加首批初级社会会计学习班的骨干。现在的区、乡镇的经营管理站就是当年会计辅导站演变来的。

总的看来,初级合作社对良乡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房山文史资料》第 13 辑)

# 1956 年前良乡县公私合营概况

王绍清

《房山文史资料》第 12 辑刊登了《房、良两县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状况及原房山县公私合营部分,为使资料完整,现将原良乡县公私合营情况概述如下。

良乡位于京都西南,早期是西南十三省有事京师、文件传递、方物入贡,饷车转运必经之站。清末民初,由于受商战、路政改革的影响,平汉铁路经良乡、窦店、琉璃河贯通南北,良乡到坨里平汉支线的筑成,改变了交通运输状况。外埠工商业资本家云集房山兴办煤矿,大办商业,后来当地富人人家务农不如经商,便纷纷办起店铺。此间,良乡城内店铺接踵而起,商业为之兴盛。民国十六年有座商 64 家,每旬一、六、三、八为集日,以粮食为大宗。“七七”事变后,因战事频繁,经济封锁,造成商业衰退。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苛捐杂税繁多,造成物价飞涨,各商号惨淡经营。

解放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调动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积极性,我党制定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私营商业得到了发展。据 1952 年调查,良乡县私营商业占全县销售总额的 51.9%,良乡城内商业占重要位置。

1954 年国家对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后,1955 年初,良乡县供销合作社认真贯彻“利用、限制、改造”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改造”的方针,在良乡城内按行业逐步组成公私合营商店 5 个,合作商店 2 个,合作小组 2 个,理发、照相社各一处。其情况如下:

良乡城关布百业公私合营,由益星厚、益和祥、祥记、忠信长、信来生、公记、文化阁、敏兴斋、文记、诚记等 31 家商号组成。资金总额 14714 元。股金 11257.89 元,年定息 572 元,其中资本家股金 6645 元,年定息 332 元;私方人员股金 4612.89 元,年定息 230.64 元。从业人员 28 名,其中私方人员 19 名,职工 8 名,公方代表 1 名。

良乡城关药业公私合营,由私营座商济安堂、福祥药局、人和永药局、同益昌药局、福源药局等 7 户商号组成。资金总额 13999 元,股金 12446 元,年定息 622.30 元。其中资本家股金 10798 元,年定息 539.9 元;私方人员股金 1648 元,年定息 82.4 元。从业人员 17 名,其中私方人员 5 名,职工 11 名,公方代表 1 名。

良乡城关饮食业公私合营,由私营小小、同益轩、和记等 38 户饭铺组成。资金总额 5098 元,股金 2957.52 元,年定息 147.87 元,其中资本家股金 902.19 元,年定息 45.10 元;私方人员股金 2055.33 元,年定息 102.77 元。从业人员 76 名,其中私方人员 44 名,职工 30 名,公方代表 2 名工资总额 2603.20 元。

良乡城关杂货业公私合营,由私营座商同义祥、新生、义泉、辅记、金源勇、春华茂、六合公、德昌永等 19 家商号组成。资金总额 8777 元,其中私方人员股金 4146 元,年定息 207.3 元。从业人员 24 名,其中私方人员 13 名,职工 9 名,公方代表 2 名。工资总额 826.10 元。

良乡城关旅店业公私合营,由同顺店、李家店、安家店、刘家店、王家店 5 户组成。资金总额 440 元,股金 440 元,年定息 22 元。从业人员 8 名,其中私方人员 5 名,职工 1 名,公方代表 2 名。

在私营商业服务业中,小商小贩是个体劳动者,在改造中,采用合作形式组织起来的有:

良乡烟酒合作商店,资金 1549 元,人员 16 名。

良乡果品合作商店,资金 930 元,人员 5 名。

肉业、豆腐组成二个合作小组,资金 527 元,人员 14 名。

良乡城关理发社,资金 1981 元,人员 44 名,公方 1 名。

良乡城关照像社,资金 953.6 元,人员 19 名,公方 1 名。

琉璃河古称燕古店,后依河更为今名,是京南交通要隘,其河可行船到白洋淀、保定、天津。商船载百货易灰煤及土特产品于此,春秋帆樯鳞集,是京都西南经济贸易之水陆码头。京汉铁路琉璃周支线连成后,交通方便。民国十二、三年间,市面更加繁荣,有座商 87 家,其中煤商达 16 家,每旬二、四、七、九为集日。驰名的老字号“德顺”煤厂最大,“祥茂斋”的点心生意兴隆,昼夜营业,房、良两县盐业总店“益照临”也独家于此,“锦福隆”粮行资金雄厚,印有河票(相当现在支票),流通房、良两县商号。琉璃河商界设有商团,配有武器,夜间巡逻,春秋船多,由巡警指挥行船。民国二十八年发大水,河道冲毁,无人修复而终断,商业日趋衰落。

1955 年 3 月,良乡县供销社为做好对私营改造工作,派出工作组在琉璃河进行试点后,组成公私合营 4 个,合作商店 2 个,合作小组一个,理发、照像、洗染社 3 个。其情况是:琉璃河杂货业公私合营,由私营座商锦复隆、丰圣永、大成公、三顺兴、维记、信记、合兴栈、天宝文具、新中商店、永兴号、天和等 23 家商号组成。资金总额 13401 元,股金 11413.20 元,年定息 570.60 元。其中资本家股金 9255 元,年定息 462.30 元,私方人员股金 2157.89 元,年定息 107.88 元。从业人员 37 名,其中私方人员 25 名,职工 10 名,公方代表 2 名,工资总额 1231.30 元。

琉璃河国药业公私合营,由私营座商天合医药商店等 4 家商号组成,名为天合盛药店。资金总额 11195 元,股金 11076.33 元,年定息 553.84 元,资本家股金 10527.06 元,年定息 526.35 元,私方人员股金 549.67 元,年定息 27.48 元。从业人员 14 名,其中私方人员 10 名,职工 3 名,公方代表 1 名。

琉璃河货栈业公私合营,资金总额 160 元,股金 138 元,年定息 6.9 元。从业人员 2 名,其中私方人员 1 名,职工 1 名。

琉璃河饮食业公私合营,股金 2599.21 元,年定息 129.52 元,从业人员 34 名。

琉璃河混合合作商店,资金 875 元,人员 17 名,公方代表 2 名。

琉璃河棉百合作商店,资金 1236 元,人员 9 名。

琉璃河羊肉合作小组,资金 20 元,人员 5 名。

琉璃河理发社,资金 1576 元,人员 43 名,公方 1 名。

琉璃河照像社,资金 239 元,人员 8 名。

琉璃河洗染社,资金 100 元,人员 3 名。

窠店又名豆店，隋末窠建德曾在此筑城，故名为窠店。自古为一镇。民国时期有座商 41 家，每旬五、十两个集日，1955 年，组成公私合营 2 个，合作小组 2 个。

窠店杂货业公私合营，由座商洪记、新发成、兴隆号、福巨龙、广玉成、新华斋、复兴元等 10 户商号组成。资金总额 5122 元，股金 4191.49 元，年定息 209.57 元，私方人员股金 4191.49 元，年定息 209.57 元。从业人员 27 名，其中私方人员 23 名，职工 1 名，公方代表 3 名。

窠店饮食业公私合营由 7 户组成，资金 469 元，年定息 23.94 元。从业人员 16 名，其中私方人员 12 名，职工 2 名，公方代表 2 名。

窠店菜业合作小组，资金 324 元，人员 4 名。

窠店羊肉合作小组，资金 55 元，人员 3 名。

交道在小清河西岸，是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民国时期有座商 10 多户，每旬一、六、四、九为集日。1955 年组成公私合营 2 个。

交道杂货业公私合营，由私营座商义兴永、永和祥、兴茂祥等 10 家商号组成。资金总额 4180 元，股金 3264.21 元，年定息 163.21 元，私方人员股金 3264.21 元，年息 163.21 元。从业人员 23 名，其中私方人员 18 名，职工 3 名，公方代表 2 名。工资总额 744.7 元。

交道饮食业公私合营，由 12 户组成。资金总额 825 元。股金 745.01 元，年定息 37.25 元。从业人员 16 名，其中，私方人员 14 名，公方代表 2 名。

对分散在各村庄的小商小贩，全县计 231 户，均由各基层供销社归口管理。

(《房山文史资料》第 13 辑)

## 关于“共产风”及其后的整顿

王硕儒

1958 年，时逢风调雨顺，在“大跃进”的形势下，我地区工农业生产全面增长。粮食总产量突破 2 亿斤，达 20950 万斤，创历史最高水平；工农业总产值 7177 万元，比 1957 年增长 70.3%。但是，这时候的领导人由于过分夸大主观意志，造成浮夸风随之而起，行政命令如潮。在经济组织之间，不分经济基础的差别，不论是否受益或受益多少，诸事都兴大兵团作战，违反了客观规律，逐步形成了一股“一平二调”的“共产风”。

大规模(指全周口店区、房山县)的“共产风”，以公社化前、后最为严重。如公社化前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搞“四通八达”(积肥)。公社化后的大炼钢铁、深翻种麦、大搞工副业等，都进行过“一平二调”，“共产风”极其盛行。

对“共产风”问题，中央和北京市都有察觉，并明令制止。1959 年，开始整顿人民公社，着手解决“一平二调”问题，明确贯彻“按质论价，等价交换”的原则，使“共产风”问题初步得到解决。例如：从全市各区、县抽调劳力，周口店区投入的农业劳力达 15000 名，各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随身带去小型劳动工具，经作价折款 41 万元，国家全部返还给公社。自 1959 年 3 月起，劳力报酬实行“定额工资制”。1958 年，全地区普遍修筑小高炉，大炼钢铁，但农民根本不懂炼铁，造成普遍亏损，累计亏损达 71.3 万元，解决“一

平二调”时地方财政给予补贴 37.8 万元。在分配上，改变由大公社统一分配的办法，恢复原高级农业社单独核算的办法，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清算，完成了 1958 年的社员分配。调用社员的生产、生活资料和炊事用具等，有实物的退还实物，实物不在的作价付给现金或作价入账。占用社员的房屋，其中大部分是农村食堂或仓库，能退还给社员的退还给社员，继续占用的议定合理的租金和借用保修制度。国营企业无偿占用农村的土地，能退还的退还给农村，不能退还时，要经土地管理部门作价，共占用土地 2999 亩，已付给地价款的达 2074 亩。

但是，由于对中央、北京市委制止“一平二调”共产风的指示领会不深，贯彻执行不力，“共产风”还未能制止，并屡有发生。特别是 1959 年冬和 1960 年春大搞水利和大搞工副业中，“共产风”又刮了起来。1960 年 5 月，北京市召开“五级干部”会议，再次解决“共产风”问题。然而，真正彻底解决“共产风”问题，还是贯彻中央批转湖北、安徽省委两个文件的重要指示和中央十二条政策以后。根据中央指示，对全地区（周口店区）区级以上的公社、大队、生产队出现的“共产风”，包括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与社员之间、集体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都进行了彻底清查、核算。凡是调用核算单位或社员的物资和生产、生活用具（炊事）原物退回，原物损坏的合理作价赔偿，原作价不合理的重新作价。对地区内部、公社内部基本建设投入的劳力，按照基本核算单位受益的大小和投工的多少，一律按应出工工价兑现。如大搞工副业中，城关公社建立运输队，1959 年 10 月从生产大队调胶轮大车 49 辆，原来车辆作价偏低，而后普遍提了价，并根据生产大队的需要退回 7 辆。琉璃河公社原调生产大队车辆 100 辆，全部退还给原单位。霞云岭公社无偿集体经营堂上大队煤窑一座，也退还给原主。再如，在粮食征购入库中，一些公社为了抢进度，掀起粮食入库高潮，调缺粮队代余粮队入库粮食 600 万斤，后由余粮队如数付给缺粮队。

1961 年 1 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年，贯彻实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房山县（原为周口店区）在贯彻中央指示的同时，对解决“共产风”再次进行检查和落实。至此，“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问题彻底解决。1962 年 6 月，中共北京市委房山县委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对“大跃进”以来出现的“共产风”、“浮夸风”等进行了自我批评。在一届一次全会上，做出了《关于健全党委制和领导方法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从此，房山县各业又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房山文史资料》第 13 辑）

## 三年困难时期的群众生活

王硕儒

1959 年后，周口店区同全国各地一样，遇到了连续三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农业歉收，粮食减产，给人民群众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当时全区农村公共食堂达 1437 个，用餐人数达 33.9 万人，占农业人口的 99.9%。因此，安排好人民群众的生活，就成为各级领导的重要任务。中共周口店区委及 1960 年 2 月后的房山县委及时提出“安排好群众生活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办好食堂是安排好群众生活的关键”。区（县）委在原粮食办公室的基础上建立了生活办公室，由区（县）委委员、粮食局长王毓华兼任办公室主任，粮食局秘书

王硕儒、计划统计科副科长王振海等负责办公室的具体工作。同时，除公社配有粮秣干事外，区(县)粮食部门抽调近百名干部到农村帮助办食堂。区(县)委还要求公社、大队、生产队认真贯彻“低指标，瓜菜代，办好食堂，管好粮食，劳逸结合”的五项原则。第一把手必须管好群众生活，对农村食堂实行“粮食以人定量，指标到户，节约归己”的办法。用粮月月有计划，天天有打算，让社员吃饱，千方百计预防浮肿病的发生。一旦发现浮肿病，要即时上报，并采取坚决、果断措施予以防治。

三年困难时期，全区(县)没有发生大面积的、严重的浮肿病，没有因营养不良而饿死人的现象。某些社、队也曾发生过浮肿病人，由于采取了坚决有效的措施，都及时予以解决。

例如，马安公社东村、芦子水等村发生浮肿病时，区(县)委立即派生活办公室王硕儒、卫生局副局长谭书声和部分医务人员前往慰问、调查。同时，由粮食局拨出元豆上千斤，由供销社拨出部分白糖，责成食品加工厂加工成豆粉，发给浮肿病人每人3斤，以增加营养，使浮肿病人很快恢复了健康。

良乡公社稻田大队(包括稻田、高佃、独义、温庄子、大宁村)共1373户，6625人。自1960年12月10日至1961年1月25日，先后出现了浮肿病人，累计发病人数761人，占总人口的11.5%。这是全县发病人数最多、最严重的大队。县委第一书记李明、书记处书记张令德亲自前去检查、指导。检查出发病的主要原因，一是大队领导指导思想不明确，没有把安排好群众生活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生活安排的不好；二是食堂办得不好，社员吃不饱、吃不好；三是口粮定量不合理，老人和小孩定量偏低；四是没有给社员分配自留地。在县委的领导下，良乡公社党委组织了慰问组和医疗队，采取坚决措施，给浮肿病人单安了锅灶，增加了营养，并安排适当休息；对二、三度病人进行了药物治疗。未发病的人，每人每周喝两次豆浆。截止1961年1月27日，浮肿病人基本恢复健康。针对具体情况，中共房山县委于2月2日发出通报，以防止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由于各级领导重视，困难时期群众生活得到逐步改善。

(《房山文史资料》第13辑)

## 良乡竹筋楼及其设计者

穆玉敏

我是在良乡长大的，懂事起就从大人们嘴里听说过竹筋楼。上学后又知道，竹筋楼就在离我的母校北京送变电公司子弟学校以南百米处，那是北京电力设备修造厂的家属宿舍楼，现在的地址是良乡体育场路竹筋巷。

从外观上看，竹筋楼是红砖砌成的，分上下二层，楼梯建在楼的外面两侧，楼顶是尖形的，楼外建有烟囱。在现代人的眼里，那不过是简易楼，可在五、六十年代，人们住的都是窄小的平房，竹筋楼里设计有厨房、卧室，房间非常宽敞，并且是楼房，人们都把能住上竹筋楼当做幸事。

小的时候，对“竹筋楼”这个名字感到有点儿怪，长大了想知道它与普通楼到底区别在哪儿，但所问及的人，都只能告诉我其以“竹筋代替钢筋”，仅此而已。

直至一年前，我有幸认识了遇罗文(文革中因一篇《出身论》而遭枪杀的遇罗克的弟弟)，才知道竹筋楼的设计者是他的父亲遇崇基。

遇崇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五十年代是华北电管局一名出色的土木工程师。在国家钢材匮乏的1955

年，他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设计了以竹筋替代钢筋的建筑工艺。这种工艺是将上好的竹材捆扎后，涂满沥青，既增加了竹材的硬度，又有防腐功效。此项革新技术在房山良乡首次推行并获得成功，造价只有每平方米四十元。两年间共建造了四十栋住宅楼，被形象地称为“竹筋楼”。后来竹筋楼因故被拆掉十八栋，现存二十二栋。

竹筋楼长约 33 米，宽约 9 米，楼与楼之间相隔约 15 米，房间分为一居室和两居室两种，均带一小厨房，一层大多为两居室，能住六户人家，二层多为一居室，

### 良乡的竹筋楼

(穆玉敏 提供)

能住八户人家。1976 年唐山大地震后，建在楼外的一些烟囱发现有裂缝，楼身却丝毫未损，后烟囱被全部拆除，楼身也被加固，并且安装了暖气。

竹筋楼早应完成它的使命了，但却超期“服役”了 30 年。1955 年遇崇基设计建造它时，预期使用十年，可到现在，竹筋楼已经为民服务 44 年，里面居住的居民已经换了好几茬，有的父辈居住二、三十年后搬进新楼房，子一辈留下继续居住。

在几百户居民欢欢喜喜地搬进竹筋楼后，1957 年夏，它的设计者遇崇基被打成右派，并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紧接着，他的妻子王秋琳也被划右派。王秋琳是个优秀的企业管理者，曾任私营企业“理研铁厂”厂长。公私合营后，厂子改名“机床附件厂”，她被任命为副厂长，被划定右派后撤销了职务。

在苦难中煎熬的遇崇基一家人，“文革”中又遭到更残酷的劫难。遇崇基的长子遇罗克因在《中学文革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出身论》的文章而被定罪“现行反革命”，于 1970 年 3 月 5 日被枪杀，一条才华横溢的年轻生命被断送。遇罗克被捕后，全家随之被株连，遇崇基被迫远避东北，王秋琳被单位羁押办“学习班”，长女遇罗锦被送往茶淀农场劳改，次子遇罗文被判刑入狱，家中只剩下年幼的三子遇罗勉，小罗勉常年靠同学送的食物生存。

1980 年，遇罗克的冤案被平反，《光明日报》还发表了长篇通讯《划破夜幕的陨星》，将遇罗克称为“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随之纪念遇罗克的作品相继面世，刚刚出版的刘心武近作《树与林同在》里有一个章节详细介绍了遇氏一家的遭遇，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也随后出版了《遇罗克遗作与回忆》。

遇崇基的才能在被打成右派后，颠沛流离 20 年时间里无用武之地，右派问题被改正后，已经是 67 岁的年纪了，虽然带病编写了《科技日语翻译技巧》一书，翻译了《黑布局》、《天体与宇宙》等日语书籍，但因身体已经垮掉，于 1988 年病逝，妻子王秋琳也因接二连三的灾难，早他四年辞世了。

值得欣慰的是，遇崇基的次子遇罗文、三子遇罗勉秉承了父亲遇崇基的天赋，改革开放后，致力于科技发明，在取得了十几项发明专利后的 1997 年，在国内首次研制出了高压水射流切割设备——京龙水刀，并通过了鉴定。女儿遇罗锦也展示了不凡的文学才华，改革开放伊始，就以一篇《冬天的童话》轰动文坛，至今已著作颇丰。

竹筋楼，它目睹了40年的世事变迁，静观了40年的人间悲欢离合，现在它仍然宽厚仁爱地怀揽着300多户居民，庇护着他们在里面安然地生活着、繁衍着。

(《房山文史资料》第13辑)

作者系燕山公安分局干部

## 房山蜂蜜生产史话

王绍清

房山有得天独厚的蜜源，养蜂酿蜜历史悠久。古代民间以桑树巢、行隙、洞穴蜂窝，“割坯熬蜜”。明代洪武初年，置土蜂于筐中，自筑蜂房而酿。养者，多则数十筐少则数筐，产量低劣。

自京师建蜂厂，选取各国优良品种，繁殖并出售，房山地区渐渐有人购买养殖。当时有黄蜂、黑蜂、土蜂、腰蜂等数种。几大寺院及山区富户受西化影响，引进优种，弃筐养为箱养，人造巢础供蜂酿蜜，产量倍增。梅雨季节，将蜜储存缸内，便于运输。或用荆条编成篓，其形状长扁型、底大口小；篓内外涂蜂蜡，大小不一。大者可装百斤，将蜜装入篓中，用猪尿皮封口捆好，用骆驼、骡、驴驼运京城各大药店，有的装船运往天津。房山荆花蜜色白、透明，滋味甜润，有蜜源植物的花香；枣花蜜浅琥珀色、透明，滋味甜，是蜜源特有的花香，故驰名京津。建国后北京同仁堂药店派人专程来房山采购。

1938年9月，日军侵占了宛平斋堂。宛平县抗日政府为保存蜜蜂，将养蜂合作社迁至蒲洼乡东村。据有关人员介绍，当时生产的蜂蜜极其珍贵，除慰劳伤病员外，大部份运出，到敌占区换回食盐及军政急需用品。蜂蜜在平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于蜂蜜《本草纲目》上记载：蜂蜜能治心腹邪气、益气补中、润脏腑、调脾胃、养脾气、除心煩，止咳解毒。经科学检测，蜂蜜含有葡萄糖和果糖65—80%，蔗糖不超过5%，水分16—25%，糊精和非糖物质，矿物质，有机酸等含量在5%左右。还含有少量酵素、芳香物质和维生素等。蜂蜜不含脂肪，对心脏病、肺病、高血压、眼病、肝病、痢疾、便秘、贫血、神经系统病、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等症均有良好的辅助治疗作用。食用蜂蜜不损牙齿，有矫正不良气味和防腐作用，是丸药主要原料之一。蜂蜜制作的糕点松软味美，保鲜期长。

近代科学分析表明，蜂王浆是一座营养宝库、所含营养物质极其丰富，有人体必需的21种以上的氨基酸、16种以上的维生素，多种酶和辅酶、微量元素。这些物质全部属于天然活性，益被人体吸收，可调节内分泌，增强代谢，有神奇的医疗保健作用。

房山区供销合作社土产公司为大力发展养蜂事业，由王建一(技术员、市养蜂协会理事)邀请中国养蜂研究院和北京市农科院养蜂研究所专家来房山，共同研究和推广“杂交优势利用”，取得重大成果。即由原群蜂产蜜二、三十斤到改进优种后产蜜百斤以上。还推广了蜂王浆高产优质新技术。七十年代房山产王浆1000多公斤，为蜂农增收30多万元。在荆花、枣花盛开的季节，为追花夺蜜，引进江苏、福建、浙江、湖北、湖南、等省市的蜂厂来房山放蜂。同时，还组织本区蜂厂北上内蒙、南下四川等省放蜂。1979年房山河套沟、拒马

河两岸和丘陵地区，有近万群蜂采花酿蜜。当年收购蜂蜜 5528 斤，创历史最高记录。土产公司在普及科学养蜂、推广新技术、引进新品种、发展蜂产品的同时，做到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产前供应蜂具，产中送蜂药消灭蜂螨，产后就地收购，受到蜂农的好评，有利地推进了本区养蜂事业，为本市提供了充足的蜂蜜。

历年蜂蜜购销

单位：百斤

年度	购销量	年度	购销量	年度	购销量
1949 年	20	1963 年	628	1977 年	2448.2
1950 年	15	1964 年	213	1978 年	2954.5
1951 年	21	1965 年	743	1979 年	5528
1952 年	280	1966 年	1144	1980 年	1947
1953 年	32	1967 年	376	1981 年	4533
1954 年	400	1968 年	1392	1982 年	1761
1955 年	500	1969 年	1958	1983 年	1700
1956 年	700	1970 年	1153	1984 年	3300
1957 年	5	1971 年	2222	1985 年	3547
1958 年	574	1972 年	772	1986 年	1016
1959 年	83	1973 年	1174	1987 年	3686
1960 年	509	1974 年	955	1988 年	862
1961 年	42	1975 年	1012	1989 年	884
1962 年	327	1976 年	2958	1990 年	2338

注：

- 1、土蜂：中国古代繁衍的蜜蜂，名为中华蜂，其特点，不与欧美蜂种杂交。交而不育，蜂种纯正。
- 2、黄蜂：意大利蜂种。
- 3、黑蜂：前苏联蜂种。
- 4、筐：用荆条编成的小筐、长扁形、四面涂泥，扣在地上，地面有小孔，蜜蜂出入。
- 5、坯：蜜蜂在石隙、洞穴自筑的窝，似长扁形状。
- 6、蜂螨：是蜜蜂危害最大的寄生虫害。消灭不及时，损失惨重。
- 7、巢础：长方型、蜡制蜂房基础给蜂筑巢酿蜜用。

（《房山文史资料》第 14 辑）

## 房山县工商业联合会的建立

王硕儒

1948年底,房山县全境彻底解放。随着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中共中央对私营工商业提出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房山县城解放时,私营工商业很少,主要集中在县城附近,其次在长沟、韩继、张坊等集镇,农村只有些流动的小商贩。据1948年底统计,房山县城附近的工商业共有125户,其中饭铺9户、面铺11户、烧饼铺7户、麻油店4户、杂货铺13户、花生店6户、洋货店5户、麻铺2户、布庄6户、肉铺6户、茶叶店3户、菜店3户、合作社1户、鞋铺2户、榨油房2户、酒烧锅1户、车行4户、铁器铺3户、炉房3户、染房2户、成衣局3户、刻字铺1户、钟表铺2户、罗圈铺1户、纸店4户、理发馆5户、照相馆土产、澡堂2户、医院1户、药铺5户、邮局1户、电信局1户、石印局2户、书局1户、火药局1户、修械所1户。

根据国家政策,私营工商业不仅允许存在,而且急需发展。但是,私营工商业不是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的任其发展,而是必须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前提下发展。为了正确贯彻执行国家的经济政策,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管理,房山县人民政府设立了工商科,负责私营工商业存在和发展的各项事宜,保证了私营工商业的正常发展。据统计,到1952年底,房山城关、长沟、韩继、张坊4个集镇的私营工商业发展到884户,其中座商(厂)272户(工业7个行业,56户,商业27个行业,216户),摊贩612户,私营工商业人口1128人,其中工业215人,商业913人,摊贩623人。国营和供销合作社营19户。

为了充分调动私营工商业者“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积极性,在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中,先后在城关、长沟、韩继、张坊4个集镇建立了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工商联)或摊贩委员会(或小组),1952年末组建全部完成。在此基础上,开始了筹建房山县下商业联合会的下作。

房山县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山县委统战部副部长辛振刚、县政府工商科长方锡智以及国营、合作社营企业负责人和城关、长沟、韩继、张坊4个集镇工商联组织负责人组成。主要任务是:提出组织章程(草案),确定代表名额、各方向代表比例、代表产生办法、确定召开代表大会时间及准备各方面文字材料等。

组织章程规定:工商业联合会是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基本任务有四项,一是领导工商业者遵守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二是指导私营工商业者在国家总的经济政策下发展生产,改善经营;三是代表私营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向人民政府或有关机关反应意见,提出建议,并与工会协商有关劳资关系等问题;四是组织工商业者进行学习,改造思想和参加各种爱国运动。

代表名额的分配以集镇为单位,一般座商7至12户推选代表1名,摊贩80至100人推选代表1名,同时照顾到各行各业和各地区。具体分配给城关镇代表11名,长沟镇8名,韩继镇4名,张坊镇3名,国合(国营、合作社企业)企业7名,共计33名。推选的方法是:以各集镇、厂商联(摊委会)为单位,按县工商联筹委会分配的代表名额,划分座商、摊贩推选小组,由小组推选代表。国合企业的代表由国合企业自行安排。推选的结果,按筹委会分配的代表名额付诸实现。根据推选的结果,筹委会进行了平衡,为照顾到代表的广泛性,经筹委会讨论决定,再特邀代表2名,共计35名。其中私营工商业座商21名,摊贩7名,供销社、粮食局、金融界等国合企业代表7名。

1953年1月25日,召开了房山县首届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历时4天,35名代表全部出席。会

议通过了《房山县工商业联合会组织章程》，选举出房山县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简称执委会）委员 13 名，选举出房山县工商联第一届监察委员会委员 3 名。

代表大会后，接着召开房山县工商联执委会第一次会议，执行委员，王蔚生、穆林山、李兆祥、吕敏、王质彬、李雅三、孟宪章、蔡增田、周宗有、郑玉森、梅廷章、张世永、薛龙共 13 名全部出席。会上共有四项议程：一是选举出执委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7 名，其中主任委员王蔚生（房山城关广泰公，杂货业），副主任委员穆林山（房山县供销合作社总社主任）。二是建立办事机构，会议决定王蔚生为驻会委员，设秘书、干事 2 名工作人员。三是决定城关镇的工商业由县工商联直接领导，建立房山县工商联长沟镇分会和韩继、张坊办事处。四是其他有关事宜，如私营工商业者学习问题等。

在执委会第一次会议的同时，召开了监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推选出主任委员 1 人，并讨论了工商联监察委员会的工作。

1953 年 4 月 9 日和 10 日，房山县工商联执委会召开了第二次会议，除执行委员出席外，中共房山县委统战部副部长辛振刚列席，主任委员王蔚生总结了第一季度的工作，提出了第二季度的工作安排，与会委员进行了广泛讨论。房山县工商业联合会的工作，从此正常地开展起来。

（《房山文史资料》第 14 辑）

## 解放初期房山县的粮食统购统销

魏志华

1953 年 10 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议”（简称统购统销）。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主要是因为建国后，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较快，1953 年又开始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把社会主义下业化作为重点。工业的发展，城镇和工矿区的发展，种植工业原料的农业地区和农产的增加，急剧扩大了对商品粮的需求量。而当时农村绝大部分是个体农民，由于生产条件、农业科学技术等方面的限制，增产粮食有限。在粮食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有些余粮户有等价惜售心理，特别是私人粮商粮贩借此机会企图操纵粮食市场，投机活动猖獗，使粮食问题日趋严重，在一些城镇地区发生了粮商抢购粮食、面粉的现象。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使工业生产受影响，而且会影响到整个物价，影响城乡人民的生活，影响到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因此，党中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粮食统购统销作为最迫切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抓紧抓好，完成任务。

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粮食统购统销的主要内容和措施是：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简称统购）；对城市人民和农村缺粮群众实行粮食计划供应（简称统销）；实行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对私人粮食工商业进行严格管制，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实行在中央统一管理下，由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粮食管理政策。

当时的房山县委对粮食统购统销非常重视，几次召开书记会、县委扩大会议。认真学习研究中央的决议、河北省委的有关指示，根据房山的情况，制定了粮食统购统销方案。1953 年 11 月初，在国家正式公布粮食统购统销前，县委首先召开了县直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为了保密，大会是在夜里两点多钟召开的，地点在当时的礼堂（即现在房山宾馆西院大北屋）。会议由县委副书记高华兴传达了中共中央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及县

委的执行意见，并对党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和纪律。要求党员干部要模范执行党的政策，在决议正式公布前不准泄密，不准抢购粮食。11月11日到17日，利用7天的时间，召开全县的粮食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属各乡的党总支书记、乡长、宣传委员、团支部书记、妇联主任、财粮主任和各区、乡的干部，还有县直各部门领导及抽调下乡的工作人员，共计600多人。会上，县委主要领导传达了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县委的统购统销方案，并分组进行讨论。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都分头到各区、乡进行指导。同时，通县地委书记王宪也来房山在大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他传达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讲了粮食统购统销的重要性，使大家很受启发和教育。通过几天的会议，大家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明确了政策界限、坚定了完成任务的信心。

县委粮食工作会议后，立即从县直各单位抽调干部100余名，包括县委委员7名，各区抽调干部250名，组成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组。做到每个区(当时全县共6个区)有1—2名县委委员，每个乡有1名区委级干部。县里建立了粮食工作办公室，由县委书记主抓。各区建立核心领导小组抓统购统销。同时，由于统购统销是个新的工作，没有经验，县委还抽调11名干部由1名县委委员先行一步，带队到四区五侯村搞试点，总结经验，及时推广，对搞好全县的统购统销起了很大的作用。掌握面上工作的领导及办公室人员还经常到各区、乡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帮助解决。

各乡的粮食统购统销的做法大体是：一，召开会议、统一思想。工作组到乡后，立即召开乡总支扩大会，吸收乡政府及各部门领导参加。学习文件，传达县粮食工作会议精神。在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制定乡里的统购统销计划。根据县分配的指标，确定各村的征购任务；二，培训骨干、开展宣传。统购统销开始后，各乡都几次对党、团员、宣传员进行培训。主要是系统讲解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粮食统购统销的内容。在培训骨干的基础上，按照县委印发的宣传提纲，利用开会、黑板报、广播等各种形式进行广泛深入地宣传。同时，党、团员、宣传员都分片包干、包产宣传。对重点余粮户都有二、三名党团员、宣传员负责。在进行宣传教育的同时，对各户的粮食情况进行摸底排队。统计出各户有多少地、产多少粮，除口粮、种子、饲料以外有多少余粮等数字；三，自报公议。经过宣传发动，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召开居民小组会，余粮户进行自报。然后由评议小组进行评议(评议小组由干部、党员和公正的群众组成)。评议中严格掌握政策界限。中央规定是向余粮户进行收购，不降低农民现有的吃粮水平和给售粮户留一点的原则。余粮多的多购、余粮少的少购、没余粮的不购。口粮标准平均每人每年300斤左右，平原高一点，山区低一点。售粮户一般占全村总户的50%左右，最多不超过80%，超过的要经县委批准。在各小组评议的基础上，各村再经过支部认真研究，根据区、乡分配的任务，评定出各户售粮数字，张榜公布；四，做好准备、组织入库。各村、各户卖余粮的数字确定后，各村积极组织车辆。粮食部门、供销社也都做好各项入库的准备(当时粮点很少，大部分基层供销社代收)，交售余粮时声势很大。各乡统一时间、统一车辆、敲锣打鼓、戴红花、贴标语、造成卖余粮光荣的气氛。这一年，全县共完成粮食统购1250.2万斤，超额完成了上级分配的任务。

1953年是我们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第一年，这项工作对全社会震动很大。它关系到城乡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尤其是一些余粮户，开始时思想阻力很大。因为农民有多少年自己存粮的习惯，有的存粮是为了备荒，怕把余粮卖了遇到灾年挨饿。有的存粮是为了卖高价，因此有粮不报，以多报少。个别户公开抵触。

有一次我和县委书记李明去夏村下乡，到一个姓黄的家里吃派饭，他们对统购统销不满。家里人在炕上吃窝头、粥，我们俩在地下光吃粥，连窝头也没给我们吃。还有的在统购统销时把粮食转移到外地亲戚家、装在中医药架的药匣子里、装在枕头里……虽然经过反复宣传、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特别是干部、党团员模范带头作用，较好地完成了征购任务，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个别地区、个别干部，工作做的不细心，发生强迫命令，对思想不通的余粮户进行体罚、逼供。也有的底数不清，片面的任务观点，购了过头粮，第二年又发生缺粮现象。对发生的问题都及时采取了措施，进行了妥善处理。在进行余粮收购的同时，对缺粮

地区、缺粮户，也拟定了统销指标。填发了粮证，凭证按月定点供应。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私人粮商粮贩一律不许自由经营粮食，只能做国家销售粮食的代销店。私营粮食加工厂，只能接受国家粮食部门委托加工，不准自购原料自销成品。粮食统购统销以后，跟着实行了油料的统购和食油的统销。1954年又实行了棉花的统购和棉布的统销。

为进一步搞好统购统销工作，从1953年以后，每年冬季县里都要集中一段时间，集中精力抓这项工作。1956年以后，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工作重点、工作对象由个体农民转到以集体为主。加之工作有了一些经验，农民有了卖余粮的习惯，把卖余粮当作自己应尽的义务，因此，工作的难度比以前要好一些。同时，统购统销的具体政策、具体办法也不断加以改进。比如1954年以后，把每年的粮食估产、评产改为按常年定产，一定三年不变，多产不多购，干部群众比较满意，促进了农民的增产积极性。

粮食统购统销的实行，初步缓解了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保持了市场的物价稳定，在不高的水准上满足了工业化对粮食的需要，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局面，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同时，粮食统购统销的实行，也推动了农业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实证明，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是非常正确的。

（《房山文史资料》第14辑）

## 初级农业社时韩营村的风波

唐占忠

韩营村，解放初期隶属河北省良乡县第四区辛庄乡。地处永定河右岸大堤脚下的涿、良、大兴三县交界。土地贫瘠，到处是盐碱沙荒芦苇草，仅有五、六十户人家。1943年张晋伶到窑上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便一头扎进该村贫苦大众之中，这里很快就成了涿、良、宛联合县五区抗日活动中心。在共产党领导下，群众觉悟大大提高。为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全村有五分之四的青壮年参了军，投入到火热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洪流之中。当时该村是支前模范村，是平南革命根据地之一。

### 土改后的风波

1949年底，韩营村在共产党领导下彻底完成了土地改革，广大贫苦农民从此翻身成了国家主人。各家各户当领到国家颁发的土地证时，欢快喜悦的心情象久旱的禾苗得到了甘露，象饥饿的婴儿得到乳汁一样兴奋不已。三代讨饭出身的武顺村长带领全体村民积极投入农业生产建设。这时，过去在战争年代参军的或解放后转业的军人，得知家乡土地改革喜讯，纷纷从部队或工作单位要求退职还乡，为农村建设充实劳动力。

1950年春，韩营村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出现了热火朝天的你推车，我肩担，我拉犁，你扶耩，运肥、耕地、播种，男女老少起早贪黑一心扑在土地上的春季生产新高潮。就在此时，武顺发现有些户的土地还荒着没耕种，他感到奇怪，于是立即召集村委会成员分头行动进行调查。原来刘俊、王玉山、张才等人，将分得的土地偷偷卖给了别人；孙老豹、赵老四等人游手好闲，将分得的土地又还给了富农户；耿大脚、赵半天、刘蔡氏、韩石氏等孤寡户知道土地是命根子，但因没人干活，托人将分好的土地租给他人。对此，武顺非常

痛心而焦急，经汇报和请示区、乡领导后，为了抑住这种歪风蔓延，果断采取以下措施：(一)召开全体村民会，请苦大仇深的阶级弟兄孙水利、韩仲文等人进行忆苦思甜，结合村里出现的问题，讲耕者有其田，翻身作主人的道理，以加深对土地改革的认识和对党热爱的阶级感情；(二)在做好思想发动工作的基础上举行群众说理批斗会，让退田户、转卖户、出租户当众坦白检讨自己的错误，群众进行公开说理批斗，以帮助其提高思想，转变作风达到批评团结之目的；(三)为巩固和发展农业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走合作化道路势在必行。武顺号召单干户立即联合起来，组成临时性或季节性的合作互助组，规模大小不拘，三五户十来户的均可；(四)为防止类似事故重演，武顺以村长名义挑头成立互助组，要求退田、转卖、出租户必须加入，带领大家走合作互助道路搞好农业生产。

由于采取以上措施，韩营村掀起的卖田、退田、租田风波得以扼制。武顺合作互助组的建立(是当时葫芦垡区南十八村自发的第一个成立的互助组)和影响，韩营村乃至辛庄乡各村不同类型的互助组，象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由于人多力量大，秋后所有互助组都获得了高产，人们尝到了甜头，对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增强了信心。

### 合作化初的风波

1952年2月，韩营村为响应党的号召走农业集体化道路，村长武顺曾两次带领各互助组长分别到岗上吴春山和军留庄李德生全县典型农业生产合作社参观访问。回来后结合本村情况将七个互助组合并一起，率先在辛庄乡建起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领导机构是社长武顺、副社长唐怀、孙永香和妻子商韵琴。下设财会股二人(任万良、孙永泰)分别负责财物账目和记工；物资保管股三人(孙永民、唐占春、唐祥)分别负责大型农具保管和牲畜饲料。入社办法：(一)原则是自愿加入不强迫，平等相待，不歧视孤寡无劳力户；(二)各户入社土地按质按量分等级作股，年终结算时按股以纯收入的40%分红；(三)大型农具、牲口和果木树按质作价待后逐年偿还；(四)入社户不分男女老少都可到社里干活按等级记工分，到年终以工分按纯收入60%分红。这样，韩营村初级农业社在区、乡政府大力扶植下便胜利诞生了。

然而事隔一个多月后，突然出现一股闹退社和另立山头的风波。情况是副社长孙永香和妻子商韵琴出于破坏农业合作化的目的(在解放前他俩都是一贯道徒，为独霸家产曾买通土匪将亲婶母杀害。他俩还投机钻营看风使舵，1947年借地下村党支部书记张珍连襟关系混入党内，是阶级异己分子)，抓住入社自愿原则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搞退社。如他的亲叔伯弟兄孙永清、孙永丰、孙永海；劳动力壮而多的户孙永安、张喜、韩仲元；牲口是骡马大车是胶皮轮的户孙永山、唐占奎、孙永川；土地多质量好的户任玉、唐连、唐占芳等。由于他们影响，动摇了一些自私自利小农意识特强的户，如刘明、刘琪、刘珍、刘兵、任万生等，他们也起哄合伙到社里抢大型农具，往回拉牲口和大车，闹退社单干。副社长唐怀劝阻不住返遭毒打。为了阻止这场闹退社的风波，社长武顺火速向辛庄乡政府做了汇报。乡长许健强为了捍卫农业合作化带领乡工作组立即深入到韩营村，经调查研究在全面掌握情况前提下，他旗帜鲜明立场坚定，采取果断措施决心狠煞这胆歪风邪气。以韩营村为事故点召开全乡群众大会。会上他作了题为“顶歪风，战恶浪子坚决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报告，同时宣布两项经上级领导批准的决定：(一)对闹退社打副社长的普通群众在会上公开批评，其本人作深刻检讨，赔礼道歉，表示悔改决心。(二)对搞阴谋煽动闹退社另立山头破坏农业社的阶级敌人孙永香和妻子商韵琴当场宣布开除党籍，免去副社长职务，让群众监督改造，以观后效。由于乡领导处理及时，群众思想觉悟提高，闹退社的风波很快平息下来。

韩营村土地改革后农业合作化时期出现的两次风波虽然是坏事，但是经由党的领导、政策指引、群众斗争，它对农业合作化巩固和发展又起到了推动作用。从此韩营村农业合作社在社长武顺和广大贫下中农辛勤

努力下，在上级各级政府的关怀支持下快速发展，他们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将盐碱沙荒改造为稻田，干群齐心协力，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夺高产，建设新家园。

（《房山文史资料》第14辑）

作者系原区成教局教师

## 在开凿胜天渠的日子里

程占元 口述 佟林华 整理

1972年3月至1978年1月，我担任房山县张坊公社党委书记。那几年，我们党委干的最大一件事，就是领导张坊人民修了一条42华里的胜天渠。胜天渠是引拒马河水自流灌溉的一条干渠，起于十渡镇（当时属六渡公社）西关上村东，终止于张坊镇广录庄。渠道有2600米是在悬崖峭壁之内，1100米在隧道之中，260米在波槽之上。渠深、渠宽各2米，2.27个设计流量，能浇灌沿途2万亩农田。渠成二十多年来，在各级领导和当地干部群众的精心养护之下，一直发挥着作用。

张坊地区北部多山，南部是平原丘陵，拒马河从西南部穿境而过。这里十年九旱，解放前人民生活非常困苦，民不聊生，拒马河水基本没有被利用。人们说：“拒马河水哗哗流，两岸庄稼靠天收，早年求天天小雨。涝年求天水乱流。”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兴修水利，沿河建了扬水站，离河远的地方，打机井建站。可是人们又说：“拒马河水哗哗流，何时浇地何时愁。无电机器不上水，有电有水贵如油。”那时电力供应不足，停电频繁，一天停几次，有时开闸后水没进地电就停了。偶尔不停电，可电费又拿不起。那年月生产队单一经营，没有工副业，就靠卖点粮食得点钱，粮价又挺低，除去水钱肥钱，所剩无几，一个劳力干一天活儿只能得到四、五毛钱，所以百姓说何时浇地何时愁，不是愁没水就是愁没钱。1972年大旱，粮食大减产，我就产生了修渠的想法，可是当时对“唯生产力论”批得正凶，就一直揣在心里。1974年中央提出普及大寨县，小平发表讲话，要求各地大干快上，我觉得时候到了，就把这个想法端到了公社党委会上。

党委会开了几次，大家主要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工程太大，用工、用款、用料太多；二是技术要求高，缺少人才，万一水流不过来，没法向广大社员交待；三是有“唯生产力论”之嫌。

前两个问题，经过讨论有了解决的眉目。用工问题，在政策上，各生产大队按受益面积摊工，不受益大队如东关上、三合庄两个山区大队也出工，将来山区修路平原大队再给补。同时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积极性，开展义务劳动。工程用款用料，发动各界捐献和摘借来解决。技术人才问题，铁匠、木匠、瓦匠、石匠，本公社不少，就地取“才”。设计由当地土专家陈定宜担任，他曾设计几个水利工程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必要时还可以找县水利局审核指导。只是第三个问题，“唯生产力论”之嫌，有少数同志愁云不消，顾虑重重。

大部分同志是刚结合上来的干部，一次遭蛇咬，十年怕井绳。为此，我请示了县里主管农业的副书记王文哲，他说：“这不算‘唯生产力论’，我们不能搞空头政治，要有点实际的。”要修渠，他答应给我们提供水泥钢材，并嘱咐我们务必做到渠成水能流。

这期间我们还组织进行了实地技术勘测，修渠的方案终于定下来了。起个什么名字呢？我说毛主席讲“人定胜天”，就叫“胜天渠”吧，大家都表示同意。我们进行了分工，由我任总指挥，下设三个副总指挥。还安排了工地、安全、供应、后勤、技术方面的负责人。为了更好地统一思想，振奋精神，我们组织了公社党委成员、机关组长以上干部和各生产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参观了大寨。

### 二

1974年11月5日，举行胜天渠开工典礼大会。我代表公社党委作了动员，王文哲同志代表县里表了态。我们号召全公社各界积极行动起来，投身到修建胜天渠的活动中，并积极捐款捐物，每个公社干部都带头捐款，小到一个鸡蛋，多者不限，会后总共集资160万元。

各行各业都参加了修渠劳动。各大队社员来了，公社干部来了，社办企业、学校、供销社、卫生院、信用社各个部门都来了。南尚乐、南窖两个公社派来了援兵，良乡海军、岗上汽车团、空军仓库出动了70多辆汽车，县里领导也时常来参加劳动。工地上，红旗飘飘，歌声阵阵，宣传标语映山岩，广播喇叭震山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各有各的任务，各有各的功绩。红旗洞、八一洞、三八洞、友谊洞、九九向阳洞、五四青年桥，都是出自各方面人之手。工程期间，编印出了120期施工简报，及时报导好人好事和工程进度，编印了一本工地诗选，还组织了文艺演出。

整个工程历时两年零两个月，分两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各修21华里。第一阶段在山区，由西关上村东开始，经穆家口北山东山，千河口大河滩，片上附近数道山梁峡谷，到片上扬水站，这一阶段，因为多是高山深谷刀逢山辟岩，遇谷架槽，工程艰险浩大。并且为了和片上扬水站老渠接上，这一渠段落差只有8米，纵坡设计为0.3%，而一般要求最低不下0.5%，因此施工质量要求非常高。这个阶段，是动员社会各界一起修的，于1976年5月中旬完下，一次通水，5月17日召开通水庆功大会。第二阶段紧承第一阶段，主要在平原丘陵，由片上扬水站，经下寺、西白岱、大峪沟、北白岱、蔡家口、南白岱各村地界，到广录庄结束。这一段虽然施工相对容易一些，但对技术性要求较强，公社组织了一个专业队施工，至1976年年底完工。

### 三

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没有手套，没有工作服。喝的是拒马河水，吃的是窝头咸菜，有时改善一下伙食，荤油熬白菜。住的是不挡风寒的闲房、工棚。张坊村大人多，就住在一个闲置的大羊圈里，下铺花秸，和衣而睡。夏季蚊子咬，小虫爬，三更半夜轰蛤蟆，可是当时谁也没有怨言。指挥部建在千河口的大河滩上，是一个简易工棚，约有五间大小。四围扎上秫秸，里外抹上泥。房顶是一层苇帘，一层油毡，一层席。冬季河滩风大，一刮风，有的席子就刮跑了，后来就系好绳索坠上石头压住席子。地上只有一个用砖头砌成的小火炉，早晨起时，脸盆里的水都冻了冰，指挥部人员就住在这里，听情况，作决策。有个同志还在门口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自力更生彩笔绘出张坊新天地”，下联是“艰苦奋斗穷乡变成当代米粮川，”横批是“人定胜天”。

当时的劳动强度很大。汽车到不了工地，中间隔着拒马河，钢材水泥，全靠人挑肩扛，过河爬山，运到工地。开始几个月打眼放炮，全是用手工，后来虽说借了两台空气压缩机，可不少地段还是靠手工打。数九寒天，有不少人虎口震裂；盛夏炎日，汗水顺着裤脚流。在通过一线峰时，施工地点在悬崖峭壁上，需要先

打一个眼儿，插上一根钎，人登这根钎，再打第二个眼儿，插上第二根钎，登上这根钎，再打第三个眼儿，这样依次爬到十几米、二十几米高的绝壁上。在上面打眼放炮时，头顶险石，脚抵峭壁，腰系大绳，凌空作业，相当危险。可是当时大家情绪高昂，都争着上去。

#### 四

关键部位，艰险地段，党、团员总是抢在前，干在前。领导干部既要管进度，又要管安全，还要和大家一起干。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真正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西白岱村党支部书记赵洪文同志，那时已50多岁了，一自坚持和民工们一起劳动。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有一次，他在山坡上处理放炮后的险石，一块石头滚下来，不偏不倚，正砸在他的腿上，鲜血立刻流了出来，同志们赶紧给他包扎上，还要把他背下山，可他就是不肯，继续用撬棍撬险石。第二天，他的腿肿得像个馒头，可还是一瘸一拐地来了。大家都劝他休息几天。他说：“腿伤了，还有手有眼，多一个人多一个劲呀！”

副总指挥兼工地指挥、共产党员周彦如同志，那时三十刚出头。有一天别人下工以后，他和一个技术员陪一位新华社记者工地上察看工程，拍照片。当他们正急匆匆向前走的时候，突然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两个炮捻正在喷着火舌，冒着烟，嘶嘶作响。他知道这是两个已经点燃的炮捻，这时躲是来不及了，他毫不犹豫，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手一个，像烫水薅猪毛一样，把两个燃烧的炮捻狠命地一下儿全拔出来，避免了一场飞来之祸。

北白岱大队共产党员工启和另外一个同志，为了施工安全，保证工程顺利进行，夜间举着灯，抓住山上大绳，连续三次爬到十几米高的山崖上排除险石。从下午5点一直干到第二天早晨8点，长达15个小时。等到别人早晨看见他时，浑身上下都是土。我们作为公社党委的领导，每天从机关到工地不知要走多少趟。县里的会要开，工地上缺东少西、磕磕碰碰要管，工程质量要检查，四、五个月才能回一次家，家里的事情根本就顾不上。

#### 五

修胜天渠不知道遇到多少困难，但我们每当遇到困难都是想办法尽量自己克服，能不找县里就不找县里。

开始几个月都是手工打钎。这里的岩石是沉积岩，含铁量大，一根钎子打不了一会儿就没刃了。劳动强度大，进度又慢，于是我们就想借台空气压缩机。我们家底薄，工程用款多，花点钱总是算来算去，能借则借，不能借则租，不能租再买。为了借这台机器，我们没法计算跑了多少路，费了多少劲。门头沟煤矿的王江，是党委成员，北白岱人，我和他早就熟悉，我第一次去他不在，开会去了；第二次去还不在，看病去了；第三次去在，他去请示一位副书记，说要开个会研究研究；第四次去说研究过了，行，但是矿上支农只支援大队，不支援公社，他们支援北白岱大队，不过空气压缩机已被一个支农点借走了还没有送回来，等送回来再借；第五次，送回来了，但是有了毛病，得修理修理；第六次，修理了，还差一个零件，不好买；第七次，全修理好了，可管库的人外出，风镐风钻拿不出来；第八次，我终于把空气压缩机装上了汽车，踏上了归途。当车到来到拒马河边时，又麻烦了，因洪水季节拆的桥还没有搭上。当时已是11月光景，河水二尺多深，天气很凉。怎么办？我把民工们招呼来，然后我和周彦如首先下河，手拉于在前面蹬水引路，民工们在后面推车，空气压缩机终于运了过来。机器到了红旗洞工地，在师傅的指导下，机器很快运转起来。可是，没几个月，新的问题又采了，风钻的钻头刃磨没了，包括我们从矿上另买了几个钻头，刃也磨没了。那时候，钻头是紧缺商品，定量供应，市场上根本买不到。我们就把钻头放在砂轮上磨一磨，接着用。后采几个钻头

上的合金都磨没了,不能再磨了,我们听说在修京原铁路时,部队打洞,百姓曾从沿途上拣到一些废弃的钻头,于是就派人到铁路沿线各村,挨家挨户地去打听、收购,5毛钱1个,就这样一直坚持到大渠修成。

在抢大渡槽时,遇到的困难更多。这里要在相距137米的两山之间,13米高的河滩上空,修一条深两米、宽两米的渡槽。县里对这个工程特别重视,派来专门的技术人员亲自来测量,刚测量完,正义哲来了,听完汇报,当场就拍了板儿,并说有什么困难尽管提。我们没有提,并且计划在第二年春天完成的工程,当时就动了工。修渡槽需要挖桥基,可刚挖一米深就见到了水,开始是两个人淘,后来四个人,最后八个人淘也淘不过来了。于是我们又从霞云岭鸽子台水库借来四台水泵,才解决问题。架渡槽需要大量圆木和木板。圆木做支架,木板打水泥盒子。我们把全公社番大队所有木板和圆木都收集来都不够,就又从阎村木材厂借来一些圆木。木材有了,还不行。主要是圆木不够尺寸,支架要十三米高,可借来的圆木只有五六米长,需要进行两层支架,这就需要四根长铁轨,做一个平台,在上面支第二层。我们又去找良乡火车站请求支援。铁轨运来了,又有了新问题。

开凿胜天渠时的场景 (程占元 提供)

要把它放在六米高的支架上,用部队的吊车吊,吊不动。我们就请来本公社在北京建筑公司工作的一个人来想个办法。他经得多,见得广,说可以用“抱杆”的方法,把铁轨用倒链先倒起来,然后再顺斜杆滑到支架上。这就需要大量的杉篙,哪里去找杉篙呢?我去西直门木材厂去借,开始他们不借,一连去了五次,我把本公社各行各业修渠的热情和杉篙的重要性大讲了一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们终于借了,并且一下子就借了500根。

在修建通过窝头山的渠道时,也出现了困难。窝头山,形似窝头。我们考虑了三个方案:一是由上面向下。一测算,要凿石3000多方,工程量太大;二是采用钻洞方法,可是这里的地质结构太碎,容易坍塌;三是从两边掏两个小洞,里面塞满炸药,将山的上部整个端走,这个方案不错,可需要1000多斤炸药,当时上面只供应几百斤炸药。这时有人说红旗渠不是自制炸药吗?我们何不去学学?于是我们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参观了红旗渠。在红旗渠,我们虚心讨教,学到了用硝酸铵、锯末加柴油的自制炸药的方法,还学到了其它一些技术。回来以后,由副总指挥曹振铎组织试验,没有几次就成功了。最后,我们是用800斤自制炸药、200斤国产炸药,一下子就把窝头山从中间削平了。以后还有几个工程,也是采用这种方法,大大加快了进度。

胜天渠终于修成了,它是张坊人民在极端困难的年月,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修成的。如今,它已流过了二十多个年头。二十多年来,张坊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各级政府和当地群众一直对它特殊保护,精心管理,几次修理、加固,使得渠水长流,普泽于民。

今天,它不是一道壮丽的旅游景观,而且依旧是当地人民的一条生命线。

最近,又听到有人说:“拒马河水哗哗流,顺着‘胜天’朝前走,北面长满了摇钱树,南面堆满了金猕猴桃。”也许,这里说的就是张坊驰名中外的磨盘柿和猕猴桃生产基地吧!

(《房山文史资料》第14辑)

作者系原区人大干部

## “大跃进”时期的南尚乐“千亩丰产方”

马向凤

1958年，随着人民公社化高潮的到来，农业战线的夺高产、放卫星成为一种时尚。当时，我在房山县长沟公社南尚乐管理区担任领导工作。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领导班子决定放一颗高产卫星，创建一个亩产千斤粮食的千亩丰产方。地址选在南尚乐村东，划地1000亩，其中包括南尚乐500多亩，北尚乐200多亩，惠南庄近200亩。抽调劳动力近千人。其中由密云水库工地调回两个我区的民工连队，300多人，各村的“四类分子”200多人，外单位支援的大学生和本公社的中学生300多人。短短的几天之内，千亩方的四个角插上了红旗，劳动力蜂拥而至，一场所谓“夺高产”的战斗就从这里开始了。

千亩丰产方的组织领导实行军事化。公社抽调专人组成指挥部，下设一个独立营，独立营下设3个连、9个排，此外还设有后勤供应处、技术指导处等机构。所有指战员集体食宿，吃粮按标准供应，整劳动力每人每年400斤。住宿在附近村庄的民房，行李和洗漱用具自带。劳动时间不固定，当时的口号是“起大早，加油干，晚上搞夜战”，有时夜里要干到12点多钟。

为使粮食高产，首先必须种上应时麦。为了抢季节，许多玉米还不成熟就进行抢收。把玉米秸砍下来就连玉米带秸一起放到地边的沟里。由于收得青，造成1000亩玉米烂了许多，没见到多少收成，真是浪费惊人。抢收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工具，致使许多参战的学生用手拔玉米秸，把手都磨出了血。收秋之后，紧接着是耕地。当时，指挥部没有牲畜和工具，耕地只能靠人翻。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思想指引下，为达到亩产千斤粮，土地要深翻1尺，施肥1万斤。在搞大面积丰产方的同时，还要搞3亩高产实验田。这3亩实验田，操作方法和种植规律都是违背科学的。要深翻5尺，每亩施1万斤粗肥和5000斤豆饼，下种子200—500斤。种植方式也进行了所谓的改革，将原来的尺二耩平播或“小对垅”改成一尺大垅平播或“小垅密植”。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劳动大军克服了重重困难，胜利完成了千亩方的抢收抢种任务。麦田打破了原来的村界、地界、道界，填平了大小坑20多个，迁去坟墓100多座，达到了地平、埂直、无坑尖、无坑洼。

麦田管理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密度过大，麦苗又黄又瘦又软，长不起来。当时南尚乐千亩卫星田比较有名，各级领导都很重视，参观的人比较多，苏联专家和大使馆的官员也来参观。市委赵凡同志亲自来千亩方视察指导工作，并对小麦拔苗工作作出指示，斩钉截铁地说，如果不拔是长不好的。市农林局杨局长经常派农大学生、科技人员来搞试验，总结经验。在各级领导的关怀和督促下，对手撒籽麦垅过宽、麦苗过密的，从麦垅中间割去一部分，三亩高起垅大播量试验田经过三、四次拔苗，最后也几乎所剩无几。

第二年，收了小麦之后就是种下茬玉米，有一部分是带着麦子套种的，种了“小八趟”玉米，还有农大调来的种子，种植方法也是搞试验。市农林局杨局长来千亩方检查工作，发现玉米缺肥料，直接调拨了20多吨化肥。“小八趟”玉米和“三种三收”的种植方法，都是从这里引去的经验在全县推广的。

1960年冬天，中央发出解决“一平二调”的指示。由于千亩方是“一大二公”、“共产风”的产物，是“一平二调”的典型。听到要解决“一平二调”的消息，指挥部就人心惶惶了，有的村要调走人，有的村要土地、要东西。当时负责的正副队长也无法领导了，就把情况向公社汇报，并请示怎么办。公社指示，现在还不能动，要稳定社员情绪，不能乱。还叫去几个技术员，假装搞测量，象搞什么建设似的，其实都是假的。领导一面做

稳定工作，一面作退赔的准备工作。在1960年年初的一天早晨，公社书记去千亩方，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传达中央指示和市委精神，讲公社的意见。讲完后，宣布几条纪律，各村人员吃早饭就走，除带好自己的铺盖，什么也不许拿，强调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就这样，人们吃了完早饭打上铺盖卷就全部回了各村。

人走了，事情并没有完。留下一部分干部，还有公社的会计等做分家退赔工作。首先确定分配方案，一是按集中连片就近的原则，按划分千亩方时土地亩数返还，彻底解决“叉花地”问题。其次，原来各村带来的农机具和其它物资退回原村，其余的以土地亩数为基础，土地多的多分，土地少的少分，按三份搭配好，根据好坏作价归村。三是对划千亩方时砍的各村的树木，千亩方所收的玉米，都评出数量并作好价，作退赔的准备。方案通过后，开始丈量土地、清理物资工具、作价、定应退赔数字。公社领导、各村支部书记、大队长等主要领导参加，开兑现大会，山领导讲政策、讲具体意见，把土地按原来有数又退赔到各村，把东西作好价和村里报的应退补的款数，都互相顶了账。群众对土地分回村都很满意。

南尚乐千亩丰产方(卫星田)是属于长沟大公社管辖，从1958年秋天到1961年春天，折腾了二年多的时间，总算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房山文史资料》第14辑)

## 房山县供销合作总社发展概况

王绍清

建国初期，国家面临严峻的财政经济困难。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医治战争创伤，稳定市场物价，安定人民生活、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当时，农村土地改革广泛开展，农民成了土地所有者，解放了生产力。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为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商业组织，解决生产资料严重缺乏和农副产品不能及时推销的问题。

中共房、良两县县委遵照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及河北省委、省政府和通县地委的部署，加强供销合作总社工作，选派县委委员——房山李明、良乡张令德两位同志分别任两县供销合作总社主任。还从党政机关调配了科长、区长等主要干部到县、基两社任职，农村供销合作社开始了蓬勃的发展。到1951年底共建立基层社32个，零售网点64处，发展社员141154人，占领了集镇的经济阵地。为保障社员当家作主的权利，供销合作社坚持民主管理的优良传统。在管理机构上，社员代表大会是供销合作社的权力机构；理事会是社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执行机构，履行社员代表大会授予的管理权利；监事会是社员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监察机构，履行社员代表大会授予的监督权力。

房山县供销合作总社首届社员代表大会于1951年9月5日在县委礼堂召开，出席代表94名。会议期间听取县总社工作报告，县委书记、县团委书记、妇联主任、工会主席到会作了重要讲话、大会决议房山县供销合作总社改为供销合作联合社。大会选举产生县联社首届理、监事会成员。

理事会主任：李明。副主任：穆林山、王腾超(县妇联主任兼)。

理事：杜恩霖(县长)、王奎玉(县社组导科长)、刘同春(政府实业科长)、郑玉森(银行行长)、刘天德(中学总务主任)、康继洲(长沟社主任)、刘世权(河北社主任)、谭景贤(夏村社主任)。

监事会主任：崔乐春(县委书记兼)。

监事：隗永忠(县团委书记)、贾宏明(县工会主任)、方锡智(政府工商科长)、赵贺清(张坊社主任)、郑春(霞云岭社主任)、于振洪(芦村社主任)。

良乡县供销合作社首届社员代表大会于1951年9月召开。会议期间、代表听取县社工作报告，通过了社章，选举产生了理事会监事会。

理事会主任：张令德。副主任：刘玉长、刘彩云(副县长兼)。

理事：秦芝儒(县社组导科长)、尚元基(秘书科长)、杨作洲(财务科长)、张成英(原三区社主任)、石永恒(原四区社主任)、贾华北(原二区社主任)。

监事会主任：霍梁(县委书记兼)。副主任：李云(县委组织部部长兼)。

监事：李文俭(税务局长)。

良乡县供销合作联合社第二届社员代表大会于1954年6月15日至19日召开。出席代表92名，县、区党政，县、基两社，主要领导17人组成主席团。会议期间代表听取县联社工作报告，修改社章，改选理、监事会。

理事会主任：尚元基。副主任：曹庶民(县长兼)，秦芝儒。

#### 1955年6月房山县供销合作社第二届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合影 (王绍清 提供)

理事：祝守信(交道社主任)、闻致和(城关社主任)、郭风鸣(推销科长)、赵连祥(政府工商科长)、刘吉庆(生产科副科长)、马有勋(县委宣传部长)、郭旭光(县妇联主任)、徐荣池(供应科副科长)。

监事会主任：张令德(县委书记兼)。副主任：陆清华(公安局长兼)。

监事：王阁臣(县财委秘书)、许亮(粮食局长)、赵世锋(银行行长)、付奎荣(县团委书记)、闫西贤(大苑社主任)。

房山县供销合作联合社第二届社员代表大会，于1955年6月6日在县委礼堂召开，出席代表81名。会议期间代表听取理、监事工作报告，改选了理、监事会。

理事会主任：隗永高。副主任：柴振江。

理事：史正甫(县社煤矿矿长)、刘玉忠(人事科长)、邓述哲(秘书科长)、田振芝(财务科长)、郭金环(计划科长)、刘庆珍(运输科长)。

监事会主任：蔡景超(县财办主任兼)。副主任：魏存生。

监事：魏宝华(城关社主任)、冯树礼(长沟社主任)。

1958年4月根据行政区划的变更，房、良两县划归北京市管辖合并为周口店区，房、良两县供销合作联合社也同时合并为周口店供销合作社。1958年6月区供销合作联社与区商业局合并，统称商业局，同时中断社员代表大会及理、监事的民主管理制度。1960年冬，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

并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毛泽东当时说：为了团结几亿农民，必须发展商品交换。废除商业，对农产品实行调拨，就是剥夺农民。在农民问题上，必须谨慎小心。1961年4月25日，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要他代表中央起草一个通知，建议各领导同志对包括恢复供销合作社在内的若干关键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以便比较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邓小平、彭真领导五个调查组到北京市顺义县等地调查。李井泉到四川南充县调查。胡耀邦到辽宁海城县调查。根据中央领导人的调查和农民的要求，以及对中国经济情况的分析，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恢复供销合作社及其集体所有制性质。1961年11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商业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规定：中央、省、县级都应当建立供销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应当实行群众办社，民主办社的方针。县社与商业局分开后，在农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农副产品收购，组织农村副业，支援社队发展多种经营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1963年隆重召开社员代表大会。

房山县供销合作社第三届社员代表大会于1963年6月11日召开，出席代表193人，会议期间代表听取审议六年来的工作总结和财务报告。六年间国库上缴利润7855000元，为国家增加大量建设资金，但所有制改变之后，在财务管理上出现一些问题，尚有310万元债务不能收回，还有增加库存，积压商品，给合作社造成一定损失。

6月13日，代表大会通过了修改的社章，选举产生新的理事会、监事会。

理事会主任：吕永珍。副主任：郭凤鸣、李凤清。

理事：李向爽(秘书室主任)、党永政(人保科副科长)、马吉昌(周口店社指导员)、赵玉文(计划科长)、刘自生(财务副科长)、王万忠(长阳社指导员)、杨春圃(计划科长)、徐荣池(供应科长)、崔文松(生产部经理)、闻志和(良乡社主任)、安振华(城关社主任)。

监事会主任：刘增勋(副县长兼)。副主任：赵福林(财贸部副部长兼)、张广珍。

监事：李敬芳(县委统战部长)、孔繁坤(县计委副主任)、王振远、姜永修(县财政局长)。

“文化大革命”中，取消了过去的管理形式，普遍推行贫下中农管理商店和供销合作社。1975年供销社得以恢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恢复了民主管理制度。

1983年4月4日，房山县供销合作社第四届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在工业局礼堂召开。这次应参加代表232名，实出席192名，其中农民代表132名，县、乡各级领导100名；妇女代表34名；少数民族代表4名，组成14个代表团，人员之多，范围之广，是供销合作社历史上的第一次。副县长张进儒致开幕词。县长邢春华作了重要讲话。县社主任任显桐代社务委员会作了二十年工作报告，总结了由于机构几分几合，给合作社的发展带来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会上，县社副主任作了财务工作报告。报告中说，全县有26个基层社、公司、加工厂等11个直属单位，各种经营服务网点319个，农村代销店228个，共计网点547个。除代销员外，有干部职工4146人，固定资产，自有流动资金，分别较1962年增加2.9倍和3.1倍。农村供销社门市、库房和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分销店进行了翻建改造。

4月5日，通过房山县供销合作社社章。

4月6日选举产生理、监事会。

理事会主任：任显桐。副主任：刘焕芝、刘永成。

理事：许志远(县社团委书记)、张文林(良乡食品厂厂长)、赵国玺(县社组织科长)、李英(县社采购科长)、王绍清(县社保卫科长)、郭志桐(县社办公室主任)、隗和官(县社财务科长)、张明生(县社生产公司经理)、孟繁禄(县社组技科长)、王洪来(长沟社主任)。

监事会主任：张进儒(副县长兼)。副主任：王砚香。

监事：王洪元(财政局长)、杜逢杰(工商局长)、张淑华(城关镇代乡长)。

同日，县委书记李永芳作了重要讲话，县委副书记张成基致闭幕词。

房山县供销合作社第四届二次社员代表大会于1984年4月28日召开，大会首先通过增补县社社员代表名单，通过县社人事任免名单。主任姜元兴代表理事会作工作报告，理事隗合官同志作财务工作报告，监事会副主任王砚香作监事工作报告，副主任许志远作提案审查报告，通过出席北京市供销社社员代表大会代表名单。会议期间，县联社与各单位签订了承包合同，市供销社主任欧阳斗、县委书记李永芳作了重要讲话。

1987年9月，“两撤一建”，房山区成立。召开了房山区供销合作联合社第一届社员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29名；列席代表27名。会议期间通过社章修改草案取消了理监事会，选举产生区联社社务管理委员会。

回顾我区供销合作社1987年以前的历史，感想颇多。战争年代，村、区、县合作社，虽无社员代表大会及理监事会的管理形式，除村合作社的干部由村民推举外，房良县二区合作社主任、会计、采购员，房涑涑联合县主任、股长、业务员、均由政府任命。抗日战争时期，他们为保证军需民食，冲破日寇对边区的经济封锁，通过地下商品交通线，乔装巧运，输出运进大批物资。二区合作社采购李和在运盐途中被日寇包围，牺牲在下寺村。房涑涑抗日联合政府合作社，为支援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从外地购进大批粮食，帮助群众渡过灾荒。合作社虽有大囤粮食，但干部仍吃政府供给的十二两小米(十六两一斤)。财务股长隗永高到涑水南城寺采购粮食，因饥饿四肢无力，只好蹲在路旁，吃个菜窝头，喝口凉水，继续赶路。解放战争时期，北窖农民合作社主任吕玉山，为了群众点灯，夜间带领人员爬山越岭，到敌占区距房山县城西五里处的沙峪村背煤油。建国后，房良两县农民积极要求建立自己的商业组织，心情迫切。但多年农民户无余粮，缺盐少油，粮菜兼食的生活，凑集股本，实非易事。合作社的干部与农会，齐心协力，不分昼夜，风雨无阻，扛着口袋，走街串巷，用既收粮食又收现金的办法筹集股本。合作社所用房屋，大部是土改时没收的公房及祠堂庙宇，设备简陋，有的搭棚售货。工作艰苦，报酬微薄，每月每人仅三十斤至九十斤小米，无固定宿舍，夜睡柜台上，开门卷铺盖；主任到县里开会，背被步行；采购进货，靠自行车带，山区只有人背驴驮，早出晚归，披星戴月；联村社建立后，添置马车，自装自卸，晚上结账值班，账目日结日清，发现短少立即追查。艰苦创业是合作社的优良传统，复写纸用旧后在煤油灯罩上烘一烘再用，节约一分钱的精神处处可见。当时有一段顺口溜，合作社的人员有三个奉献：一献青春日夜坚守在合作社；二献子女帮助装车卸货，业务忙时提篮送饭；三献家庭春种秋收得雇人帮助。自1952年房良两县合作社执行河北省民政厅“对长期脱产工作人员免服代耕勤务，家属享受优待”的规定后，合作社的人员爱社如家的事更数不胜数。社群关系密切，民兵为合作社夜间巡逻放哨，合作社的组导人员到村建社，深受群众欢迎。一次我在蒲洼建社时，突然高烧、头晕、呕吐，不能到户去吃派饭。这户的老大娘得知，作了一碗面汤送到住处。事隔五十载，难以忘怀。上级社为下级社服务，基层社为社员服务是合作社的宗旨。1958年周口店供销合作社黄山店分销店负责人王砚香，带领职工背篓送货，群众称为“背篓商店”，闻名全国。1964年9月，王砚香同志参加全国劳模观礼代表团，受到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朱德，总书记邓小平及其他中央首长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战争年代合作社的干部把生死置之度外，建国后他们继续艰苦创业，工作热情更加高涨。其原因除个人革命觉悟外，平日领导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紧，经常召开民主生活会，听取社员意见，防微杜渐，不容懈怠，理监事会及社员代表起着重要监督作用。合作社有着辉煌的历史，那种革命精神一定会永远发扬光大。

(《房山文史资料》第15辑)

## 房山县的农村“小四清”

魏志华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1963年初，决定在农村进行“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先后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明确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认为“四清”、“五反”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是国内反修防修、挖修正主义根子的一个重大战略措施。农村四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

根据中央和市委的指示精神，经县委研究决定房山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小四清”）分三批进行。第一批，石楼、琉璃河、窦店、南召4个公社、57个大队为试点，1963年10月开始。第二批18个公社，除试点以外的平原所有公社282个生产大队，从1964年3月初开始。第三批山区10个公社，从同年8月开始，计划在年底全部结束。

县委对四清运动极为重视。尤其是1964年平原公社的四清全面开始以后，县委把农村四清当成突出的政治任务来抓。县委成立了四清领导小组。有县委书记霍梁、副书记张革夫、王介山、农村工作部长胡汉文、宣传部长佟建和、组织部长隗永树、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张占明7名同志。县成立了四清办公室。县委常委每人各抓一个点。同时，为便于检查指导，除试点公社外，划分城关、良乡、长沟三个片，由县委常委分工负责。县委常委每10天碰一次头，交流四清情况、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为了搞好农村四清，市、县委抽调了大批干部。第一批4个试点公社抽调工作队317人。第二批18个公社抽调1519人。其中科局长以上干部113人，市级1143人，县级149人，公社227人。市里派来的工作队员主要是大专院校的干部、教师。

根据华北局和市委的指示，农村四清运动的步骤是：宣传教育、干部洗澡、进行四清、开展对敌斗争、总结教育、组织建设和改善经营管理、规划生产等六个阶段。根据这一安排，第二批四清工作队于1964年2月下旬，利用一周的时间在县里进行集训，学习中央两个十条，市、县委关于四清的部署，并介绍了四清试点公社的经验。四清工作队经过集训，于3月初到达各公社、各村。四清工作队到村及到运动暂停，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思想发动、培训骨干。四清工作队进村后，对干部、群众大张旗鼓地宣讲中央两个文件，宣传四清的目的、意义、方法步骤和政策界限，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并通过深入到户、访贫问苦、小型座谈等各种形式扎根串连，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在宣传教育、思想发动的同时，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进一步学习，宣传中央文件，揭盖子、放包袱。公社主要领导带头检查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工作上存在的问题。同时部署公社的“四清”运动。

二是组织大队、生产队干部洗手洗澡，放包袱。通过思想发动，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大队支委在党员会议和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放包袱，作检查，查危害，挖根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上有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由贫下中农代表及四清工作队负责向群众转述。一次通不过的再次检查、直到大多数人通过才算“下楼”。其他干部结合讨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群众反映大的，作重点检查，并组织评议。

三是四清算账。在群众揭摆问题、干部检查放包袱的同时，成立大队、生产队四清查账小组。由贫下中农代表及熟悉业务的人参加。一是近几年的账目普遍查，一是按群众揭摆出的问题重点查。

四是整改退赔。对干部检查和群众揭发出的问题，经过调查核实，按照政策进行处理。从检查交待出的经济问题来看，除少数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外，绝大多数属于多吃多占、借用公款问题。对这些问题，除本人进行深刻检查外，都根据干部本人的归还能力，退还了多吃多占的公款、公物。当时不能还的，都作出了还款计划，分期归还，并经过贫下中农代表讨论通过。揭发出的政治上、工作上的问题，一般也提出了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在1964年麦收后，各公社、大队大部分进行了干部洗手洗澡放包袱。通过这段工作，使大多数干部改正了错误、放下了包袱，改善了干群关系。“三夏”开始以后，四清运动暂停，社队干部及四清工作队全力以赴投入“三夏”。

1964年7月，因四清工作队力量不足，县委决定将进度较慢的张坊、天开、黄山店、崇各庄、葫芦堡五个公社的四清暂停。把这五个公社的四清工作队转到其他公社。7月底，三夏结束后，县委根据四清运动发展情况，考虑到大队、生产队干部的四不清问题与公社、公社企事业单位有密切联系。公社及企事业单位的问题不解决，大队、生产队的问题也不好解决。因此于7月底又从各村的工作队抽调一部分骨干搞公社及公社企事业单位四清。7月份以后，公社及企事业单位的四清，在原来的基础上，根据各村、各单位群众揭发的问题，再次进行动员，掀起揭盖子高潮。公社的主要领导下好三层“楼”，即在党委扩大会、公社干部会，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会上放包袱，检查交待自己的问题。并吸收各村的贫下中农代表参加。在“洗手、洗澡”的同时，组织专门班子内查外调，查证核实，最后进行退赔整改。同时，各村四清主要是对重点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并逐步建立起大队生产队的贫协组织。为了加速公社机关革命化，根据华北局和市委的指示，撤销了公社机关食堂，公社干部及四清工作队一律到各村贫下中农家里吃派饭。

公社及公社企事业单位四清正在进行中，市委指示，为了保证四清运动的质量，防止走过场，要改变全面开花的做法，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各县四清运动暂停，四清工作队全部集中到通县会战。因此到1964年8月底，全县的四清运动没有结束便全部停了下来。

1964年的四清，尽管指导思想是“左”的，但进行中强调在当地党委、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中又强调执行政策，因此，没有引起干部、群众大的思想波动，没有影响当年农业生产，对工作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通过宣传教育，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也有了一定提高，各级干部的作风有了很大转变，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明显增加。通过干部“洗手、洗澡”、放包袱，有错误的干部作了检查，退赔，放下了包袱，也密切了干群关系。1964年底，结合年终分配，全县消减了干部不合理的工分4万多个劳动日。退还多吃多占粮食11000多斤，款15800多元。特别是对农业生产，从四清一开始就强调从生产人手，从县里到各村，各级领导都有专人抓生产，农忙时集中力量抓生产。最后，把粮食是增产还是减产作为验收四清运动的标准之一，因此，对当年生产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64年的小四清有些地区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有的工作组对基层干部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撇开党支部去搞扎根串连，访贫问苦。不是依靠大多数干部、大多数群众，而是像土改那样，单纯依靠所谓的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使运动不能正常开展；有的工作不深入，发动群众不够，使运动走了过场，该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的地方由于思想工作不细致，干部群众不理解，发生了几起自杀事件。

1964年9月初，各公社利用三至五天的时间，召开三级干部会，并吸收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由公社党委和四清工作队传达市委关于四清的部署，讲清四清运动暂停的原因。总结几个月来四清的成绩。动员干部、群众团结起来，搞好农业生产，搞好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为了巩固前段四清成果，防止四清工作队撤走后发生问题，县委还对全县干部提出约法六章：一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准搞资本主义活动；二要坚持依靠贫下中农，不准打击报复；三要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准再搞四不清；四要积极工作，搞好集体生产，不

准消极怠工；五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六要加强对地富反坏分子的监督改造，不准敌人乱说乱动。同时，全县还留下八十多名四清工作队员，每个公社设一个留守组，巡回检查，帮助社队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巩固前段四清运动的成果。

(《房山文史资料》第15辑)

## 公社化时期的农民食堂

魏志华

农民食堂是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事情，但至今还记忆犹新。

房山地区的农民食堂开始建立在1958年的6、7月份。有些经济基础较好、工作基础较强的村，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办起了托儿所、幼儿园、农民食堂，群众自愿参加。当时，对解放劳动力，搞好农业生产，起了积极作用，干部、群众是欢迎的。但到了1958年的下半年，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农民食堂的性质就改变了。各级领导把农民食堂看作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把农民食堂作为“必须固定的社会主义阵地”。因此，农村食堂问题，在当时被看成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要求各级领导必须加强领导，积极扶持。在这一形势下，于1958年8、9月份，没有经过群众充分酝酿，一哄而起，全县就普遍办起了农民食堂，实现了全县的“食堂化”。群众家里的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无偿归了食堂。食堂用不着的，社员自己处理。由于没人要，许多都砸锅卖铁了。农民食堂的规模很大，一般为一个生产队建一个。有的村小户少，一个村建一个。每个食堂一般都一、二百户，四、五百人，山区规模稍小一点。1958年公社化后，认为到了“共产主义”、“一大二公”，对群众实行供给制，实行几包(吃饭、穿衣、看病、烧煤、子女上学等)，包的越多越好，包的越多，“共产主义”因素越大。根本不顾当时的条件。因此，当时的农民食堂也是吃饭不要钱、不要粮、吃“共产主义”饭。不仅本村的社员吃饭不要钱，就连外村、外地的亲戚朋友来了也是白白吃喝。因此，食堂化初期，虽然不是群众自愿参加，但多数群众也没有多大意见。认为吃食堂省心、省事。特别是家里没人做饭和人多生活困难的户特别满意。但时间不长集体经济越来越空、粮食越来越少，很快就取消了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实行劳力分等、以人定量。

1959年以后，由于自然灾害和各级领导的“瞎指挥”，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浮夸风”，使集体经济遭到很大破坏。粮食减产、农业减收，农民食堂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群众的意见也越来越大。食堂的主要问题是：一是食堂规模过大，群众“打”饭不方便。一般一个食堂有几十户，几百人，每天吃饭排大队，等半个多小时。尤其是丘陵、山区的群众居住分散，有些住家离食堂几里地，甚至十几里地，一日三餐要走十几里甚至几十里路。遇到刮风、下雨、下雪，路不好走，吃饭更难。张坊几个山村，冬天因下雪路滑，打饭时经常摔跤，把饭菜也扔在地上。二是对老弱病残无法照顾。在食堂吃饭是大锅饭、吃“死”食，花样很少，也不细致，只能做什么吃什么，对老弱病残没法照顾。家里来了亲戚、朋友也没法招待(当时农村没有饭店)。有的群众说：“这二年吃食堂连亲戚朋友都断了。”三是浪费劳力。如果群众在自己家里吃饭，老人和身体不太好的或有小孩的妇女就能做饭，根本不占好劳力。吃食堂以后这些人没事干，而每个食堂都要占十几个管理人员和炊食人员，这些人又大都是好劳力。四是不利于节约。社员在自己家里吃饭可以农忙

吃干，农闲吃稀，可以掺点瓜菜，节约粮食。而在食堂吃饭只能按定量吃，天天光。五是不利于社员饲养猪、羊等家畜。在家里吃饭有泔水、糠皮、菜叶可以养猪，吃食堂以后就不能养了。1959年以后社员户养猪的明显减少。此外，还有少数队干部强迫命令，社员不出工，不服从领导就不给饭吃。还有少数队干部和食堂管理人员贪污盗窃、多吃多占、克扣群众口粮。由于食堂办的越来越不好，社员吃不饱，长期营养不良，到1960年有不少村干部和群众得了浮肿病。

当时尽管食堂问题很多，群众意见很大，但谁也不敢公开讲。因为食堂是“人民公社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阵地”，对待食堂的态度，就是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只能说好，不能说坏。有些干部和群众就因为说了对食堂不满的话，受到了批判。长沟公社有些人说：“人民公社好，就是吃不饱”，于是就按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思想进行批判，有的干部还受了处分。

根据食堂出现的问题，各级领导极为重视，并采取了一些措施。一是加强领导。公社领导每人包一个食堂，各级领导确定专人抓群众生活、抓食堂，解决工作中的问题。1960年后，粮食不足，就帮助食堂用玉米皮、玉米瓢儿做淀粉。开垦边角荒地种粮种菜，增加生产，实行“瓜菜代”。二是整顿食堂。对工作态度不好，群众反映大，特别是经济上有问题，手脚不干净的炊管人员，进行了调换和处理。三是撤销公社食堂，公社干部全部到农民食堂去吃饭，与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克服公社机关化作风，使干部深入群众，深入食堂，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浮肿病严重的群众给予及时治疗，并给了一些黄豆、糖等营养品。四是改进了一些食堂管理办法。对老弱病残和离食堂太远的户，可以从食堂领粮食回家自己做饭。有的一次领三、五天，有的一次领十来天的，有的村、队还专办了“老人食堂”，这样缓解了一些矛盾。

农民食堂出现的问题后，中央、市委、县委都派人进行了调查。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及李庄、李林等人就曾到我县城关公社羊头岗等村调查。与队干部、党员、群众，食堂管理人员进行了认真地交谈。经过调查，市委、县委对食堂的态度有些转变。强调要坚持自愿，吃食堂也可以，不吃食堂也可以，不要把食堂当作政治问题来对待。这一精神传达以后，少数队的食堂散了，有一些户退出了食堂，有些户退一半，留一半。有的老小退出、劳力留在食堂；有的家属退出，党员、干部留在食堂。但绝大部分社队干部思想不通，坚持把食堂办下去。原因是有些干部是“左”的思想影响，认为食堂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只能发展，不能倒退。而大部分干部，群众是心有余悸，怕犯错误、怕政策变，怕“秋后算账”，怕挨批判。直到1961年5月底，为农民食堂问题，市委专门给农村干部、群众发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原原本本地向党员和群众传达。信中强调必须彻底走群众路线，完全按群众的意愿办事。指出：“吃不吃食堂都自愿，吃不吃食堂都好，都光荣；吃不吃食堂都给予便利；吃不吃食堂都是拥护社会主义。”市委给农村党员、群众的这封信，经过党内党外的反复传达讨论，干部、群众解除了顾虑，情绪高涨、反映强烈。普遍反映“这回心里可踏实了。”绝大部分表示愿意回家自己做饭。到5月底，全县1171个农民食堂，68513户。经过讨论，已解散和决定停办的就有637个，占54%，46568户，占68%。到1961年的7、8月份，各村的食堂就陆续解散。到此，全县办了三年多的农民食堂，随着“大公社”的解体而宣告结束。

（《房山文史资料》第15辑）

# 大战“旱高台”

## ——南韩继村打井抗旱纪实

韩磊

南韩继村隶属房山区周口店镇，位于著名的龙骨山脚下，距北京 50 公里。该村占地 1.35 平方公里，拥有耕地 1040 亩，有 365 户人家，常住人口 1143 人。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南韩继人在村党支部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徐庆文的带领下，就是京郊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进入八十年代，又在京郊率先实现吨粮村，以稳产高产而远近闻名。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南韩继的农业成果，得益于当年的打井抗旱。

### “旱高台”

现在的南韩继村，给人的印象是：宽阔整洁的街道，一排排整齐漂亮的楼房，四周分布着平坦肥沃的良田，全部灌溉农业是这里的一大特色。但是，以前村里可不是这个样子。村子周围遍布沟沟坎坎，素有“七梁八岗十道沟”之称，村西还有一片干河滩。横卧的大沟，有的沟长 1000 多米，有的沟深 10 多米。沟岗坑梁，纵横交错，把 1000 多亩耕地分割得七零八碎。由于地势复杂，高低不平，而且地下有着较厚的砂石层，不但水位深，并且极易塌方，打井十分困难，使村里的耕地变成了浇不上水的“嘎嘎地”，是一个典型的“旱高台”，严重的贫水区。村民这样形容“旱高台”：“有水泡了汤，没水一抱秧，涝了收蛤蟆，旱了收蚂蚱。”

### 打井抗旱

种地没有水不成。打井，成了南韩继几代人的心愿。1957 冬天，村党支部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我们自己动手打井！”人们惊诧，人们怀疑，“在这个不到黄泉不见水的鬼地方打井，行吗？”二十多名壮汉子在党支部书记徐庆文的带领下，冒着严寒，在“旱高台”上抡镐挥铤地干起来。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眼深 30 多米的人工水井就打成了。这是南韩继有史以来，在村外打成的第一眼水井。喜讯很快传遍全村，人们奔走相告，“南韩继有水啦！”村民们就象过大年一样高兴。

尝到甜头的南韩继人，在此后的十年里，又打了 100 多眼水井，平均一亩地一眼井。许多撂荒地，变成了丰产田。南韩继粮食产量，不断递增，1958 年上纲要（亩产 400 斤），1960 年过“黄河”（亩产 500 斤），1965 年跨“长江”（亩产 800 斤）。

### 东水西调

1972 年大旱，从春天到 7 月中旬，没下过一场透雨，全村所有的水井，只有二眼水况好些，还有四眼只出半管水，其余的水井全部干涸，1000 多亩秋收作物受到了严重威胁。事实说明，要保证农作物能够得到足够的水分，光靠村里的土井不是办法，必须另找稳定的水源。经过全村社员讨论，集思广益，最后决定到位于村东的北庄村打井，实施“东水西调”战略。通过与石楼公社北庄村友好协商，达成打井协议。1972

年初冬，打井工程在北庄村地界破土动工，并于当年打成两眼深水井。

水井打成了，但新问题随之而来。从水源地到南韩继，相距 6.7 华里，地势东低西高，用明渠引水十分困难。大家想来想去，最后想到地道战的办法，修地下暗渠。暗渠就是从水源地开始，在 3 米深的地下，平行挖一条高 1 米、宽 1.5 米的通道，用砖石拱砌内壁，地面每隔 50 米挖一个竖井。竖井有几个好处：一是为了井下通风，二是容易纠正挖土方过程中的偏差，三是为了维修方便。说干就干，没有砖自己烧，没有石灰自己烧，没有测量仪器，就用土办法测量。由于工期紧，任务重，村里三十二名党员，除了两名年老体弱的，其余的全部到工地参战。几十名党员、干部和群众在党支部的带领下，不怕苦不怕累，不分昼夜连轴转，就连大年三十的饺子都是在工地吃的。经过几个月的奋战，次年 3 月 15 日，地下暗渠顺利通水，实现了东水西调。源源不断的地下水，为南韩继农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一年冬天，平整土地的战斗也打响了。

## 西水东调

1975 年，又是一个大早年。村里原有的水源，远远满足不了需要，缺水的问题又暴露出来。面对严酷的现实，永远不服输的南韩继人，又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到村西的干河滩打井，来一个西水东调。

大河滩下面是砂石层，到底有多深，谁也不知道，在上面打井有一定风险，弄不好就会失败。南韩继人有着百折不挠，敢打硬仗的作风，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三十多名壮劳力，在于河滩上，大干苦干几十个昼夜，一口气打出一眼可同时供两个 8 寸水泵使用的大口井。成功的经验，坚定了他们继续打井的决定。不久，又打了两眼深 200 米的深水井，并修了一条长 2500 米的防渗渠和 500 米的地下暗渠，完成了西水东调工程。至此，南韩继村一个较为完善的水系网络建成了，使保浇面积达到百分之百，彻底摘掉了“旱高台”的帽子。

（《房山文史资料》第 15 辑）

作者系房山房地产开发公司干部

## 房山小铁厂的建设经过

张本荣

钢铁是工业的基础，可是在七十年代以前房山县的钢铁工业还是一片空白，一斤钢铁都不能生产，严重制约着房山县农业的发展。1970 年北京市批准在房山建设钢铁厂，喜讯传来，极大地激发了房山人民的建设热情，仅用了十个月的时间，一座年产近万吨的小铁厂就在磁家务村的大河滩上建立起来了。

### 闯过生活关

“兵马未到，粮草先行”，这是中国兵家的一句名言。房山小铁厂的厂址选择在磁家务村河滩上，周围是一片荒芜，连一间房屋也没有。工人们进到工地时正值夏末秋初，白天是烈日暴晒，晚上是蚊虫袭扰。面对这种艰苦环境，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提出了“头顶蓝天、脚踏河滩、艰苦创业、改地换天”的豪迈口号，日夜守在工地。没有宿舍，就用塑料布支起，临时工棚，没有厨房就用围席围成临时伙房，没有炉灶就用河滩大石块砌灶台，就这样安营扎寨下来了。“先遣部队”安营后，立即为后续大部队准备粮草。当时工业建设的座右铭是“先生产、后生活”，生活上力求简朴。大家动手，学习大庆人的“干打垒”精神，盖起了800多平米简易得不能再简易的住房，解决了部分人员的住宿和办公问题，闯过了第一道生活关。

### 提前完成基础工程

工程开工后，面临的第一个战役就是土石方基础工程。土建工程受季节影响，冬季施工会影响工程质量。因此必须在寒冬来临之前完成全部土石方基础工程任务，时间紧、任务重，党支部决定速战速决。基础工程破土后，由于地下水位高，下挖一米后，地下水涌量很大，用三台水泵排水才能保证施工正常进行。在一个刮着刺骨寒风的秋夜，突然水泵发生了故障，地下水排不出，施工不得不被迫中断。支部委员杜明和刘士法带领工人们，不顾疲劳，连续奋战两天两夜，终于把水泵抢修好了。挖掘土石方的工人们，个个吃苦耐劳，下雨天也不休息，坚持工作。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硕的果实。一个月的时间，共挖土石方2400立方米，胜利完成了基础工程任务，比计划提前13天。

### 临危不惧的架线工

电力是工业的命脉。小铁厂要生产，必须接通高压线。高压线穿山越岭，架设十分困难。电线杆长10米，重约1吨，每根都要靠架线工的一副肩膀，两条腿，一步一步地扛运到山顶，往返路程3公里，这种劳动强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有一次，一根电线杆快要抬到山顶时，突然绳子断了，电线杆眼看就要从山顶滚下去，危及下面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这时，排长王启和其他几位同志眼急手快，不顾个人安危，用木杆子竭尽全力顶住了下滚的电杆，避免了一次恶性事故的发生。还有一次，胡刚和白金敏同志在树电杆时，突然南北支持腿失去了平衡，三根支撑杆向他俩倒来，眼看整个电线杆就要倒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俩不顾个人安危，紧紧拉住绞磨绳不放。他俩受了轻伤，却保住了电杆，避免了国家财产损失。

### 力拔山兮的“土抱子”

高15.5米、重10吨的热风炉，高20米的洗涤塔和炼铁炉，这些都是庞然大物，要吊装，要么用塔吊，要么用汽吊。可是工地既没有塔吊，也没有汽吊，怎么办？党支部坚信群众的智慧，把这个重担交给了马文兴、杜恒、杜玉山等七位老工人。这七位老师傅群策群力，琢磨几天几夜，终于想出了一个很好的施工方案。他们用4根杉木杆接起来代替塔吊的钢臂，再用两根钢丝绳和两个滑轮在炼铁炉前搭起一个高20米的土抱吊，大家都把它叫“土抱子”。这个“土抱子”可了不得，只用了三个多小时，就把三座热风炉吊装好了。当时在场的首钢老师傅也伸出大姆指称赞说：“在首钢用塔吊，这么短时间也不一定吊装好。”随后，一鼓

作气，相继完成了炼铁炉、洗涤塔、除尘器等大设备的吊装任务。

### 心红手巧的钳工组

钳工组肩负着整个设备的安装任务，大部分工作都是高空作业。钳工张德山老师傅，体重 90 公斤，爬到 16 米高的热风炉顶上去安装，对他是个考验。可是张师傅毫不畏惧，顶着严寒，带领同志们顺利地完成了高空平台的安装任务。砌炉子要用耐火砖，当时运来的耐火砖规格不对路，需要一块一块切后再进行磨削加工。工地没有磨砖机，用手工磨，不但劳动强度大，速度也跟不上；到外面求援吧，需要一个多月才能加工出来。时不待人，怎么办？这时钳工组在王贵组长的带领下，提出自己干。他们人人出主意，在一无图纸，二无设备的困难条件下，奋战十个昼夜，终于试制成功了一台磨砖机，比外围加工提前了一个月。磨砖机试制成功后，大大提高了磨砖效率，按时完成了磨砖任务。

### 无私奉献的焊接班

焊接是一种十分艰苦的工作，夏天穿着厚厚的工作服，顶着太阳操作；冬天迎着刺骨的寒风，在高空焊接。焊工老师傅贾启年既是战斗员，又当指挥员，还是安全员。他处处用模范行动带动青年徒工，一切从严要求，确保工作质量。在贾师傅的带领下，焊接班经常工作十几个小时不休息，星期天照常上班。要知道，当时是没有加班费的，更谈不上奖金了，一切属于无私奉献。

十个月，300 个昼昼夜夜，在技术、设备、材料奇缺的情况下，在一片荒芜的河滩上，建成了一座小型钢铁厂，这在钢铁史上，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硬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由工人的双手创造出来了。

房山小铁厂建成距今已有三十年了。当时，这个铁厂不仅满足了房山县农业机械化的需求，而且支援了兄弟区县。当时冶金部钢铁司曾安排斯里兰卡国家‘的代表团来厂参观，1973 年北京市委主管工业的书记王纯同志在这里召开现场会，提出全市工人学铁厂的号召，随后来厂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后因来参观的人日益增多，厂子接待不下且已影响了生产，不得不请示市里领导给予制止。八十年代后期，由于矿产资源不足和国家工业结构调整，这个小铁厂虽已下马转产了，但是在建这个铁厂时的一个坚强的党支部率领着建设者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精神所谱写的篇章却历历在目，催人泪下。

（《房山文史资料》第 15 辑）

作者系原房山县政协主席

## 房山最大的公路桥梁

### 房山公路分局史志办

在房山、大兴两区县交界处——永定河下游的河床上，一座雄伟的钢筋混凝土公路桥东西横跨，同北面的卢沟石桥比翼齐飞，这就是房山至北京地区当时最大最长的公路桥——永定河大桥。

#### 概况

永定河为华北海河水系的五大河流之一。源出山西省北部的管涔山，上游名桑干河，东流入河北省官厅水库，自此以下称永定河。东经北京市西部，奔腾而下，直泻天津市，注入海河。其上游流经黄土高原，含沙量仅次于黄河，故有“浑河”、“小黄河”之称。下游淤浅，河道迁徙无定，故有“无定河”之称。清代筑“永定大坝”，以固河槽，后定名为“永定河”。

永定河从坡度较大的山麓区流入平原，河道即进入中游，为卵石河床。自卢沟桥以下，河道进入下游，为细沙河床。永定河大桥即位于永定河下游的河段上。

永定河下游的河道游荡性很强，河身宽浅，沙滩密布。洪水暴发时，汪洋一片，波涛汹涌，雨季一过，叉道交织，水流散乱，河床改道迅速，主流摆动不定。由于泥沙沉积，河身逐年淤高，如今大堤内之老滩，已高出堤外地面约5—7米，形成“地上悬河”。

永定河下游的形势极为复杂，而且正当房山与大兴之间，这不仅使两区县间的交通受阻，而且首都的东、南、西各郊区县之间的往来也只有绕道市区，方能相互通达。所以修建永定河大桥实为必要。

1968年，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为了满足战备要求及日益发展的工农业生产的需要，决定修建此桥。

#### 设计

此桥由北京市市政设计院设计。

##### (一) 桥位选择

桥位选择在房山葫芦垡村东南，主要理由如下：

1、该处主槽较稳定，水流摆幅较小，河道不易移动。西岸有砖砌护面丁坝一座，长达180米左右，可防护桥头路堤。

2、桥位两端，均可修筑道路，西经葫芦垡于管营、东杨庄、可到良乡，与京石公路(北京至石家庄)、京周公路(北京至周口店)相接；东经马村、辛立村、罗奇营，可至黄村，与京开路(北京至开封)相连。

3、此处能够满足北京市水利管理部门所提的要求，最后确定的桥梁轴线能与规划的永定河治导线正交。

##### (二) 设计概要和标准

1、根据永定河下游河道的河床形态、水文条件和河道演变特性，为了确保两岸大堤的安全以及满足桥梁使用要求，经上级批准，修建一座全年通车的高水位桥。又根据北京市水利管理部门所提的桥梁孔位不宜

小于 600 米之要求，经过详细比较方案，桥梁全长确定为 677.16 米，共分 45 孔，单孔跨长 15 米。计算结果桥下冲刷总深度为 7.70 米，冲刷前桥梁上游最大壅水高度之理论比值为 0.33 米（当流量为 2500 立方米/秒时，壅水高度之理论值为 0.26 米）。

2、从桥位附近的河势看，桥址处河道的主槽有向东扩展的可能，因此，本桥在设计上保留了桥梁向东接长的可能性。

3、本桥上游的卢沟桥处 50 年一遇的洪峰流量为 5270 立方米/秒，卢沟桥下游的现有河道大堤之安全泄洪量仅为 2500 立方米/秒，最大泄洪量为 3000 立方米/秒，流量超过此值即需由小清河分洪。因此，本桥设计流量采用 3000 立方米/秒，约相当于 20 年一遇的洪峰流量，其相应的天然水位为 45.45 米，主槽天然流速为 1.79 米/秒。

4、桥梁设计载重为汽—26，拖—100，按 8 度地震烈度进行核算。

5、桥面为双车道，净宽 7 米，不设人行道，两侧各设 0.25 米安全带。

6、桥梁设计水位为 45.45 米，计入壅水高度的 1/2，保留 0.5 米余高，桥面中心高程定为 47.00 米，桥面不设纵坡。

7、上部结构：根据钢材品种以及考虑施工条件等因素，决定采用配 44 锰二硅低合金钢筋的先张预应力钢筋混凝土大梁。T 梁翼板宽 1.59 米，梁高 0.75 米，每孔上部结构横向共 5 片梁，全宽 8.0 米，梁顶铺筑 300 号混凝土桥面。

8、下部结构：采用 200 号钢筋混凝土钻孔灌注桩，桩径为 0.8 米，桩顶用 250 号钢筋混凝土盖梁连接。

9、为使水流顺畅地通过桥孔，并保护桥头路堤，本桥两端均设置导流构造物。

## 施工

本桥由北京市市政二公司桥梁大队施工。参加施工的有市政二公司的工人 300 名，民工 150 名。投资 162.5 万元（连同路基工程共 295.8 万元）。于 1968 年 9 月进行施工准备，11 月正式开工，到 1970 年 10 月全部竣工，为期两年。但 1969 年 4 月至 1969 年 11 月，北京市市政二公司桥梁大队因接受其他任务，中断施工。故就整个工程看，施工期较长，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1968 年 9 月至 10 月为准备阶段。

2、1968 年 11 月至 1969 年 4 月，主要为下部基础施工阶段。在此期间，配合制作少量预制梁。

3、1969 年 11 月至 1970 年正月，主要为构件预制和安装阶段。

在准备阶段中，一切筹备工作已安排妥当。1968 年到 1969 年的第一期施工，是全工程的主要阶段。在此期间，进行下部基础施工及预制 T 梁。时值数九严冬，寒风刺骨。但技术工人在当地民工的密切配合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利用大锅锥钻孔，创造了两天进尺 20 米的记录。即使滴水成冰的寒夜，水下混凝土灌注，也从未中断。有时一昼夜连续灌注三根，亦不叫苦。

第二期施工的预制安装工程，从 1969 年 11 月到 1970 年 10 月，也胜利完成。

大桥东西横跨永定河下游河段，全长 677.16 米，净宽 7 米，全桥 45 孔，每孔跨径 15 米。基础为钻孔灌注桩，深约 20 米，每排两根，上部结构为钢筋混凝土 T 梁。大桥设计合理，造型大方，结构坚固，气势雄伟，是在卢沟古桥之南新出现的另一道长虹，东西凌空飞架，极为壮观。

## 效益

大桥建成后,黄良公路(大兴黄村至良乡)的11.45公里的路基、路面工程也同时完成,房山和大兴的人民群众,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过去两地往来由于永定河天堑当途,交通阻断,除泃水渡河外,势必绕道卢沟。而今大桥飞架东西,征服险阻,在房山、大兴两区县间,由葫芦堡至黄村乘汽车瞬息可到。真是胜天无难,缩地有术!不仅两区县人民往来方便,而且两地物资也得到充分交流,这对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尤其是黄良公路和大桥的建成,不但沟通了北京市东、南、西部的通县、大兴和房山三区县的交通,促进其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还对捍卫和建设首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黄良公路又与京开(北京至河南开封)、京石(北京至石家庄)两公路相接,向东又有公路连接京塘(北京至塘沽)干线公路可达天津,向西可通过阎东公路(阎村道口至东庄子)与京原公路(北京至山西原平)干线相连,这就既可减轻京周公路(北京至周口店)的交通流量,又可使我国的重要港口天津通过黄良公路和京原公路通达河北西部,山西北部以及边疆各地,进而沟通了我国沿海与内地乃至边疆的联系,在战备上,其意义尤为重要。

永定河大桥,是房山管养的最大的公路桥梁。自建成之日起,它就巍然屹立在永定河上为房山和首都的经济发展,发挥着巨大作用。

(《房山文史资料》第15辑)

## 东方红炼油厂的创建回顾

张广明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在开发大庆、胜利两大油田之后,为就近解决北京和华北地区的石油产品供应问题,于1966年决定在北京建设一座大型炼油厂。1967年2月14日,国家计委批准了石油工业部的建设方案。当时出于战备的考虑和不占耕地的要求以及要“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原则,经多方勘察,国家计委、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石油部和北京市共同决定,厂址选在房山县周口店公社坟山村一带,并定名为东方红炼油厂。从此在首都西南猫耳山下,凤凰岭之上,一道荒凉贫瘠的山沟里,东方红炼油厂诞生了。经过三十五年的艰苦创业,顽强拼搏,发展壮大,昔日的炼油厂已发展成为现在的国内外知名的大型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东方红炼油厂当时设计为年加工能力250万吨的燃料—润滑油型炼油厂,分两期建设。被国务院、石油部、北京市列为重点工程项目,并作为北京市向国庆20周年献礼项目之一。目标确定之后成立了东方红炼油厂筹建处领导小组,石油部任命李世源(原石油部生产技术司副司长)为筹建处主任。他被称作炼油厂第一个创业带头人。

1968年3月,东炼厂一期工程开始,8月开始安装生产设备。施工采取大会战形式,由兰州炼油厂安装公司、抚顺炼建公司、红旗总队承担装置区的建设;北京市第六建筑工程公司、市政工程公司、设备安装公司等单位承建土建和公用工程建设。参加施工会战的还有房山县民工和北京石油学院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等院

校的师生们。建设期间，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多次到工地视察并作重要指示。国家建委两次召开专门会议，解决铁路、供电、施工等方面的问题，全国各地在技术、物质等方面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在布满花岗岩的山地搞建设是非常难苦的。开山劈石，削峰填谷为建设大军开辟出符合安装条件的施工场地是首要任务。按照设计规划，仅建成一期工程就需要移动 150 多万土石方。有人推算，如果摆成高宽各 1 米的矮墙，可达 1500 多公里，相当于北京到广州的距离。只一项凤凰亭装油站台的场平工程，就需要搬掉 3 座小山，填平 3 条峡谷，总工程量达 50 多万立方米，等于在花岗岩上硬是开出一片平地。当时的交通条件也不通畅，直达炼油厂的运输车辆只能绕道房山走周口店公社西庄村到胜利桥。在那里最先矗立在半山腰的是一块巨大的标语牌，上面红底白字赫然写着毛泽东主席的题词“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这也是当年千千万万创业者真诚的心声。

观向上的拼搏精神，提出了“先生产，后生活”、“先治坡，后治窝”的口号。会战指挥郁就设在间长 6 米、宽 4 米、墙高 2 米的小板房内。职工们住在冬不暖夏不凉的大工棚内，四外透风。吃的是定量供应的粮油，穿的是粗布工作服。冬天狂风怒吼，夏日酷暑难当。为了抢任务，经常加班加点；日日夜夜奋战在工地上、由于当“才”全国正在掀起“工业学大庆”的高潮，所以自东炼厂破土动工之日起，就把大庆建设的经验贯穿于整个建设、生产等各项工作当中。由当时炼油厂的建设处在“文革”初期，社会上大搞“停产闹革命”、批判“唯生产力论”，建设者们一方面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一方面又要跟非常恶劣的政治环境作斗争。当时北京所处的特殊地位，在周恩来和邓小平先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有利条件下，建设者们冲破各种阻力和干扰，在指导思想，学习大庆“两论起家”和“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创业态度；在精神状态上，继承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创业精神；在基建组织上，采用了大庆油田大会战的模式；在职工队伍建设上，发扬了大庆“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工作作风。经过 14000 多名建设者 13 个月的团结拼搏，东炼厂一期工程提前竣工投产。

1969 年 3 月 27 日，第一座重 187 吨的炼油塔——常压塔高高耸起，银灰色的塔身在蓝天下闪闪发光。塔身上书写着一幅“中国人民有志气”的标语，显示出石油工人的豪情壮志和为国争光的决心。

8 月 8 日，随着一声嘹亮的汽笛声，“毛泽东”号机车徐徐驶进新建成的房山石楼原油转运站台，第一车大庆原油运抵东方红炼油厂。

9 月 9 日凌晨 2 时，常减压装置生产出第一批成品油，从此结束了北京“只耗油，不产油”的历史。工人们用彩绸把油样瓶装扮一新，送到北京市政府，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喜，向北京人民报喜，向国庆二十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

炼油厂一期工程建成后，二期工程相继上马，尔后又分门别类建成了一批化工企业。东方红炼油厂形成了一个门类齐全的石油化工基地，发展成为中国国有特大型石油化工二集团。

#### 参考书目：

《中国共产党燕化历史大事》

《燕化志》

《主人翁之歌》

（《房山文史资料》第 16 辑）

作者系原燕山副食品公司办公室主任

## 房山县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王硕儒

### 全县手工业概况

房山县手工业同全国各地一样,系依靠手工劳动,具有使用简单工具、生产规模小的特点。一般开始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随着社会的分工,不少手工业脱离了农业,形成独立的个体手工业,后又进一步发展为简单协作的手工业作坊或工场手工业。这种变化大多发生在县城附近和集贸市场中心地区。据1948年底统计,房山县城附近的工商业125户,其中手工业户50户。当时的手工业,不少是属于服务业,如修鞋、修车、修理钟表、理发、做衣服、染布、浴池等等。还有的属于饮食业,如炸麻花、烙烧饼等等。在广大农村仍多是以农为主,兼营手工业。特别是农村土地改革以后,无地少地的贫下中农分得了土地,他们农忙务农,农闲从事手工业。农村手工业多以烧砖、烧灰、采煤、荆编、食品加工和瓦匠、木匠为主。据1952年统计,全县手工业户669户,从业人员1796人。其中工场手工业户20户,从业人员545人;个体手工业户649户,从业人员1147人。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全县的手工业也在不断变化。不少手工业劳动者发展成为手工业者,虽然大部分还是从事劳动,但有些手工业者开始带徒工或雇工,特别是工场手工业大量雇工。据1953年统计,全县手工业1396户,比1952年增长一倍;从业人员4151人,比1952年增长一倍多。在从业人员中,雇工668人,徒工59人。全县手工业中,工场手工业56户,从业人员767人,其中雇工560人,徒工9人;个体手工业1250户,从业人员3384人,其中雇工108人,徒工50人。按行业分,户数最多的是烙烧饼、炸麻花、做豆腐等食品加工业,有431户,占手工业总户数的33%,从业人员并不多,958人,占手工业总人数的23%,都是个体手工业,但出现了个体手工业者,有雇工42人,带徒工2人。手工业从业人数最多的是烧砖、烧石灰、采石料等建筑材料业,有119户,从业人员1417人,占手工业总人数34%,其中工场手工业39户,占工场手工业总户数69.7%,从业人员616人(内有雇工445人,占工场手工业人数72.2%);个体手工业80户,从业人员801人。煤炭采掘业20户,从业人员220人,其中雇工31人。

### 全县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房山县的手工业历史久,行业多,分布广,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生产规模小,劳动工具落后,生产效率低,影响生产的发展。为了扩大规模经营,增强整体实力,发展手工业生产,实现手工业劳动者的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在国家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必须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1951年6月,全国合作社召开了第一次手工业生产工作会议,肯定了个体手工业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并提出“重点试办,稳步前进”的工作方针。在中共房山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从1952年开始,在全县进行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县供销社合作社联合社内设立了手工业科,负责全县手工业的管理工作。对全县个体手工业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摸底,按照“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

愿互利”的原则，引导个体手工业劳动者组织合伙经营，或建立供销生产小组，向供销社或国营商业购置原料、推销产品、接受加工订货等。一些临时性的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开始建立起来。

1952年下半年，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房山城关8户修理自行车的手工业劳动者，由梁瀛倡议，开始组成一个临时性的互助组。以“合伙作业，年终分红”的方式进行自我管理，主要经营仍是自行车修理业务。互助组的成立，集体优势得到发挥，生产蒸蒸日上，鼓舞了全体组员，并对其他个体手工业影响很大，参加互助组的人逐渐增多。到1953年春，分散在房山城关附近一些打铁的个体手工业户也参加了这个互助组，互助组成员扩大一倍，营业范围也增加了修理和打造小农具业务。

手工业互助组的发展壮大，完全适应党和国家关于由互助组向合作社过渡趋势。在这种形势下，县委、县政府因势利导，及时派出工作组到这个互助组进行转办生产合作社的试点工作。1953年11月，工作组与互助组负责人协商，成立了以梁瀛等5人为主要成员的建社筹备委员会，讨论制定社章(草案)、有关各项管理制度，生产资料评估作价、收益分配方法等。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各项准备基本就绪，于1954年1月15日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宣布房山县城关铁业生产合作社(简称房山县城关铁业社)正式成立。讨论、通过社章，经社员民主选举出合作社的理事会和监事会。理事会负责生产、销售等业务，监事会代表全体社员对理事会的工作进行监督。全社共有社员18名，固定资产3000元。这是房山县第一家高级形式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其性质类似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的主要生产资料归社员集体所有，实行统一经营，统一计算盈亏，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合作社的利润，除按国家规定纳税、提取公积金、公益金和按主管部门规定缴纳各项基金外，对社员采取工资和劳动分红的形式实行按劳分配。

1954年，房山县手工业合作化有了很大的发展，迎来了手工业改造的第一个高潮年。为了加强领导，成立了房山县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社，具体领导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半年的努力，到7月底调查统计，全县共有手工业劳动者4189人(包括农民、农业社兼营手工业)，已经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7个，从业人员709人(其中社员702人)；组织手工业合作小组3个，从业人员274人。两项共组织起来983人，占手工业总人数的23.5%。未组织起来的个体手工业按行业分：金属制品业69人，木材加工业87人，竹藤棕革软木制品业93人，缝纫业114人，皮革制品业14人，软皮货生产3人，其他行业(小炉匠、锥鞋业、拴簸箕、染房、焊壶等)186人，共计566人，占手工业总数的13.5%；农业兼手工业：金属制品业67人，木材加工业191人，竹藤棕革软木制品业295人，缝纫业11人，砖瓦石灰业268人，其他行业(粉坊、豆腐坊、烙炸、酿醋、磨面、石碓、石料、筛石子、石板等)670人，共计1502人，占手工业总数35.9%；工场手工业，包括石碓、砖窑等698人；农业社兼营手工业440人。对手工业继续改造的重点任务是个体手工业者。

1954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报告〉的指示》指出：必须走合作化的道路来实现国家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8月25日~31日，河北省手工业工作会议召开。检查、总结手工业生产互助合作情况，对下步工作提出加速发展手工业合作化的要求。房山县原定到1955年底手工业合作社员、生产组员发展到2500名，第三季度通县专区会议调整为2540名，实际组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3个，生产合作组11个，社(组)员2592名，占全县手工业总人数(包括农民、农业社兼营手工业)61.9%。13个合作社是：房山城关铁业社，由初建时18人计划发展到31人，实际完成42人；张坊铁业社，计划6人，实际完成16人；石窝铁业社，计划17人，实际完成17人；长沟铁业社，计划21人，实际完成24人；城关木业社，计划28人，实际完成34人；石楼木业社，计划10人，实际完成11人；城关服装社，计划24人，实际完成23人；韩继石灰社，计划151人，实际完成143人；六间房石碓社，计划188人，实际完成188人；岩上石碓社，计划387人，实际完成387人；广录庄石碓社，计划344人，实际完成344人；南甘池石碓社，计划95人，实际完成95人；石窝石料社，计划552人，实际完成550人。11个合作组是：黄元井石碓组，计划119人，罗家峪石碓组，计划206人；三座庵石碓组，计划230人；曹章木业组，计划

10人；中院玻璃石组，计划50人；北庄石料组，计划10人；城关鞋业组，计划10人；城关皮麻业组，计划11人；张坊服装组，计划6人；吉羊席业组，计划27人；孤山口玻璃石组，计划39人，均按计划如数完成。计划外还建立城关理发组，8人；长沟理发组，7人。截止1956年2月调查统计，全县手工业共有3009人，比1954年减少1180人。减少的原因是部分农业社、农业不再兼营手工业。已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2885人，占手工业总数96%，其中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4个，社员2005人；手工业生产小组19个，组员880人，基本上完成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整顿与调整

在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自始至终贯彻“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坚持边改造、边整顿，在整顿中巩固和提高，在巩固提高中扩大规模，发展组织。整顿的重点是生产互助组问题多的三类社。据1955年初调查，全县14个手工业社，组中，办得好的一类社、组5个，一般的二类社、组7个，问题多的三类社、组2个。整顿中，根据各社、组实际情况，帮助干部提高认识，改善经营管理，建立健全生产管理、财务管理、收益分配、民主管理等制度。促进后进社、组向先进社、组看齐，生产组由初级向高级过渡，在巩固社、组的基础上，吸收和扩充新社(组)员。对尚未组织起来的个体手工业户，重点是加强社会主义教育，加快改造步伐。手工业行业繁杂，农兼手工业又很难固定，这给领导和管理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需要理顺关系，进行必要的调整。

1957年，贯彻“民主办社，勤俭办社，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方针，在手工业中进行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调整组织形式，切实解决、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改造面偏宽，农业社和农民兼营手工业偏多的问题，为了支持农业生产，妥善处理关于手工业与农业之间的矛盾，将六间房石碓社、城关建筑社、孤山口玻璃石生产组、北庄石料生产组、中院玻璃石生产组等划归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移交农业部门统一管理，移交财产14000余元。为了理顺关系，便于管理，将理发社、照相部、洗染组等服务性行业划归了供销合作社统一管理，连同木业社因技术低又以农业为主的社员共划出462名。自愿退社的社员45名。经过调整，截止1957年底，全县基本固定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4个，共有社员751名。

(《房山文史资料》第16辑)

## 良乡县手工业联合社的发展

顾宪图 口述 白玉 整理

解放后的良乡，私营手工业户不断发展，到1953年私营手工业发展已达到高峰。这时，党和国家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良乡县委根据上级的指示和形势的发展，于1954年8月正式成立良乡县手工业联合社——地方工业管理局，地址设在供销社内。同时决定调四区区委书记顾宪图任手工业联合社主任，主抓手工业联合社的发展，并参加良乡县委班子。同时调入手工业联合社的还有刘吉庆、杜景华、崔克勤、王治中等人。新成立的联合

社决定先抓良乡城内的个体手工业户，以点带面，推动全县手工业的发展。主要工作思路是：一、个体手工业户必须组织起来，成立手工业联合社；二、实行股份制，可以带机器入股，有机器入股可以带人；三、有技术才能的人，可以参加工作；四、要选举产生联合社的领导；五、成立手工业联合社的理事会和监事会，共同管理联合社的发展；六、定期分红和扩大积累，为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

在开展上面六项工作后，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声势，联社及时召开了个体手工业户大会，向他们宣讲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化三改”的重大意义，给手工业户们指明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是我们的发展方向。会后，通过座谈讨论，谈认识，讲体会。发现个别有顾虑的户，联社的同志们就深入到户进行动员，给他们解除思想顾虑。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又向他们讲明了组织起来的办法，大家听了很高兴，认为办法是可行的，也就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于是韩进明、高富会、刘玉、刘华池等七、八户，在联社的指导下，很快地成立起第一个缝纫社。把他们的缝纫机做为投资入股并带进了会缝纫的技术人员参加社里工作。有技术的管裁剪，会理财的当了会计，共有十七、八个人。在他们的带动下，良乡地区很快的又成立起以董士君、宋有立、宋有德为首的自行车修理社；以屈广林、屈广德、翟胜领为首的铁业社；以薄家鼎、薄家珍为首的地毯社。随后，理发社、刻字修表社、皮麻社、制鞋社等也都相继成立。

随着形势的发展，1954年11月召开了良乡县手工业联合社成立大会，琉璃河、交道、窦店、坨里等乡镇的个体手工业户也参加了大会。对促进手工业联合社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通专地委工业办事处主任安幸存、副主任张栓柱、郭铁柱听了良乡县委的汇报以后，认为良乡县是手工业联合社发展的典型，在通专范围内发通报给予表扬，并组织通专各县的领导到良乡参观学习。

手工业联合社成立起来后，规模不断扩大。逐渐设立了人秘科、组织科、财务科、生产科、供销科、监事会等，人员也达到了二十多位。局面打开了，社内同志又分赴琉璃河、交道、窦店、坨里等地，组织发展新的手工业联合社。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各乡的手工业联合社，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到1955年5月在上述乡镇又成立起铁业所4个、缝纫社3个、理发社2个、自行车修理所3个、刻字社1个，制鞋社1个，木器所1个，晓幼营、后补营的制灰厂2个，从而使良乡县的手工业联合社达到了25个。这些联合社的成立和发展，把良乡县的“一化三改”推向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促进了农村合作化的大发展。

当时，国家二轻部部长白如冰、邓捷等领导，带着国家手工业司长等有关同志来到了良乡考察。经过两天座谈，他们认为良乡县在一无资金、二无设备、三无管理人员的情况下，凭着真抓实干的革命精神，白手起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成立起县手工业联合社，并在全县范围内建立起二十五个联合社，是全国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典型。为此，良乡县委特意召开了庆祝大会。到1956年，良乡县的手工业联社已发展到40多个单位，有1400多名工人，产值是30万。那时良乡县的名牌产品是铁业社生产出来的镰刀等生产工具，这些产品销往大兴、涿县、门头沟等地，受到各地群众的欢迎和好评。

当县手工业联合社，在合作化道路上蓬勃发展时，某装甲部队要在赵辛店建一座坦克学校，需要大量的砖瓦、灰、沙等材料。这是一个发展联社的大好机会，联社领导立即主动找到部队司令员马季协商。最后，部队出部分资金，在高佃村西建起了“串窑”，县里成立了制砖社。不久，魏各庄也建起了制砖社。后来又经通专和保定有关部门批准，买了30辆马车，成立起了马车运输队，同时还在长辛店设立了10人的供销小组，给装甲部队运送砖、白灰、沙子等建筑材。在满足装甲，部队需要以后，还把生产出来的建筑材料销往武汉等地。后来，用挣来的钱为联合社买了2部汽车，为铁业社买了5部车床和压力机等。

1957年，良乡、琉璃河的铁业社、缝纫社、制鞋社以及晓幼营制灰社等都转为合作化工厂，退还了股金。1958年5月，房山、良乡两县合并时，良乡地区的集体企业达二十五个，固定资产1万元，总产值68.4万元，良乡县手工业合作化工厂的扩大与发展，为合并后的房山县工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房山文史资料》第16辑）

作者白玉系原区老干部局良乡活动中心副主任

## 房山木业社的创建与发展

张广文

五十年代初期,为了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经济,从农村到城市都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农村成立互助组、农业社(初级社)。城镇地区的手艺人也在政府的号召下组织成立有各种行业特色的合作社。当时政府负责这项领导工作的是手工业联社,房山附近成立了铁业社、马车社、皮麻社、背包社、服装社等,房山木业社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成立的。

房山木业社的组织者和创始人是房山东关的木匠张振忠(1912—1994),他当时40多岁,从师于东关耿家,为人正直义气,手艺又好,在同行中有一定的威望。解放前夕因为不愿意为国民党保安队干活而被没收了全套工具,曾发誓不再当木匠。解放以后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土改、镇反、扫盲学习等活动。领导的农村互助组曾获得模范互助组称号。政府号召搞手工业合作社,张振忠积极响应,重新置办了木工工具,联络了耿瑞、耿祥、耿士明、耿士清、苏士言、张宗旺、史景荣、史惠明、王再五、刘舫、韩志文等16人,于年底成立了房山木业社。后来手工业联社又陆续派来侯兰兴、陈苗、王华轩当会计。利用房山南街路东恒泰隆杂货店旧址,前店后厂成立了房山县木业社。木业社由理事会、监事会管理。理事会主任和会计由手工业联社任命委派,算是干部身份,理事会负责经营和生产组织工作,主任是张振忠。监事会主要是监督工作,有职工代表会性质,监事会主任是韩志文。

木业社成立之初,既缺资金,又缺业务门路。但职工们认定共产党号召搞合作社不会错,坚持艰苦创业不动摇。张振忠身为领头人,首先把自家准备盖房的木料全部拉来当底垫,从自家拿来烟茶招待联系业务的客人。职工们自带工具、自带干粮,每天按时上班干活。成立之初四个月没发一分工钱(当然也没有劳保福利工作服之类)。有时出去揽活给不了钱,顾主就用老玉米顶替。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木业社的生产经营逐步走上了正轨,职工们开始发套袖、手套、围裙,吃饭有了饭厅,计件工资每月也能开到五、六十元。1955年底,经过考察和培养,张振忠在手工业联社副主任郑玉山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着1956年全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形势,木业社一下于扩大到30多人,同时也建立了基层党组织。

房山木业社经过不断发展,到了1958年“大跃进”时期,原有的场地已经不适应生产发展需要了。又随着房山、良乡两县合并,由河北省划归北京市,良乡木业社也归房山木业社统一领导(1960年前后两社又分开),厂址就迁到顾册村北供销社背后原李家当铺院内。最多时有职工80多人,并逐步添置了一些小型生产机械,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这些机械有手压刨、凿眼机、圆盘锯等。生产规模也随之扩大,几个车间开始进行流水作业。当时主要是生产木床、二屉桌、三屉桌、碗柜、衣箱、椅子、木凳、床板、包装箱等,还生产一些木制农具。为了节约木材充分利用下脚料,还引进设备生产过锯末刨花板,但因为工艺不过关,质量低而成本高,生产一段时间就停止了。

顾册时期是房山木业社的一段辉煌时期,获得过不少表彰,当时是房山唯一一家享受计划内指标木材的规模最大的集体企业。产品品种虽然不多,但由于一直担负供应县直各机关单位办公家具和一些民用家具,产品常常是供不应求,不少家属都到社里去当临时工。由于生产能力和生产工艺水平不断提高,木业社还能够到内蒙古包头等外省市去承包大宗的木器加工生意。

随着生产形势一天天好转，职工的劳保福利得到了进一步改善，工人们能够领到工作服，并能报销医药费，离家远的职工也有了宿舍。在经济效益逐步提高的同时，木业社领导根据职工大多数只是扫盲文化水平，跟不上生产经营发展和设备技术发展形势的需要，决定成立业余文化补习学校。提高中青年职工的文化水平，当时房山中学领导十分支持这项工作，挑选了两个在校的高中学生每周一、三、五来给职工们上课。课本是专门供业余文化补习用的课本，相当于小学三年级到五年级的水平。所教课程主要是算术和语文两门课。算术由家住顾册村的石蔼茹教课(石蔼茹大学毕业后任青岛大学教授)，语文由家住房山东关的张广文教课(张广文大学毕业后成为高级工程师)。职工们利用下班时间一、三、五中课，每天两节课，一节语文，一节算术。

职工们深知文化水平低的难处，都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放下家里的事情，不顾一天干活的劳累，不分寒冬酷暑坚持上课，认真听讲和做作业。经过 1959 年一年的学习，大家文化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写信看信和简单的会议记录、报告总结也能应付了。一些聪明好学又有些文化基础的职工在用料计算和生产成本核算方面更是有了明显的进步。

经过三年困难时期，房山木业社也进行了调整，有 20 多名职工下放回家或调到其他单位工作。1962 年木业社又从顾册搬迁到房册南关棉织厂家属院内(房疏路和京周路交叉的三角地院内)，1966 年更名为房山木器厂，归属房山县工业局。后来，生产规模又逐步扩大，机械设备进一步增加，人员又达到 80 多人，1973 年随着生产发展，成立了锯木车间，安装了现代化的带锯，厂址也由南关迁到北关路西现外贸公司院内。开始生产比较新式的“一头沉”(写字台)、写字台、文件柜、衣橱、大衣柜等。全厂职工最多时达到 110 多人(其中党员 14 人)。当时的厂支部书记是杜生义，厂长是梁文泉，副厂长有张振忠、芦克勤，政工员是荣亮。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加快，木器市场开始有了竞争。房山木器厂工人普遍文化水平低，多数是木匠出身的领导班子成员，管理水平有限，经济效益开始下滑，直至出现经营亏损。厂里工人开始思想波动。相比较，良乡木器厂却有了较快的发展。为了扭转亏损和规模经营，1979 年房山县工业局决定撤销房山木器厂，领导班子与良乡合并，职工中有 30 多人合并到良乡木器厂上班，房山木业社——房山木器厂的创业发展历史也划上了句号。

本文写作过程中由老职工耿士明、老会计陈喆、原政工员荣亮提供了很多历史情况，特此表示谢意。

(《房山文史资料》第 16 辑)

作者系原区规划局高级工程师

## 房山地区棉花的生产与购销

王绍清

### 种植

棉花是农村广泛栽培的传统经济作物。房山栽棉始于明代。据史料载：黄河流域原始社会晚期出土文物中就发现有麻布，燕地植麻可上溯至周初，先民们用麻纺绳织布。汉至隋唐，丝织业兴起，其产量微薄，大

部用于宫廷官府、豪门贵族、工商大贾、富户之家。明代中期,民间普遍穿着布衣,替代麻布,因此,棉花种植日广。民国年间,官方为发展棉田,曾采取多项措施,但发展十分缓慢。1936年《河北省棉田报告书》称,房山县植棉占农作物4.64%;良乡县占4.93%。品种为“益农一号”,此棉质劣、绒短、产量低。“七七事变”后,日军于1938年确定良乡为河北省新民实验县。为掠夺棉花,在黄辛庄设有种籽繁育厂,引进美国棉种,1940年改植“斯字一号”。1947年国民党房山县合作社经理亲赴北平合作金库、天津合作银行索取棉花贷款,未得到实效,两县棉田均在一万多亩左右,发展受到限制。

建国前、京津、沪,三大城市解放,为支援城市工业建设,中共房山县委接分区指示,要求完成一万亩植棉任务,县委从党政各部门抽调50多人(其中警卫队17人)组成工作队,并提出“要发家,种棉花”的口号,分赴一、三、四、五区,与群众一起担水点播棉花,四区(今周口店地区)出动4541名妇女;植棉1007亩,全县完成1568.7亩。良乡县委派生产推进社负责人,腰揣边币赴石家庄地区购进棉籽6万斤,分配给各区。

新中国成立后,棉花生产得到迅速发展。房良两县供销合作社通过商品流通领域,对棉花生产进行引导,本着“发展生产、扶植生产、并参与棉花生产全过程”的方针,从种植、管理至采摘、交售、为棉农提供系列化服务。1952年大量引进“密字103”优种,棉田扩大到27.583亩,总产达到1161000斤。七十年代化纤产品日增、棉田遂转衰退,1979年中共北京市委决定,不再提倡种植商品棉,利用棉田种植其它经济作物。八十年代中期棉花在全区停种。

### 收购

封建社会,乡间以笨拙的人工弹花,手摇纺线,木机织布,多为自用。虽有些用于集市交换,但基本停留在小生产者之间的粮棉调济。元代采取减免商税,鼓励发展商业的政策,运河畅通,促进南北地区间贸易逐渐发达,棉花有较长距离的运输,开始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棉商品流通。明代由于实行轻赋休民政策,生产迅速恢复发展,手工业作坊接踵而起。弹花、纺线、织布、染布工艺有了进展。京师还在前门附近修建“廊房”,招商居货,店铺林立。随着商业的发达,货栈、集市的兴起,棉花行业相继出现。

十九世纪末期,沿海一些大城市建起纱厂,机械纺织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棉花商业的发展。由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垄断,棉商操纵、官卡刁难,造成棉花购销不畅。德人SUHR氏,曾有一自生产之手到消费者之手的棉花生产、销售图解。其程序如下,即“棉农→花行→大花行→纱商→织布商→染布商→缝衣商→售衣商→消费者”,共九个阶段,层层受到商人剥削。河北及房良地区棉花大多控制在棉店或兼营棉花业务的商号,春播时以低息贷款,付给棉农,秋季廉价收购。房山自古有“耕而不桑”之习俗,织布者甚少。棉商将收购的棉花打包,运往天津,到津后,首先通知中栈房,报关交牙税,经牙税局核准数字,检验局发证入栈库,方可销售。房山农民穿衣,依赖津、保、任邱、高阳商贾贩运,美观细纹的过江布(产于浙江萧山一代)价格昂贵。民间有句谚语:“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新中国成立时,面临严重的经济和财政困难,1949年全国棉产量仅44.4万吨,远远不能维持纱厂和市场需求。加之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封锁,长期依赖进口棉花的城市,供应更为紧张。上海纱厂每周只能开工三昼夜。1949年10月中旬,上海发生物价大波动时,棉花价格不稳是重要原因之一,这种情况,严重威胁人民生活和人民政权的巩固。陈云在第二次全国财经会议指出:“(要保证)人心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是纱布”。并提出要组织由中央直接领导的花纱布公司。

房良两县遵照河北省委指示先后建立了花纱布专业公司,初步形成以国营经济领导的花纱布批发领域。但在农村原棉收购上仍由国营、合作社、私商三家收购。1951年春,两县供销社接受国家委托,派出工作组,采取先付给棉农8%定金,供应化肥的方法进行预购棉花。房山供销社与二个农业生产合作社,722

个互助组，签订 724 件合同；良乡供销合作社与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945 个互助组，签订 946 件合同。

房山历年棉花播种产量收购量

项目 年度	播种面积 (亩)	总产量 (万斤)	收购量 (万斤)	项目 年度	播种面积 (亩)	总产量 (万斤)	收购量 (万斤)
1949 年	12182	27.3		1965 年	20536	116.3	97
1950	28959	30.2	6.7	1966	20454	115.2	88.9
1951	29072	72.3	17.3	1967	19744	86.4	47.3
1952	27583	116.1	29.8	1968	23980	130	99
1953	11922	41	77.3	1969	22648	62.1	32
1954	28749	79.7	23.7	1970	23001	191.2	143
1955	22309	98.5	84.1	1971	28945	242.6	211
1956	23622	46.8	29.2	1972	30015	159.1	138
1957	14305	55.3	46	1973	20921	232.7	198
1958	20772	84.1	69.9	1974	29967	246.1	199
1959	14956	66.5	45.3	1975	29984	207.2	156
1960	9613	43.5		1976	29613	78.4	34
1961	9514	28.6	15.9	1977	20082	100.2	85.9
1962	13073	53.3	33	1978	20184	49.6	38.9
1963	15109	61.8	63.3	1979	3755	16.7	
1964	20007	111.5	115.4	1980	3557	18.5	

翌年 12 月 24 日，毛泽东主席批示从 1952 年起“棉花应全部委托合作社收购。由三个头改为合作社一个头，已为毫无疑义”。两县供销合作总社为按时完成国家委托的收棉任务，成立了原棉经理部；下设收棉站四处，设有经济警察，持枪守护。1953 年，一些棉商为争夺棉花市场，在农村抢收棉花，囤积居奇。一些农民待价惜售，使全国纱厂一度停产。加之当年棉花减产，收购量大减，供求矛盾十分突出。为解决这一矛盾，1954 年 9 月 14 日，政务院公布了《关于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命令》规定，农民将所产棉花按国家规定的收购价格，除交纳农业税和必要的自用外，全部卖给国家。私营棉花商贩，一律不准经营籽棉、皮棉的贩运业务，私营籽棉加工业，统由供销社委托加工，不准自购加工自销，供销社及时供应人民需要的絮棉和手工纺织用棉。各级人民政府加强市场管理，对违犯和破坏棉花计划收购的投机分子、依法惩处。实行统购以后，国家有效地控制了棉花资源，在国民经济稳步发展的形势下，1955 年房良两县收购棉花 84.1 万斤，是棉花收购第一次大发展。

1958 年以后。国民经济出现三年的严重困难。当时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农民对经济作物种植积极性不高。1961 年北京市人民委员会遵照中央指示，对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采取了奖售措施。多收购一百斤皮棉，奖售粮食 35 斤、布票 5 尺。以后又规定，除奖售粮食外，再奖售化肥 50 斤、布票 10 尺。

经过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充实、提高”的方针后，粮食问题有所改善，而棉花问题越来越突出。发展棉花生产，解决衣着问题，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1962 年 11 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周恩来、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等中央领导等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各级领导把棉花工作当成一件大事来抓

来,想方设法把棉花搞上去。同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象抓粮食一样,把棉花生产和收购狠狠抓起来。国务院成立了由李先念领导的棉花办公室(机构设在全国总社)。房山县人民委员会召开了公社主管财贸书记、基层商店经理等有关部门领导会议,贯彻中央及市委对棉花生产和收购的指示精神。扩大了棉田种植,1963年比1961年棉田增加5000多亩。1964年皮棉收购量达115.4万斤,是房山棉花收购第二次大发展。1971年皮棉收购量达211万斤,创历史最高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务院作出了调整棉价的重大决策,极大调动棉农的生产积极性,使生产迅速发展,收购量不断扩大。1983年结束了中国进口棉花的历史,而转向出口。1985年国务院决定改棉花统购为合同定购。定购以外的棉花允许棉农自销。为鼓励农民多生产、多销售棉花,实行超额加价政策,对超购加价款,不打入棉花成本,由国家支付,1979年至1985年,国家支付的加价总金额达145亿元。1985年化纤产品大降价。棉布销量减少,在这种新形势下,对棉花收购进行重大改革,把实行三十多年的统一分配制度改为有计划的选购,纱厂可直接到棉产区和棉麻公司选购,取消了纺织和棉花经营环节。房山供销合作社所属棉站及轧花厂陆续转营。

### 检验

棉花检验不仅是统一棉花标准,提高棉花质量的不可缺少24的技术手段,而且对落实按质论价的价格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民国初年,棉花检验没有统一标准,当时的棉花贸易习惯以产地命名定价。“七七”事变前部分省颁布棉花检验办法。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不断努力,逐步建立了一些检验制度。1950年,第一次全国棉花检验工作会议制定了棉花分类别、品级、长度、水份、杂质正个项目的检验规程和全国性品级实物标准样。从此,城乡棉花产销市场基本执行这个检验标准,并明确要求公私棉业采取统一的检验打法,以肃清掺假作伪的弊病。1956年,实行棉花(皮棉)品级检验暂行办法。棉花分粗绒、细绒两大类制定了品级标准,合作化以后,农业合作社统一采摘和交售棉花,房良两县各农棉站采取专业检验与群众检验相结合的办法。统一目光、统一技术、达到正确掌握棉价标准。1956年制定的棉花标准,对提高棉花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分级过细、长度采用英制,执行起来很不方便。1966年,国务院成立了棉花标准改革办公室。经过六年试点,1972年,制定新的棉花标准。新标准将棉花分为七个级,以三级为标准。长度以2毫米为单位,分六个档次,以27毫米为标准长度,还规定了含水杂质标准,超过或不足标准的,实行扣补,这个新标准,基本适合中国国情,受到农民和棉花检验技术人员的欢迎。

### 销售

棉花是国家重要物资,实行调整供应,计划管理。1950年国家缺少周转棉,基本是逐收逐用,棉花统购以后,国家掌握了棉源,而进行需求平衡,对纺织棉、絮棉、军用棉、医药用棉,以及省市用棉统一安排。民用絮棉由供销社负责,供应对象主要是非产棉区和城市工矿区的居民。1950年至1959年,絮棉供应 unlimited。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为保证人民群众御寒用棉最低需要,1960年2月19日,本市停止供应零售民用絮棉。新的供应方法是:对婚丧、生育用棉凭街道办事处或人民公社介绍信掌握供应;对国际友人,归国华侨及机关团体特需用布一律由机关团体和接待机关开具介绍信,经市农产品经营处审核供应。1963年,北京市商业局通知,可凭侨汇布票供应絮棉、每七尺侨汇布票供应絮棉一斤。1969年11月20日,干部职工、知青、及城镇居民疏散人口,补助絮棉二斤。1983年12月1日,国务院批准,从1984年不发布票,本市

取消棉布凭布票，絮棉凭棉票(证)销售办法。

在价格政策上，絮棉的零售价格从五十年代以后长期没有变动，由于棉花收购价格几次提高，形成购销倒挂，造成政策性亏损。1979年至1980年，两次提高棉花收购价格，对提高价格部分，分别由省财政和中央财政给予定额补贴，平均每担絮棉补贴24元。由于定额补贴过低，棉花经营部门仍承担部分政策亏损。1979年到1983年，国家财政给纺织和絮棉的补贴总额达66.7亿元。1983年为改善城乡居民衣絮用棉，国务院从国家储备拨出50万吨优质棉，以优惠价格供应。税务部门免税、供销合作社保本，消费者实际得到的优惠约15亿多元。

房山区供销合作社认真执行中央、省市有关棉花收购和销售政策，专业干部兢兢业业，历经三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完成国家赋予的光荣使命。

(《房山文史资料》第16辑)

## 人民英雄纪念碑采石略记

张玉泉

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52年8月1日动工兴建，1958年4月竣工，5月1日举行揭幕典礼。纪念碑底部的双层栏杆石料和上面的浮雕所用的汉白玉石料，全部是当年的房山县石窝石雕生产合作社提供的，当年的一些采石人依然记得开采的过程。

1951年，国务院纪念碑建设筹备组的科技人员沈进林、陈金录来到房山县高庄村西石头山上大约用了两三个月时间进行勘测、制图。1954年初春，纪念碑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彭真派当时的国家粮食局局长贾国清任石料组指挥，率沈进林、陈金录及几位转业军人住在高庄村村民高继福家，指挥选料、起石。起石工人都是当时大石窝采石厂的工人。当时在高庄村村北同时开了四个塘口，每个塘口五十多人，后来刚要见面不知何故停止了。1956年，重新组织开工，四个塘口上了二百多人，分成几个组进行施工。挖了二十多米深，开口二、

1956年9月，河北省房山县石窝石料生产合作社在首都纪念碑皇  
史成雕刻石料全体社员合影 (张玉泉 提供)

三百平方米。后来实行三班倒，昼夜进行施工。

份量轻的石料拴上绳子，用人抬，份量太重的就用绞磨机一点点地往上拉，起上来的石头最大块的有三十多吨。由于当时没有先进设备，一切全靠手工干，劳动强度非常大。

天有不测风云。四个塘口进到三十米左右的时候，一天夜里，突然下了一场大暴雨。塘里都灌满了水，尤其是紧靠村边的第一个塘口因面积大、位置低，灌的水最多，足有两、三万立方。

那时没有抽水机，只能靠人工淘水，于是迅速集中了七、八十人用木头桶往上挑水，为了调动大伙儿的积极性，实行多劳多得，每挑一挑儿水，给二分钱，当天兑现，有的人最多时一天能挣两块四毛钱。

这样挑了两天，大部分人膀子肿了，也干不动了。指挥部又重新部署，让工人们从坑上到坑下排成三队，一桶一桶往上传，中间的上队传空桶。干了不到两天，大部分人的手都磨出了血泡。

后来又在二十五米高的斜坡上，每隔一米半挖一个坑，一坑一坑地往上掏，每一个小时轮换一班人；掏了两天，还剩半坑水。后来现场指挥找来水轧子，进度才明显加快。

干了六、七天，眼看水快淘干了，可老天好像特意做对，又下一夜大雨，各塘口又成了满满当当的大水塘。当工人们踏着泥泞的路来到工地上，见到此景时，心一下子凉到了底儿，眼巴巴看着出不了石头，心里干着急。

怎么办?水不及时排净，将不能按期供料，影响纪念碑建设进度，责任重大咧!指挥部召开紧急会，研究对策。最后，由副指挥(大石窝石料生产合作社主任)周桂存到国家工业局借来一台柴油抽水机，安装后效果显著，一号塘口只用了半天就抽出半坑水。后来，又从天津等地找来了六台抽水机和三台卷扬机。

那时只要有建设纪念碑总指挥部的条子，到哪儿都得到大力支援。

经过开采工人們的拼搏，到1956年夏季，四个塘口中，已有两个塘口部出了汉白玉，最大有一、二十吨的。

当时的运输也存在很大困难。从坑塘到半壁店公路上有8华里，只能走马车，大卡车根本上不来。而十来吨以上的石料，马车又运不动，当时只能前头用绞磨绞，后边用撬棍往前滑，速度相当慢。记得一块十八吨的料，用了一个星期才绞到公路边上装上汽车，而当时仅有的一、二辆汽车，还经常不能及时赶到。

完成了采石任务已到初冬。指挥部又从石窝村抽调二、三十个雕刻艺人，由刘永荣(当时的北京市人大代表)和刘树堂带队参加了纪念碑的浮雕雕刻和栏杆、栏板的制作、安装工作。

大石窝石料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全部由建设工程指挥部管理，工地上最多时达三百多人，由石窝、高庄、新庄三个村的石匠、壮工组成。到了1957年末，高庄村西第一塘口(最大)就给合作社挣了四十多万元。年底召开的庆功会上，每个工人按工资比例发了一部分奖金。其余的用于采石加工厂投资，建设厂房、购设机械设备。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修建凝聚了房山人民的心血和智慧。如今，参加过建设纪念碑的大石窝人，每逢来到天安门广场，站在高耸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仍然十分激动。

(《房山文史资料》第16辑)

## 参加修建密云水库的回忆

李希贤

“大跃进”时期的1958年，我才19岁，有幸参加了密云水库的修建。当时，我在周口店区支部秘书

科文印室工作，两年间火热的工地生活，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密云水库在密云县城东北约40华里，设计总库容为41亿立方米，相当于100个昆明湖或60个十三陵水库那么大。它是借密云东北部的燕山山脉将潮白河的水拦蓄起来。白河主坝建在溪翁庄，坝高66米，长110米；潮河主坝建在碱厂，坝高56米，长960米，除这两条主坝外还有九松山、北白岩、走马庄等10多条副坝，高度都在30米以上；还有一座溢洪道和两个小型水力发电站等建筑物。动用的土石方总量如果全部装上火车皮，可达23000公里长。在两座主坝的上游（即迎水面）还要分别修建防渗设施。白河主坝下的地质情况不好，采用了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施工方法——水泥帷幕灌浆。即用钻孔机在坝前打出垂直钻孔，然后灌入水泥灰浆，待水泥浆渗入到地下风化岩石的缝隙后，便形成了一道帷幕，这样就起到了挡水、防止渗漏的作用。这种工艺施工简单，工程量小，造价也比较低廉。潮河主坝则与此不同，由于该坝地下地质情况较好，采取由坝基向下开挖一条十几米深的防渗槽，并在槽中央筑起一条两米高的水泥防渗墙，再将防渗槽连同防渗墙一起用粘土回填，一直由坝基逐渐缩小回填至坝顶，这个粘土斜墙就在砂、砾料中被包裹起来，这样就在这座砂、砾料坝中，由下到上形成一道坚固的防水屏障，起到了防止渗漏的作用。密云水库当时在中国，特别是在华北地区是最大的人工湖，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到目前，大约也只有长江的三峡和黄河上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能超过它。

修建密云水库原计划要调集30多万人参加，后来减少到22万。民工们都是北京市各区县和河北省两地的农民，这么大的队伍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调集完毕。1958年9月初，我跟随着“房山支队”来到了目的地——潮河工地。

民工到工地后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吃住伤病治疗等实际问题，民工们的困难很快都被水库党委和北京市委、河北省委解决了。

“房山支队”（即周口店区支队）民工将近万人。按公社划分，下设七个团。支队政委是胡汉文，副政委是魏有忠，支队长是吕镒，副支队长是张镇。支队部设在距潮河主坝几里地的北碱厂标，七个团则分别驻在碱厂村的周围。支队部虽是水库工地的建制，但也带有机关性质，共有七个科室还有一个修配厂。我每天的具体工作是负责刻印表格，抄写为领导准备的讲话稿；负责油印每天出版的一份工地小报，同时负责文件的下发。这些工作虽然简单，但工作量比较大，经常有几件事赶在一起，就要加班加点，但我们没有过抱怨，和打字员胡振芳配合的也很好。

除此以外，我还附带负责工地上的一项“大”任务，就是每逢重大节日和家乡慰问团来工地时都要在生活区做一些宣传准备工作，书写一些大标语烘托气氛。

1959年夏末的一天，快接近中午时，支队领导突然通知我立即去工地，任务是写一条“毛主席万岁”的标语。要一领席一个字，越快越好。我听了这个任务，不禁心中一动，什么话也没说赶紧去了工地。大约一个多小时就写完了，几个人立即将标语摆放到潮河主坝南坝头的山坡上。当我们返回到现场指挥部时，一位支队领导过来对我们说，老人家不上这儿来了！我心中一热，果然被我猜中，真是毛主席要来呀。但遗憾的是据说他老人家由白河主坝乘船，在库区下水后，计划游到潮河主坝，但后来游到九松山副坝就上岸了。潮河工地各支队的政委们在九松山工地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其中也有我们周口店支队的政委胡汉文，第二天，密云水库报和全国各大报纸的头条显著位置都刊登了毛主席视察密云水库工地和畅游水库的消息，并配发了大幅照片，水库民工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在水库工地的两年中，支队领导曾多次号召全体支队干部们参加第一线劳动到下边去锻炼，与民工们同甘共苦。劳动是愉快的，而重要的是参加劳动亲临第一线更体会到了“移山倒海”的壮观场面。

到工地除去劳动之外，我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在劳动间隙写广播稿，表扬好人好事。在这1000多米长仅几百米宽的工作面上，一个班就有两、三万人在劳动，后来有时高达五、六万人。真是人山人海，人如潮，

车如流，红旗招展，热火朝天。广播喇叭播放着鼓劲的乐曲，只要有人吼上一嗓子，立刻就会形成一个劳动的小高潮。吃饭也不下火线，夜里灯火通明，照明灯、探照灯把整个工地照得如同白昼，可以说用什么语言来形容它都不会过分。

当我工作不忙时，领导还让我去工地参加宣传队的活动。工地上的宣传队就是鼓动队，队员只有几个人，有几面红旗，一套锣鼓，一个铁筒喇叭。宣传队进入工地后选择一个合适的地形，如一个道口或是一个散料区，插上彩旗敲起锣鼓，开展火线鼓动。只要宣传队在哪里出现，哪里的工作面就会一片欢腾，现场便立即出现一个劳动的小高潮。有时宣传队还组织几个突击队搞一个短时间的小型劳动竞赛，对优胜者宣传队当场给戴上大红花或者发给一张奖状。奖状是由支队组宣科的支国华手绘的。各连队和突击队的队员们都非常喜欢这种奖状，都以能获得这样一张奖励为荣，他们把多次获得的奖状贴在工棚内既美化了环境又鼓舞了斗志。

早在密云水库开工不久，我们就曾听说要在白河的上游，也就是在燕山山脉的深处还要修建一座水力发电站。这是对潮白河综合利用，阶梯开发的一个重要工程。没等密云水库修完，水库指挥部调集了上万民工投入了这一工程，其中就有房山支队的数千名民工组成的青石岭水电站周口店支队，我也受命前往。

1959年11月的一天，支队部男女数十人分乘十辆一卡车，拉着办公用品和生活必需品浩浩荡荡地登上了去青石岭的崎岖路程。开车时是早上五点钟，天上还是满天星斗，历尽重重危险直到下午才到达目的地。其实我们的潮河驻地距青石岭也就是百八十里地，但当时还没有直通的路，所以我们只好绕道怀柔才到达了目的地。

到青石岭时，工棚还没搭好。支队部设在四合堂村，这是个密云深山区的大村。我住在一位姓张的老师家中。

四合堂村因为地处深山区，交通闭塞，生活条件很差，距怀柔和密云都有二、三百里。刚来这里时，支队有很多具体事情，特别是在生活方面，要与在潮河的支队部联系。那时的通讯设备比较落后，有台普通电话就很不错了。而电话线路都是工人们翻山越岭架设的，线音的干扰非常大，通话时非常困难。领导把与潮河支队部联系的任务交给我，我就经常在半夜爬在被窝里蒙上头与潮河那边联系，弄得满身大汗嗓子都喊哑了，只有这样才能不影响别人休息，对方才能听的清楚。

大约在村里住了一个多月，我们就搬到了新建的支队部内。支队部建在与这个村同是一条山沟里的南坡下的一块平地上，地势比较高，约有一亩多地的面积，在这块平地上建起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四合院”，院内的办公室，都是用竹杆、席子搭起的工棚，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进到室内感觉很好，既宽敞明亮又干净卫生，还有生活用电。在这深山里的山沟中，由于地势狭窄形成的小气候，虽是塞外，但冬天并不很冷，夏天也不太热。

青石岭水电站按原来的设计是当时全国最高的一座砼薄拱坝，排在世界的第四位。它的主要功能是发电，装机容量为13万千瓦，建成后对北京市的高峰用电将起重要的缓解作用。对我来说参加青石岭电站的修建不仅开阔了眼界，而且还增长了知识。青石岭工程不同于密云水库工程，如果说密云水库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水墨写意画，展现给我们的是粗犷豪放、气势磅礴的大气；而青石岭工程则是一幅画工精美的工笔画，给人的印象是深沉而凝重，令人遐想。密云水库是聚砂成坝靠人海战术；青石岭则以精兵为主向岩石开战。在这里看不见人山人海，看不见汽车、火车隆隆，有的都是高高的脚手架和数条上千米长、宛若黑色长龙的皮带运输机，长龙由搅拌站一直延伸到坝身现场。在导流廊道的开挖工程中，突击队员们两人一组，一人扶钎，一人抡锤，数万人打成一个点儿，引得山川共鸣，给人一种地动山摇的感觉。

导流廊道完成后，又在大坝基坑的上游筑起一道围堰，让白河水按照人们的意志乖乖地流进廊道。然后便在围堰内进行大坝基础的清理和开挖。

1960年7月，房山支队接到通知，要求我们撤出青石岭工地。

我们撤回潮河干什么？这里的工程怎么办？谁来接着干？这些都来不及思考，也没有得到肯定答复。几年以后才得知，当时正是中苏关系破裂的转折时期，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图纸，迫使青石岭工程下了马，青石岭小电站就此夭折。想起来实在是太可惜了，不仅浪费了国家的巨大财力物力，还牺牲了我们

一些好同志，浪费了无数工程建设者倾注的无限期望与感情。

1960年8月6日，我们周口店支队的数千人马撤出了青石岭工地，又来到了潮河大坝工地。此时的坝顶上的环湖公路已铺上了沥青，临水面也修上了防浪墙，台阶和坝顶的公路上每隔数十米就安装着一组美观漂亮的白色球形路灯。我们站在坝顶放眼向库区水面望去，此时正值太阳西下的将要落山之际，只见万倾碧波被一轮红日照得金光四射，霞光万道，真是壮美极了。我们为参加了这项举世瞩目的工程而深感自豪！

此后我们又在潮河住了两个多月。就在这火热的水库生活行将结束之前我被水库工地支队党委批准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我来水库整整两周年的那天，支队党委为我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这是我在长达两年的水库建设中机关支部举行的唯一一次入党宣誓大会，也是对我的水库生活的最好总结。当我站在庄严的党旗下举起右手的时候，脑海中不断映过了火热的水库生活场景，它能激励着我永远前进。10月3日我们带上下行装，告别了永远值得我们留恋的地方，回到了已阔别两年的家。至此，我便结束了在我一生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充满激情的水库工地生活。

（《房山文史资料》第16辑）

作者系原区劳动局干部

## 民国二十八年良乡地区的水灾

王绍清

民国二十八年(1939)阴历七月二十日起，北京地区大雨连绵，持续不断。二十五日，大雨仍然一夜未息。子时，佛尔门沟山洪暴涨，良乡西门守护士兵，见洪水到来，水位陡长，当即报告良乡城为保卫团警务局和日军驻良乡的深濑部队。因水势汹涌，愈长愈高，西北城墙被洪水冲破，直奔城内，时至深夜，民众正在酣睡，故鸣枪报警。一时城内哭声、喊声、风声、雨声、洪水声骤然大作，其景之惨，令人心悸。

这时良乡东门、北门已相继进水。因洪水来之凶猛，群众未来得及远逃，只好在各家房顶上、附近树上、高坡上躲避。

天明后，良乡城内房屋陆续倒塌，积水深丈余，呼救之声到处可闻。众多百姓无家可归，亦无柴无米做饭，一度造成恐慌。工商界及民众紧急向官方呼野立即采取赈灾措施。很快就组成了由良乡知事王虎忱为首的救灾委员会，开始救灾行动。同时指定县城文庙和小学男部为男收容所，小学女部为女收容所，灾民每日以稀粥度日。

良乡地区此次遭受洪水之灾比光绪十六年发生的那次水灾更大。据有关史料载：当时良乡四个行政区共辖85个村庄，均遭受不同程度的灾祸。共倒塌房屋21492间；因禾田淹没，农作物被害1017598亩；受灾人口达43000多人；死亡102人。其中良乡城内死亡2人，倒塌房屋647间；东关村死亡4人，倒塌房屋173间；农作物受害500亩；纸房、南关两村死亡男5人女6人，房屋倒塌912间，农作物被害2207亩；西北关村死亡男1人、女1人，倒塌房屋263间；大小马村死亡女孩2人，房屋倒塌213间，农作物受害

1258 亩；南洛村死亡男 1 人，房屋倒塌 500 余 1 间，农作物受害 2000 多亩；北白村死亡 66 人，房屋倒塌 500 多间，农作物受害 1870 亩；南召村房屋倒塌 1000 多间，死亡二男 9 人、女 1 人，农作物受害 7500 亩；祖村房屋倒塌 711 间，死亡 2 人；后石羊村死亡 2 人，农作物受害 4521 亩。

洪水过后，良乡地区因缺医少药，疫情严重。日伪政府束手无策。《新良乡月刊》水情报告载：“至于将来之善后办法，则来日方长，尚有赖于仁人君子之惠施义助者……，当时受灾的几万难民只好投亲靠友，背井离乡，自谋生活。

(《房山文史资料》第 16 辑)

## 岗上大队的骡马经

陈济生

编者按，《岗上大队的骡马经》原发表在 1964 年 1 月 14 日的《北京农民报》，作者陈济生当时在北京农校工作。1986 年 5 月 19 日作者(现在中国农业大学任教)将文章的剪报寄原房山县政协主席张本荣同志。作者在附信中说：“荣老，兹送上《吴春山的骡马经》一份，因当年不准突出个人，故用《岗上大队的骡马经》为题。”

吴春山同志是全国劳动模范，他在牲畜饲养和使用方面的经验尤为丰富。本着抢救珍贵史料的原则，我们将《岗上大队的骡马经》及原报的《编报人说》一并刊出，以飨读者。

编报人说：牲口队会喂，喂好就不容易。再说，要做到半年繁殖，多下小牲口，就更不容易了。可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你看，今天登的房山县岗上大队的“骡马经”就是一个证明。他们那里，抓住了四件宝：草料好，饲养好，使役好，繁殖好，使得牛马驴骡兴旺，农业生产得劲，还有牲畜支援兄弟队。他们的经验确实值得介绍。请大家细心地看一看吧。

崇各庄公社岗上大大队的大牲口养得好，这在房山县是远近闻名的。前些日子，我来到岗上村，所见所闻真是名不虚传。

岗上村的村边上有一个四合院，这个院里，现在喂养着六十二头大牲畜(其中骡子六头、马十二匹、驴四十四头)，头头臀肥膘满，其中有十一、二头毛茸茸的幼驹，更是欢蹦乱跳。过去几年他们卖出了一百四十七头大牲畜，如果和现有的大牲畜加在一起，共是二百多头，有谁能想到，在十一年前他们刚办社时，全村只有四十八头毛驴和一头骡子(以后才入社的)，1953 年又买了一头母畜，就在这个基础上，自力更生，自繁自养的发展起来。每当谈起这事，社员们都要提到大队党支部书记吴春山。大伙亲切地称呼他“老社长”。“老社长”对农业生产有经验，对饲养牲畜更有经验。社员们说：“老社长”有一本“骡马经”没有这本经，岗上的牲口就养不了这么多、这么壮。吴春山跟我讲了这本“骡马经”的大概，听了很受启发。我想把这本“经”的主要之点和我自己的一点感受，转告给那些长年累月与牲口打交道的饲养员和使役员们。

## 谈草料

饲养大牲畜用什么草料好，如何正确地看待草和料的关系，以及怎样合理安排草料的生产等问题，岗上大队的做法给人很深的启发。

一般有经验的饲养员都认为：“高粱长腿劲，黑豆长肉劲”。常说：“要想牲口喂得好，黑豆高粱不可少。”这话是有道理的，因为豆类含蛋白质丰富，蛋白质是牲口生长乳、肉、皮、毛不可少的物质，而含淀粉丰富的玉米，高粱、大麦等禾谷类饲料，正是牲口产生热能的源泉。还有人认为豆类是一种“香料”能促进牲口的食欲，这是因为豆类含有一种能提炼味精的“谷氨酸”，也是有道理的。据说，有的生产队喂牲口，是日喂五斤高粱、五斤黑豆，或者至少是“三(斤)麸三(斤)料八斤草”，牲口还经常爱闹个毛病呢！但是，在岗上大队却不这样认为，老社长说：“牲口不认爹和娘，但要草好料巧的肚肠”，优良的饲草是保证牲畜健康的重要条件。因为连年干旱，豆类欠收，最近三年来他们很少喂牲口豆类，他们喂的主要是玉米。春耕大忙时每头牲口一天平均才喂一斤粮食，冬闲减半，要是在七、八月间青草多的日子，光吃青草，不喂粮食，牲口照样长得膘肥体壮，很少闹病。这在那些认为非有大量精料喂不好牲口的人看来，是很难理解的。岗上大队的窍门在哪里呢？除了把精料用在刀刃上，即看膘、看个头、看活茬使用饲料外，还在于他们把饲草和饲料看得同等重要。不像有的地方把饲草看成是牲口“填肠壮肚”的辅助饲料，错误地认为只要有料，草的多少和好坏没关系。岗上大队是把草料紧密配合起来使用。每年这个大队都要种谷子五百多亩。种谷子，他们认为有三大好处。第一，谷草的营养取决于早秋收割的五花草，牲口吃了不爱上火；第二，谷子的产量不低；第三，谷子耐旱，又不拔地力，很适宜岗上大队的丘陵岗坡地种植。只要抓住全苗，每亩至少收二百多斤。而谷草的产量差不多是“一斤谷，二斤草”，这样算起来，五百亩谷子能收二十五万斤谷草，日食草量以“驴八(斤)、骡十二(斤)、马十五(斤)”，平均每头日食草量十斤计算，就足够六十头牲口吃上四百多天了。他们每年还要种上一百五十亩花生和近百亩的豆子，花生秧和豆秸都是牲口的好饲草。老社长说：“谷草好比大米饭，豆秸有如荤菜汤。”把谷草和豆秸，花生秧掺合起来喂，牲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壮。他们几乎是年年如此，一到入冬以后，就开始用两成豆秸或晒得青绿带叶的花生秧，拌在那谷草里喂牲口。入伏后，雨多、天热、草长，除了在山坡草地放牧以外，还专有五、六个人给牲口割青草，“不到白露，誓不收兵。”老社长说得好：“抓割秋草要趁早，抓草尖别抓草根，狗热的搭拉舌头时你不着急，到鸡冷的缩了脖子时再抓草，人、畜不受罪才怪呢！”

## 谈饲养

老社长说：“书靠讲，地靠榜，牲口全靠人喂养。”有了丰富的草料，还要看你怎样喂哩，喂养牲口，既要有经验，又要负责任，这就必须有个好饲养员。老社长说：“牲口怕三换，换人、换口和换棚圈。饲养员不能常调换。”

岗上大队的六十二头牲口由两个饲养员饲养，据说最多喂到八十头呢。把这么多牲口照料好，不是件简单事儿。拿牲口喝水、吃草来说吧，里面就有很大学问。不分冬夏，饲养员永远是四点半钟在井台边的石槽旁饮头遍牲口，有的一伙一伙的放山来饮，有的两头两头的牵着饮。老社长说：渴死的马也不喝脏水。冬天不饮冻水，防止肚痛和流产，夏天不饮发臭的水，以免泻肚和肠炎。

每当社员下工时，饲养员们总要迎上去接住牲口，先遛上几步，牲口就会习惯地在地上滚上几滚，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土。老社长说，“牲口得病不得病，急吃暴饮头一宗，这个关口把得好，永辈不把恶病生。”又说，“牲口饱肚出，饿肚回，奔家心急，脚步快，毛孔开，若急着饮水，里热外寒，像暖瓶装冷水，还有个

不炸吗?轻的伤水起卧,重的闭汗炸肺。常言道:饮马三提缰,少病保健康。”还说:“先上槽,落落汗,歇歇火气,裹上一阵干草节,刷掉满嘴满肚的粘涎,再足饮饱吃,也不会得病。”根据他的经验证明:猛吃不嚼,裹住草料是得结症的根源。嘴里的粘沫把草料裹成一个大粘疙瘩,咽到肚里,堵在哪儿下不去,哪儿就得结症。“前结刨(地),后结摇(尾),中结往后瞧(肚)”,治晚了,牲口就有死的危险。“牲口歇个透,结症断了后”。这些经验老饲养员都记在心上。难怪,在牲口统统上槽后,细细咀嚼预先放在槽里的干草节,刷洗嘴里的粘沫的时候,老饲养员还要叨嗒上两锅儿旱烟,当牲口由疲惫急躁贪吃,渐渐安静下来时,老饲养员才去把它们放出来,足足地饮上一阵水以后,一遍又一遍地给牲口添干草。这就叫“牲口不离嚼,人不能离槽”。老饲养员总是在午夜后的两点钟准时起身,给牲口一遍遍地添草加料。老饲养员说:“马无疲草不肥。夜里安安静静地,牲口才能踏踏实实地吃草。惊马三天瘦啊!”他走到槽边,先把饲草倒进槽里,然后捋胳膊挽袖,往饲草上倒些水,用手掌平平地在槽底把草搓湿,再少撒上一层香喷喷的炒玉米面,诱着牲口多吃些草。他说:“这叫先扭后精,越吃越凶,热天吃拌草,牲口不上火,冷天换干草,牲口不肚寒。”

俗话说:“寸草铡三刀,没料也上膘。草细能顶三分料。”他们铡出来的草连个双节都不容易看见。他仍把这样的草叫“料瓣草”。老饲养员在添草前,总把槽里的剩草先筛一筛,把新添的草也筛个净。老社长说这是“石块泥土去个净,牲口不得肠胃病”。

有一次,我又和老饲养员闲扯起来。

“我们岗上的牲口,一年四季,老是这八、九成膘。大秋地里场院有的是粮食,也不能随便乱喂。好一顿,歹一阵,饥一顿,饱一顿,喂馋的牲口惯坏的儿,永辈甬打算把牲口养好。”

“牲口最有情义,喂熟了真是两不相舍哩!熟人来喂它,又是舔,又是闻。添上草,低着头一个劲儿吃。要是猛一换生人,它总是斜眼瞟着你,吃不安,歇不好。性情不好的,耳朵一翻,还要咬你刨你呢!”

“侍弄牲口不累人,就是缠磨人,急性慢性都不成,一年三百六十天,不论刮风下雨,老得一个劲儿。没有居家过日子的心,甬想把牲口喂好!”

### 谈使役

老社长说:“喂牲口容易,使牲口难。”使役不好,最容易把牲口累得五劳七伤,五劳就是:筋劳、骨劳、皮劳、气劳、血劳;七伤就是:寒伤、热伤、水伤、饥伤、饱伤、肥伤、走伤。牲口受了伤,生产就遭殃。使坏一头牲口,队里受损失生产受影响。

“慢拉勤歇巧装车,牲口永辈不受伤。”老社长经常用这样的话嘱咐车把式,特别是在春耕秋收的大忙季节。装车时,把式们都会摹仿着老社长的口吻说:“轻巧、轻巧,大车不放炮;路远无轻载,车是越拉越重。”大队还做了这样一项规定:给社里拉煤运石,装车一吨,不准超重,路远宁可起早贪黑,不准赶路疾驰。

老社长认为搞运输时,最需要注意牲口和大车的安全。对车把式要加强思想教育,让他们经常注意两条:一条是不要为了多拉多得,便拚命多装多拉;一条是不要随便给三亲六故捎东西带脚。免得牲口劳累过力,车辆也顶不住劲,弄得牲口车辆两损伤。

饲养员和使役员,一喂一使,两者必须密切配合,才能把牲口养好。老饲养员和车把式们双方从来没有互相推卸过自己的责任,他们互相督促,有问题当面说清。

岗上大队的牲口,甬说打背、长疮,就是碰破一点皮,或汗淋漓的劳累一点,卸草时连老饲养员这一关都过不去。谁家用队里的牲口,不论是拉磨套碾,或是车水,驮东西,谁要是虐待了牲口,连小学生看见,也会说上几句:“六毛驴钱(使一天毛驴交六角钱)不够本吧?你这不是破坏集体吗?”

## 谈繁殖

老饲养员常常摹仿着老社长的口气说，“牲口能顶半个家，耕、耩、驮、拉都靠它，一天没有它，就得抓了瞎。”他不但喂牲口有经验，繁殖牲口也很有办法。就拿办社初期老社长用自己得的奖金给社里买的那匹枣红马说吧。在他手里已下了八头马驹。他说：“马生马，驴生骡，这叫繁殖、提高一齐抓。每年三月以前驴配不上骡，就得抓紧配驴，不能叫牲口空怀！”他说这是老社长亲口传授给他的。我也不只一次地听老社长说：“村要富，农林牧。只有六畜兴旺，才能五谷丰登。”确实是这样，岗上大队有八十多头耕畜(包括耕牛)，每头平均才负担二十几亩耕地，是种是收，都没误过时令节气。

岗上大队坚持自繁自养的方针，具体作法是：卖公不卖母，卖壮不卖小，卖好不卖坏。他们年年都要出售一批牲口，既支援了兄弟社队，又增加了社员收入。有人说，老社长把牲口身上的“算盘打绝了”，他们的作法是“光使力气不使本钱”繁殖牲口。这个大队还规定了一个按饲养员、使役员、配种员以七、二、一比例分配的奖励制度。但是，重要的还是社员和老社长的关心，才使他们这样重视繁殖工作。几年来他们做到了“紧配、轻使、赶热窝”，牲口发情后连配几次，怀孕六个月以后单养轻使，十个月停止干活，产后十二天就抓热配。老饲养员说：“大伙不如小灶，单着喂好照顾。”仔畜出生六天后，开始补草，母畜要单独喂养一个月才合群。十年来，岗上大队的大牲口坚持自繁自养的方针，在精心饲养和使役下，就这样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地发展起来了。

## 结束语

老社长肚里的那本“骡马经”靠三头两月，一年半载是学不好的。回来的时候，我根据从老社长那里学到的一点儿，编成了一段“大牲口三字经”，以便于记忆，不妨写出来，供给郊区的饲养员和使役员们参考。

喂牲口，要细心；如绣花，似穿针。  
 牲口回，要看真；有毛病，追原因。  
 卸下套，滚滚身；先上槽，歇歇身。  
 急吃草，结症根；猛饮水，肚痛因。  
 清明后，天气暖；湿拌草，料面炒。  
 立冬后，大肠阴；煮玉米，换干草。  
 前半夜，先喂草；后半夜，再加料。  
 中午喂，料要少；上套前，先饮好。  
 大把草，小把料；添多了，吃不好。  
 料瓣草，喂到老；饲养员，要记牢。  
 使牲口，量力好；劳累伤，不得了。  
 打着跑，牲口倒；慢拉套，先吃饱。  
 多歇息，饮要巧；车超重，要检讨。  
 自繁殖，贯彻好；靠公社，靠领导。

(《房山文史资料》第1辑)

## 被困矿井的九天

赵润东

1974年11月2日,位于房山西南11公里黄山店煤矿井下突然崩水塌方,正在采煤作业的10名矿工,不幸被困在400多米深的矿井中。事故发生后,在原房山县委领导和有关部门紧急调集人力物力全力抢救下,11日晚七点钟,被困长达9天的王志、许大振、贾金海三人竟奇迹般地被抢救出来。此事转眼过去20多年了。这件事虽然已经成了历史,但当时的动人场面仍使人们不能忘怀。

1957年8月10日黄山店乡建成大湾子矿。为了巩固扩大集体企业,1974年决定开办东矿,派事业心强、经验丰富、分管工副业的副主任王志担任矿长兼党支部书记。当时,经济条件十分困难,开矿全靠人工开凿。没有路,也没有桥,交通不便。王志带领40余名矿工,每天早上背上干粮扛着窑木到东矿,人工打钎,石子铺路,一干就是一整天。

11月2日,王志安排好矿上工作便参加乡里建班子会议。会后,他赶紧来到矿上,准备下井查看。这天,上工11人。除一人因身体不好被王志安排在井口外面修路外,其余都在井下作业。当时,进深已经400多米,准备好一个通风孔。王志戴着帽斗、窑灯,穿着窑衣往下放。这时,井里传出口信说出事了。待王志来到井下一看,发现井水特大,顶部要“座轿”。他意识到事故马上就要发生,便立即安排身边三名矿工打两个洞,准备防洪用,并指挥他们马上疏散躲避。然而,就在这一刹那,只听一声霹雳,一股强大的气流把他推了上去。据王志回忆,“当时就觉得背上好像压着千斤的分量,让你动弹不得,两只耳朵里就像凿了木楔似的一阵生痛”。离他不远的王会一下被强烈的气流吹下去,死在井中。随后,忽的一声崩水了。水越来越流越大,没了身子。王志好不容易才挣扎着爬起来。他赶紧寻找其他人。后来在他2米多远的地方找到许大振、贾金海。三个人聚到一起,也弄不清东南西北。再生布工作服被煤泥浸透,像一块毛毯披在身上又沉又凉。王志手中始终攥着一条皮带、一杆钎和一把锤,一根荆子棍能砸火取亮。他让许、贾二人砸棍取火,自己劈柴。点了好久也点不着。没有办法,三人只好摸黑坐着。后来,王志摸到了窑灯,好不容易才把火点着。可是,没过多久,三人引起二氧化碳中毒,不知不觉就昏过去了。

井下冰冷潮湿,不知什么时候三人被冻醒过来。一商量,准备出去看看。于是,借着窑灯微弱的光亮,看见水还流着,漂着木头,石渣乱滚,十分吓人。找不着出路,上边还有塌方。他们只得又找到原来的地方,贾金海捞木头,许大振往上递,王志一根一根地支,两层横一层竖,防止被水冲走。贾、许二人冷了就互相趴在对方的脖子上哈哈气,暖和了再抱在一起。就这样,三个人靠井下的脏水、树皮充饥,再后来连身上的卷烟纸、棉花团都填进了肚里。

几天过去后,许大振一愁莫展,拿着三根导火线,准备一人一根结束生命。贾金海总是说以后家里孩子大人没法过。身为共产党员、支部书记的王志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井下工人,他反复做工作,把导火线系在腰间,给二人讲起三国故事,鼓励二人坚持下去。

当煤矿崩水塌方的消息传出后,县、乡政府马上行动起来。原中共房山县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孙海同带县委领导亲临现场,指挥抢险队昼夜挖掘。县委办公室昼夜值班,随时听电话报告情况,以备救援。年底11月份,气温很低,天上还下着小雨,但来自四面八方的解放军战士,各地赶来的干部群众,不怕死不怕苦,用锹铲,用手刨,轮番作战,表现出深厚的阶级情意。在矿井口上,还准备了10口棺材,随时准备收

敛遇难的矿工。结果，谁也没有想到，被困在井下9天时间竟有三人被奇迹般地抢救出来，这事很快轰动整个房山，又在京郊各地传为佳话。

如今，贾金海已经过世，许大振在乡政府上班，72岁的王志已退休。

（《房山文史资料》第10辑）